

◎林东源／著

坚守在荒寒之路 ——陈衍评传

陈衍，
清末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学者，
福州人，
他一生不愿当官，好交友、集会赋诗，
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供职，
致力于写诗与诗评，
耕耘于学界与教坛，
著有《石遗室诗话》、《元诗纪事》等，
为人刚直，
坚守在荒寒之路。

福建教育出版社



林东源 福州人，生于1949年。高中未毕业即赴农村插队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时圆了大学梦，毕业后从教至今。现任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法律系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及应用写作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编教材2部，参编教材4部。

里而下門隱數至天門又見凡五隱見正中
天門登山此路甚生望天門之近遠大小生
以甚異于初見者也之數隱見後木峰
晚有夢丈人諸峯瞰其上向所見一線瀑
門下三五五六松雲步橋從澗居從道之
左自雲步橋下至中天門澗居磴道止
右蓋東峯出水多小縣不數處至去壩
于雲步橋而為瀑布流出橋下別入一澗
此東水出歸于西者七自下天門下至
迴馬嶺澗又居磴道出大東諸峯之水

大山出陽自頂至尾有石而無土寸毛有松若梅

無他木石止處實生泉小者滴澹去者近瀉

凍赴諸峯之洞

之所獨也又山之奇以石為泉

泰山北雪獨者古

後之登道也余以辛亥六月十三日將源至秦

安城公家命

南天門

印

上見其

已下下有一條瀑布已潤而留其縣流

路

湖此夫

傳

而非泰山諸

評

著

守

寒

衍

東

堅

陳

◎



陈 衍 (1856~1937)

目 录

序	陈庆元	(1)
引言		(1)
第一章 早年家居(1856~1878)		(17)
第一节 “宝鼎香萦新柏翠,锦屏书映落梅红”		(17)
第二节 “修竹亭亭倚,黄花淡淡姿”		(29)
第三节 “犁然治《说文》,始一以终亥”		(35)
第二章 出游初期(1879~1890)		(39)
第一节 “九曲溪山我旧游,滯淫春雨幔亭舟”		(39)
第二节 “割席华与管”,“安得长相从”		(49)
第三节 “江湖满凫雁,强半稻粱谋”		(61)
第三章 上海八年(1890~1898)		(68)
第一节 “中年倦游畏鞍马,作健犹能止两鞞”		(68)
第二节 “我有元人本事诗,敏夫樊谢是吾师”		(83)
第三节 “嗜学如甘肉,醉心犹饮醇”		(89)
第四章 武汉十年(1898~1907)		(96)
第一节 “君已盟鸥江水湄,我原雁鹭在芦碕”		(96)
第二节 “何为一卷货殖传,手自编排兼补苴”		(121)
第三节 “从此长安真日远,出门惆怅大江横”		(128)

第五章 北京十年(1907~1916).....	(140)
第一节 “诗有萌芽意,人多磊诃形”	(140)
第二节 “临颖美人今不见,座中唯有薛华歌”	(160)
第六章 里居修志(1916~1930).....	(174)
第一节 “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	(174)
第二节 “横舍高楼壮海滨,重阳风日足清新”	(190)
第三节 “七旬百炼筋骸在,万里三分骨肉亲”	(198)
第四节 “芙蓉红白晓来天,此景依稀卅载前”	(230)
第七章 苏州晚岁(1931~1937).....	(237)
第一节 “诗人垂老到扬州,禅榻茶烟两鬓愁”	(237)
第二节 “一幅林山收晚景,数家茶肆息劳生”	(246)
第八章 诗歌与散文创作.....	(249)
第一节 “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清启盛唐”	(249)
第二节 “说子渊渊无尽藏,上薄风骚气独苍”	(252)
第三节 “千言排比铺张易,几字商量妥贴难”	(257)
第四节 “不务雕琢,平淡苍老”	(259)
第九章 《石遗室诗话》.....	(266)
第一节 “同光二三子,差与古淡会”	(268)
第二节 “雅人深致循良事,都被先生古锦收”	(273)
第三节 “歧而二之,即已误矣”	(278)
后记.....	(284)

序

陈庆元

已近岁末，盘点一年来写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年初写的《陈衍〈金门洪景星先生墓志铭〉书后》，发表在《炎黄纵横》第五期上。我见到的《金门洪景星先生墓志铭》，系洪景星的后人展示的墓志铭拓本。此文《石遗室文集》不载。也就是我在写那篇短文的同时，东源正在紧张地撰写《坚守在荒寒之路——陈衍评传》的书稿。

东源执教于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我认识东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源是“老三届”中的高中生，恢复高考后考上南平师范专科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即调到福建银行学校（后改为今名）。那时我也刚到福建师范大学工作不久。二十多年前的办学规模比现在小得多，学校少，招生数也少。福建师范大学当时办有夜大学，其中一个班是中文“专升本”的，入学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这个班的同学大多是七七或者七八级的专科毕业生。那两年招生、特别是七七级，“大龄”考生尽管成绩优异，本科院校往往不太愿意招收他们，不少“大龄”考生因此就落到专科院校。东源和他的许多同学“专升本”

的背景大抵如此。那时我研究生毕业不久，有幸给这个班的同学授课，如果不是“文革”的原故，我和他们大概就是前后届的同学罢了。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班的同学大多发展得不错，有的还担负了相当重要的领导职务，东源则一直在学校教书，并且好多年前已经晋升为副教授了。二十多年间，和东源一直有着来往，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原来也是任教于南平师专后来调到公安专科学校的张廷泗先生、原来和我同在武夷山任教后来调到银行学校的郑秀清先生等，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都有比较浓厚的兴趣。

这几年，除了教学，东源还担任了一点行政工作，很忙。尽管如此，东源仍然很刻苦，教学和工作之余，还编写了供金融院校使用的《公文写作》教材，参加了我主编的《大学语文》的编撰工作。东源还前后两次来跟我做高级访问学者，研治福建近代文学。最近的一次，我们商定了《陈衍评传》这样一个题目，作为访学期间的课题。

陈衍（1856～1937），一生著述甚丰。陈衍以《石遗室诗话》名世。《石遗室诗话》已有两个点校本，并且已有多篇的研究论文发表，但不容讳言，目前学界对《石遗室诗话》研究还比较肤浅。在近现代交替之际，陈衍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远非一部《石遗室诗话》所能代表。从旧学来说，他是“同光体”诗派的倡导者和代表诗人；他对经学和史学也有精深的研究。新学方面，他对经济学和金融学也有相当的研究，甚至还有译著。就陈衍的生平而言，论者比较多地看到他是清朝秀才的一面，而较少重视他在张之洞幕府一系列的革新思想。于教育方面，较多议论的是他在无锡国专的情况，很少关注他在京师大学堂和厦门大学执教的业绩。为了能全面地了解陈衍的生平思想以及学术成就、诗歌成就的方方面面，东源对陈衍的研究，采取了评传的方式。因此，

这部《陈衍评传》是一部全景式的对陈衍进行研究和评述的专著。这样的写法，最大的好处是让读者对陈衍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可以消除历来对陈衍的某些误解。东源写这部书，很努力，也很费心血，查阅了不少文献资料，做了大量的笔记，有些章节多次易稿，的确也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新鲜的见解。当然，评传也有评传的弱点，在一些具体问题方面，评传可能比不上专题研究的论文那样详细，这是评传这种文体使然，而不对作者作过多的苛求。实际上，作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对陈衍学术思想的某些评传难于表述或论述的问题，已另用论文的形式进行写作，其中有的论文已经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阅，或许能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前几年，到我这儿从事高级访问学者的张帆教授和刘建萍教授，在他们结业的时候，分别完成了《陈宝琛评传》和《诗人何振岱评传》两部著作，随后他们又和闽江学院中文系的同仁们一道编纂了《同光体闽派诗选评》一书，将“同光体”闽派的研究大大推进一步。现在，东源的《陈衍评传》又将出版了，“同光体”闽派的研究又有了新成果出现，为之欣喜。福建近代文学是一个丰富的宝库，还有非常之多的课题需要研究，现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有几位博士生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或能弥补某些缺憾。但是我们福建省还很少有专家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整体的研究队伍也还没有完全形成，研究力量也还比较薄弱。不过，我个人对福建近代文学的研究还是抱着乐观态度，相信研究队伍会越来越壮大，成果会出版得越多、越好。期待包括东源在内的同好们一起推动吧！

2006—11—12 于
福州烟山南麓华庐

引 言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在文学上他的成就首先是诗论，他编辑、评论诗歌的著作卷帙浩繁，所揭橥的“同光体”诗论对近代诗坛影响巨大。他的诗歌与散文创作内容丰富，形式别具个性，语言时而清苍刻峭，时而清新圆润，熔文学性与哲理性于一炉。然而，由于陈衍是“同光派”的代表诗人，而这一诗派在晚清“众多的诗派诗人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们所诟病”，^[1]所以陈衍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研究上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因素使然。时至今日，在我国文坛上，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片面解读已经逐渐淡化，艺术的个性和自觉意识已受到普遍的尊重，对陈衍的文学活动乃至人生道路进行一番去蔽还真的探讨，重显它的意义自然是很有必要的了。

陈衍又是一位朴学家。他经、史、子、集无不淹该，他在治学时循清代乾嘉学派“经世致用”的路径，撰写出经学、小学和史学等大量著作。他又将传统的学问与当时随“欧风美雨”一起

传入中国的西学相结合，撰写出《戊戌变法榷议》和《货币论》等近代政治、经济著作，它们既是近代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又是在当年提供给当权者作决策时参考的依据。

陈衍还是一位爱国者，他一生光明磊落、清刚劲直、淡泊名利。我们不仅要对他文学、经学、史学、朴学等多方面的学问进行整体上的研究，还要对他进行道德和文章两方面的总体观照，才能避免出现鲁迅先生所批评过的“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的偏颇，力求在研究上对他作出一个全面、公正的把握。

一 道德与文章

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清启盛唐。^[2]

这副对联出自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章太炎之手，是陈衍80岁生日（1935年旧历4月8日）时，章太炎撰送的寿联。仲弓是东汉的陈寔，任太丘长，被党锢之祸牵连，却不逃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后来何进等招他做官，他辞而不就，当时被公认为最有德行的人。伯玉是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的字。此联既是寿联，难免带有旧时奉承的习惯，但作为几十年交往的两位知音，晚年又在苏州谈艺论文，友情老而弥笃，章太炎对陈衍从道德文章两方面进行评价，应该说是十分恰当的。

先说道德。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侯官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他生活的年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而急剧变化的年代。他十分关心政治。据陈衍长子陈声暨编，后由王真续编、叶长青补订的《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

谱》)载,1864年太平天国战乱,福建危急,当时陈衍才9岁,即知道为时局而忧虑。1884年陈衍29岁,中法马江海战在他的家门口爆发,他赋诗讥讽当道者的无能和腐败。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惨败,陈衍赋诗谴责当时的“一朝将相”。1898年他支持戊戌变法,上《戊戌变法权议》一文以向当时的统治者言事。1900年八国联军戕杀陈衍次子陈声渐,陈衍悲愤至极,怒斥昏庸的统治者和残暴的外国侵略者。接下来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在历次重大政治事件面前,陈衍均观点鲜明、立场坚定。但是,他并不直接介入政治,而是有意识地使自己边缘化。他自幼“雅不喜治举业”,一生不愿当官。这一点与陈寔的辞官相同。虽然他也顺从父母长辈们的意愿而与兄长们一样去应试,但每次落选均毫不措意。最典型的一次是1903年,张之洞奏保他应“经济特科人才”试,但因为多年未应试,在文章开头仍按旧格式顶格书写,因而被作为“违式”卷不予送阅。对此次落选,陈衍不悲反喜,认为是塞翁失马。他说:“设不幸而取,又用知县,则吾所固有而不为者也,岂不冤哉。”取是冤,不取反是幸事,这是因为他去应试本身就是“徇广雅之期望,勉强就试”。终其一生,只在1908年至1911年任过3年的学部总务司审定科主事,“官不及五品”。此前张之洞等人多次劝其做官,均被陈衍婉言谢绝。辛亥革命前,他先后入刘铭传、张亨嘉、刘麒祥、张之洞等人的幕府,并以执教于新式学堂和主编报刊等方式服务于社会与国家。辛亥革命后基本上是任教于大学,他自己说“自入民国,既不为官,绝口不谈政治”。1916年,施愚等人成立“筹安会”,严复参加其中,签名劝进袁世凯称帝,有人强拉陈衍列名其中,被陈衍严词拒绝,断然除名。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他义愤填膺,赋诗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并捐款慰问十九路军将士。邓晓芒先生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一文中说:

“‘知识分子’的头衔已开始限于有文化知识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即对社会现实采取批判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立场并没有明确的实际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而是从自己的学术专业标准出发对现实提出的一种超功利的个人意见。显然，形成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批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3]所谓“边缘化”，就是指这类知识分子不直接介入政治，但却从专业的角度对政治进行批判。陈衍正是这样一类从传统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

和陈衍相比，他的诗友和同人们则大多跻身官场或成为政治风云人物。以“同光派”领袖为例。曾是陈衍最亲密的诗友郑孝胥是个极端，他一生奔竞仕途，“惘惘不甘”，最后竟卖身求荣，当上伪满洲国的“总理”，成为民族的败类。陈衍与他断绝关系，斥他为“丧心病狂”。陈三立跟随父亲陈宝箴投身戊戌变法运动，受到慈禧等人的惩罚，被革职靠边，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沈曾植一生仕途平稳，直到60岁才辞官，还曾赞助康有为办“强学会”，支持改革，清亡后，又于1917年北上参与溥仪复辟之役，事败而归后也以遗老自居。当遗老也是一种政治身份，陈衍就明确反对当遗老。陈衍的另一位诗友易顺鼎，虽没甚政治才能，却极力挤进政治漩涡，科举不顺则靠捐官而至二品虚衔的“贵官”。1900年慈禧西逃，他竟效仿杜甫的“麻鞋见天子”，也“麻鞋赴行在”，危难时刻表忠心，好不容易在1902年才捞到一个官来当。只当了三个月就被罢了官，但仍然向张之洞自呈冤抑，继续捞官当，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还在袁世凯政权中任职。另一位唐宋派诗友樊增祥则是社稷重臣，官位显赫，一直到晚年还充任袁世凯政府的参议院参政。陈衍的老乡、“同光派”的扛鼎诗人陈宝琛青年得志，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被黜25年又复出，后当上“帝师”，竟陪伴退位的清帝20年，可谓

愚忠至极。

与上述数人的为官及政治态度相比，可以看出陈衍与他同时代及经历相同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自觉地与官场和政治保持距离，自觉地自我边缘化和自我放逐。按照目前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家萨义德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放逐者和边缘人”。^[4]如果说，辛亥革命前，陈衍还要依赖于统治阶级，参幕或当了3年的官；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他尽量摆脱了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完成了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作为这种过渡期的知识分子，陈衍一生坚守于诗歌的美、学问的真和教育的善。

再说文章。虽然他严加删削自己的诗作，但仍然为我们留下了1380余首诗词，他还为我们留下了150多万字的诗论，并撰写了《宋诗精华录》等十多种编辑、评论古代及同时代诗歌的大部头集子，为诗歌及其理论作出重要贡献。陈衍是清末“同光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他实际上成为当时诗坛的一位盟主^[5]，对清末民初的诗歌及诗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章太炎用伯玉诗的“清”来称誉陈衍，点明了章陈二人的区别。陈衍所代表的“同光派”闽派诗歌的特点就是“清苍幽峭”。^[6]“清”者“寂”也，它的反义词是“喧”。陈衍曾在《何心与诗叙》一文中说自己为诗的特点是不畏“困”与“寂”，走的是一条“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陈衍一生“雅不喜治举业”，不愿为官。他不像章太炎那样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他说自己“位卑身隐”，也就是说，他的人生之路与诗歌之路一样，也是一条“荒寒之路”。他“身丁变《雅》变《风》，以迨于将废将亡”的末世，^[7]却以诗歌与学问的坚守为己任，为我们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他和他所代表的“同光派”诗歌又与南社等团体不同，没有以诗歌为革命服务的明显倾向，“同光派”

接过唐宋“三元”的传统，以学问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俨然走一条追求“纯”艺术的道路、一条以学问传统作为诗歌根柢的道路。

然而，如前所述，“同光体”在晚清“影响最大”却又最受“诟病”。这似乎是个矛盾的说法。我们先说第一方面，之所以发生过最大影响，是因为“同光派”是中国近代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陈庆元先生在《论同光派闽派》一文中说“陈衍论‘同光体’的产生，上溯到道光、咸丰中程春海诸人，这是从全国的诗坛来考察的。在笔者看来，‘同光派’闽派的产生，在福建诗歌发展史的历程中也有其内在的原因。”^[8]也就是说，“同光派”诗歌是顺应诗歌发展的产物，它不论是在当时还是身后都受到广泛的认可。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它为什么受到“诟病”呢？从政治上看，陈衍和“同光派”的其他代表诗人如陈三立等人，虽然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变法，但一旦遭到慈禧的镇压，或退出了政坛，或保持着沉默。他们的表现与革命派截然不同。章太炎曾被关入狱中，却视死如归并含笑与邹容和诗，一个道：“且向东门牵黄狗”，一个说：“头如蓬葆犹遭购”。而陈三立只能摸摸自己的脑袋唱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衍则高唱高适的《还山吟》。他们像大多数士人一样，虽然也忧国忧民，但不能像章太炎和也是“同光派”重要诗人的林旭那样为维新变法或蹲牢狱或抛头颅。从诗歌上看，“同光派”的诗歌虽然也有不少忧时爱国的佳作，但他们诗作中的大多数还是歌唱性情、抒写生活的篇章，这便自然不能与“诗界革命”者一样受到“喧”评，而难免为激进派诗人所“诟病”了。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同光派”诗歌的艺术成就。以陈衍为例，他除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论外，还撰写了大量的诗文，其中的《石遗室诗话》“文字之浩繁，前无古人，内容也极

为丰富……对近代和现代的旧体诗诗坛影响很大。”^[9]陈衍还编辑、品藻了大量古、近代诗歌，如《元诗纪事》、《宋诗精华录》、《近代诗钞》等，卷帙巨大，评论精细。在现代接受美学看来，鉴赏评论与创作一样都是对艺术的接受。我们可以陈衍对最神往的诗歌之一、高适的《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的接受为例来窥覷陈衍的诗意人生：

还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还山识君心，人生老大须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间偃仰无不至。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常满地。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白云劝尽杯中物，明月相随何处眠。眠时忆问醒时事，梦魂可以相周旋。

面对乱糟糟的政治，像陈衍这一类知识分子所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力挽狂澜的效力，那么，陈衍们的“君心”是什么呢？“人生老大须恣意”这一句诗是最好的概括：不愿在官场的泥淖中挣扎，向往超脱，大隐隐于市。这就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喜剧：在遇到挫折时就退居山林。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逍遥”、释家的“出世”联合造就了一条不无美感的出路：“山间偃仰”。我们不妨把陈衍的“山间偃仰”理解成对诗歌与学问的坚守。因为诗歌与学问可以把很浅俗的一件事变得妙趣横生，例如上面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无非就是一句话：“人生如梦”。但是经高适这样的大诗人一点化，则令人拍案叫绝：不是醒时问睡眠时的事，却反其道而行之，是梦中问醒时之事。这种与“梦魂”“相周旋”的意境，马上令我们想起庄子的梦蝶的妙喻：“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

在政治上“穷则独善其身”，转而追求文学的美，陈衍和他的“同光派”因而受到“诟病”。然而，这一流派在艺术上的成就却不容抹杀。我们看到，陈衍循着这样一条“荒寒之路”，“把

宋诗派的理论有力地推进了一步，同时在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后一个真正的理论家”。^[10]

除了诗歌，陈衍还有一个坚守，那就是学问。陈衍是一位朴学家，他经、史、子、集，无不研究，“取所谓词章考据之学杂治之”，又为我们留下了 150 多万字的学术专著。陈衍治学，能为现实服务，求变求新。戊戌变法之后，废除科举，举国兴学堂、办报纸。陈衍在京师大学堂、厦门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校任教垂 40 年。他又先后任《求是报》、《湖北商务报》、《国学论衡》等报主笔，成为开官智、开民智的硕学名儒。他人张之洞幕府 10 年，为张圆“中体西用”之梦理财，著、译了大量金融、经济著作。

陈衍曾对他的学生黄曾樾说：“求诗文于诗文中，末矣。必当深于经史百家以厚其基，然犹必其人高妙，而后其诗能高妙。否则虽工不到什么地步去。”^[11]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钱仲联先生曾有这样的评论：“郑陈又领袖闽派诗坛，达数十年之久。海藏（郑孝胥）晚而叛国，而先生以德高独尊。所著《石遗室诗话》正续编、《近代诗钞》二十四册，煌煌巨帙，声教远暨海内外，一时豪俊，奔趋其旗纛之下。”^[12]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道德文章天下事”。在他的 80 岁寿筵上还有一位祝寿者选择了和他相近的人生道路，这位祝寿者就是钱钟书，他对陈衍的“志行学问”同样给以很高的评价：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日，石遗丈八十生辰，置酒苏州胭脂桥寓庐，予登堂拜寿。席散告别，丈恍然曰：“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余以金石之坚，松柏之寿，善颂善祷。丈亦意解。是年冬，余在牛津，丈寄诗来，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等语，余复书谢。以后音讯遂疏。二十六年夏，得许大千信，则丈以疝气卒矣。

欷歔愴况，为诗以哭。中日战事寻起，而家而国，丧乱弘多，遂无暇传其人，论其志行学问。息壤在彼，斯愿不知何日偿也。

上文引自钱钟书先生的《石语》，他说，这篇文章的取名是“文出双关”，这表面的原因当然是陈衍号石遗，而内里的意思却让人们想到中国文化中对石头的赞许和神往。石头是自然山水中最美的景观之一。陈衍诗歌中的清苍幽峭，令人联想到曹雪芹名著《红楼梦》的曾用名《石头记》和郑板桥笔下的铮铮石影。

二 朴学与文学

陈衍认为治学应将文学与朴学兼而治之，他在《复章太炎书》中说：

窃叹区区旧学，考据、词章数千年无能兼者。歧而二之，即已误矣，卜商、荀况，已属偏至，何论许、郑、杜、韩，君乡竹垞，颇识崖略，亭林浅尝，只可供梁鼎芬、林纾之仰止。足下学与年进，真善读书，见解高超，海内罕其匹。

这里所讲的“考据”即清代的朴学，“词章”即我们今天的文学。陈衍认为有成就的学者应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来治，“歧而二之”是错误的。他认为从子夏到顾炎武，几千年都没人真正“兼而治之”，但他对章太炎评价很高。这是因为，他与章氏的治学思想十分合拍，他在这封信中称章为“老友”，因为他早在写这封信的28年前，就曾向张之洞推荐过章氏的学问，陈衍一生中的最后7年在苏州，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而晚年的章太

炎正好也退居苏州的书斋中“阐扬国故，复兴国学”，两人志同道合，共同切磋。章太炎曾在《论文学》中写道：

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学、文辞，皆谓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彪……当以文学为主，不当以彪彰为主。^[13]

以上章太炎所说的“文”即文学，而此处的“文学”则指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等，是一个宽广的定义。陈衍同样这么认为，他在《五言四十韵哭畏庐（林纾）》一诗中说：

人事如转烛，交君五十年。长我才四龄，奄忽竟我先。君去长已矣，我心郁烦冤。论文常誉我，自昔荷断断……君始学骈俪……既而骋议论……既而五七言……后皆舍之去，专攻散文。久之乃自命，样湖柏枧间。秘钥矜昌黎，于抑不使宣。我进以朴学，君谓道已分。我更以哲学，君谓非道原。桐城有师法，吞吐出半山……

“转烛”是风摇烛火，比喻世事变幻莫测。陈衍和林纾之间有深厚的友谊，但在文学上有许多异同，争论是常有的事，“誉”和“断断”都是指责的意思。林纾在散文上接近的样湖（吴敏树）、柏枧（梅曾亮）均为桐城派作家，陈衍却对“家法”等规矩并不在意。陈林二人是终生老友，但在对学问的看法上有分歧。林纾从开始学骈体文，再到议论文、诗歌，最后到散文，自命颇有成就；但陈衍却向他进以朴学和哲学，他都不能真正接受，只对“桐城”、“师法”感兴趣，在文学上两人既有分歧，也有共同之处。

相反，当年陈衍向张之洞推荐章太炎时，就极力推荐章氏的《春秋左传读》等著作。章氏早年所作《春秋左传读》等三部关于《左传》的著作就是承乾嘉汉学传统，从文字、音韵、训诂人

手，将《左传》和周、秦、两汉典籍进行比较研究的系列佳作，其中所发掘出的微言大义，实际上是为他的“经世致用”而服务的。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期间提倡“文学复古”的运动，借鉴欧洲文艺复兴，名为复古，实为创新。这里的“文学”概念，即指先秦的文、史、哲合一的大概念。章太炎曾在《文学总略》中对上述“文学”的界定作过补充：

今欲改文章为彰彰者，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
违书契记事之本矣。^[14]

他的主旨是强调恢复古代“书契记事”那种为现实服务的“文学”，反对走上形式主义的桐城“义法”的死胡同，即反对局限于所谓的“彰彰”的苑囿之中。

陈衍同样强调文学的通经致用的朴学精神，为现实服务。例如钱仲联教授在编辑《陈衍诗论合集》的《前言》中说：

先生之论诗，以为道咸以降，丧乱云旆，身丁变风变雅以近于诗亡之会，故其选诗之旨，无异于尼父之删诗，盖有感于诗与时世相关之切而云然，其所见为先立乎其大。^[15]

由此可见，“同光体”诗歌虽然较重形式，但并非没有内容，虽较保守，但并不完全落伍，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诗歌的个性化使然。“同光派”被称为清代的宋诗派之一，其命运与宋诗也有相像之处：虽不如前代唐诗之豪迈壮阔，却不失空灵清峻；虽有议论的弊病，却颇具理趣之韵味。陈寅恪先生曾评宋代文化：“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6]

陈衍的文章有很高的成就，往往写得质朴自然，这是跟他强调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学术观点分不开的。他提出“未有不精于经术而能行文者”，总是以朴学的精神将经、史、子、集等学术兼采而治。在陈衍五孙陈步所编的《陈石遗集》中，学术部分的目录为：《尚书举要》、《周礼疑义辨证》、《考工记辨证》、《考

工记补疏》、《说文举例》、《说文解字辨证》、《音韵发蒙》、《通鉴纪事本末书后》、《石遗室论文》、《史汉文学研究法》、《要籍解題》、《戊戌变法權议》、《伦理讲义》、《福建方言志》、《烹饪教科书（节录）》、《经济类著译选编》等，共 16 部，此外还有《礼记疑义辨证》、《货币论》、《续古文辞类纂》、《八家四六文补注》、《元文汇补续》等。另外，陈衍还编辑了《福建通志》、《闽侯县志》、《台湾通纪》，译著西方经济、金融著作《商业开化史》、《商业地理》、《商业经济学》、《货币制度论》、《银行论》、《商业博物志》、《日本商律》、《日本破产律》、《欧美商业实勢》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陈衍治学的路径：从朴学和哲学的高度观照学问的坛坫，所以我们如果仅以诗人甚至“同光派”诗人看待陈衍，则是片面的，陈衍是一位具有渊博的学术思想的学者。他曾说：

人类之思想，必有所用，不用于此，则用于彼，康、乾间各种考据之学勃然兴起者，盖惩于文字之狱，不得不向此烦碎而远于政治之一途发展，其势使然也。^[17]

陈衍知道，乾嘉间人搞那些“烦碎”的学问，是“文字狱”的形势使然，迫不得以，只能用这种工具来“经世致用”，为现实服务。章太炎是如此，他自己也是如此。他从 30 岁以后开始“颇究哲理”，^[18]而他打出“同光体”的旗帜治诗，也是 30 岁以后，可见他的诗歌文学是与他的朴学、哲学互为表里的。他提出“三元”说，以开元、元和、元祐为枢纽，并上承风雅，下接当代，以发展史的观点观照诗歌，就是这种学问根柢使然。

三 诗论与诗文

陈衍一生的成就以诗论为最。他的诗论首先是对“同光体”诗歌的揭橥。“同光体”这一概念，由陈衍和郑孝胥于1886年共同提出。实际上，作为一个流派，“同光派”诗歌当时已客观地产生并形成，陈衍等人只是敏感地从理论上揭出并发扬光大而已，其代表人物还有浙派的沈曾植和赣派的陈三立等人。他们继承清初宋诗派的传统，反对“诗必盛唐”的狭隘观点，开拓诗的“新世界”。如前所述，陈衍提出“三元”说，并以发展史的观点观照诗歌，这是与他的朴学观点相一致的。陈衍还针对严羽的“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诗“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并提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主张，他认为工诗必以学问为根柢。陈衍还研究了诗歌的个性化，诗歌中的“性情”、“至”、“通变”等诸多理论问题。陈衍的诗论著作主要有：《石遗室诗话》、《石遗室诗话续编》、《诗品平议》、《诗评汇编》、《诗学概要》、《感旧集小传拾遗》、《樊榭诗评》等。这些构成了他自己的诗论系统，对思考中国近、现代诗歌及诗歌理论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陈衍的诗文创作同样成就斐然。陈衍为今天的读者留下的诗词作品约1380首，其中的内容丰富多彩，首先吸引我们的是那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佳作。例如，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自己的祖国，他有着切肤之痛，并予以坚决的谴责：“孽臣昏妖天下无，鬼兵守关先张弧”，“危邦乱邦动可死，王涯宅有玉川卢”，“萧萧悲风时起，今我不愁何如”。其次，陈衍的诗作关心民瘼，如《祷雨

诗》和《三喜雨诗》中有“大早已八月，山川意殊恶。肤寸既不合，怪物亦未遭，陂池糜不枯，井渫罔不涸……官长蹶然起，忍坐视民瘼”，“小楼三听雨潺潺，万户农民尽破颜。比似河流分擘后，龙门伊阙不能关”。陈衍晚年诗效香山体，“歌生民病，伤民病痛”，反映人民生活疾苦和愿望，如“故山不雨已累月，米价日高田未堡”。而他的诗集中为数较多的是山水诗、游览诗、论诗诗以及交游诗等抒写生活、个人情感和创作感受的诗歌。这些抒写个人生活的诗歌绝不是无病呻吟，同样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陈衍在《小草堂诗集叙》中批评道光、咸丰以前的诗人“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露其愤懑，间借咏史、咏物以比附于比兴之体”，他提倡继承道咸以来的传统：“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薪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至嘻笑怒骂，无所于恤。”（《小草堂诗集叙》）陈衍的山水游览诗如陶渊明般于平淡中寓风雷之气：“晨游宝泉河，路过慈仁寺。闻昔之双松，兵火近已被。”（《慈仁寺访松同鹤亭》）“劳生天岂容高枕，乱世人尤贱布衣。”（《思归》）这类诗中还有大量诗句是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陈衍的散文，“有什么讲什么，讲完就完，不作迂回蓄缩”，没有条条框框。其中记人散文往往能寥寥数语就描绘出人物别具一格的性格和环境，并注入真挚动人的感情；记游散文同样能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曲尽塞北江南的水光山色，令人陶醉；议论文及书信则最能体现他散文的特色——富于哲理性。

陈衍一生以推动诗歌繁荣为己任，他除了撰写诗论、创作诗文外还大量搜集整理、评论品藻历代以及当代的诗歌作品。除了《石遗室诗话》正续编外，主要有：《宋诗精华录》、《宋诗选》、《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全闽诗录》、《清诗三

百首》、《近代诗钞》、《续近代诗钞》、《石遗室师友诗录》等。陈衍这些煌煌巨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成为当时诗坛的一位盟主。加上他带头唱和、组织诗社、执教大学，当时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向他学诗、请他选评诗歌的盈门集户。陈衍一生旅食四方，从家乡到上海、武汉、北京、苏州等地，他到处都播下了诗歌的种子。陈衍为中国近代诗歌的繁荣作出了显赫的贡献，也使“同光派”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

但是，陈衍和他所代表的“同光派”诗歌又与南社等团体不同，没有以诗歌为革命服务的明显倾向，因此，这一流派虽然在晚清诗坛“影响最大”，但却受到南社等激进派的“诟病”。如果借用章太炎的赞誉，将他比为“道广”的陈寔和“诗清”的陈子昂，那么，和身处汉唐的他们相比，所不同的是，陈衍生当封建社会的末期，他为中国古典诗歌所促成的是最后的繁荣，陈衍的这种意义正可以用他的自悼诗句来形容：“一幅林山收晚景，数家茶肆息劳生”，其中浓郁的生活和文学气息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与引文出处：

[1] 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第1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3月。

[2] 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第207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本书以下所引《陈石遗集》处甚多，为避繁琐，采用在引文后加括号的方式注明。

[3] 《书屋》2004年第8期，第4页。

[4] 同[3]，第10页。

[5] 《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第155~160页。

[6] 陈庆元：《诗词研究论集》第299页，巴蜀书社，1998年9月。

[7] 陈衍撰，钱仲联编：《陈衍诗论合集》第87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社，1999年9月。

[8] 同 [6]，第 300 页。

[9] 同 [6]，第 309 页。

[10]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第 438 页。

[11] 同 [7]，第 1018 页。

[12] 同 [7]，第 1 页。

[13] 吕慧鹃等编，姜艺华撰：《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章太炎》第 264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年 3 月。

[14] 同 [13]，第 265 页。

[15] 同 [12]。

[16] 转引自《读书》1987 年第 5 期，第 6 页。

[17] 同 [7]，第 1086 页。

[18] 同 [7]，第 1091 页。

第一章 早年家居

(1856~1878)

第一节 “宝鼎香萦新柏翠，锦屏书映落梅红”

陈衍 1856 年旧历 4 月 8 日生于福州城东北井楼门内龙山之麓，排行第三，故字叔伊，号石遗，晚号石遗老人。福建的地形为丘陵，福州城市内多山。除高耸的于山、乌石山、屏山三山鼎立外，众多的小山现在已随着城市的建设而渐渐消逝。在今日热闹繁华的井楼门附近仍有“龙山巷”和“龙峰村”的地名在，但高楼林立，除了马路有些微上下坡外，已根本没有“山”的形势了。即使是清朝末年，“井楼门大街”也已是昌明隆盛之邦了，人们站在车水马龙之间，大约是同样看不见“龙山”的。

闽越之地，在远古曾是断发纹身的“蛮夷”之乡。当公元前

202年汉高帝封无诸于此，为闽越国时，它与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还是人烟稀少、文化相对落后之邦。后来，经过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南迁，福建渐渐发达了起来。从两宋开始已相当繁盛，发展到明、清，福州渐渐被称作“海滨邹鲁”，经济和文化都发展较快。宋、明、清三个朝代，福州籍进士达3624人，其中文状元16人，武状元7人，位居全国各府州的前列。^[1]

对于自己如画般的家乡，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一中曾辑评过这样几首诗歌：

京师净名社降神，移至闽。剑池冶亭，乌石山双骑园，陶江玉屏山庄，时时夜集。《驂鸾倡和集》，动厚盈寸，今此册已亡，甚可惜。所存零星残阙，犹记《至闽示同社诸子》，其一云：“江波绿上郭西门，泼眼山光媚酒尊。鸭脚鸡头生事足，免葵燕麦几家存？半扉水落留鱼须，一桁霜晴晒楼禪。来向荒龕寻十子，寒泉秋菊剪灯论。”其二云：“绿榕城郭画中来，海气层空拔不开。鹤鹤高秋盘大野，蛟龙独夜啸危台。叩关金鼓三传箭，横槊楼船数举杯。瘦马羸童渡江去，将军孤负令如雷。”其三首二句忘之，余云：“自携方足寻华洞，又裹干鱼礼幔亭。寂寂落花书库改，茫茫秋水墓门扃。九原泉路交期在，头白山阳倚笛听。”其四忘之矣。第一首言由上游入闽，先至西郭外小西湖，访湖上宛在堂诗龕诸先生及所见景物。次首言明末清初，唐、鲁二王，郑成功、耿精忠诸割据事，钓龙台王气已消也。三首又回溯所经西路山水武夷、玉华洞诸处，结言生死交情也。

所谓“净名社降神”，指的是乾隆年间南方文人在北京开展的一种将迷信降神与写诗结合进行的活动。降神就是扶乩：由两人扶一丁字架，在沙盘上作字，以示神言。再以此神言作诗。当

时的一位神主为苏州进士吴泰来，他著有《净名轩集》，这便是“净名社”名称的由来。后来这种降神活动移到福州进行。陈衍的长兄陈书及叶大庄等人常常参加。陈衍自己说“余素不信鬼神事，亦坡公所谓吾从众而已”，但对其中的诗歌特别喜爱，因为这一活动中的诗歌往往具有浓郁的地域风光。以上第一首诗中的“鸭脚鸡头”均为植物，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载：“古人种为常食，今之种者颇鲜。”“鱼须”是沙鱼的须，《尚书》郑玄注：“所贡物，鱼须，今以为簪。”这些闽地风物加上衣架日晒的围裙，真是一幅榕城生活的风俗画面，而宛在堂中所供的“闽中十子”等诗人，将自然景色与人文底蕴交相辉映。第二首中所说的福建明清易代时期的战争，则给人历史沧桑之感：明朝灭亡后，苟延残喘的“南明”王朝曾有福王、唐王、桂王三个政权。其中唐王朱聿键于1645年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依靠郑成功父子的力量而存在。鲁王朱以海，则在绍兴称“监国”。耿精忠为康熙时的“靖南王”，1674年在福建起兵响应吴三桂叛乱，两年后又降清，被召入京，于三藩叛乱被平定后处死。第三首再次把将乐玉华洞，武夷幔亭峰等令人神往的自然风光与长眠在“九原”“墓门”之中的“书库”（博学之人）、福建民风淳朴重生死交情等人文环境融为一体，代表着福建独特的文化魅力，至为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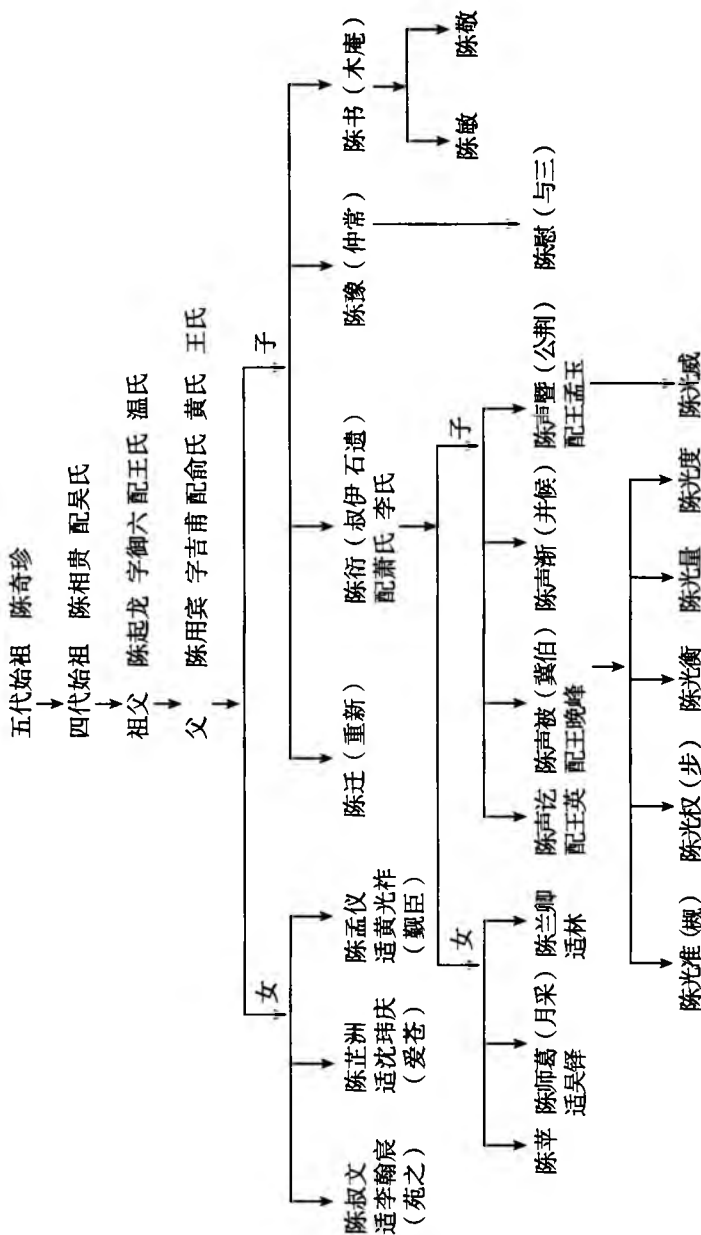
然而，就是这个美丽的家乡，经过几千年的闭关锁国，已经在科学与国防等方面大大落后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陈衍出生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而从5年前开始燃烧的太平天国的战火也正在全国十几个省蔓延。福建同样是灾难深重，这样的内乱和外患使“海滨邹鲁”成了首当其冲的战场。如前所述，陈衍9岁开始就懂得深深地为时势所忧虑。他一生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光明磊落的操守，然而始终没有直接介入政治，却一生坚守于诗坛、学界和教坛。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举人，陈衍同时具

备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专业品质，这一性格特点从他的少年时代就能初见端倪。

陈衍出身的这个井楼门内的家庭是个真正的“书香门第”。祖上于顺治年间从晋江迁榕城。他的第五代始祖陈奇珍“以军官征台湾，战歿，捡骨归葬东关外金鸡山，世袭云骑尉”，传到祖父陈起龙、父亲陈用宾，几代人“皆积学未仕”，靠设馆授徒为生。陈衍是陈用宾 50 岁时才生的，所以取名“衍”，^[2]字叔伊，叔是第三的意思。他的出生给一家人带来了欢乐。和对待前两个儿子一样，烂熟经史的陈用宾对陈衍进行了严格的教育：从 3 岁开始就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5 岁开始又加上《四子书》、《毛诗》、《春秋左氏传》；6 岁开始读《尚书》。父亲亲自授课，儿子则自幼聪颖，对学习“别有会心”。每天黎明即起，陈衍站在床前背诵前一天所授的课文给父亲听。陈衍的接受力很强，当陈用宾听着儿子每天背诵几千个字的文章，却能“音节苍凉”地“抗声而诵”时，他对这个小儿子读书的神会，喜形于色。父亲的循序渐进、系统认真的教育让陈衍受用终生。他 1918 年曾写过一首诗，后四句为：“千家诗是潜夫（刘克庄）选，三字经原伯厚（王应麟）成。绝世文人从此始，教科坊本漫争鸣。”（《童孙》）道出了对往事的留念。

陈用宾的四个儿子除陈迁只考中秀才外，其余三人先后均考中举人，三个女儿也都能诗会文。现将陈衍家世列表如下：

陈衍世系图



陈衍的母亲王氏，将她的勤劳和坚强的性格基因传给了他的儿子们。她怀孕陈衍数月时，仍然常常砍伐灌木杂草以作为煮饭的柴禾，旁人劝她不要挥刀劳作，恐伤及腹中胎儿时，她笑着说：“没有事的。”这位勤劳的主妇，将屋后废园中的荆棘艾草砍光后，平整土地种上各种蔬菜，收获后便成为一家人盘中的美食。物质生活虽不富裕，精神上却十分欢乐。诗才横溢的长兄陈书将这种情形撰成楹联贴在北堂之上：

圆月满华堂，妇献椒花儿进酒；
富春开后圃，笋抽稚子芥添孙。

母亲的这种言传身教积淀在陈衍的一生中：他笔耕不辍，心劳力任，走南闯北，不畏艰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77岁那一年还登上了华山。

《年谱》的“九岁”段中有一处记载说：“家君尝言夜读时，见大世父瓶中所插菊花，秀色沁入脑际，胸中一种诗味不可名言。”陈衍自幼对诗歌有“神会”，一生以诗歌为生命，当然应该说是父亲和兄长教育影响所致，但是，看看他从小就不为传统教育所限，“雅不喜治举业”，后来“有县令而不为”，却笔耕不辍，领袖诗坛，不能不说，这种对诗歌和学问的坚守是天性使然。

对诗歌的感觉是一种天性，对自然界的热爱也是一种天性。7岁的陈衍，跟随父亲游览城中三山、城西小西湖、怡山长庆寺、施氏园、李氏园、城东温泉等名胜，背着大人写下的诗歌已积成了一小本。8岁这一年，一家人搬到了汤门街。这时的居所，屋前有宽敞的院子，环绕着长长的回廊。夏夜月出于东墙之上，轩窗尽开，光射室中。陈家的兄弟姐妹们将福建人最喜欢的竹席铺在地上，谈狐说鬼，背诵“危冠广袖楚宫粧”“耶娘送我青枫根”的诗句，深夜仍在玩乐，常常忘了睡觉。

少年时代的陈衍，正经事本应是“习举业”（考秀才），但他

对此没有兴趣，兴趣却在于跟着兄长游览赋诗。兄长常常召集朋友们开展一种叫“诗钟”的创作活动，方法是取两个意义不同的词，或嵌字、或分咏，创作五言或七言诗两句，以出手快且凑合自然、对仗工整者为上。在这种活动中，常将一段短香系上一枚铜钱，下承一个钟碗以控制时间，时间一到，香尽钱落，敲响钟碗，超过时间诗句作得再好，也不能取胜。陈衍在这种活动中常常得奖最多。到了17岁这一年，他开始帮着长兄陈书一起做文章，有一次，他代陈书为某太守作寿序，序中的句子有“以五品官与宰相争可否者，御史也；以二千石与皇帝共忧勤者，太守也。”陈书逢人便背诵给他们听。

十几岁的陈衍，另一个兴趣是结交诗友。当时交的一个朋友叫高钟泉，他们经常一起，时而在原野上信步而游，时而到寺庙或坟墓旁排遣忧闷，时而走遍了河边断港，时而在荒无人烟的破屋子里相对而笑。这个高钟泉，字通孙，从小是个孤儿，家里很穷，却好学多才，诗歌佳句甚多，如“贫家红紫都如洗，惟有青苔上井栏”，“好书久借缘多病，旧句频删厌说贫”等。他们饿了买水果充饥，天黑了还舍不得回家。有时身上有点钱，就登上酒楼，高声谈笑吟诗。高钟泉道：“花事尚无据，东风面太生。”陈衍接着道：“废池春水生，倒影屏山背”，惊动了邻座。

陈衍不仅常常在“诗钟”的活动中占尽风头，而且从小就“日课一诗”，创作了大量优美的诗词，让我们看看他16岁创作的诗词中显露出来的才华：

浣溪纱

过雨苔痕玉不如，紫藤亭馆闭门居，可怜闲煞七香车。
燕子不将春爱惜，落花哪管客踟蹰，茵浓曾见海棠初。

浣溪纱

一桁衣香晒晚晴，几生修到夕阳明，那人梦向玉山行。
纱眼尚知人意思，帘钩不解汝心情，呢喃燕语作么生。

摊破浣溪纱

一碧茶烟染不成，竹炉松子坠零星，风做松声茶亦响，
不分明。雨过楼台帘影翠，月来栏槛篔纹青，团扇夜凉无
用处，佇流萤。

松树、茶烟、雨过、月来、团扇、流萤，这便是 16 岁的陈衍诗
词中的意境。大哥陈书曾在家里题过这样一副对联：

宝鼎香萦新柏翠，锦屏书映落梅红。

陈衍便是这样一棵新生的翠柏，他对兄长们书斋里的“宝鼎香
萦”、“锦屏书映”，倾注了无限的情感：

春日题仲兄冶亭书斋二首

废池春水生，倒影屏山背。吾兄闭门地，文章假大块。
登亭已夕阳，酒面似桃醜。桃红李复缟，昼炫夜不晦。枇杷
虽未金，黄花散寒菜。对此惜流光，华年去难再。

南丰宦游地，水木爱潇洒。虽无名士轩，临水缅欧冶。
此池非明湖，此亭非历下。鹄华在何许，乌石极秀雅。一篇
《道山记》，文字几传写。僻陋本在夷，赖有登探者。

春暮登冶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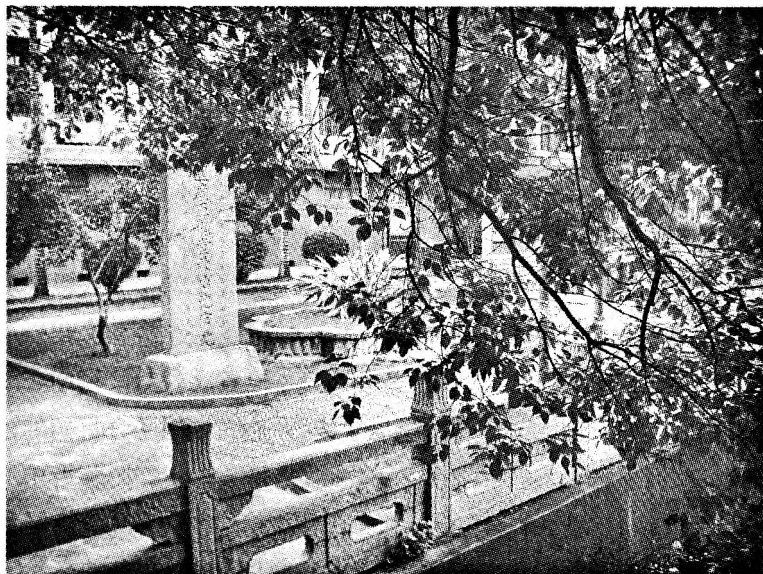
舍北舍南白鹭群，桃花万片赤鱼鳞。钓徒何必烟波远，
浅渚捞虾即富春。

复题冶亭二首

孔明八百桑，渊明五十亩。庾郎二十七，鲑菜惟有韭。
吾生眷菰芦，菰芦亦何有？不须买陂塘，即此落吾手。有蒲
应有鱼，有竹或有鲫。绕塘生青草，得句梦中否。先生肯窥
园，弟子当载酒。醉上听蛙亭，独立忽已久。

园丁不畏劳，伛偻覆其背。往来屡抱甕，颇有忘机态。
麦黄瓜蔓水，捞取萍满载。借问此何为？言饷鱼仓内。一担
数十钱，亦复同卖菜。

以上的诗歌都是为陈衍的“仲兄”——陈豫在冶亭执教的书斋而题的，这冶亭坐落在欧冶池旁，而欧冶池地处屏山之麓，相传这里正是汉高祖刘邦所册封的闽越王无诸的王城所在地。无诸是越王勾践的后代。传说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冶炼专家欧冶子曾在这池子里铸剑，他见证了源于铁器时代的闽地文明。今天，当我们在冶山古迹游览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池边上的亭、台、轩阁和元代的官地碑。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冶城定然并不宽广，但却山水秀丽。从以上所引这几首青年陈衍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屏山倒映在冶池中的倩影：桃红李缟，枇杷黄花，翠屏映衬，夕阳流光。陈衍常跟随兄长在这里的课馆中学习。诗人的这



元代所立官地碑，中间碑文为“城皇庙五龙堂欧冶池官地”。



当今的欧冶池一景。

种“诗味”，春气盎然，它凭借的是大自然（“大块”）的美。庄子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李白则唱道：“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而在陈衍的笔下，桃红李缟，竟可以照亮黑夜，这是一幅怎样的田园风光！

无诸的子孙们后来渐渐地融入到中原民族的文化中去，特别是汉末的动乱之后，闽越大地渐渐成为饱经战乱的中原人民“衣冠南渡”的迁徙地之一。到了唐宋时期，福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得更加繁荣，特别是南宋迁都杭州以后，福建成为与政权中心毗连的省份，此时的屏山之背、欧冶池畔更是成为朝廷官员们的宦游之地，成为骚人墨客潇洒吟哦的温柔之乡了。正如陈衍诗中所说，这原本“僻陋”的“夷”地现在却大有“登探者”，这是因为著名的散文大师曾巩（江西南丰人）曾以60岁左右的高龄治理过福州，颇有政绩。这“秀雅”的土地，早已不再是古代无诸

王统治下的南蛮之地了。屏山之麓，欧冶池畔，人文荟萃，风景秀丽。摩崖石刻上一篇曾巩的《道山记》，使乌石山闻名天下。人们尽可以将它与杜甫咏唱过的济南大明湖以及历山互相媲美。那些有志归隐的钓徒们，又何必去寻找远方的子陵滩呢？福州的南台也是一个人间天上的钓鱼台啊！伴着群群白鹭和万片桃花在闽江的浅渚中捞虾，难道不会胜过美丽的富春江吗？以上最后两首更是把冶亭比作孔明、陶渊明的隐居之地，既陶然忘机，又现实具体；既如梦似仙，又细致可及。“庾郎二十七”指庾信被逼仕北后所写的思念家乡的诗歌《拟咏怀》27首，与《哀江南赋》齐名，所抒发的“乡关之思”凄怨绵绵，哀感动人。陈衍青少年时期诗作显露出的风格是清新飘逸、自然真实。诗句“有蒲应有鱼，有竹或有𪚩”中的“𪚩”指闽地特有的一种专食竹根的啮齿类动物，这样的用语充盈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以上最后一首即形象地描绘出园丁的劳动生活，贴近自然，令人神往。陈衍早期的诗歌已具不俗之水平，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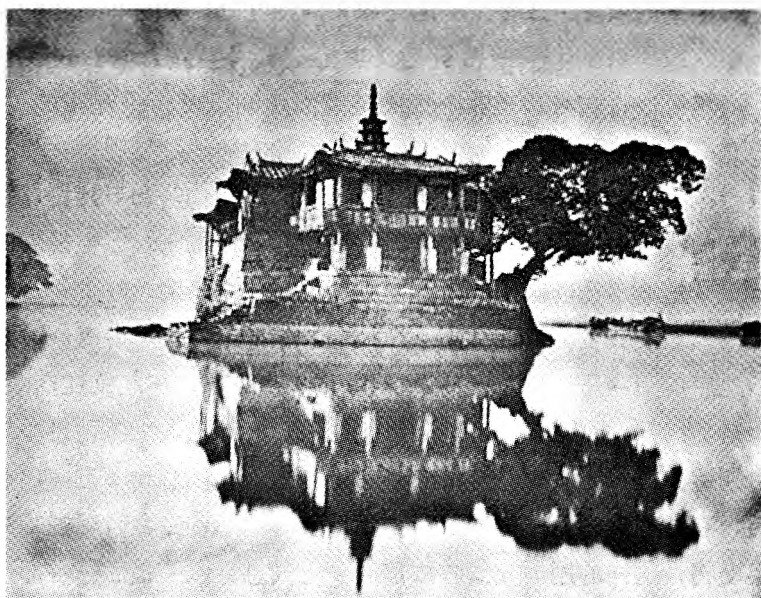
秋早视兰生

一夕西风作意寒，袷衣重叠不胜单。芙蓉红白天初晓，
鬼蘸青苍露未干。如此秋光抛可惜，谁能早起与同看，吴江
动我扁舟兴，叶叶霜枫想正丹。

九月初七日同人集塔江金山寺

面江光碧且涟，抽帆绝好纳凉天。此间置我应三日，
独树于人长百年。胜地布金方丈小，佳名浮玉覆杯圆。衣裳
山水清晖里，坐到忘归憺可怜。

王景（字兰生）也是陈衍早期的一位诗友，最喜山水之游。他曾随四川的学使入蜀，那里绝美的山水使他诗思泉涌。陈衍评他的诗“诗骨清瘦”“矫健不群”。陈衍把这首美丽的“秋”诗送给他，这是因为兰生最喜“秋光”，他的诗集便命名为《秋影庵



爱尔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 1868 年所拍金山寺照片。

遗诗》。

金山寺坐落在福州洪塘江碧水中的一座小岛上，这个小岛小得象一方印章，被称为“浮塘金印”，陈衍诗中的“布金”和“浮玉”皆从此名而来。他和同人们于九月初七来这里聚会，这在福州还是“秋老虎”的酷热季节，而在江面上“抽帆”、“纳凉”当然是绝好的享受了，留连三日而忘返是很自然的。1868年，爱尔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来到福州，拍下了一张金山寺的照片。这一摄影艺术印证了陈衍笔下的 19 世纪末的“金山寺”的独特的情影（图片中的这一建筑已被毁，现存的金山寺系后来重建），“面面江光碧且涟”，“衣裳山水清晖里”。你看岛上那棵“独树”，相传是由明代的状元翁正春手植的，如果不把这棵榕树算在内，这一美丽的建筑不正像一只倒翻过来的圆杯吗？

第二节 “修竹亭亭倚，黄花淡淡姿”

陈衍于18岁与萧道管定婚，19岁那一年正式迎娶。这位富商的千金，天生聪颖儒雅，结婚不久，就能与陈衍以诗唱和，并共同作文著书。琴瑟和谐的一对新人，在家里度过了长达七年的一段文学夫妻的美满生活。

陈衍结婚时家里十分贫穷，催租人屡至。夫人将她的嫁妆变换为生活用品，陈衍则靠着诗赋被时人所传诵这一本领，经常到书院去创作，以所得奖赏津贴家用。萧道管受过极好的教育，是一位雅然深致的才女，请看她的《戴花平安室杂记》所述：

余初嫁之明年，二月移居妙巷。室极小，向窗处仅容一书案，与君共之，曲尺而坐，膝相促也。窗前种竹二三十竿，金银花一架，绿阴在地，幽香入帷。时余未生子，室中尚雅洁。是年为今上纪元，特开恩榜，君为其仲兄邀往经院巷寓斋攻举业，间一二日一归。余独处无悝，日取《通鑑》欹枕阅之。倦则易以《聊斋》、《红楼梦》之属，而岑寂况味，时觉黯然鲜欢。既下第，不复往。则买菊花于小院中栽之，案头罗列瓶盎供折枝。上灯离离疏影蘸窗纸，粉壁如画，余诗所云“窗纱灰白地，位以瓶花影”者也。是秋余肌容略瘦，君题楹联云：“翠袖影婵娟，日暮天寒倚修竹；疏帘风料峭，秋深人瘦比黄花。”是年腊月，余产一男而殇，病甚殆。君亦病，次年正月愈，君呼画师为余写小影，题洞仙歌一阙云……

据《年谱》载：“先母有《种竹小记》，《春暮》、《金银

花》二诗。是岁，先母多看唐宋人笔记小说及《四库全书总目》。以为读书用功，端自目录学入手。”这一情景，让读者联想到李清照与赵明诚这样的淑女与文士的琴瑟和谐。请看陈衍的《蝶恋花·落梅用韵》：

地近阑干能几尺。一夜东风，点尽梅花白。只有一窗窗
纸隔，不知谁弄江城笛。花气药炉多病客，疏影暗香，
绝调今难得。逝水年华看锦瑟，昭君关塞琵琶黑。

隔着一层薄薄的窗纸，江城中传来《梅花落》婉转的笛声，北斗低垂离地仿佛只有几尺。一夜春风，“点”白了所有的梅花，花香和着多病客的药炉味，让人联想起了林逋“疏影暗香”的“绝调”，想起了李商隐的《锦瑟》，再联想起昭君出塞。夹杂着淡淡的哀愁，年青的夫妻俩此时的生活是如此地诗意盎然。和春梅不同，秋菊给人带来的是凄凉。同样是20岁这一年写的《疏影·菊影用韵》道：

疏灯一点，又遮遮掩掩，秋满栏槛。次第看来，如此萧
疏，那有一分明艳。水仙祠下寒泉荐，冷落雨，酒旗茅店。
到不如梦醒纱橱，约略梨花云冉。谁话餐英旧事，美人怨
迟暮。初服清感，止水盈盈，古镜精神，总怨烟消香暗。画
图若写西风照，莫孟浪，秋容增减。算夜凉。蝶瘦蛩寒，只
有个萤还闪。

菊花凋零，一片萧疏，诗人感到人生如梦，这里借用唐王建《梦看梨花云歌》中写梦中恍惚所见如云似雪的缤纷梨花的意境。接着引屈子“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典。诗人自感初服高洁，美人迟暮，“止水盈盈，古镜精神”，最后是“寒蝉凄切”，连几个流萤闪闪也显出无尽的悲凉。

萧道管《戴花平安室杂记》中有一段诗歌记录了当时夫妻俩的浪漫生活：

凉宵同不寐，无计阻生愁。濡墨开端砚，烹茶觅越瓯。
挑灯牵絮语，掩卷起清讴。忽忆秋期近，双星银汉头。

《戴花平安室杂记》记录了作者自己与陈衍这一段贾宝玉与林黛玉式的反叛儒雅的二人世界：

当是时，年少气盛，余与君皆不甚以功名为意。夏月溽暑必昼寝，或席地卧黄琉璃，饱啖荔枝、菱角、藕诸果品。瓶中多插白莲花。夜则达曙不寐……

他们俩拉家常般絮说的是诗歌与学问的蛛丝马迹。“一语齟齬，继之以争”，他们无法阻止这种反目生仇，只有“论辩透彻芥蒂消释而后止，则又酣嬉淋漓以为乐。室既东向而浅，月出竹影婆娑，从疏櫺中斜筛床上，并枕共语必视窗纸白，寺钟鸣，始倦极而寐。”此诗以牛郎织女喻结，是很确切的，因为不久后，陈衍便离开萧道管，开始“旅食四方”，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就是这样“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戴花平安室杂记》是一部文字优美的散文，我们再举其中一段以窥这位才女的文字魅力：

明年二月，余又举一男。移居水流湾，屋极开敞。纱榻竹簟，余日卧其中，不复为吾宗之“露筋神”矣。忆“露筋神”姓萧，小字荷花，见何书，忘之矣。五月，与君游小西湖，夜泛舟，宿宛在堂。君得十绝句，余得诗数首。是冬移居西门街，屋三楹，有小池，缭以朱栏，环以假山，上为露台，旁为花坞。花木则有木芙蓉、石榴、千叶桃、水杨柳之属。是岁，君有《除夕杂诗》五首。入春多雨，池水遂盈，绕池青草莓苔，如绒如罽。重以绿阴压檐。举几榻衣袂，无不苍润欲滴，残花坠叶浮水面，久则水不洁，余戏缚小竹网，竹竿为柄，倚栏持向水上捞之。池小，不久已净尽，少澄则晶莹见底。

朱絲詞

浣溪紗

過雨苔痕玉不如紫藤亭館閉門居可憐
閒煞七香車燕子不將春愛惜落花那
管客躊躇箇儂曾見海棠初

前調

一桁衣香曬晚晴幾生修到夕陽明那人
夢向王山行紗眼尚知人意思簾鉤不



解汝心情呢喃燕語作麼生

攤破浣溪紗

一碧茶煙染不成竹爐松子墜零星風做

松聲茶亦響不分明雨過樓臺簾影翠

月來欄檻篔簹紋青團扇夜涼無用處仙流

螢

蝶戀花

落梅用韻

文中“露筋神”一典，载《高邮州志》：

唐时有一女子，不详其姓氏，或曰郑荷花，又曰萧氏，又曰金节娥。与嫂行郊外，日暮，嫂挽女投宿田舍，女不从，乃露坐草中。时秋蚊方殷，弱质不胜，嗣旦，血竭露筋而死，后人因号露筋女，为立祠以敬祀之。

婚后的陈衍常常携妻子游览福州的名胜古迹，并将洒落在美景中的一串串足迹和身影熔铸成诗的意境。引文中所提到的宛在堂至今犹存于福州西湖公园中，当初是为祭祀福建自明代以来的诗人而建的。23岁的陈衍携妻子住宿在这里，全身心地感受湖光山色和已故诗人们的幽幽诗意：

虚堂四无人，月午忽然暗。坐久已灭烛，有啸疑鬼瞰。

隔岸鬼灯移，只是萤光淡。凭乎张三影，云破月来暂。

——《五月十四夜宿湖上宛在堂堂祀明以来闽中诗人》

“张三影”指宋代诗人张先，他的诗句有“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幕卷花影”、“坠轻絮无影”，被人们所称颂。

再看陈衍的《秋晚杂书》：

朝看几枝花，暮得一帘雨。疏疏与淡淡，秋意满眉宇。
故人留夜坐，欲去还延佇。簷滴砚水承，窗罅香烟补。悠悠忘夏日，可畏有如虎。

但是，这种吟诗治学的生活虽是琴瑟和谐，经济上却日益窘迫。1878年，陈衍与萧道管结婚已4年，几位姐姐已先后出嫁，兄弟们也已相继成家，于是大家分开来过日子了。陈衍先迁到雅道巷岳母家，后来因为生活穷困，一连搬了好几次家，房屋越住越差。这时陈衍想到自己喜欢的宋代诗人陈师道，毕竟自己还不至于像陈师道那样到了要将妻子寄居外家的地步，心中又转悲为喜：

移家何数数，家具尚盈车。桥喜当蒸饼，亭还近煮茶。

黄梅应许乞，紫笋可容賒。城市终非隐，过从一笑哗。

后山有诗榻，转徙似行窝。儿小齐鸡犬，邻比恼鸭鹅。
曝衣交竿衽，汲井辘轳歌。并入先生句，新诗料已多。

——《陈夕杂诗四首》(之二、三)

陈衍虽然有一车家具，但很破旧，被路人“笑哗”，却自得其乐：新居附近的桥边有蒸饼店，亭边有茶卖。“行窝”指可以小住的安适之所。他像陈师道一样，不断“转徙”自己的安乐窝。窝里竟然有邻家的“鸡犬”和“鸭鹅”频频造访，这些“诗料”便是陈衍当时生活的写照。

但是，“转徙”“行窝”毕竟不能解决贫穷的问题，这也就是第二年陈衍开始出游并继而“旅食四方”的原因了。

第三节 “犁然治《说文》，始一以终亥”

陈衍一生除了以诗歌为己任，坚守诗意的美，同时以学问为根柢，坚守学问之实。23岁的他，便完成了第一部著作《说文举例》，这是陈衍治“朴学”的最初成果。所谓“朴学”，指清代乾嘉之世的学者继承汉儒学风而治经的考据训诂之学。然而，到了“道咸以来，士溺于陈腐时艺，愈益不学”。（《张之洞传》）于是张之洞“著《辘轩语》、《书目答问》教士”，“自是后进乃略识读书门径”。而在福州，时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设致用书院专考经史，1874年，陈衍考取致用书院。陈衍对张之洞和王凯泰这些洋务派自强兴学、提倡朴学十分赞赏，他自幼对“治举业”取应付了事的态度，18岁中秀才后，“每逢乡试（考举人）之前，匆忙聚集几个朋友，习作试帖诗赋。考试一过，如脱羈之马，轻




松自在，置之脑后。”^[3]他重又开始“集数友人为文会”，“取所谓词章考据之学杂治之”。（《年谱》22岁条）1878年，他完成《说文举例》。陈衍遵循正统的学问门径：通经必先通《说文解字》。

如前所述，乾嘉时期治“朴学”者多，故《说文解字》成为显学，最著名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筠的《说文释例》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按许慎的《说文解字》的540个部首——“始一终亥”来编排全书，许慎的540个部首共有9353个字，每个字均从义、形、音等方面进行解说。许慎在对不同的字进行解说中时有不同的说法，如“从某某”、“从某某亦声”、“从某某声”、“从某省”、“从某省声”、“读若某”、“从某阙某”等。另外许慎的解说中还列出篆文、籀文、古文的异同。对这些十分复杂细致的体例，许慎并没有做出说明。有感于此，王筠的《说文释例》改按体例而不按部首来编排，即先解释“六书”，再按籀文、重文、形、音、义、引经等方面安排目录，而每一方面下再按体例分为若干个理论点进行阐释，如“形声”下再分为“亦声”、“省声”、“一全一省”、“两借”、“以双声字为声”、“一字数音”等小的方面进行解说。这样就弥补了许慎《说文解字》体例不明确的缺陷。陈衍循王筠的《说文释例》再行深入举例研究，在他的《说文举例自序》中说：

治经之有释例，由来旧矣。旧闻王贯山（王筠字贯山）先生治《说文》，先成《句读》（即《说文句读》），后撰《释例》（即《说文释例》）。衍则先究许君著书之例，乃执以读许书，王氏所释有病其过繁近晦者，衍则务求明简。首六书，次合古籀，次引经，次读若，次通人说，次方言，次同意，次部居，次古今字，次列字次第，次阙字，次阙训，次说解各例。此其大凡也。执其同以绳其异，又审其不能尽同者，而其书乃可治矣。

所谓“先究许君著书之例”，就是说陈衍的《说文举例》是从爬梳许慎《说文解字》的体例入手，按“首六书，次合古籀……”这样的顺序进行研究的，所谓“执其同以绳其异”，是通过归纳这些不同体例的表达方法，如“读若某”、“从某阙”等各种遣词造句来分别研究“六书”及所有文字义例的异同，包括指出许书的错误之处。陈衍的这种研究有超过前人的独到之处，如他指出有些字“疑于象形而实指事”：

指事范围尚广，非止上、下等字。但其字有疑于象形者。如“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然相予者事之形，非物之形也……“夹”，盗窃怀物也，从亦，有所持。亦，本象形字，有所挟，转为指事矣……故一贯三为王，为指事字，玉、像三五之连，“丨”，其贯也，为象形字。

根据许慎的说法，指事是“视面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象形不易混淆，除了日、月，还有山、水、草、木、鱼、鸟等等，都是一种“图画”。而指事却界限不明，如“予”字，篆文写作，《说文解字》中说明是“推给”的意思。可这个“推给”是将某一事物或某件事情推给另一方，这“推给”的可以是“物”，如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件事，如“读一本书”。这里以“推给”为主而不以“推给”的东西为主，陈衍解释说，这是“人事”，所以是指事。“夹”字篆书作，从“亦”，，像人的两腋，但两腋下“有所持”，所以是指出一件“人事”，即从“亦”的象形转成了“夹”的指事。所以陈衍最后举例说“王”是一贯三，是指事，因为所贯的这三个东西是什么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贯”这件事；而“玉”字中的一竖贯的是三块玉、是物，所以便是象形字了。

以上是陈衍《说文举例》卷一中的第二“例”，即“疑于象形而实指事例”，其余各“例”诸如：“指事异于象形例”、“指事

兼象形例”、“指事异于会意例”、“指事异于形声例”等等。全书共7卷145“例”，根据先“六书”后“古籀”、“引经”等等这样的次序逐例分析。该书通过这样的“执其同以绳其异，又审其不能尽同者”的阐释和探讨，对《说文解字》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深入研究，成为近代治《说文解字》的一块里程碑。

陈衍此书著于1877~1878年间，他的夫人箫道管在为他帮忙的同时，将《说文解字》中的“重文”进行了研究，著为《说文重文管见》一书。真是夫唱妇随，琴瑟和谐。夫妻俩的这种学问研究是超功利的，所谓“为学问而学问”。陈衍后来于1912年箫道管逝世5年后，为纪念她而出版了《说文重文管见》，在《说文重文管见叙言》中他说道：“际此国学荒芜，学子略不识字，尤不宜韞而不出，乃序而刊之。”在夫妻俩共同研究的基础上，陈衍后来继续对《说文解字》进行了研究，于1919年又出版了《说文解字辨证》一书，成为研究《说文解字》的集大成者。

参考文献和引文出处：

[1] 赵汝棋主编：《福州奇观》，第4页。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 《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参见陈槻《诗人陈衍传略》第2页，台北市林森文教基金会，1999年版。

[3] 同[2]，第6页。

第二章 出游初期

(1879~1890)

第一节 “九曲溪山我旧游，滯淫春雨幔亭舟”

1879年2月，陈衍的长兄陈书由钦差大臣、前福建巡抚丁日昌荐于浙江巡抚梅启照幕府中。长兄临启程时，陈衍为他赋诗送行。到了这年秋天，他渡海出游访问陈书。诗人先到宁波、再途经余姚、上虞、会稽（今绍兴）、箫山、西兴，最后冒雨渡过钱塘江进入杭州。他一路上饱览了浙江的美丽山水，下面这首诗记录了从西兴过江入杭州时的壮观景色：

望西兴

群山葱郁气佳哉，钟鼓西兴首重回。昨日颠风当断渡，
却随飞雨过江来。

诗人登上杭州城内的吴山，被这一块古称为“东南第一州”的“会稽”山水所陶醉：

吴山晚眺

木落山气苍，叶干人步响。斜阳满山径，在地人影长。
凭楼俯襟带，左右了指掌。晴湖青漾漾，澄江白晃晃。烟开塔旋螺，风平帆张鳶。市廛背填咽，颇脱局促想。当年有美堂，冥佐此吟赏。东南第一州，休沐挹朝爽。迳来马曹辈，手版持倒仰。人事有古今，登临感吾党。

诗人在这里“晚眺”西湖和钱塘江，抚今追昔，“颇脱局促想”，从夏禹大会诸侯于此到近代倒持笏板的“马曹辈”，陈衍引发了浓厚的历史感想和思考。

但是，诗人不论是漫步孤山还是泛舟西湖都无时不思念着刚刚分别在家的夫人：

寄道安

一点乡心忽起予，烂银月色浸阶除。灯花漫结双红豆，枕上难裁尺素书。

陈衍在杭州住了一个多月后，要离开陈书入幕的抚署了，诗人尝到了一种人生各自东西的身世飘流之感：

六言绝句一首寄别伯初家兄

几日话残凉雨，今朝行过清溪。此去樵风南北，由来沟水东西。

陈衍一生酷爱旅游，到一处必有诗记其游。此时本因归途至上海而作金陵之游，但因沈葆楨逝世而取消了这一计划。陈衍与沈葆楨是姻亲：他的六姐嫁给沈葆楨的长子沈玮庆。回闽后，陈衍在家住了一年。1881年春，徐学永请他作武夷之游。往返又是一个多月，得诗30余首。又一次离家出游，最难的又是与娇妻作别：

别道安

娇宠清歌唱折柳，樽前时有暗来香。东风破费邻家物，
千片梅花吹过墙。

一路上陈衍有《将至水口山势甚峭》、《延平城下》、《连日滩行三首用渔洋山人十八滩韵》诸诗，到武夷后又有《题万年冲祐宫》、《路人天游观》、《水帘洞歌》等诗，这些诗歌连起来简直就是武夷山的导游诗册，如《八曲见桃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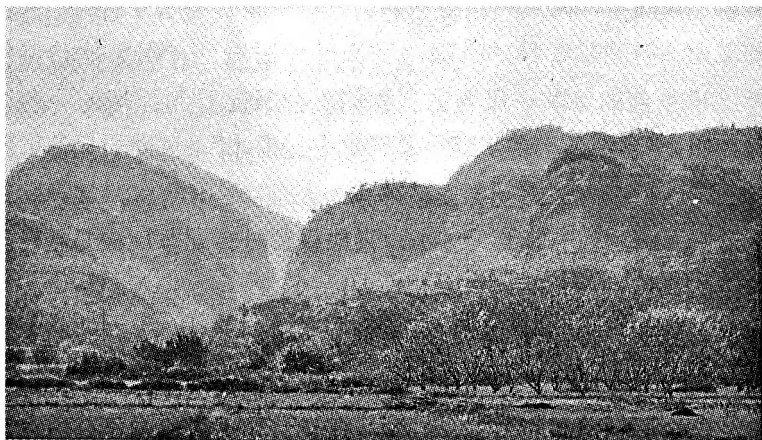
笋洲抽笋渐嶙峋，笋外夭桃簇簇新。他日相思问津到，
桃花要认再来人。

又如《建安道上过谢坑塘时有断句数联情景可念足成三首》：

笋舆破晓便登程，过雨溪山色色清。一片野云低断渡，
前溪早已先人行。

山花著雨红皆白，野烧经春黑更青。记得笋舆侵晓发，
诗情无那短长亭。

霏微林雨忽沾衣，细竹如毛路四围。幽涧断杠藏隐隐，
野泉山碓见依依。



武夷山八曲附近的桃花。

武夷山“情景可念”，诗人长亭短亭，隐隐依依，以诗歌为这绝美的山水花草画下了一幅又一幅红白青黑色彩鲜艳的图画。回到福州后，又与兰生和友枚二人在丁坂欣赏菊花：

接叶卑枝碍帽簷，荒山秋色亦詹詹。江头一带黄泥坂，
二客从予似子瞻。

诗人随时想起并效仿的是苏东坡，他一生推崇宋诗，喜爱子瞻。

1882年9月14日（阳历10月25日）陈衍在家乡中举，这一榜的第一名是郑孝胥。他们两人认识后的第一件事是谈论诗歌，但是一开始，郑孝胥论诗推崇的是汉魏六朝，两人“多有不合”，加上年轻气盛，未免争论激烈。陈衍后来回忆说：“初时持论，若南山秋气之相与高、所谓否，不稍假借，用辄引为诟病。”^[1]

第二年开春，陈衍与两位兄长一起赴京会试。这一回他带上了夫人萧道管，这是因为她多次难产，此时又已身怀有孕，所以陈衍不能不防备。二月初八这一天，在临近北京的一个旅社，他们遇见了同科解元郑孝胥，他也是来北京参加会试的。他们现在是老乡兼同年，两人一起游览都城，将4个月前刚开始的唱和接了下去。但是郑孝胥的酬唱诗我们已无法看到，因为他治诗极严，30岁前的诗歌一概删去。我们现在只能看到陈衍的一些诗句，如：“卷中名士多于鲫，爱好贪多几俊才”（《同伯兄苏戡游崇效寺观红杏青松图卷遍读诸题作》）、“落尽檐前白海棠，满庭唯有雪丁香。长安客话无多子，记取昏黄月转廊”（《法源寺看花过谢文节祠下》）。

陈衍一行四人这次到北京，是住在福州老乡陈宝琛的孙子陈翥家中的。陈翥与李慈铭是朋友，李是著名的《越缦堂日记》的作者，该书涉及经史百家及时事，文彩斐然。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卷十一中说：

癸未（1883年）春挈眷入都，小住陈汝翼（翥）编修处，数遇李莼客户部慈铭，貌古瘦，读其为某封翁所作墓志铭，散行中时以八字骈语，殆所谓阳湖派体也……时未见莼客之诗，后得刻本，亦未细阅。识沈子培（曾植），乃亟称其工，识樊云门（增祥），则推服其师等于张广雅（之洞），实则清淡平直，并不炫异惊人，亦绝去浙派俚钉（堆砌语言）之习，惟遇考据金石题目，往往精确可喜。……《齐子仲姜铸二首为郑庵赋》云：“我读齐鏹文，书阙乏左证。独取圣祚字，古谊藉以正。亲殂偁考妣，从女疑非敬。《说文》有祚字，乃训祀司命。此文两皇祚，配祖义相应（文有曰：“皇祖圣叔”，“皇祚圣姜”，“皇祖又成惠叔”，“皇祚又成惠姜”，俱从示作祚）。幸得三代物，可与汶长诤”……

李慈铭将考据学的内容写入诗歌，“齐鏹文”指周朝古器“齐侯铸钟”上的492个字。李慈铭对其中的文字进行了考证。例如“祚”与“妣”通，但许慎的《说文解字》却将“祚”训为“祠司命”，李慈铭认为不妥，应与妣同训。诗中的“古谊”即古义，“偁”为“称”的古字。许慎曾任“汶长”。陈衍还提出李慈铭的“考据亦间有未确者”数处。

陈衍这是首次来京师，又恰逢春天。三月三日是中国传统的上巳节，民间有古老的踏青春游等习俗，而文人雅士们则把它演为一种文酒娱乐。王羲之《兰亭集序》：“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这一年上巳节，陈衍或与诗友们一起或携夫人萧道管，先后游览了陶然亭（即江亭）、苇湾、十刹海和天宁、崇效、法源、极乐等寺庙，而每个地方都留下诗歌。

三月三日登江亭

长安何处不尘土，爽塏犹数陶然亭。地偏更饶水草趣，

稍觉景物如江城。今朝三日天气清，水边风物空复情。登亭突兀出林杪，西山爽气来窗棂。陶家之土谁所化，一簣顿起再成英。道咸以来数十载，敦盘坛坫差零星。偶然命侣事游眺，此亭密迳相逢迎。每当积雨之既晴，芦芽短长同青青。小车来去似泛艇（“穿苇小车疑泛艇，出林高阁似登山”，亭中楹联传诵者），疑有曲汊兼迴汀。儿童三五时坐钓，生鱼吠哈飞蜻蜓。去我所居几牛鸣，冲泥步履门无扃。梨花满地已如雪，明当重来倒酒瓶。

北京经常笼罩于尘土之中，江亭等郊外却仍然是干净美丽，充满诗情画意。但道、咸以来，文人们的聚会（敦盘坛坫）已零星无几，对着满地如雪的梨花，陈衍明日定当携酒重游。陈衍的记游诗还有《重游天宁寺同道安》、《晤芸敏闻兰生有蜀道之行书寄》等。陈衍自1879年开始离家出游以来，每每在异乡怀念夫人，曾写下《寄道安》、《怀道安》等诗歌，这一回带夫人出游，了却了与她同游这一心愿。萧夫人是最爱花木的，陈衍的《重游天宁寺同道安》诗句中有“我从携家车辙边，廿四番风日月除”，古人把从小寒到谷雨的八个节气中的每一个节气分为三个候，共二十四候，每候五日，应以一花，始于梅花，终于楝花，共二十四花期。风应花期而来，称“花信风”。萧夫人是最爱花木的，这回饱览了“花信风”的奇异景色，美不胜收。

陈衍夫妇兄弟一行4人两个月后便返回福州了，而郑孝胥则逗留在北京为内弟吴鉴泉授子课读。1884年旧历5月郑孝胥的岳父吴赞成过世，10月份，郑回到吴的故乡安徽庐江，12月份才从庐江取道南京上海，于年底回到福州。

陈衍自幼“雅不喜治举业”，而科举制对他也没给以好运，暮春之月，他兄弟仨“报罢”而归。而恶运往往是相连的，陈衍行至上海时，竟因摆渡的小轮船欹斜而坠入水中，险些毙命：

黄浦登舟失足落水浮沉数十须臾却援一篙而上

不道无端了此生，人间失足实堪惊。已拼朽骨沉渊去，
不道无端却更生。

1884年8月23日（光绪十年七月初三），中法战争在福州东南端17公里处的马江爆发。陈衍自幼关心政治，对时局抱有忧虑。这一回，他目睹的是福建近代史上最大也是最惨痛的一次战役。据《年谱》载：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当法军舰来窥马尾时，我军竟“任其出入，莫之或阻”，当天下午，法军猝然偷袭，“我军诸船俱毁”。福建水师阵亡796人。荒唐至极的是，一开始官员们竟然是捷报争传。第二天黎明，逃难者从马尾拥入福州城，总督、巡抚们便成了缩头乌龟，躲进衙门。陈衍悲愤地将这一幅丑图绘入他的《七月初三后杂诗五首》，辛辣地讽刺了满清当局的昏庸和无能，以下是其中的三首：

孤军深入黄天荡，盛事争传采石矶。百姓倾城避兵去，
将军下马捷书飞。

敢信佛狸饮江死，颇疑老鹳凿河新。丸泥既欲封函谷，
捧土又闻塞孟津。

将暉而幡弃犀兕，妇鬢相吊聚狐貍。不知庾信江南赋，
可有招魂宋玉哀。

以上第一首中的“黄天荡”是南宋韩世忠1140年打败金兀术的地方。这里写出了“将军”们把丧事当成喜事来报告的丑像。第二首第一句中的佛狸是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他打败南朝刘宋的王玄谟军队后追击至长江北岸的瓜步山，建立起的行宫即后来的佛狸祠。第二句指法舰疑从梅花港遁逃，后竟夺路扬长而去，当局怕他们再来，竟然讨论将港口填掉。第三首写当时匆匆诸公失败后的可悲景象，将张佩论为文祭阵亡者与庾信作《哀江南赋》、宋玉作《招魂》相比，令人想起当年面对国破家亡的庾信，

他悲愤已极：“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清政府和当年的梁朝一样软弱无能，不修武备，官员们一样以战争为“儿戏”，只会“清谈”。而宋玉的《招魂》则是“怜哀屈原忠而斥弃”，亡国之悲感动千古，所以杜甫唱道：“摇落深知宋玉悲”。

发生于甲申年的这一场屈辱的海战，至今仍是中国人心上的痛处。坐落在今日马尾特区的“昭忠祠”，永远纪念着这个悲惨的日子。祠堂的背后，安睡着当年为国捐躯的将士们，他们在令参观者怅然的同时，也在激励着人们的爱国情怀。

这一年8月，为了避战乱，陈衍全家来到建溪边上的房村。房村位于今天的南平与建瓯之间，是李宗言掌管的“西路盐帮”设关查验处。李宗言是沈玮庆的外甥，他请陈衍暂时在这里任职。这查验处背靠着碧绿的群山，面对着清澈的溪流，正屋外还有楼房和宅院，环绕着楼房的是一片梅花和桃树。登楼一望，马上让人想起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中的意境：

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但是和许多刚来这里的外地人一样，陈衍打起了“摆子”。他冷热交加，一连10天不能吃饭，浑身无力。萧夫人只好带着全家人护送他回到家里。他竟在床上躺了100多天。但是，“风帆沙鸟、烟云竹树”的吸引力太大了，到了这一年的12月，陈衍病好后又重返房村游览了一趟。第二年，即1885年正月才从房村回到家里。他听说李宗言的弟弟李宗禕（次玉）要作武夷之游，便兴致勃勃地作了一首绝句送给他：

九曲溪山我旧游，滯淫春雨慢亭舟。独留一角流香涧，让汝题诗在上头。

1885年正月刚过，郑孝胥与陈衍又见面了。交谈之下，陈衍发现归自金陵的郑孝胥已发生诗变：从原来的“始治大谢（灵运），浸淫柳州”变为“亟称孟东野（郊）”，并拿出两年来的几十首诗歌交给陈衍品评。此时他们俩时常互相往来。陈衍后来在为郑的诗集作《海藏楼诗叙》中回忆这一段的来往说：“时多过从，夜谈坐池旁树下老屋，尽两三烛而去。”据《郑孝胥日记》载，两人会面的时间为1885年二月初八、十二、廿六，三月十七、廿二、四月初二、十一、十三、十六、十七、廿三。常夜谈至“三鼓”或“月午”始去。为了感谢陈衍对自己诗歌的圈点，郑孝胥还赠给他两首诗。而陈衍也有一首回赠的诗，题为《苏戡属题其诗后即效其体》，诗中说“君诗我夙好，矜宠负高姿”。郑孝胥则认为陈衍诗有“精进”，并喜欢到处吟诵陈衍的诗歌。

很明显，郑孝胥的诗歌成就超过陈衍，所以称陈衍的诗有“精进”。而陈的诗论水平，则高于郑。所以陈衍将“同光体”诗歌分为两派，将其中“清苍幽峭”一派的“魁垒”称号封给了郑孝胥，而另一派“生涩奥衍”的代表人物则是沈曾植和陈三立。郑孝胥在这一年的春天，曾借给陈衍一本钟嵘的《诗品》，鼓励陈衍“盍仿其例，作唐诗品”。直接促成了陈衍的巨著《石遗室诗话》。陈郑两人的诗歌观点也渐走渐近，直至基本上合拍。就在这一年，他们揭橥了“同光体”这一诗歌流派。他们两人从此成为“同光体”闽派的领军人物。

陈、郑共同治诗时间长达40年。这40年间，在人生旅途上他们是知心朋友，在诗坛上则艺趣相投，这决非偶然。而两人在生命的最后14年的晚景中分道扬镳，同样有着深刻的原因。分析此中的异同，对理解这一个时段中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在这一历史背景中两位文化精英的演变，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陈、郑两人的前半生，有着太多的共同之处。他们同科中举

后促膝谈诗，又都共同关心国运，一起选择了入洋务运动领袖之幕府、支持维新改革的道路。在两人的眼中，如果将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家乡福州，那只是“水浅而舟大，风之积也不厚”，所以“九万里则风斯在下”，不久后，他们都飞到了洋务运动的中心之地。但在此前，他们同样都接受过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陈衍在24岁（1879）之前一直家居未出，10岁之前由烂熟经史的父亲陈用宾一手授读，10岁父亡之后则由兄长陈书、陈豫精心教育。而郑孝胥7岁前由叔祖郑世恭授读，7岁至17岁则跟随父亲郑守廉在北京饱读诗书，其父逝世后又归福建从叔祖习举业。福建自宋代朱子之理学形成闽学流派之后，八闽风气重学兴教，这就是福建在近代中国文化发达，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陈衍和郑孝胥就是闽学文化哺育出来的一代名人。

1885年旧历四月，郑孝胥被陈宝琛推荐到李鸿章的幕府中去，二十七日（新历6月9日）这一天，他动身离开福州，取道上海到天津去赴任，在即将离开家乡时，陈衍为他作了一首充满感情的送别诗：

送苏戡之天津

君自江南至，江南是故乡。翻飞偏独往，人海重相望。
春尽波犹绿，庭幽草自芳。不知何所事，袵触断人肠。

郑孝胥虽然是福建人，但自7岁起就到北京生活，17岁父母双亡后又回到福建，后则辗转于南京等地，所以陈衍在诗中说他们反以他乡作故乡，像鸟儿一样“翻飞偏独往”，在茫茫人海中，他们两个人相知相望。他们共同的悲哀不仅仅在于大丈夫“不知何所事”的迷惘，更在于国家形势危若累卵，令他们两人肝肠寸断。

第二年二月，陈衍与林纾等人又一次进京参加礼部会试，他们再次与郑孝胥频频过往，诗酒相会。陈衍发现都下许多人正在

传诵自己的诗歌，这些诗作都是郑孝胥所传播开来的。一转眼，陈衍又该回福建了，临别之时，陈衍又送给郑孝胥一首词：

高阳台·别苏戡

锦瑟年华，黄骢客子，一春同搁刀环，曾几番游。匆匆烛炮歌残，分明故唱贞元曲。忆当时，朝士衣冠，自依然。别去春明，出去阳关。诸君不少何戡在，更旗亭贯酒，赌取双鬟。急管繁弦，无端枕簟先安。江南倦客归欤未？唱玲珑，让我孤还。没心情，白下莺花，白下江山。

他们两个同是处于“锦瑟年华”的“黄骢客子”，此次在京都又曾“几番游”玩，然而时势堪忧，人事日非，正如刘禹锡所写的那样“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面对着“烛炮歌残”的国家，他们这两个“江南倦客”都没有好心情，何况郑孝胥要留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幕中，让陈衍一个人“孤还”，这种心情与“西出阳关无故人”是一样的令人伤悲。

回福州不久，这一年9月，陈衍便赴台湾入了同样是洋务派干将的刘铭传幕府。他们两人都希望以自己的才干辅佐洋务派，挽救国家于水火之中。

第二节 “割席华与管”，“安得长相从”

参入幕府，融入主流社会之后，陈衍和郑孝胥两人都发生了诗变。而两人诗变的转折点正是1885年两人在家乡的一番燃烛论诗。

如前所述，这一年陈衍在家里设帐授徒，而郑孝胥从金陵回到了福州，他来到西门街，找到了同科中举的陈衍。三年前他们

一认识，就开始谈论诗歌，当时两人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一次郑孝胥从南京回来，诗风已变，极力推崇孟郊等诗人，两人谈诗更加合拍。这一次在家乡的燃烛论诗，在两人的诗歌交往史上十分重要。郑孝胥入都后，还写信给陈衍，对这一往事寄予深深的怀念。陈衍后来在《海藏楼诗叙》中说：

君诗始治大谢，浸淫柳州……己丑（1889年）、庚寅（1890年）入都，君寓可庄所及官学，案上手抄诗本，有晚唐韩偓、吴融、唐彦谦诸家，北宋梅圣俞、王荆公诸家。君诗已一变再变为姚合体、为北宋，服膺荆公。而余感君言，作诗盘郁往复于中者稍久，其出之也，必有自耐咀味者。乙酉后渡海游台，北溯江，游湖南，亦遂变其前诗。

这一次家乡论诗，两人达成了许多共识。他们开始“戏称”一个新概念——“同光体”，为他们后来共同领军“同光派”打下了基础。陈衍后来在《沈乙庵诗叙》中说：

余与乙庵相见甚晚。戊戌五月乙庵以部郎丁内艰，广雅督部招至武昌，掌教两湖书院史学，与余同住纺纱局西院。初投刺，乙庵张目视余曰：“吾走琉璃厂肆，以朱提一流购君《元诗纪事》者。”余曰：“吾于癸未（1883年）丙戌（1886年）间，闻可庄、苏戡诵君诗，相与叹赏，以为‘同光体’之魁杰也。‘同光体’者，苏戡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由此可知，陈、郑两人提出“同光体”的时间在1883年至1886年之间，而这一次在家乡的燃烛论诗的时间正是1885年。他们所揭橥的这种“同光体”诗歌，反对专宗盛唐，而崇尚宋诗，避俗避熟，发扬自古以来的诗歌传统。近人汪国垣在一首诗中这样评论“同光体”诗派：“同光二三子，差与古淡会。骨重神乃寒，意匠与俗背。”

以下，我们以考察陈衍和郑孝胥两人几十年治诗的异同为切入点，来作为对“同光二三子”的窥视。为了这一窥视的方便，我们暂时在时间的跨度上做一个伸缩。

陈衍《石遗室诗集》的开篇作品为《咏史三十八首》，其中第二首曰：

子由论六国，咎其不合纵。凡事合则难，道谋无成功。
弟兄常阅墙，百忍空弥缝。割席华与管，邨下本一龙。六家
各要指，孔老宁同同。三晋楚燕齐，安得长相从？

此诗对苏辙的《六国论》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指出政治上合作的困难。其实何止是政治，在文学上的合作也常常如这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安得长相从”。陈衍在写这首诗时也许不会想到，他自己日后和郑孝胥在诗歌上的合作，虽然曾经有过长时期十分合拍的阶段，但最后竟如管宁割席，直至分道扬镳，终以“绝交久矣”结束。陈衍和郑孝胥同为“同光派”闽派的领袖人物，都在中国近代诗坛上享有盛誉。他们论诗先是“多有不合”，后则共同揭橥“同光派”并互相唱和论诗达40年之久，而最后又闹到“阅墙”。他们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确如“孔老”，不可能“同同”，两人治诗形成的轨迹是“异—同一异”这样的一条曲线，而这种异同的背后，隐含着文学与道德等深层次的动因。

如前所述，陈衍和郑孝胥相识于1882年，当时两人同科中举，便开始讨论诗歌。但起先郑孝胥论诗推崇的是汉魏六朝，两人“多有不合”。1885年，陈衍在家里设帐授徒。而郑孝胥这一年也从金陵回到了福州，他来到西门街，这一回郑孝胥诗风已变，极力推崇孟郊等诗人的诗歌，推崇“寒”、“瘦”等风格，两人谈诗渐走渐近，直至基本合拍。这一次家乡论诗，陈郑二人对诗歌形成了许多共识。他们并在此时揭橥出“同光体”这一名目。陈衍后来在1901年所作《沈乙庵诗叙》一文中称沈曾植为

“同光体”之魁杰，后又称郑孝胥为其中之“清苍幽峭”一派的首领。

郑孝胥在光绪十九年（1893）11月19日日记中说：“今宜取唐人诗二家、宋人诗三两家、国朝人一家，置案头常看之，久又易之”。^[2]林纾也是郑孝胥和陈衍的同科举人，《年谱》载：“至是，苏戡丈问其（林纾）为诗祈向所在，答以钱注杜诗、施注苏诗。苏戡丈以为不能取法乎上，意在汉魏六朝也。”郑孝胥诗中有“风雅业坠地，士心滋淫悖”，批评当时诗经“风雅”的传统已经“坠地”。郑又有诗云：“五年南国游，一卷东野诗。寄余独往意，重此绝世词。连城必良玉，三染必素丝，勿惊绚烂文，终与大璞期。夸后含陶思，超异同谢规。谁言中唐声，此是小雅遗。”^[3]总之，郑孝胥认为应取法上下：从诗经到汉魏六朝诗再到唐宋诗，再到今人诗，这种“转益多师”的看法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

陈衍的取法同样是多元的。他认为应效法“《三百篇》、汉、魏六朝而有开、天、元和、元祐，以至于无穷”。^[4]他还在《石遗室诗话》卷一中说：

余九岁时，先伯兄讲授唐诗，自秋徂冬，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诗，成诵一、二百首，上及陈伯玉（子昂）、张曲江（九龄）之作。次年乃及李（白）、杜（甫）与晚唐。十余岁时，已习举业，然有终年学为诗，日课一首者。时闽人诗极陈腐，袭杜之皮。而木菴（陈书）先兄，年二十余，出语高隽浑成，绝无所师承，天才超逸然也。所与游者，惟陈子驹明经，徐云汀孝廉……数人，则才华自喜，自命能为玉溪生（李商隐）、杜樊川（牧）近体者。伯兄久而厌之。同治季年，乃与叶损轩中书、徐仲眉副将、陈芸敏编修倡为厉樊榭、金冬心、万拓坡、祝芷塘

辈清幽刻削之词。^[5]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陈衍自幼主要接受唐诗的教育，后来转向了形式上的多样化，叶大庄（损轩）、徐葆龄（仲眉）、陈琇莹（芸敏）都是陈衍的长兄陈书的朋友，他们的诗歌祈向，大致崇尚宋诗以及厉鹗（樊榭）、金农（冬心）“清幽刻峭”的形式。

综上所述，陈衍和郑孝胥治诗之所以能从开头的“多有不合”到后来的走到一起，其共同原因是：

首先，他们两人都能冲破当时福建诗坛的陈腐气息，眼界开拓，共同打出“同光派”的旗帜，与浙派和江西派一起，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这个重要流派。“时闽人诗极陈腐，袭杜之皮”，而他们提出并促成的“同光体”却能“不专宗盛唐”，“喜言宋诗”。这样就开拓了眼界，打破了泥古不化的诗风。陈衍提出“三元”说，把宗唐与宗宋统一起来。郑孝胥还“始治大谢”，和浙派的沈曾植将“三关”中的第一关延伸像“元嘉”一样，能做活六朝。中国古代诗歌的源流上薄风骚，下逮清诗，陈郑二人的上伸下延突破了“诗必盛唐”的狭隘观点。应该说，“同光派”承继了郑珍、何绍基等人开启的宗宋的风尚，是给当时诗歌的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的，是顺应了诗歌发展的潮流的。

陈郑二人诗歌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清苍幽峭、苦涩冷隽。陈衍10岁丧父，此后便接受兄长的教育，他的诗歌及对诗的看法受陈书先人为主的影响，贯串终生。如前所述，陈书和他的诗友们推崇宋诗且崇尚“清幽刻峭”的形式，《石遗室诗话》有多处论及：

叶损轩郡丞为诗三十年，寝馈于渔洋、樊榭，语多冷隽。

损轩时时往来吴山浙水间，所为诗心摹力追于石湖（范成大）、后村（刘克庄）。

芸敏骈文学阳湖、诗学浙派，力避高调，而苦落纤仄。^[6]

陈书的性格是“绝无师承”，不专宗一家，他与好朋友们对晚唐诗歌“久而厌之”后追求形式上的多样化：王士禛的“神韵”及厉鹗等人的浙派乃至部分宋代诗人，总体上是回归自然，以“高隽浑成”、“天才超逸”的语言来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表现社会生活，时或杂有孤寂之感，苦涩冷隽。陈书的这种诗风对陈衍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陈衍一生的诗风清苍幽峭与陈书不无关系。

作为“同光派”的领袖人物，郑孝胥的诗风同样有“清苍幽峭”的特点。

如前所述郑孝胥的“作诗盘郁往复于中”、“自耐咀味”，这种风格和所谓“清苍幽峭”的意趣是十分类似的。1885年两人分别入了李鸿章和刘铭传的幕府，此后都发生了诗变。

陈衍是从王、孟、韦、柳走出来的，而郑孝胥“浸淫柳州”，诗受韦应物和柳宗元的影响。郑孝胥《录韦苏州诗题后》诗中赞韦应物“违华即冲漠，散性难自整”，《录柳州诗毕题卷后》诗中誉柳宗元“蓄悲语离奇，取幽意奥衍”。陈衍在为郑孝胥的《海藏楼诗》所写的“叙”文中说郑孝胥“乙酉（1885年）归自金陵，访余于西门街，则亟称孟东野”。^[7]其实，韦的“冲漠”、柳的“奇”“幽”“奥衍”、孟郊的“寒”“瘦”都是对李杜风格的继承和发展，都对后来的宋诗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同光体”诗歌清苍幽峭的风格正是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同样是“同光派”，同样是既宗唐又宗宋，取法多元，共同唱和了40年，陈、郑二人却有诸多不同。如陈衍提出“三元”说来推崇唐宋的开元、元和和元祐，郑孝胥又把它前推到汉魏六朝。所以两人1882年刚相识时，一开始谈诗就“多有不

合”。即使是后来两人过从甚密，共为“同光体”的领军、相得益彰的时期，两人的风格还是多有不同的。

郑孝胥功名心切，曾在诗中自我表白说“利欲苟熏心，神智必尽耗”，“平生济时怀，千万不售一”。其实郑孝胥在官场上还是比较顺利的，但他总不满足，这种情感表现在诗歌中就如陈衍所说的“多惘惘之作”，如：

事业那可说，所忧寒与饥。我如风中帆，奔涛猛相持。
不怨漂流苦，但恨常乖离，何时得停泊，甘心趋路歧。向来
负盛气，不自谓我非。

——摘自《送怪弟入都》

中宵起舒啸，夜气漫林谷。乡心茫欲碎，离念牵更酷。
我愁妇亦叹，身世类转毂。

——摘自《立秋永田町日枝山下新居作》^[8]

陈衍把郑孝胥这些诗称为“穷塞主语”。郑孝胥虽然在作诗上钦慕韦（应物）、柳（宗元），但是郑孝胥不像韦、柳那样仕途挫折却更加关心民生的疾苦，相反，他将生活中的“所忧寒与饥”换成了政治上的“利欲”、“熏心”，最终卖身求荣，这是郑孝胥的悲哀。和郑孝胥钻营官场不同，陈衍却是“有县令而不为”，一生不愿当官，辛亥革命前勉强当了3年小官或长期佐幕完全是为了维持生计，“自入民国，既不为官，绝口不谈政治”，所以诗集中少有像郑那样怀才不遇的“惘惘不甘”之作，更多的是寄情山水的恬静之唱。

儒家思想在审美上的体现是“中和之美”和“中庸之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9]，“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10]所谓“中和”、“中庸”，指对欲望关乎“德”者，持适中而不过分的态度。以郑孝胥奔竞仕途、热衷功名与陈衍“雅不喜治举业”相比，后者更符合“中和”、“中庸”的古

训。人不能没有欲望，“存天理灭人欲”是违反人性的，但对欲望要“发而皆中节”。对于郑孝胥“向来负盛气”、“我愁妇亦叹”这一类诗句，陈衍评之为“穷塞主语”，而郑孝胥夸耀自己的诗文“风骨高骞”，反过来批评陈衍“奄然媚世靡不为，使我不忍与言诗”，“石遗与师曾，媚俗徒取闹”。在这一点上，两人实际上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如本文开头陈衍诗句中所说的“凡事合则难，道谋无成功。弟兄常阅墙，百忍空弥缝”。

对于郑孝胥这些因用世心切而唱出的“睥睨一世”的诗歌，陈衍认为是“矜宠负高姿”，且“无变化”。郑孝胥晚年诗崇王荆公的劲悍廉厉，爱唱“高调”；而陈衍晚年则“亟推香山、诚斋，渐趋平淡”，喜作恬静之诗。这文学上的不同其实是心境乃至思想的不同所致。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典之语是“诗言志”，这个“志”就是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不能不与政治倾向相联系。郑孝胥晚年“丧心病狂”，成为汉奸和罪人，陈衍与之绝交，因为陈衍虽然不像郑孝胥那样介入政治，却有明确磊落的政治立场，不做遗老，顺应历史。当然，这里谈的是诗歌，我们既不能因人废言，抹杀郑孝胥诗歌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能顺势拔高陈衍。陈衍虽然在政治上赞同改革，入张之洞之幕，办洋务，强国体，但毕竟只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坚守的是诗歌和学问，即使支持变革，也只是以学者的身份发表言论，并非直接介入政治。

郑孝胥的人格是分裂的。当他写诗时，其心志回复到传统的人格理念上来，如中国知识分子所崇尚的民族气节、爱国爱家、忠孝两全等，郑写诗时不忘这一点，他批评钱谦益“牧斋才非弱，无解骨之秽”，抨击钱的变节，但到了实际行动时，自己则丧失了基本的人格，为虎作伥，充当伪满洲国的总理，同样是“无解骨之秽”。1914年他曾致书林纾云“胥甚恶国人之不义，又叹士大夫名节扫地，不能使流俗有所忌惮。”1931年后他自己

成了自己所谴责的“不义”和“名节扫地”之人。陈衍批评他政治上“大言欺世”，正是与他在诗歌中的唱“高调”是一致的，陈衍遂与他决裂。郑作诗时崇尚韦应物、柳宗元的冲淡恬静，光风霁月般的人格，所以深受评论者的好评，而实际生活中却钻营官场，为权利地位不惜丧失人格、国格。相比之下，陈衍在言行上是统一的，他不愿为官，不趋炎附势，为人也和他的诗一样清苍刚硬，如袁世凯复辟帝制，严复参加其中，名流们纷纷签名劝进，有人竟私自将陈衍的名字列入其中之“硕学通儒”栏内，陈衍知道后严词制止，终于除名。他态度坚决，毫不犹豫，后来张勋复辟，陈衍同样嗤之以鼻。陈衍坚持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的操守，一辈子磊诃刚直。因此，陈衍与郑孝胥尽管并称于“同光体”闽派之领袖，同科同乡，共同论诗达四十年；然而他们两人因为“志”的不同，所“言”出来的“诗”也便不同。到了1923年以后两人不再诗歌往来，从深层次的本质上看，两个人“割席华与管”是必然的归宿，其无法“长相从”也是很自然的结局。

陈衍和郑孝胥两人治诗的异——同——异的曲线，给我们带来的两点思考是：从其同中，我们看到了诗歌乃时代现实反映的规律；而从他们的异中，我们则看到了诗歌是个人道德乃至政治思想的真实表现。

先说前者，陈、郑二人所揭橥的“同光体”诗歌反对“专宗盛唐”的狭猛的诗歌观点，提出宗宋并主张复古而不泥古的多元化的诗歌主张，这是符合诗歌发展历史规律的，所以“同光体”诗歌能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正如钱仲联先生所说，“在这众多的诗派诗人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是‘同光体’派”。这一流派之所以影响最大，原因在于以宗宋的形式冲破泥古的诗风，能反映当时的现实，且艺术上的成就较大。

这一派当时受到“南社”等激进文学团体的“诟病”，原因在于“同光体”诗派虽反映了现实，但侧重于艺术，且“同光体”诗人在政治上相对保守；他们没有以诗歌为政治服务的明显倾向。“同光体”诗派崇尚“三元说”，以开元、元和和元祐为诗歌发展的枢纽，说明这一流派在治诗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如前所述，陈衍和郑孝胥诗歌均有一个共同点是“作诗盘郁往复于中者稍久，其出之也，必有自耐咀味者”，这与他们共同喜欢的孟郊等诗人的惘惘之作、凄苦之词一样，都是反映诗人的身世之感。陈郑两人的诗均有“荒寒”的特点，正是与孟郊的诗歌反映了开元、元和之世由盛转颓的形势相一致的，他们的心情是有共性的。郑孝胥和陈衍的诗歌均反映了对当时形势的忧患情怀，郑孝胥在辛亥革命前是爱国的，是支持变革的，他的诗句有“沧海横流事可伤，陆沉何地得深藏”、“劫后神州运渐开，救时须是异人来”。陈衍同样有爱国的诗句：“一卧忽惊天醉甚，万牛欲挽陆沉艰。上游形胜看如昨，要拱中原控百蛮”；“将睥而幡弃犀兕，妇鬻相吊聚孤骀。不知庾信江南赋，可有招魂宋玉哀”。他们都深味“陆沉”的悲哀，都具有“救时”、“控百蛮”的紧迫感。他们都介入革新和洋务运动，都高兴看到“神州”和“中原”能“形胜”或“运渐开”。当然，郑孝胥卖身投靠之后对“沧海横流”开出的药方是凶医的“虎狼药”，低首扶桑，成为历史的罪人。但他在前半生，对“流亡”之民还是关心同情的，还具有“虚愧”“捧钱”之心，对于他的两面性，我们不能不区别开来进行分析。陈庆元先生说“戊戌变法前后，郑孝胥也写过一些反映时事的作品”。陈衍则自始至终对形势均保持清醒的政治眼光。他们两人乃至“同光派”诗人的宗宋等特点，均与当时形势与宋代有相似之处分不开。陈衍和辛亥革命之前的郑孝胥，都意识到国难当头而必须图强自救，并把这些情怀反映到诗歌中，应该肯定

这些诗句是健康的和积极的。虽然我们要肯定他们相对保守的一面，但不能因人废言，一概抹杀他们诗歌的成就。特别是陈衍，他多次说过自己“身丁变《雅》变《风》，以迨于将废将亡”之世这样的话，所以他的选评诗歌的标准首先是“有感于诗与时世相关切”^[11]这一宗旨。对于郑孝胥，陈衍的评论是“海藏善说诗，尤深《小雅》，余尝闻其说《大东》矣，喜颂《离骚》，其音繁以厉，唐人则柳州东野，皆变《雅》《离骚》之遗也”。^[12]这是他们二人共同的地方。

再说他们两人的不同处。陈、郑两人虽都看到形势的“将废将亡”，因此两人的诗作以及陈衍的诗论，都是一种变《雅》变《风》，但是由于两人的“志”的不同，所以他们所唱出的曲子也是各异的，从中我们看到的是诗歌与个人伦理道德及思想情怀的紧密关系。虽然他们两人的诗歌均有“盘郁往复于中”、“自耐咀嚼”的共性，但不同也很明显：郑孝胥更多“惘惘不甘”，陈衍却更趋平淡超逸；郑有更多“清苍幽峭”，陈更多的“清新圆润”。这是与他们的性情分不开的。郑孝胥一身奔竞仕途，追求功名，虽然官运相继，但总不满足，所以总是“利欲苟熏心，神智必尽耗”。而陈衍自幼“雅不喜治举业”，勉强为官的时间不到三年。郑孝胥在诗句中多次不打自招“名心未死深可哀”，“事业那可谈，所忧寒与饥”；陈衍却更多地歌唱“菰芦”、“三径”，自甘“荒寒”和“困”、“寂”。当然，郑孝胥也并非没有吟咏归隐之作，陈衍也并非没有自嘲腐儒的句子，但是他们两人在道德乃至政治情怀上有很大的差异，到了辛亥革命后，两人则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两面性。苏格拉底曾给自己的学生色诺芬讲故事：赫拉克勒斯坐在自己人生僻静处的树下，见到两个女人朝自己走来，名字分别叫卡吉娅和阿蕾特，前者美丽性感能给

阿赫带来“幸福”，但人们却叫她邪恶；后者质朴恬美，能给阿赫带来美好，但她说：身体必须成为心灵的仆人。苏格拉底给色诺芬的道德指令是，你应该与阿蕾特在一起。应该说，陈衍的一生是与阿蕾特在一起的，而郑孝胥却始终无法摆脱卡吉娅的诱惑，终于堕落为民族的罪人。两人最后决裂，从诗歌上来看，陈衍除揭橥“三元”说外，又极力主张“学人之诗”说，以朴学和道德为旨归来治诗，而被郑孝胥指责为“媚世”、“惟俗”。反过来，郑孝胥为诗“惘惘不甘”，凌厉无前，乃至“低首扶桑”，被陈衍批为“郑苏戡诗专作高腔，然有顿挫故佳，而亦少变化，更喜作宗社党语，极可厌。近来行为益复丧心病狂，余与绝交久矣”。

苏格拉底要求他的学生要抵御卡吉娅的诱惑选择阿蕾特，孔夫子同样要人们“明德”和“止于至善”，“止”者脚跟，它应立定在“善”的位置上，不能被外界引诱。他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郑孝胥与其妾睡觉被妻所妬，弄得家里不“齐”，却托词说“国事日非”半夜起来是要“锻炼筋骨”。在陈衍看来，郑孝胥生活中的这种“大言斯世”是与诗歌中的“唱高调”一致的。郑孝胥不但纳妾，而且狎妓，陈衍则从不作纳妾之想，萧道管逝世后12年才续娶李柳。所以人们对他的评论是“文之博大昌明者，必其人之光明磊落者也……其体曲而直，其辞矫以健，于子厚、介甫为近”，^[13]而郑孝胥的学王安石，就难免是“为文造情”罢了。

当然，我们以上所分析的是从他们两个人的异同中得到的一点启发，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艺术的规律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如他们两人都强调的诗歌贵独创、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等观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第三节 “江湖满鳧雁，强半稻粱谋”

1885年，陈衍潜心治《三礼》，并初步撰就了《元诗纪事》。

1886年9月，他应刘铭传之聘，乘官轮至台湾入刘的抚部幕府。刘铭传1884年督办台湾军务，1885年开发台湾，采取“先抚番，后开垦”的策略。率先在台湾修铁路、开矿山，办理洋务。陈衍到达台湾后的第一个活动是去观“剿生番”之战。把台湾的少数民族称为“生番”是一种偏见。陈衍跟随刘铭传的部下艰难地进入原始山林后，发现“生番”并不可怕。这些所谓“生番”，其实是当地的劳动者：他们头发长长的，打着赤膊，每个人都背着重物，正在艰苦地劳动。他们腰上插着刀，用猿猴一般的眼神看着这一队官兵。当陈衍他们以微笑向他们问好时，他们也报以微笑。到达目的地后又发现“生番”已“就抚”，而“生番”的头目竟是“一白晰少年，不知何以凶拞如彼也”。实际上，大陆的汉族统治者与台湾少数民族之间当时存在许多误解，刘铭传们的“抚番”，终于使这种对立化干戈为玉帛。这一真实的历史镜头，被陈衍定格在《行抵台北内山加九岸记》这篇文章优美的文章中：

凡六十里连峰仰刺，升向天，降入地。其层级皆泥涂濡滑，开路军士以刀剗成者。至崩崖绝涧，山尽路断，则伐此岸巨木仆至彼岸，使若桥然。然非藤葛罗筱之属蒙密，覆翳其下，奔流澎湃，稍怯者不敢践而渡也。

刘铭传顺利“抚番”后，接着在台湾倡办洋务、发展经济。陈衍的《刘铭传别传》中说他“抚台，则铁路、电线、邮政、炮

台、学堂、船商、火气、水雷、诸机械制造，于举国未为之日，独先为之。”这说明刘铭传是一位干大事业的封疆大吏，但他在腐败的满清政府中却是“郁郁而亡”。

陈衍在刘铭传幕府中的主要任务是写作公文，同时，他的政治见识也为刘提供一种决策上的参考。从下面的诗歌中可以看出陈衍作为一个“书生”，对刘铭传的抚番政策的支持和赞许：

日落故营门，短衣不至鼾。长揖未云已，军膳已罗案。
书生能健步，顾语一笑粲。谅知得渠魁，已誓不复叛。贯其一
衅鼓，彘棘弗敢窜。一朝杀廿人（生番名马来诗昧者，曾一日杀
樟脑厂工人十九人，刘抚军赦弗杀），厥状殊不悍。攻心乃为上，枯
骨固可惋。日日牛酒来，就抚欢未散。书生亦何知，惟有默
赞叹。惭非甲冑士，空尔弄柔翰。

刘顺利地“抚番”靠的是“攻心”，而不是滥用武力，陈衍对此表示赞赏。虽然番“魁”马来诗昧残忍地杀人，但刘以政治教化来和抚，这种收民心、保安宁的策略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为刘的第二步行动——从经济上开发台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营造出一个和平的环境。虽然陈衍说自己“惭非甲冑士，空尔弄柔翰”，其实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给当权者提供决策的依据和参考。作为“书生”，陈衍自幼读的是孔夫子的书，懂得不论是抚番还是开发经济，都要实行“和为贵”的仁政，都要靠文化教育作基础，才会有长久的稳定和发展。

初次入军队，陈衍就能着短衣日行山路几十里，刘铭传满意地报以粲然“一笑”。刘铭传重用陈衍这样有文化眼光的知识分子，而陈衍也佩服刘铭传这样的洋务派领袖。1887年4月萧夫人奉母亲、率儿子渡海来到台北，但是，居住一段时间后，陈衍发现水土不服，妻儿多病，于是不得已，只好向刘铭传提出辞呈，刘铭传送给陈衍400块银元作为辞行礼物。这次赴台的情景

和一年零三个月即辞回的心情从《得爱苍京师书却寄》一诗的后半部分中可以读出：

……去去日以远，蛮府效参军。龟勉就羈棲，忽忽冬复春。曾从万山来，毒雾所蒸熏。蔽亏恶木阴，纷骇鸟兽群。周王马不到，谢公屐不闻。长揖谢吾子，才薄休云云。

“蛮府”指掌管少数民族的官府。陈衍以晋诗人郝隆自比，当时郝应大将军桓温召，为蛮府参军。周王指周穆王，他西击犬戎，东征徐戎。在这连周穆王和谢灵运都足迹未到的地方，他的妻儿无法适应，后两句表达了陈衍负疚的心情。

陈衍入刘幕府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年半，便于1887年底辞去幕府中的职务回到了家中。陈衍必须继续为生活而奔走，因为他这时已有4子一女，连同岳母，一家8口。1888年4月陈衍穷得将萧夫人的7条裙子都做了典当，注定他还要“旅食四方”。6月，陈衍的姻亲沈瑜庆想推荐他到闽浙总督卞宝第的官府中任处理文书的官员，却没有如愿。8月，回到福州后，四川、河南和湖南三省学使都致函邀聘陈衍为总襄校。所谓“总襄校”，就是帮助掌管教育的学使处理事务，主要任务是评阅试卷。陈衍认为河南文风鄙塞，名胜荒废，四川虽然山水雄奇，但路途险远，只有湖南较近并且文风蒸蒸日上。而且湖南学使张亨嘉又给陈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热情洋溢地渲染了洞庭湖的美丽和衡山的雄伟。张亨嘉夸赞湖南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中兴伟人，相信一定会有文士继之而起。他的热情邀请令陈衍下决心到湖南去应聘。

张亨嘉（1847～1911），字燮钧，又字铁君，侯官县人，1883年中进士。他于1888年提督湖南学政，此后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在主试湖南期间，亲自拟定题目，分为经史、小学、舆地、掌故、兵谋、算术、词赋等二三十门，以大量的题目考查学生的才学和时务知识，不为僵化的八股文所拘泥，他办事认真，

公正廉洁。1889年5月，陈衍带着一个仆人动身了，他取道长江，从安徽、湖北，进入湖南。一路上，他饱览了长江上“北来扑面飞杨花，南去汀洲长荻芽”的自然风光，又游历了人文荟萃的名胜古迹：

牛渚望青山

谢公风景地，六代洗繁华。牛渚将军镇，青山太守家。
西江一片月，满眼散余霞。坐觉千秋胜，风流尚永嘉。

遥题采石太白祠

地傍青山山便青，雨余石气碧泠泠。人生理骨当何处？
不见楼头旧酒星。

牛渚山在安徽当涂西北的长江边上，其北部突入江中，名采石矶。陈衍站在这里眺望东南的青山，在那里，宣城太守谢朓曾筑室为家，唐天宝中因此改名为谢公山。他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让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李白原葬龙山，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据白生前“悦谢家青山”遗意，于唐元和十二年迁葬此山。

溯流而上，陈衍便来到了苏轼谪居黄州时写《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地方。“大江多赤壁”，这里未必是“三国周郎赤壁”。但是，历史已随那东逝的流水而去。当陈衍来到了黄鹤楼旧址下时，楼已被火所毁，他当然想起了崔颢《黄鹤楼》中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现在这楼也随黄鹤而去了，鹦鹉洲是如此地寂寞萧条。然而，人们还是希望衡山回雁峰归来的大雁在这里陪着江水一起飞翔。

进入湖南，诗人又游览了一个又一个的名胜：岳阳楼、贾谊祠、岳麓书院、小桥墓。

岳阳楼月夜用杜韵

巴陵无所往，日上岳阳楼。山对青玉案，水环碧玉流。

由来湖海客，必渡洞庭舟。今夜兼明月，临风欲拍浮。

来到巴陵，“日上岳阳楼”，诗人登楼、观山、渡水，流连了整整一日还舍不得离开，还要在月夜里临风拍他一浮呢！拍浮为诗酒娱情意。

陈衍到任后，马上投入紧张的“秋闱”，也就是乡试的评卷工作了。湖南文风极盛，参加乡试的考生多达一万八千人，试卷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张亨嘉亲自阅卷，常常通宵达旦，不遗余力。评卷的襄校只有六人，总襄校陈衍用眼过度加上湖南酷热潮湿，连着两次眼病发作，还好碰上了好医好药，才得以痊愈。张亨嘉求贤若渴，爱才如命，而陈衍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文章修养，和张亨嘉一起兢兢比较，录取遗才，成了相马的“伯乐”。

陈衍一生追求学问与诗歌，自然便选择了“惟楚有才”的湘地。我们常说“人杰地灵”，而“地灵”还能吸引更多的杰出的人才，形成良性的循环。张亨嘉对陈衍十分赏识，这是因为张亨嘉主持考试十分认真，陈衍则以他渊博的知识给以帮助。其中一个例子是：张亨嘉每到一个地方，考试完毕就让考生提出疑问，后一一给以答复。有一个考生卷上有“明斤”二字，看卷的襄校不知其意在下面划了一道杠杠，那考生在旁边贴了张纸条反问襄校：“二字出《尔雅》，何以不知？”陈衍则在旁边题上批语加以反驳：“子只知此四字出自《尔雅》，尚未知《尔雅》本《诗经》之‘斤斤其明’，何得单举‘明斤’二字连用之？是谓不词。似此狂妄，本应发学戒饬，姑饶初次。”“斤斤其明”四个字出自《诗经·周颂·执竞》是歌颂成王康王的明德，下面接着一连用了几个叠字：“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所以该考生将“斤斤”二字拆开是不通的。还有一次有一个襄校与张亨嘉有意见，故意将考卷上的几个地方涂抹得上下不能连接，陈衍却能帮助张辨认出被涂的文字，恢复了上下的连接。这样的例子很

多，使治教严谨的张亨嘉对博学多才的陈衍十分感激。

但是，像陈衍这样的人才，却不受科举制度的青睐，1889年初，他是又一次人都应试未售，此后才于5月末来到湖南的，

在长沙，陈衍游览了贾谊祠堂、岳麓山、岳麓书院、爱晚亭，他在这里留下了一串串足迹，也留下了一首首诗歌。诗人还常常乘船到岳州游览岳阳楼、君山和小桥墓，分别留下《岳阳楼月夜用杜韵》一首五律，《游君山记》一文和《题小桥墓》四首绝句。这一年11月，诗人还乘大船沿着洞庭湖的西边作了一次环湖游。诗人由岳州沿湖边的港湾向澧州纵舟而去，但因为洞庭湖西边数百里当时就已渐渐淤积，很多地方水浅无法行船。一路上但见圖山、琴棋望、冷饭洲诸处芦苇林立，遮天盖地，无数的大雁群居在水边，人们不断地捕杀它们，到处血肉狼藉，令人目不忍睹。这些紫褐色的候鸟，在这里排列成行，一边飞翔一边悲鸣，不忍离去。这一幅惨景令陈衍联想到世上为生存而不避危险的人，他们的悲哀不是和这些鸿雁一样的吗？

不遇禁烟节，来过冷饭洲。江湖满凫雁，强半稻粱谋。

——《舟过冷饭洲》

此情此景给人以无尽的哀思：洞庭湖西边数百里渐渐淤积，湖在渐渐缩小，这是第一可悲之处；洲上的芦苇本是“蒹葭苍苍”的美景，却成了人类屠杀鸿雁的恐怖场地，令人不寒而栗，这是第二可悲之处。“江湖满凫雁，强半稻粱谋”是第三可悲之处：他由那些鸿雁的惨景联想到人世的悲哀，这里写出了生当动乱颓败的末世的陈衍的心态，他自幼饱受匪祸战乱，为躲避兵灾多次出逃，为“旅食四方”而不畏风险，深入台湾，码头落水，陈衍触景生情，对自己的不幸和当时“世之谋稻粱而不避危险者”发出感慨，富于哲理。龚自珍有一首《咏史》诗中有两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形象地写出了大丈夫的可

悲处境。陈衍此时的感伤心境正与此相同。

参考文献和引文出处：

[1] 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第 508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6 月。

[2] 转引自黄坤、杨晓波校点：《海藏楼诗集·前言》第 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8 月。

[3] 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第 10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

[4] 同 [3]，第 1060 页。

[5] 同 [3]，第 20 页。

[6] 同 [3]，第 14、66、64 页。

[7] 同 [3]，第 1050 页。

[8] 黄坤、杨晓波校点：《海藏楼诗集》第 18、2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8 月。

[9] 《中庸》第一章。

[10] 《论语·雍也》。

[11] 同 [3]，第 1 页。

[12] 同 [3]，第 1082 页。

[13] 同 [1]，第 2162~2163 页。

第三章 上海八年

(1890~1898)

第一节 “中年倦游畏鞍马，作健犹能止两鞞”

1890年2月陈衍在北京参加会试，榜出后又是落第。福州老乡王仁堪与都察院给谏冯锡仁是同年，王托冯将陈衍推荐给上海制造局总办刘麒祥，入刘的幕府。这样月薪更高，又没有湖南总襄校那样劳累。王仁堪（1849—1893），字可忍，1874年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1877年考中状元。历官山西学政，贵州副考官等，1887年回京在上书房行走。他当地方官爱民如子，“卓然有古循吏风焉”^[1]，当京官则刚正不阿，上疏谴责崇厚擅自签订《交还伊犁条约》的卖国行径，还为民请命，批评慈禧太后动用大量钱财修建颐和园，触怒过慈禧太后，被贬为镇江知府，殉职

时年仅 44 岁。而 1889 年郑孝胥在北京考取内阁中书时，正是住在王仁堪家里，两人关系十分密切。通过郑孝胥的介绍，王仁堪也成了陈衍的同乡好友。

陈衍写信和张亨嘉商量，张亨嘉起先回信说：和陈衍分别，“如处幽而去其烛，如涉大海泛万斛之舟而不得航师”，他不想失去陈衍这个得力助手，而要“劫足下以来”。但第二封信则考虑到陈衍“家累重，学幕薪薄事繁，挚好如吾两人，必责诺足下，使辞十万而受万，心所不安，则前言亦所谓戏之耳”。于是陈衍便来到了上海，入了刘麒祥幕府，并兼方言馆的汉文教习，再加上授徒卖文，陈衍至此才开始摆脱了经济上的拮据境地，“旅食赖以不困”。7 月份，陈衍全家移居上海。

1892 年正月，陈衍的母亲逝世，回福州奔丧。到了四月才回到上海。在上海，陈衍与同乡叶大庄过从甚密。叶大庄是陈书的朋友，字临恭，号损轩，陈衍评他为“诗文格调在牧斋（钱谦益）樊榭（厉鹗）之间”。叶大庄比陈衍大 12 岁，1884 年中法马江海战爆发时，他丁父忧在家，组织团练，带领乡人抵抗法军入侵。中日甲午战争时，他正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他同样积极备战，抵御日本侵入长江。而他担任江苏邳州知州后，则大力治理当地的水灾，呕心沥血，殉职时年仅 55 岁。叶大庄这时正在上海任司法官，陈衍和他成了志同道合的诗友。

题损轩《吴门集》后

解吟得雨彻宵听，判牒还来坐讼庭，苦笋亦多螃蟹有，只除少个冷泉亭。

次损轩韵

扬州司理王贻上，书了公事夜接宾。过江入吴诗百首，十旬于役太湖滨。后来司理官久废，大邑谿吏斯甚伦。君今奉檄谿斯邑，淞滨繁会争辘轳。都厅悬知满颂系，无暇渔洋

为替人。车马流水天涨尘，笙簧千指歌沸唇。杜郎纵工赋豆蔻，鬓丝可奈非青春。仆也四年此流寓，寒蝉所以瘖不呻。还山夜谈觅祖约，投辖此地谁陈遵。君言听讼有常晷，尚可嘯傲余昏晨。昨携行卷副腰腹，肩輿鼎来江之滨。卷中便是《入吴集》，压尾林际望春申。菰芦寂寞赖君辈，脱衫苦笋休断断，君看经师出大令，金坛曲阜双嶙峋。

陈衍和叶大庄是同乡知己，叶来到上海“坐讼庭”其中苦乐参半的味道令人深思，而“苦笋”就是一种苦中有甜，甜中有苦的食物。当然，在这里听雨观瀑，不如杭州西湖灵隐寺旁边的冷泉亭，但是，此雨既能“解吟”，是不妨“彻宵”而听的。以上第二首接着写叶大庄在这里当司法官“谏吏”，之所以苦中有乐，是因为“过江入吴诗百首”，“书了公事夜接宾”，和陈衍等诗友唱和。上海这个“繁会”的地方，诉讼事务是很“辘轳”（曲折）的，但为官如民父母的叶大庄常能“颂系”（宽容）为之，把政务处理得很妥贴，因此，他尚可在这里“嘯傲”吟诗，还研究训诂多年。“君看经师出大令，金坛曲阜双嶙峋”指的是段玉裁、桂馥这两位清代治《说文解字》的大家，他们都当过县令，段是江苏金坛人，桂是山东曲阜人。叶大庄就这两位“双嶙峋”的“大令”和了一首诗，也用两位治小学的县令为内容，与陈衍的诗句相匹敌：“洙 滋令长虽异代，中天万古双嶙峋”，说的是汉代作《说文解字》的许慎当过洙长，晋代作《字林》的吕忱也当过滋令。叶大庄诗歌的特点是喜言考据，“所为诗心摹力追于石湖、后村”^[2]，他以学问为诗，追崇范成大、刘克庄等宋代诗人，这些取向均反映了“同光体”诗的特点。

1893年3月陈衍回福州省兄。一年前，母亲已经去世，而陈衍离开如父般的长兄陈书出外旅食也已经十多年，陈衍深感一种骨肉分别的“凄恻滋味”。这一回在家中与陈书相聚时间长达

25天，他们在家里饮酒和诗，以此来抚慰“远别”的痛苦和相忆的牵挂。下面这首诗题目特别长，情意也特别长：

春暮归家与伯兄相聚者二十有五日得读《客冬大雪》、《与弢庵阁学叠韵》诸作春尽日既别来沪殊不可为怀得诗一首亦次弢庵韵

颍滨彭城两绝句，凄恻滋味童已谳。十年落落四五见，何似割舍成瞿昙。乡山去年皑南雪，我独憔悴行江潭。银杯缟带盛倡和，南冠紫者毋往参。今年航海暂归去，剑铉海上穿层嵒。绿榕城郭是海物，饱啖不饮颜亦醅。芙蓉环碧两载酒，栗留为我鸣声鹈。登盘乡味遍螺蚌，四簋不数雉与鹤。淋漓论诗杂听雨，尖叉叠韵搜两三。倾筐倒篋见佳什，片段宝贵如圭担。诗涛诗骨涌且耸，恍遇东野穷披襟。江东菰芦得君辈，渭城何苦听何戡？（久寓沪上，无闲时聊复听戏）掉头往返四千里，博此秉烛连宵谈。夜阑见跋且屡易，几日栉发行又耗。风驰电卷骊驹至，饯春情绪同醅醅。诗人兄弟例远别，那觅求点南山南。登高寒食黯相忆，看花把酒谁能甘？

“颍滨翁”是苏辙晚年隐居时的别号，此时的陈书已与陈宝琛在家隐居多年。“瞿昙”是和尚的意思，俗话说：“和尚出家不顾家”。陈衍十多年来“旅食四方”，只回过四、五次家，如同和尚一样难见兄长之面。这种聚少离多，使陈衍情难割舍。去年的福州，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二三十年来不曾有过的。“南冠客思深”的陈衍今年回到家乡，又一次品尝到故乡的山珍海味。听着黄莺（“栗留”）动人的歌唱和着春雨的“滴答”声，诗人兄弟秉烛论诗，通宵达旦。然而相聚是短暂的，转眼又来到了上海，两千里相隔，又只能似王维兄弟一般，登高相忆，“遍插茱萸少一人”。“看花把酒”，此情此景谁的心中能够平静下来呢？诗中赞誉的苏辙、孟郊，分别为元祐、元和时期的诗人。陈衍推崇的“三元”

说指的就是唐代的开元、元和与宋代的元祐，这是“同光体”理论之一。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他比陈衍大8岁，是陈衍和陈书的共同朋友，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内阁学士等官职，曾以敢于直谏慈禧太后著名，与张之洞、宝廷、张佩纶等号为“清流”。1884年的中法马江海战惨败后，张佩纶遭查办，陈宝琛也受牵连，同年“丁母忧”回籍后，在家闲居25年。在这长期的家居生活中，他与一样在家闲居的陈书经常往来唱和。

陈衍这一次回福州，款待他的朋友中，还有一个龚易图。龚在城南建了一个“芙蓉别岛”，其中的水石亭林令陈衍留连忘返。到上海后，他寄回一首绝句：

寄题龚霭仁布政芙蓉别岛中多好石

环碧池头水槛凉，荔枝虽好不能尝。算来未及芙蓉岛，
一品曾容拜阿章。

“阿章”是对米元章的昵称，这位宋代画家自称“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龚易图家中的园林令人想起米芾笔下的山水园林。

这一年的秋天，福建的乡试解元是年仅19岁的林旭，他是沈瑜庆的女婿。沈瑜庆是陈衍的姻亲，陈衍的六姐嫁给了沈葆楨的长子沈玮庆。瑜庆是玮庆的弟弟，他的爱女叫沈鹊应，嫁给了林旭。开头，沈瑜庆看上了林旭的文才，但又因林旭是个孤儿而有所犹豫，陈衍作为沈鹊应的恩师，劝沈瑜庆收这位难得的人才为婿。林旭自幼家贫，常靠借阅书籍来饱读诗书。他工于词赋，博闻强记。中举后广交当时的名流如陈宝箴父子、梁鼎芬等。而林旭最佩服的诗人就是陈衍，下面几首诗是一直挂在嘴边的：

游后湖

步登北极阁，俯瞰玄武湖。模糊泽与陂，历乱荷与蒲。

驱马至湖濡，一道柳夹扶。仿佛苏公堤，跨湖为此途。跃转红板桥，瓜畴及芋区。团焦三五处，草树相枝梧。似行冷饭洲，云水侣雁凫。亭榭水一方，净境归浮屠。芙蕖既以花，弥望青叶铺。壁间官有示，算此田田租。竹苇文酌篇，蒲鱼职方图。悠然愿一廛，为氓于菰芦。

林旭当上沈瑜庆的乘龙快婿后不久，即随沈瑜庆到上海、南京、武昌各地漫游，陈衍笔下那美好的玄武湖，就像一幅图画，勾起林旭对南京的印象：湖水与堤岸的边界像是国画中模糊的线条，“历乱”之中灿烂的荷花和菖蒲仍然参差地开放。柳树夹道，穿湖而过似杭州的苏堤。“瓜畴及芋区”之间安上一座红色的板桥，而草树横斜相支的地方则配上三五座圆型的草舍（“团焦”）。再步入湖边的沙洲，令人想起洞庭湖边上的冷饭洲，鸿雁们生于斯也被残杀于斯，虽然有娇人的荷花，田田的荷叶相衬，田租赋税不能不压得人人为稻粱而发愁。“职方”就是地图，这里的竹苇和鱼儿都让人想起文章和地图，诗人们恨不得都无拘无束（“悠然”）成为一个隐居的乡氓。

过半山寺

策马孝陵卫，回憩半山寺。到门霜叶红，惬我萧散意。多事万言书，慷慨立亦帜。竭来归定林，惘惘行与睡。坐看青苔上，细数林花坠。渡头赴暝色，钟阜割冷翠。第一五七言，散体已其次。屋角谢公墩，我名与公字。今昔此苍生，愿拜何人赐。

孝陵卫和半山寺都在南京城北面，半山寺曾是王安石的故居，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慷慨廉厉，引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宋朝从此“多事”。诗的末尾说王安石曾写过一首题目叫《谢安墩》的诗歌，怀念曾在此登临的晋太傅谢安，谢安字安石，所以诗中有“我名与公字”之句，陈衍此时也来此登临，拜赐这

些“超然有高世之志”之士，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林旭最喜欢称颂陈衍的诗歌，陈衍对这位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同乡后生也是赏爱有加，他在一首题为《五言一首赠晚翠》的诗中称赞林旭（林旭号晚翠）：“吾乡山水秀，往往钟黄童。”把他的文才与王粲和张华相比：“体弱王仲宣，情多张司空。”

1894年5月，在湖北宜昌任盐官的沈瑜庆出资为陈衍刊行《元诗纪事》，沈常顺长江而下到上海与陈衍谈诗歌论国事，陈衍有一首诗为：

爱苍出资代刊《元诗纪事》赋诗为谢

时海氛甚恶连夜过宿剧谈

我有元人本事诗，敏夫樊榭是吾师。十年搜讨拼全力，一诺开雕拜重资。著述等身系画饼，戈船横海亦围棋。南楼办得凉千斛，再把胡床就月移。

敏夫和樊榭分别是南宋及清代文学家计有功和厉鹗的字，他们曾撰《唐诗纪事》和《宋诗纪事》，现在陈衍续作《元诗纪事》。作为一介书生，他虽然著作等身，但对国事来说犹如画饼，当时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读书人为国事而深深地担忧。从1894到1895这两年，陈衍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是抗议日本侵略和谴责甲午战后朝廷的割地妥协的政策。上面的这一首诗，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诗人的心情。作为一介书生，“著作等身原画饼，戈船横海亦围棋”，剧谈国事乃至“连夜过宿”，诗人的忧国之情是如此地强烈。在《五言一首赠晚翠》的最后两句说“浪战提偏师，何如善谋攻”。在《杂感十七首》中有“念此竟偷闲，踟躕阴可惜”，他为自己报国无门感到惋惜。“旨蓄不御冬，零落将奈何”则引用《诗·邶风·谷风》中的典故“我有旨蓄（贮藏的美好食品），亦以御冬”，对国势民生深怀忧虑。《试礼闈毕寄伯初

家兄江南》的最后两句是“併将时事沧桑感，忆弟空斋想复同”。当时陈衍年近六旬的长兄陈书被沈瑜庆聘入筹防局幕中，所以陈衍想象陈书在南京的空斋中想念自己的情景。

陈衍这两年中还多次到南京与郑孝胥会面。郑孝胥自从1885年入了李鸿章的幕府之后，于1889年春夏间考取了内阁中书，历任同知、镶红旗官学堂教习等官职。1891年郑跟随李鸿章的嗣子李经方出使日本，担任驻日本使馆书记官，后升任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他随李公使下旗回国。这时沈瑜庆被两江总督张之洞聘为筹防局总办，于是沈瑜庆向张之洞推荐郑孝胥和叶大庄为筹防局文案委员。张之洞总是将文化精英和政治人才集合在自己的麾下，他于是向沈瑜庆问及陈衍，意欲延入幕府，但沈告诉张：陈某家穷，正在苏松太道幕府中，待遇较好，不便影响。但是，张之洞聘用陈衍的想法并未打消，因为他前不久在由御史出知云南昭通府的福建人林绍年（赞虞）的扇面上读到陈衍题送的诗句，至为激赏：

绝句三首送林赞虞之官昭通（之一、三）

不遗词臣祭碧鸡，蒙恩出守一家携。君看六诏风烟句，锦字缄题独拚闺。

印本连舫费重资，轻装山路免倭迟。（昨同君向市肆市石印书）。赠行不敢将他物，方斲欹斜七字诗。

以上第一句讽刺那些柔媚的侍从之臣（“词臣”），以与林绍年的直言敢谏形成鲜明对比。“六诏”代指云南一带，清人陆元辅有诗句曰“三江日月孤臣老，六诏风烟万里归”。“连舫”即船，“倭迟”即迂回意，“方斲”即方扇。林绍年为远行而轻装上路，陈衍当然只能送一把扇子了。但那“欹斜七字诗”却令张之洞爱不释手，虽然只是无意间看到。

1895年3月，陈衍人都应试，听说政府将批准《马关条

约》，他与方家澍、林纾、卓芝南、高啸桐等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割地。这封上书由陈衍起草，但是递上之后，犹如石沉大海，朝廷怎会答理几个书生的抗议文章呢？

1894 和 1895 这两年，陈衍在上海当幕僚，陈书和郑孝胥在南京当幕僚，他们一群福建老乡常常有机会相聚在一起，而且往往一谈就是半天。话题自然主要是中日关系和家国的危机。在《郑孝胥日记》中有许多关于他们谈话内容和郑孝胥的想法的记录，如 1895 年新历 1 月 17 日记载：“午后与爱苍谈及和议。余曰，若朝廷能因役翻然改图，更新政令，变易纪纲，造铁路，讲吏治，振商务，修战具；然后命一介至日本，晓以利害，与之罢战修睦，吾奉命而行，必能折其气而发其衷矣。若以苟安旦夕为念，虽幸而成议，孰能善其后者乎？”无论是陈衍们的上书还是郑孝胥们对张之洞提出的建议，都表明当时大多士人反对议和的爱国情怀。《马关条约》被清政府批准的消息传来时，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可复问，惨哉！”“中国岂皆狗彘耶？遂为机上之肉！”而陈衍则在诗中唱道：“夕阳来登燕子矶，满目山川涕欲隄。”“一朝将相既无分，骑马骑驴要分畛。”大家的心情是共同的，有的登台痛哭，有的咬牙切齿，有的辛辣嘲讽！

以上提到的叶大庄、陈书、龚易图、林旭、沈瑜庆（爱苍）等人均为“同光派”闽派的骨干诗人，可见“同光派”诗人大多关心时势，支持变革。如前所述，陈衍和郑孝胥早在 1885 年时就已开始“戏称”“同光体”这一概念。9 年来，陈衍不论在故乡福州，还是旅食地上海，都能与他的众多诗友们唱和或讨论“同光体”诗歌，先是同乡，后来还有他的门生。实际上，“同光体”闽派已经在他的周围形成，而陈衍已是他们的盟主，因为陈衍一是以诗歌为生命，有着执着的追求，二是能创作脍炙人口的

诗歌，三是会对“同光体”诗歌进行理论上的总结。

1894年8月清政府下诏正式对日宣战，然而清军平壤失守，黄海战败，第二年（189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下面这首诗就是陈衍在这期间创作的。陈衍虽然是一介书生，不涉政治，但忧国之怀，溢于言表：

岁朝六日自金陵归沪上拉杂书

事寄伯初家兄并视爱苍

昔者柴桑旧令尹，儿子门生舁篮笋。急装昨日渡江来，千载此风忽未泯。石城出门例驴背，驮我诗卷如束捆。颇闻发思风雪中，歇后郑五不自哂。舒王老去蕲王来，湖上钟山方接轡。一朝将相既无分，骑马骑驴要分吟。中年倦游畏鞍马，作健犹能止两靷。夕照来登燕子矶，满目山川涕欲陨。南来懒作过江鲫，北顾忍问登州蜃。人日题诗未可知，寒食出游更难准。忽忽离家已二年，此语定遭荒伦鞫。呼儿且复渡江去，婚嫁粗毕当远引。吾兄倘有芝芙梦，作速买红为阿敏。

陈衍于1894年底带着儿子陈声暨到南京门生钱家骥家中度岁，正月六日回到沪上。上面这首诗表面看来都是拉家常，其实是从身世言及国事，朝廷无能，“海氛”（海疆动乱的形势）甚恶，诗人悲从中来，语多讽刺当政的衮衮诸公。陶潜晚年曾在柴桑隐居，有脚疾，外出辄命二儿以篮舆（轿子）舁（抬）之。而此时的陈衍身边有儿子和门生一起伺候他，正与陶潜类似。“歇后郑五”指唐代的郑繁（排行第五）以诙谐的“歇后语”入诗，造成讽刺时势的效果。诗人讽刺朝廷大敌当前只知道频繁的调换官员，“舒王老去蕲王来”，像走马灯似地前后“接轡”，对着满目山川诗人欲哭无泪。东晋王朝在江南建立后，北方士族纷乱地来到江南，所谓“过江名士多于鲫”，难道大家就此忍心不问北

方的大好河山吗？“登州蜃”指蓬莱附近的海市蜃楼。“荒伧”指南人讥北地荒远，北人粗鄙，“鞦”是笑貌，诗人以这种“郑五歇后体”隐刺国事日非，感到前途堪忧，流露出悲凉的情绪。但是，正如诗中所言“中年倦游畏鞍马，作健犹能止两鞦”，诗人虽已人到中年，但自信健康时仍能驾车沙场。

1896年正月陈衍再次游览金陵，回沪上时经过京口，住在茅子贞家里，忧国伤时的心情仍然郁结胸中：

京口访茅子贞留宿晓起同登北固山

留宾避雨茅季伟，约我晨起游金焦。肩舆出城先北固，高高石磴连山腰。江山京口信第一，烟霏澜浪殊昏朝。人愁茫茫百端集，我方对此烦忧消。石飏多景尚突兀，甘露海岳俱萧条。中兴将帅竞祠庙，仲谋寄奴何寂寥。稼轩怀古题词日，惟闻铁甕陶寒潮。雄兵天堑足扼守，何事饮马愁天骄？纓冠被发谁肯救，谋国乃欲西邻招。登高坐念又叹息，冻雨不止还潇潇。

“飏”同帆，北固山上的甘露寺建于三国吴甘露年间，唐李德裕加以增辟。李德裕曾收复幽、燕，平定回鹘和昭义军节度刘稹。“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3]诗人面对一片萧条的江海和高山，百忧交集，想起了当年的李德裕、孙权和刘裕，他们这些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英雄们已寂寥于历史的深处，但当今的“中兴将帅”和“天骄”们却只会在江边饮马发愁。“纓冠被发谁肯救，谋国乃欲西邻招。”指的是当时一些无能的将领们竟然提出把长江归英国保护，以抵抗日本的战舰。“纓冠被发”典出《孟子》，形容急切地救人。这些腐败的满清官员，“乃欲”将救国大业的希望寄托在“西邻”身上，令诗人在潇潇“冻雨”之中“登高坐念又叹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理念。“同

光派”诗人中的多数人虽然不像那些激进派诗人那样直接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但他们大多有坚定的爱国立场和维新的改革志向，叛国或苟且的只是少数，不应笼统地对他们加以“诟病”。第二年（1897年）7月，福建同乡陈季同、绎寿彭、洪述祖等人在上海集资开办了一个《求是》杂志。作为读书人，他们痛感中西交涉以来，我国一再受侮辱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闭塞而不通晓外国情况。所以，他们办杂志的目的在于介绍外国情势，翻译西方格致实学以及法律规则，评论是非，揭发弊端，唤醒国人。林旭认为这一杂志非陈衍来执笔润色不可，于是陈衍又兼任《求是》主编，“撰文主张在中国设洋文报馆，作为国家对外喉舌，延聘贯通中外时务之人，举所谓务财、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筹议切实可行的整顿之法，广为论说”。（陈步《陈衍经济类著译选编·题解》）该杂志每月出三册，一时风行海内，捐资助刊和预购的人纷至沓来。陈衍的长子陈声暨也到杂志馆当了校理。但是这一杂志办了半年时间，第二年开春，陈衍被张之洞招人武汉幕中，杂志便停办了。

这一年8月，刘麒祥兵备因病辞世，陈衍失去了“旅食赖以不困”的这一幕职。回想他在上海幕中一待就是8年，原因在于陈衍缺乏当官的兴趣。陈衍以诗歌为性命，将诗中的情趣融入人生之中去，当他的生活将再一次失去来源时，唱起了他最神往的诗歌之一——高适的《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然而，陈衍虽然甘愿当烟波钓徒，却连陶渊明都不如：故乡无可芜之田园，只能浮家泛宅，四处为家！每次吟诵《邱迟与陈伯之书》，他对自己的蹉跎岁月毫不后悔：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悵！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性也，将军独无情哉！

陈衍一家此时住在高昌庙，在上海这样房屋拥挤的都市，他所租之房屋却很宽敞：前后两进，每进三间，中间的院子很大，种上老梅、梧桐、芭蕉、桃、杏等花树。居所旁临大河的一边隔着一道篱笆，上面爬满了金银花。河边有台阶可通河里打水洗涤。这幢房屋前后空地横竖几丈宽，旁边有几间邻舍。小土堆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在这个被题名为“小浣花草堂”的居处，陈衍时常沉醉于高适、邱迟们的意境之中。在繁忙的公事之余刊成了《元诗纪事》45卷，完成了《尚书举要》五卷。

时间很快便到了年底，眼看再过三天除夕就要来到了。家中的腊梅一起开放，煞是可爱。陈衍正斜倚在长廊边上吟诗赏梅，这时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原来是邮递员送来武昌的电报：梁鼎芬代张之洞传话给陈衍，聘他入幕，其中有“久切饥渴，欲请新正到鄂一谈”等语，并催促陈衍给以复电。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份电报，是郑孝胥发来的，电文上说张之洞读了《求是》杂志上的文章后，一定要见一下陈衍，听说郑孝胥和陈衍是同年并是好友，就发了一份长电，邀请陈衍。电文上有“文章光明伟俊，读之令人神往”等话。

郑孝胥此时已入张之洞幕府有三年多时间了，但郑孝胥的身份与陈衍不同，陈衍长期只当幕客，而郑官运亨通，且政治上自视极高，不会长期甘当幕僚。他自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随公使下旗归国后，入了张之洞的幕府，于当年11月被张之洞聘为总督署洋务文案。在日本3年期间他曾研究明治维新与日本富强的关系，研究欧美诸强国对日本的影响，形成了他对亚洲国家求富强的一整套看法。甲午战争期间，郑反对议和，并对张之洞的洋务运动的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谋划。1896年郑先后被张委任为洋务局提调及商务局委差、学务处总办等多种职务，他实际上成为张之洞的首席高参。1898年，郑孝胥以同知擢用道员，

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乞假南归，又入了武昌张之洞之幕。郑一直是政界中心的要人，而陈衍长期居幕，只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从中可看出两人的政治态度的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两个人诗歌和书信上的密切往来。陈衍后来在给章太炎的信中谈自己对“奔走国事者”不敢攀援，这是他的一贯态度。以陈衍的性格，对于政界人物不接触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虽发生关系，但将主要精力和兴趣落在诗歌与学问之上。郑孝胥在变法失败后又被张之洞委办湖北全省营务处，^[4]被铁路督办盛宣怀委派为芦汉铁路（今京汉铁路）南段总办。陈衍对郑孝胥同样保持这种以治诗歌为主的关系。^[5]陈衍被梁鼎芬、郑孝胥介绍入张之洞幕府后，与沈曾植他们在武昌一起唱和，成就了“同光体”诗歌的一段黄金时光。

如果把陈衍和郑孝胥这些人入了洋务派领袖幕府的文化精英算作一个派别的话，这个派别还包括众多的一代宗师，如陈三立、沈曾植等人。这一派人扎根于传统文化，努力守护着民族精神，同时又支持变革。与激进派相比，他们往往被指认为保守思潮一类人物。但实际上，他们不仅与张之洞等洋务运动领袖们心心相通，而且与康、梁、章等激进的维新变法派的心也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从宏观上看，这三派人都有两点共同之处：一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尊重，二是都能接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他们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西方文化。^[6]这三个派别都与顽固派有截然不同的不同。正像葛兆光先生所说，“在中国，在中国知识界，在几乎每一个中国士人心里，都不是非此即彼的民族主义或世界主义。尽管我们说西方的冲击在中国激起了民族存亡的忧患和民族主义的热情，不过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背后，偏偏又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世界主义背景”。^[7]

以陈衍为例，一方面他是从传统家庭出来的旧式士人，对传

统中国文化先入为主，另一方面，诞生于福建这一沿海开放的地带，他主动地接受了近代欧风美雨的洗礼，关心西学的输入。从第一方面来看，早在陈衍年轻时代，当时读书人大都醉心于八股文，很少能治实学，这种实用主义的气氛在福州尤其盛行。后来张之洞出版了他的《辘轩语》和《书目答问》这两部著作，给年青人指出读书的门径。当时福建巡抚王补帆（凯泰）在福州设立致用书院，专考经史，使张之洞指出的这一条读书门径在福建蔚成风气。陈衍19岁那一年与二兄陈豫一起考进了致用书院，在张之洞、王补帆的影响下走上了治实学的道路。从第二方面来看，当时在福建，西方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广。陈衍的同乡好友中就有两位后来成为译界泰斗、同时又是国学大师的人物，这就是思想家严复和文学家林纾，他们对陈衍思想的影响是有迹可寻的。

陈衍在上海的八年，目睹了国难当头和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形势堪忧。他深知张之洞实行“中体西用”政策挽回国势的良苦用心，张之洞在甲午战败后也主张变法，但他的变法与戊戌变法不同，属于稳健一派。现在陈衍一再受到这位令自己敬重的大臣的邀请，于是便下定决心到武昌去为这位精明干练的湖广总督助上一臂之力。这一天他向武昌回复了电报：“开正有江轮即行。”陈衍对着庭院中的满树繁花吟出五律一首：

村居移梅二树开花粲然

繁花开满树，肯共岁寒时。枝有盘虬势，人添似鹤姿。
短廊看徙倚，浅水照嶷嵒。对汝情殊愧，从无警策诗。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总能从梅花中品味出这种粲然之美，这其实是一种“主观力量的对象化”。诗人心中有一种对抗岁寒而弥漫开来的一种坚强而独立寒江的丰富美感，这种“主观力量”“化”到了梅花这一“对象”身上，从严寒中的繁花到盘龙般的

花枝又联想到独立寒江的“鹤姿”，对比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陈衍总感到自己的诗句不如林逋来得“警策”，因此而内感“殊愧”之情。封疆大吏张之洞作为一员“儒臣”，喜欢广纳文人雅士，他早有延请陈衍的想法，这一次下决心聘陈衍担任官报局总编纂是因为看到了陈衍主笔的上海《求是》杂志的原因。

《求是》杂志的主旨在于了解西方，思考西潮冲击下的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中国在近代因落后而挨打，故思变求变，向西方寻求真理。林毓生先生认为，中国士人有一种从先秦即存在的传统，即“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陈衍和他的同乡林纾、严复一样积极引进西方思想。这些有眼光的诗人不仅饱读传统文化而且接受西方思潮，开民智是为了图国强，上海的这些“俊伟”的文字，从内容到形式都吸引了远在武汉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慧眼。

张之洞这位正做着强国之梦的清政府的重臣，在武汉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开拓。仅以1890年创建的汉阳铁厂一例就能说明他的雄心伟杰：这座拔地而起的东方第一座近代钢铁厂比日本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还早了七年。

第二节 “我有元人本事诗，敏夫樊谢是吾师”

陈衍的《元诗记事》草创于1881年，1885年粗成，1894年由沈瑜庆出资代为刊行，1896年又加以补辑，于1919年再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元诗纪事》之后，陈衍又著《辽诗纪事》和《金诗纪事》。他自己写的《辽金元诗纪事总叙》中说：

诗纪事之体，专采一代有本事之诗，殆古人所谓诗史也。国可亡，史不可亡，即诗不可亡。有事之诗，尤不可亡。然或以为异族而主中国，则其国之诗，可叫其亡，于是宋之计有功氏、清之厉鹗氏、陈田氏、有《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而辽、金、元阙如……

所谓“本事”，指关于诗歌中所依据的故事情节、主要内容或原委。唐代的孟启曾作《本事诗》，记载唐人诗的本事。后来又有计有功搜集唐代文献及口耳相传的诗歌轶事，汇成《唐诗纪事》，厉鹗作《宋诗纪事》，陈田作《明诗纪事》。陈衍这里所指的“诗纪事之体”就是指继承计、厉、陈的体例，对所辑诗歌前有作者、出处本事等内容的介绍，后有点评这样一种诗论体裁。古人有以诗证史的习惯，陈衍在他的《元诗纪事·原叙》中说：

钱竹汀（大昕）先生，尝病《元史》疏芜，欲采各家诗文集及笔记小说之类，改修《元史》……独念竹汀先生，博极群书，尤熟元事，果如计，厉二书之遍采诗林故实，其卷数必裒然数十计……纪事之体，当搜罗一代传作，散见于笔记小说各书者，不宜复收寻常无事之诗矣。

因为要“搜罗一代传作”，所以《元诗纪事》多达45卷，除民歌外，作者达803人，可谓卷帙繁巨。我们分别以“卷一”中的文宗皇帝和顺帝两人的诗各一为例来品味一下这种“以诗证史”式的“纪事体”的体例：

文宗皇帝：帝名图帖睦尔，武宗次子，初封怀王。即位，改元天历、至顺。在位五年。

《黄文献集》：天历二年三月，上肇开奎章阁，延登儒流。至顺二年正月，御制阁记成，万几之暇，亲洒宸翰，书阁记，刻置禁中。

自建康之京都途中作

穿了毳衫便着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两三点露滴如雨，五六

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草木子》：梁王登宝位时，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尝作一诗云云。

《月山诗话》“明太祖《早行》诗：“忙著征衣快著鞭，转头月挂柳梢边。两三点露不为雨，七八颗星尚在天。茅舍鸡鸣人过语，竹篱犬吠客惊眠。等闲拥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案：此篇乃元文宗自集庆路人正大统，途中所作，不知何以载入明祖集中？且窜易十数字。又案：“两三条电欲为雨，四五个星犹在天。”乃五代卢延逊《山寺》诗，文宗剽取之。

顺帝：帝名妥帖帖睦尔，明宗长子。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元统、至元、至正。明太祖灭之，奔沙漠，元亡。

御制诗

父疾精虔祷上天，愿将己算益亲年。孝心感格天心动，恍惚神将帝命传。

母渴思瓜正岁寒，那堪山路雪漫漫。双瓜忽产空岩里，归奉慈亲痼疾安。

《榕阴新检》：元王荐，字希贤，福宁人。父疾，祷天减年以益父寿。父绝而复苏，曰：适有神人，皂衣红帔，语我曰：汝子孝，上帝赐汝十二龄。后果符其数而卒。母沈氏，病渴思啖瓜，时冬月不得荐，至深壑岭，值雪，避树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见石岩间青蔓离披，有二瓜。摘归奉母，渴遂止。至正间，福建宣慰司上状旌之。御制诗云云。

以上《榕阴新检》中所载故事即所谓“本事”。元朝的帝王，把最深重的民族压迫加在汉族人民身上，施行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却宣扬汉族人的忠孝文化思想。可见汉族诗歌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巨大的吸纳力量。

其实，以“本事诗”来证明历史并不是诗歌艺术的主要功能，陈衍的《元诗纪事》所整理、注疏的大量元代诗歌乃是以“纪事”为体，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特别是那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所唱出的诗句，有的寄托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有的记述了诗人周围的生活景象，有的描绘祖国的

壮丽山河，有的则见证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我们以卷十五中所选萨都刺的部分诗歌为例来看看《元诗纪事》中搜辑的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深刻的生活内容和清新的艺术风格：

萨都刺：字天锡，别号真斋，本答失蛮氏后，为雁门人。登泰定丁卯进士第，官至河北廉访司经历，有《雁门集》。

……

《至正直记》：京口萨都刺本朱氏子，冒为西域回回人。长咏物赋诗……

送欣上人笑隐住龙翔寺

江南隐者人不识，一日声名动九重。地湿厌看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钵云寒卧夜龙。何日相从陪杖履，秋风江上采芙蓉。

《闲中今古录》：萨天锡尝有一诗《送潜天渊入朝》“地湿厌闻天竺雨”云云，闻者无不脍炙，惟山东有一叟鄙之，公以素愜意，访问其故。叟曰：“此联措词固善，但‘闻’字与‘听’字合耳。”公曰：“当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公诘其“看”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来看雨’。”公俯首，拜为一字师。

案：《今古录》作“送天渊”，《雁门集》作“送笑隐”，今题从《雁门集》。

立秋日登乌石山

海国山四围，繁华坐消歇。楼观沈夕阳，鸿雁下秋色。

水边无丽人，石上多古刻。感此暮归迟，秋露满山白。

《榕阴新检》引《竹窗杂录》：“家藏天锡遗诗数卷，词藻横逸，真足驰骋虞、杨，毋论石田、松雪也。入闽赋诗颇多，今录其数篇于后云云。”

织女图（一作《题寿监司所藏美人织锦图》）

兰闺织锦秦川女，大姬哑哑弄机杼。小姬织倦何所思？帘幕无人燕双语。成都花发江水春，门前马嘶车辘辘。髻鬟两珥看欲堕，蛾眉八字画不伸。良人一去无消息，冰蚕吐丝成五色。柔肠九曲细于丝，万缕春愁正如织。倚窗睡起闻早莺，西楼月落金盘倾。暖霞拂地海棠晓，香雪泼户梨花晴。日长深院机声动，梭影穿花飞小凤。水心惊起鸳鸯飞，花底不成蝴蝶梦。纤纤玉指柔且

和，香钩小袜裁春罗。满怀心事付流水，荡日云锦生层波。佳人自古多命薄，风里杨花随处落。岂知丑妇嫁田家，生则同衾死同椁。君不闻长安市上花满枝，东家蝴蝶西家飞。笼中鹦鹉唤新主，门外侍儿更故衣。又不闻田家妇，日埽春蚕宵织布。催租县吏夜打门，荆钗布裙夫短裤。我题此画三嗟吁，百年丑好皆虚无。排云便欲叫阊阖，为我献上《幽风图》。

从以上所选的三首诗及前后的“纪事”，我们可以看出萨都刺诗歌所反映的隐者生活，闽地河山，织女愁怨等元代社会生活画面及其“一字师”故事和“词藻横逸”的风格。陈衍埋头诗海，以整理历代诗歌为要务，除了《元诗纪事》外，后来又撰《辽诗纪事》、《金诗纪事》，而令人庆幸的是，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同好，共同坚守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领地，为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贡献心血。上引陈衍《辽金元诗纪事总叙》的后半部分为：

于是宋之计有功氏、清之厉鹗氏、陈田氏，有《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而辽、金、元阙如。然则李拔可（宣龚）之有造诗林，可谓能见其大者矣。余旧有《元诗纪事》之作，沈涛园（瑜庆）、端陶斋（方）黄鲜庵、梁节庵（鼎芬）诸君共为印行。继复有所增损，则高君梦旦（凤谦）与拔可，于所设书坊印之。近拔可知余尚有辽诗、金诗二《纪事》，则大喜，以为辽、金、元三代诗史，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合诸唐、宋、明三巨帙而告大全，尤不可不亟为行世，商于王君岫庐，欣然同意，乃合三《纪事》为同式之印版焉。

陈衍和李宣龚们编辑出版这一“有造诗林”的三种《纪事》，是于1936年为“同式之印版”印行的，这时陈衍已是81岁高龄的老人了。陈衍的《元诗纪事》与《辽诗纪事》、《金诗纪事》以

及《石遗室诗话》是清代诗话百花园中几丛瑰丽的花朵。清代是中国诗话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其数量之丰富，形式之多样都是空前的。陈衍的“纪事”体诗歌评论有其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的具清代诗歌评论的共性，有的却有其鲜明的个性。

首先，“纪事”体的诗论是录评“有事”之诗，陈衍在《元诗纪事·原叙》中说：“纪事之体，当搜罗一代传作，散见于笔记小说各书者，不宜复收寻常无事之诗矣。”这种纪事体诗评注意多角度地观照诗歌，如从历史的角度来观照诗歌，上至皇帝及其后妃、太子等皇室成员，下至官员及其夫人乃至平民百姓等所创作的诗歌，都予以搜罗、记事与评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元诗纪事》既有元代的著名散曲家、文学家、书法家等文艺名人，如萨都刺、元好问、张翥、方回、杨维桢、戴表元、熊明来、王冕、赵孟頫、鲜于枢等，也有一般的知识分子作者。这种多角度的透视和 800 多位作者的广泛的代表性，对了解和思考诗歌文学与当时社会的各种关系多有裨益。

其次，《元诗纪事》卷帙宏大，全书 45 卷、字数 50 多万，加上《辽诗纪事》、《金诗纪事》三大部头共计 60 多万字，其规模在清代的众多诗论著作中是少有的，它们为中国诗歌史和诗歌批评史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开拓了研究的空间。

再次，如前所述，陈衍的这三代诗《纪事》与计有功，厉鹗等人的《唐诗纪事》、《宋诗纪事》以及众多的诗论家们的此类著作，一起构成了中国诗话与诗歌评论的整个体系，使它们在清代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系列。加上陈衍的《宋诗精华录》、《石遗室诗话》等其它形式的诗论，陈衍为中国诗论史做出了令世人尊敬的巨大贡献。

最后，陈衍作为一位学者型的诗论家，将其深厚的朴学修养和“实学”基础融入纪事体的诗论，使清代乾嘉以来朴学与文学

相融合的文学研究的严谨化和理论化蔚为壮观，这也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贡献。

第三节 “嗜学如甘肉，醉心犹饮醇”

《周礼疑义辨证》（以下简称《周礼辨证》）初稿完成于 1891 年，迟至 1932 年才在苏州付印。《周礼》是汇集周朝的典章制度而成的文献，全书富于儒家的政治理想。它共分为六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以及《冬官·考工记》。古人认为周天有 360 度，所以以上六篇共列举周朝的官职 360 种，分别说明。如前所述，陈衍认为，治学要从文字训诂开始，陈衍的第一部专著《说文举例》即以文字学为内容，这一部《周礼辨证》则以训诂学为内容，考证历代诸家对《周礼》的注疏有可疑的地方达 100 多处。陈衍综合各家注疏及各种经史著作进行研究，纠正了许多错误不实的地方，使相关的学问更加明确而落实。

著名的经学家孙诒让听说陈衍已作《周礼辨证》后，就寄信给他，想把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周礼正义》书稿送给陈衍进行商榷。但不久后孙诒让便病故了。等到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出版后，陈衍就其中的几十条进行了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的 26 条便汇总于《周礼辨证》一书中。《周礼辨证》一书共分五卷：其中“卷之首”为总论，其余四卷分别就上列六篇中的前五篇举出 60 种职务进行“辨证”。至于最后一篇《考工记》则另有专著论之。我们以其中的一个职务为例，看看陈衍的研究所得的生动成果：

“酒人，奄十人”条：

案，郑注云：奄，精气闭藏者。以奄为天奄，不指刑奄，至当。而以注酒人之奄，不以注内小臣之奄，则未当。古者宦官皆用士人，无用刑奄者。用刑奄者非周公法也。故国君不近刑人，刑人不在君侧……用刑奄为宦官，始于秦始皇。赵高兄弟数人，皆生隐宫。（见《史记·蒙田传》索隐。其父犯宫刑，妻子沦为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于隐宫也。《通鉴》注，宫刑在于隐室，故曰隐宫。）则刑奄也……汉时宦者，犹用士人，未从秦法。至后汉常用刑奄。则女后临朝者六，以用奄人为便也。自汉文帝以来，肉刑久除，而宫刑尚存，施于无罪之人。宇宙之大，惟中国有此惨无人理之事。周公所用奄人，非精气闭藏，即有罪而宫者，非若后世宦者，无罪而受宫刑也。

陈衍旁征博引，用渊博的知识考证了使用阉人作宦官（酒人）的产生和历史沿革。但陈衍作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学者，指出全世界只有中国将无罪之人进行阉割后当宦官使用的“惨无人理之事”，在陈衍身上显然已表现出二十世纪人性之觉醒。陈衍批评秦始皇用刑阉者为宦官，指出这种残忍的做法不是周公之法，这就突破了训诂章句之范畴，使他的研究上升到人性与爱民的近代意义上来。古代“国君不近刑人”，周公这样的贤者具有民本的思想，陈衍用他来与暴虐的秦始皇对比，突出了“爱民”的主题。陈衍认为：

《周礼》一书，周公设官分职，所以为民拯也。其政教之本，维以爱民之宗旨。

陈衍作为近代学者，能够开眼看世界，治儒学能渗人民主意识，为“鼎革”的时代服务，这是必须肯定的。当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里虽然批判了将阉刑施于无罪之人，那么将这种

“惨无人理”之刑施于有罪之人呢？陈衍在这个地方停住了脚步，仅用一句“君子远庖厨”轻轻带过。我们当然不应苛求于陈衍，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司马迁正是因为那种莫名其妙的“罪过”而受了阉刑，为中华文化留下了千古的遗恨的。

陈衍的《周礼疑义辨证》是近代研究《周礼》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陈衍的《尚书举要》（以下简称《举要》）一书，据《年谱》载，完成于1897年，出版于1919年。书名为“举要”，是举出29篇中的部分要句，就东汉至清季经学家注疏《尚书》的是是非非进行评析。

《尚书》是距今2300年至3000年间夏、商、周三个王朝的一部历史文献，涉及政治、军事、司法等方面的大政，形式为典谟、诰命、誓词等。自汉代以来，《尚书》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陈衍力主今文为真。《举要》全书所举29篇按伏生大传中的今文经的次序编排，但在进行辨证分析时也能吸收古文经派学说中合理的地方。

例如《虞夏书·禹贡》是一篇以大禹治水破题的经济地理著作，包含了山川结构、土壤质地、所出物产及治理方法等内容。陈衍的《举要》中举出《禹贡》中的“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三江既入”、“导岍及岐……”等四句（段）话，对历代的注疏进行讨论。这前面两句话的前后文是：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为白壤，厥赋为（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

以上大意是：治理从壶口开始，接着是梁山和岐山。修完了太原，又治理太岳山的南面。覃怀一带的水利工程修得成绩显著，并延伸到横流的漳水。冀州的土壤白色，这里的赋税是一、二等

的，而这里的田地属于第五等。恒水、卫水已经疏浚，大陆也已经治理好可以耕种了。

读了这一段《尚书》，我们肯定会产生疑问的是：为什么冀州的土地是白色的，属于第五等，却要收一、二等的赋税呢？陈衍就针对这一疑问解释了两句话，第一句是：

厥赋为（惟）上上错

郑云，此州入谷不贡赋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税，上中出八夫税，上下出七夫税，中上出六夫税，中中出五夫税，中下出四夫税；下上出三夫税，下中出二夫税，下下出一夫税。通率九州，一井税五夫。（《礼记·王制疏》）

以上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先把九个等级说明清楚了，接着解释并分析第二句话：

厥田惟中中

马融曰：“土地有高下。”郑玄曰：“田著高下之等，当为水害备也。”（《释文·书疏》）

衍案：凡水害田之高者，修防可缓，下者宜急。故治水先从下起。地形西北高，东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可见高为上。扬州在东南，田下下，可见卑为下。荆在扬西高一等。梁又在荆西又高一等。水害沈州为甚，地卑也，田中下。冀州帝都，治水所自始。次即衮州，地下，水害急也。于是顺道过青州、徐州，而急下扬州，渐高至荆州，顺道至豫州，豫近帝都也。又西上至梁州，地卑，居三等。然路远不能先越而至，终乃至雍州最高之地，最后盖由东北而东，而东南，而南，而中州、而西，而西北，九州转一周也。若王肃说上上、上中等，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则何以田下下、第九等者，赋下上、上错，却居第七等六等乎？田上上，第一等者，赋中下，却居第六等乎？田中中、第五等者，赋上

上，却居第一等乎？大抵田患水，亦患旱，地高者易旱，故雍、徐、青三州，赋皆在中等。地低者易水，故扬、梁赋皆在下等。上流梁州水最难治，下流兖州水最难治，故赋亦在下等。冀州地高低最得中，故赋上上等。豫州次之，故赋中上，又杂上上。惟荆州田第八，而赋第三，不患水者。盖兖、扬为南北条入海之路，梁山山势险陡，水患皆太甚。荆州地虽低，而江、汉、九江、沱、潜，水道大通，不为水患，而转得水利也。

在以上的分析文字中，陈衍把土壤的肥瘠与水利条件综合评价，解答了读者的疑问。文字难懂的《尚书》，经过马融、郑玄这些古代解经家的解释，变得可以阅读了，再经过陈衍用这种近代的语言进行诠释和辩证后，更加豁然可知了。

陈衍不仅引用马融、郑玄等正确的注疏来解说《尚书》，更在于辨别他们注疏中的正误，以使《尚书》的文意解释得更加畅通和合理，例如《周书·无逸》中有一段：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

陈衍所加的注释和辩证评析为：

孔疏引郑云：“祖丁，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贤，武丁欲废兄立弟，祖甲以此为不义，逃于人间。”故云“久（旧）为小人。”《史记·集解》引马融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贤，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废长立少，不义，逃亡民间。”

衍案：马、郑二说略同，惟郑以为祖庚贤，马以为祖甲贤。自以马说为较长。祖甲少而贤，故武丁欲舍长立之。而祖甲逃去，是祖甲果贤也……

我们细玩文意，虽然是“二说略同”，但确是“马说为较

长”，因为“废长立少”是不义的，所以祖甲逃到民间做了老百姓。而他自幼贤，故武丁才要“废长立少”，加上后来祖甲即位为王后，统治时间长达33年，且“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齔寡”，陈衍认为祖甲贤于祖庚确是有道理的。

陈衍治《尚书》虽力主今文为真，但在进行辩证分析时却能择善以从，对古文经说中有道理的地方予以首肯，这种尊重科学的精神是特别值得治学者提倡的。例如《周书·费誓》一文的开头为：

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

陈衍《尚书举要》中对“淮夷、徐戎并兴”一句的分析是：

孙星衍云：“史公说以淮夷、徐戎反为在与管、蔡同时。但伯禽封鲁，据《洛诰》经文‘命公后’及‘惟告周公其徐’，则七年归政之时，此云即位之后，有管、蔡、淮夷等反，殊不可解。”皮锡瑞云：“史公以淮夷、徐戎反为与管、蔡同时，即伏生今文说也。”……若伯禽即位，而管、蔡反，则安得有商奄之民，以命伯禽？自以从古文说为长。

念过这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周武王驾崩时，周成王尚年幼，周公摄政七年后再把王位归还给成王，所以成王感激周公，才把鲁地封给周公的，伯禽是周公的儿子。平定管、蔡的叛乱是周公一手指挥的，而平定淮夷、徐戎的叛乱则是在周公去世后由伯禽干的，所以孙星衍等人怀疑司马迁的说法是错误的，原因是遵从了“伏生今说也”，陈衍指出“自以从古文说为长”是很妥当的。

陈衍在《尚书举要·总说》中的开宗明义便说“治《尚书》当先辨今古文，今文皆真，古文有真有伪”，可见陈衍治《尚书》的科学态度。陈衍的尚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与引文出处：

[1] 林公武、黄国盛主编：《福州名人》第 10~13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

[2] 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第 66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

[3] 《通鉴·唐纪六十四》。

[4]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545 页，中华书局，2005 年 8 月。

[5] 陈槻著：《诗人陈衍传略》第 138 页，台北市林森文教基金会，1999 年 5 月。

[6] 喻大华著：《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 年 5 月。

[7]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 690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第四章 武汉十年

(1898~1907)

第一节 “君已盟鸥江水湄，我原雁鹭在芦碕”

1898年正月初五，陈衍带着一个仆人从上海出发，初九日来到武昌，住进了梁鼎芬的寓所。第二天一早，张之洞便接见了陈衍。

张之洞的官衙内宽敞明亮，陈衍看到这位湖广总督已衣冠楚楚地等候于客厅之内，他身材不高，但额头宽大、鼻梁高耸，长长的胡子垂于胸前。张之洞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下面是他和陈衍的一席对话：

张之洞：“石遗足下，何以名衍？”

陈衍：“先君年五十才得我，故名。”

张之洞：“又何以字叔伊？”

陈衍：“我排行第三，小名尹昌。”

张之洞：“听说你已刊出《考工记》和《元诗纪事》二书，此外尚有何著作？”

陈衍：“我还著有《周礼疑义辨证》、《说文举例》、《说文解字辨证》、《尚书举要》，但都未刊行。”

张之洞：“在上海除馆谷外，还有何收入？”

陈衍：“除馆谷外，还兼以授徒、卖文。”

张之洞：“你久在上海，所识海内有学问之人必多，我所未知者，能分类举其最优者说给我听听吗？”

陈衍：“写散文文的，有直隶新城的王树楠、义宁的陈三立；写骈体文的，有武进的屠寄、泰州的朱铭盘；考据之学可信者，有瑞安的孙诒让，善化的皮锡瑞。这些老师兴许已经知道。此外尚有浙江的章炳麟。”

张之洞听到这里不以为然地打断说：“梁启超文字宗旨颇谬，但是还算文从字顺，章某却连文字也很怪异，足下何以谈及此人呢？”

陈衍：“章炳麟能读书，实际上超过梁启超，老师好像并未见过他的著作《左传经说》……”

谈到这里，话题被转移到其他事上去了，过了一会儿，话题又谈到桐城古文。

张之洞：“姚姬传与方望溪相比如何？”

陈衍：“姚虽然说考据、义理、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但是方的根柢远过于姚。人们都说姚胜过方，我认为方胜过姚，连恽子居也胜过姚。只不过恽迷信佛教，没有什么意思罢了。”

张之洞听到这里，点头表示赞同，话题又谈到郑孝胥的诗歌上去。

张之洞：“苏戡的诗不错，只是我所见不多。”

陈衍：“赵瓯北评元遗山诗，‘学不甚博，才不甚大，惟以精思健笔，戛戛独造’，苏戡就像元遗山。”

话题又转到了上海的《求是》杂志上。

张之洞：“你可以来我这里当总编纂，我这里也想出一份杂志。”

……

这一天的谈话，从黎明一直持续到中午，张之洞连一口水都不喝，滔滔不绝，谈个不停。对话中所提到的“老师”，是当时人们对张之洞的称呼。“恽子居”为恽敬（1757～1817）的字，擅古文辞，世称“阳湖派”作家。这次谈话后不久，张之洞催陈衍入都会试。陈衍离开后，张之洞把章炳麟请到武昌幕中，每月给他薪水一百多块光洋。但梁鼎芬有个部下朱克柔认识章炳麟，章向他宣传革命，梁鼎芬和朱克柔因此逼张之洞赶走章炳麟。张之洞只好把他打发走了，临走还吩咐送他五百块光洋，并向他买了一套《左传经说》。梁鼎芬竟然把钱给扣了下来。等到陈衍回到武昌，才看到桌面上一封章太炎的信，信中说张之洞令他如此狼狈，实在不是英雄。信上还说他到上海找陈衍未遇，听说陈衍在杭州，又到杭州找他，也未遇。陈衍将信给张之洞看，并说章太炎“学问优长，小学世尤罕其匹”。

张之洞在接见陈衍的第二天傍晚宴请陈衍，作陪的主要是张之洞的门下士，除梁鼎芬外，还有王秉恩观察、王仁俊主政、朱克柔等。席间，张之洞说：

“中国自大创于日，朝廷厉行新政，然起行必由于坐言，拟稍集留心时务者研究政学，庶有裨于万一。”

于是陈衍在张之洞所办的纺纱局官屋中一处三进的房子中住了下来，暂任官报局总编纂，办理一切新政笔墨。陈衍对于张之

洞的知遇之恩是心存感激的，对于张之洞“要拱中原控百蛮”的能力也是充满信心的：

张广雅督部电招来鄂呈二首

廿年忧国老尚书，汲汲求才渴不如。拒魏联吴劳决策，辟荀荐孔费征车。罪言猥许空余子，长句曾邀叹起予。愿识荆州天下士，翻传急递到樵渔。

昔岁沅湘单舸还，苍茫风雪下江关。路从郢树荆门转，梦落郎官大别间。一卧忽惊天醉甚，万牛欲挽陆沉艰。上游形胜看如昨，要拱中原控百蛮。

“廿年忧国老尚书”，是讲张之洞忧国忧民，早在20年前，张曾就“东乡惨案”和“庚辰午门案”，忠言直谏，为民伸冤，既打击了贪官和阉党，甚至委婉地批评了慈禧，又以实际行动向慈禧表达了忠诚。为了推行洋务，做他的“中体西用”的强国之梦，张之洞长期以来“劳决策”“费征车”，深受朝廷上下的好评。“罪言”指奏议或议论时政得失的文章，“猥许”是众多的意思，“长句”指七言诗，“起予”是启发自己。张之洞这位“老尚书”的诗文对人深有启发，现在又求贤若渴，“急递”电文招见，作为“樵渔”的陈衍当然是心怀感激的。第二首的颈联是陈衍的名句之一。“天醉”喻世事混乱，从张之洞到陈衍，千千万万的忧国忧民之士都在挽神州于陆沉，陈衍虽然深知此中之艰难，但他对张之洞坐镇湖广，控制中原局势的能力是充满信心的。

对于以上第二首诗中的后四句，陈衍的孙子陈步在编辑《陈石遗集》时，在《经济类著译选编题解》一文中有以下诠释：

甲午战败，清廷以台湾、澎湖割地并赔银二亿三千万两，奇耻大辱，举国愤慨。订约前，陈衍在京会试，乃与诸友上书都察院抗议割地，由陈衍撰稿，但投入不答。戊戌七月，又作《戊戌变法权议》十条，上书言事。其时张之洞以

中兴大臣自命，请陈衍在鄂办理新政笔墨，陈衍亦欲有所建树，跻国家于富强，故在《呈广雅督部》诗中云：“一卧忽惊天醉甚，万牛欲挽陆沉艰。上游形胜看如昨，要拱中原控百蛮。”他盼望新政早日成功，扭转积弱的国势。诗中“上游”指湖北，其时汉口、沙市、宜昌已相继开埠，舟车辐辏，商贾集中，尤以汉口为盛。湖北扼长江中上游，中国中西部各省的土货荟萃于汉口……张之洞自两广移镇湖北十年，迁造械、织布等机器于武汉，设铁厂、枪械厂及纺纱织布、缫丝、制麻等局厂。惨淡经营，初具规模……

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满清政府的无能和列强的进逼，使那些从传统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甲午战败后，像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和“戊戌六君子”等一批知识精英“倡言革命”，十分激进。而像张之洞、李鸿章等一批忠于清王朝的知识精英，他们与陈衍常在诗中讽刺的那些昏庸的“一朝将相”有所区别，他们比较开明，也想挽神州于陆沉。但他们与康梁等人站在对立面上，虽然有时也与他们有短暂的合作，例如张之洞把章太炎请入幕中，就是想与他合作。但这两批知识精英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一方主张激进的革命，一方想稳健地实行“清末新政”。而陈衍则介于两者之间。他一面向张之洞推荐章太炎，一面又劝自己的小老乡林旭少问“经济”，劝他不要激进冒险。陈衍不直接介入政治，但并非不关心政治。他一方面支持张之洞、刘铭传这样搞洋务的重臣，支持他们实行“中体西用”的路线以挽救国家。在激烈的政治风浪面前，陈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贡献的是知识，具体的说就是观察、评论、研究，以供决策者参考。陈衍另一方面不赞成章、林他们与以慈禧为首的满清政权激烈地对抗，但又希望自己的才华能被张之洞这样代表政权执行政策的官僚所用。陈衍在诗中赞赏张之洞“汲汲求才渴不如”、“辟

苟荐孔费征车”、“愿识荆州天下士”，都是显示了陈衍与张之洞之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陈衍下榻的纺纱局房屋坐落在文昌门外的江边上。早在1880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就已着手创建织布局，他的目的就是为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他上奏朝廷时说：

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其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1]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考虑到广东不产棉花，而湖北盛产棉花，故将织布局迁往湖北，在湖北建成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座工厂，办公处统一设在织布局，陈衍就住在房子较空的纺纱局内。

张之洞还将湖北的两湖书院设立为分科教学的新式学堂，梁鼎芬为“山长”。这座新式书院建在两湾小湖中，学舍、书库、讲堂、教员室一应俱全。抱湖而立的走廊十分气派。书院聘请了一大批学者教授，结识这些同行，令陈衍非常高兴，例如其中的杨守敬，精于舆地之学，他的官舍与东坡雪堂相近，自号“邻苏”。杨著有《历代地理沿革图》、《水经注疏》、《水经注要删》等著作。他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刚好碰上明治维新，他将别人丢弃的旧善本书贱价购得，用海船载回黄州，存在一幢大房屋中。

陈衍在武昌结识的最重要的诗友和知己则是沈曾植。沈曾植官刑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因遭逢母亲的丧事（“丁忧”）而被张之洞聘为两湖书院史学分教，也住在纺纱局。第一次见面，他望着陈衍道：

“你就是我花8两优质白银在北京琉璃厂买到的《元诗纪事》的作者，今天终究见面了！”

在夏热难当的武昌，他们经常相聚，一谈就到深夜。

沈乙庵招游月湖夜话达曙

赫山不能云，暄暑苦无计。夜谋月湖宿，晨鼓渡江柁。
有路入万荷，有台矗水际。稍觉窗棂间，新翠欲染袂。晚来
隔江雨，欲至旋开霁。终分雨余气，烟水澹摇曳。风萤升复
沉，云月出还闭。露坐遂到明，俯仰是何世？君家鸳湖上，
无业供王税。一官典属国，廿载京华滞。未办买山钱，尚阻
墓门誓。（时君丁内艰。）我家东海头，六月足啖荔。处处听松
风，谡谡李司隶。飘转堕江湖，春申又夏汭。万方正多难，
行作虫沙继。问君欲何之，吾亦从子逝。

陈衍和沈曾植这两位近代诗坛上的翘楚，望着湖北一带光秃秃的山上没有一丝云彩，无计逃避酷暑，他们只能相约夜晚来“月湖”上消夜，早晨再移舟渡江而回。水路中一望无际的荷花荡，翠色染衣，而隔江的凉雨，眼看要渡过来了，却又由阴转晴，只有几丝雨气使江面上烟气摇曳。那风中的萤火虫时升时降，云天上的月亮时出时隐。两位诗友“露坐”到天明，“俯仰”人间。他们俩一个家住嘉兴“鸳湖”（南湖）之上，世代廉官，自己当了20年的京官，现在又“丁内艰”。另一个呢，家住“东海头”，榕城“六月”，荔枝飘香，“处处”听到的是“谡谡”刚劲的松风之声。《世说新语·赏誉》：“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从上海“飘转”到湖北（“夏汭”指夏水一带）。“墓门誓”指归隐，“虫沙”指死于战乱者，陈衍觉得他们两人都处于“万方正多难”的时代，连清静地归隐都难以实现。

沈曾植主要精力用于史地的研究上，并且是一位书法家，又工于诗，陈衍曾把他归入“同光体”中的“生涩奥衍”一派。陈衍一生喜欢搜集友人诗作，于是向沈曾植索要旧作。谁知竟篋空如洗。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沈曾植：“我对诗看得多，可谓诗学深，却写得少，可谓诗功浅。我随写随扔，现在一张纸都找不到了。”

陈衍：“我也喜欢考据之学，但这些学问与个人的感情无关，只有诗文才是自己的性情语言，并且富于哲理。”

沈曾植：“我素来喜欢张籍和黄庭坚的诗歌，我并不轻易贬低前后七子的诗歌。”

陈衍：“这样看来，你兴许也会喜欢梅尧臣的诗歌的。”

……

要了解“同光体”诗歌，不能不略知陈衍与沈曾植二人的交往。两人的初次见面虽是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但是早在这次见面的12年前，陈衍就已从郑孝胥处读到沈曾植的诗歌了：

丙戌（1886年）在都门，苏戡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戡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见子培数诗，雅健有意理。后十年相见，索旧作，皆弃斥无一存者。余谓君博探群书，治史学洵西北舆地，余亦喜治考据之学，其实皆为人作计，无与己事。作诗尚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子培意不能无动，间一为之。次年余移居水陆街，君居姚园，相去不数武。秋冬病疟寒困卧，遂日有所作。或一日数夸示之，或夜三四鼓打门送诗。不两三月，已积百余首，多可存。

——《石遗室诗话》卷一

这种未见其人，先见其诗，并因见诗而神往，相见之后又劝对方作诗并互相送诗的关系，被陈衍称为“文字骨肉”。而对于这一次见面，沈曾植同样是激动十分，据《年谱》载：“自是多聚，夜谈至三、四鼓。”

诗歌流派的形成，往往有客观上的必然，“同光体”也是如此，互不相识的许多人一起写出“同光体”的诗歌，可见他们的

宗宋、以学问和文字为诗等特点是当时部分旧体诗发展的一个趋势。诗歌流派的形成，除了客观上的必然性外，也有主观上的交流、互动的原因。陈、沈的这一次见面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沈曾植此前不太写诗，且写完后也不保存，“皆弃斥无一存者”。这一点从《海日楼诗集》可以看出：全集有诗 12 卷，卷一为陈、沈两人见面（1898 年）之前的诗歌，历时 18 年，此后 25 年间的诗共有 11 卷。其间平均约两年写一卷。说明沈曾植的大量写诗确是在认识了陈衍之后的事情。陈衍在《沈乙庵诗序》一文的结尾中说“余生平喜检拾友朋文字，君（沈曾植）作落余处者殆百余首，念离合之踪无定也，特序而存之”。在《海日楼诗集序》一文中则写道：

往者涛园（沈瑜庆）尝言，予兄弟（指陈书和陈衍）于朋辈之为诗，能鼓舞而督促之，使衰然成帙，乃戏以催耕之布谷，促织之络纬相况，可云善谑。盖涛园素罕作诗，自要先伯兄木庵先生客皖南大通，淮北正阳关，不两年，成《正阳集》一巨册。陈弢庵（宝琛）太傅少作多不存稿，自里居与先伯兄相倡和，始存其稿，至今殆千首。余之怙恣寐叟（沈曾植）为诗，则已祥同客武昌时所作序中。

陈衍两兄弟的以“鼓舞而督促”友朋诗歌创作为己任的精神，正是“同光体”演变成一个流派的主观因素。

陈衍与沈曾植见面相识的第二年即 1899 年，两人互相唱和的诗有近 20 首，其中陈衍的《冬述四首示子培》前三首为：

诣谈无昏晨，积雨断还往。涂泥败驰道，搏跃可过颡。
昨闻东山下，寒色足泱泱。千松聚一壑，中有一泉响。稍为群赭山，一洗貌粗犷。驾言思出游，怀哉几吾党。梁公劳教授，郑老疲鞅掌。宽闲尚有子，合作马曹赏。却思去年雪，招手鹤楼上。薄寒中背吕，拳曲不可强。波及居士装，披蓑

代鹤蹇。今年诗逐疟，破胆到魍魉。乌头时为帝，腰脚藉稍养。屡期阅市行，且抱樊口想。稍晴具三爨，聊用适莽苍。

与子既南来，夏甑遭蒸炊。嗟我宁余钱，赁屋糜重资。屋旁有废圃，侥幸南风吹。露宿息喘喙，稍苏星汉移。风湿作薄癖，爬搔遍肌肤。先生屋打头，相从对唵呓。藏冰渺北陆，浮瓜非南皮。借问清凉散，寄书郑当时。答言生地黄，捣之以终葵。焦焚至毒时，沃之聊数匙。皖公有乡祠，百亩环荷池。追凉仍挥汗，薄啜荷叶糜。蔚然苻娄庭，移居惜微迟。石台抚双梧，凉露忽已滋。子由将北行，瘦马不独骑。追送平山堂，茱萸仍分持。疟寒岂杵臼，乃以秋为期。净名久默然，文字禅在兹。

往余游京华，郑君过我邸。告言子沈子，诗亦“同光体”。杂然见赠答，色味若染醴。十年始会面，辄乐正读礼。从之索旧作，发篋空如洗。能者不自珍，翻悔笔轻泚。我言诗教微，百喙乃争启。风雅道殆丧，庞言天方瘳。内轻感外重，怨悱遂丑诋。何人抱微尚，不绝似追蠹。宋唐皆贤劫，胜国空祖祢。当涂待典午，导江仅至澧。先生特自牧，颇谓语中禊。年来积怀抱，发泄出根柢。虽肆百态妍，石濑下见底。我虽不晓事，老去母未昧。谅有古性情，汨汨任有瀰。

这四首诗，《年谱》中注为“拉杂说本年一年事”。其中第一首写在武昌“积雨”“薄寒”的恶劣天气中，“病疟”阻挠他们的诗歌“诣谈”，但“泱泱”“粗犷”的景色，还是令他们“思出游”，这里提到梁鼎芬“劳教授”，郑孝胥“疲鞅掌”（职事烦忙），而沈曾植患疟疾，“破胆到魍魉”。最后一句用《庄子·逍遥游》典“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裹然”。孟郊《古别曲》

“荒郊烟莽苍，旷野风凄切”，欧阳修《自歧江山行至平陆驿》“萧条断烟火，莽苍无人境”。诗中记录了诗人们的活动过程：“诣谈”、“出游”等；还写出诗歌创作的秘诀：“拳曲不可强”、“屡期阅市行”。钱钟书先生曾谢绝记者对他的采访，说你们只要看我的作品就行了，就像看到母鸡生的蛋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看母鸡本身呢？以上这些诗却把诗人的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岂止是母鸡本身，连母鸡生蛋的艰难过程都绘声绘色地展现出来了。

第二首则写暑天酷热难熬，皮肤骚痒。据《年谱》载：“湖北天酷热，无好瓜，子培丈诸人醅钱为瓜食会。使声暨寄书，托上海运输。”在这样“夏甌遭蒸炊”的季候中，吃瓜可以带来清凉，此首结处言京师净名社已“默然”沉寂，“文字禅”已移来武昌，戴复古《寄报恩长老恭率翁》诗：“好留一室馆狂客，早晚来参文字禅。”明焦竑《焦氏笔乘·不改其乐》：“《谈苑醜酬》云：‘有问予颜子不改其乐，所乐者何事？予曰：且问子，人不堪其忧，所忧者何事？知世人之所忧，则知颜子之所乐矣……’此我辈文字禅，不须更下一转语也。”诗的理韵常与哲学及宗教结缘。

第三首是最重要的，其中许多对诗歌的见解与沈曾植十分合拍。陈庆元先生在《论“同光派”闽派》一文中对此诗曾有一段评语曰：

曾植为陈衍“同光体”的同道，陈衍曾誉其为“同光体”魁杰。此诗先叙“同光体”名称的由来，次叙与沈结识交往，次叙诗教微，风雅道衰，“三元”说的提出并得到沈的首肯，最后称赞沈诗如同欧阳修评梅圣俞诗那样：“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陈衍《〈沈乙庵诗〉序》云：“乙庵博极群书，熟辽、金、元史学舆地。”故此诗说沈诗有“根柢”。

就陈衍的这三首诗（第四首所谈不关诗歌的事），沈曾植和了一首《寒雨积闷杂书遣怀爨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诗》，其后半部分的诗句略为：

乃知古诗人，心斗日迎拒。程马蜕形骸，杯盘代尊俎。莫随气化运，孰自喙鸣主？开天启疆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输古。韩白刘柳騫，郊岛贺籍件。四河道昆极，万派播溟渚。唐馮逮宋兴，师说一香炷。勃兴元祐贤，夺嫡西江祖。寻视薪火传，暂如斜上谱。中州苏黄馥，江湖张贾绪。譬彼鄱阳孙，七世肖王父。中汽一勺泉，味自岷觞取。沿元虞范唱，涉明李何数。强欲判唐宋，坚城捍楼橹。咄兹盛中晚，帜自闽严树。氏味荀中行，谓句弦偏矩。持之不根说，一眇引群瞽。丛棘限墙闾，通途成岨岵。谁人开天眼？玉振待君拊。

以上开头几句引庄子的典故，说世上万物都“随气化运”，处于变化演进之中，而诗歌同样是处于“薪火传”式的流变之中，而不应“诗必盛唐”，到此为止，不再辉煌。沈曾植和陈衍一样，认为诗不要强分初盛中晚（唐），也不要“强欲判唐宋”，否则就背离了诗歌发展的道路，“通途”就成了岨岵了。“同光派”推崇宋诗的成就，稍不相同的是这首诗的后面还有一句是“画地说三关，撰策筹九府”。沈曾植提出与“三元”相类似的说法叫“三关”，指元嘉、元和、元祐这三个关键。后面的“两关”与陈衍的后“两元”相同，前一“关”则从开元延伸到了六朝的元嘉，延伸到了陶渊明、谢灵运的时代。其实陈、沈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不能“墨守旧说”、“日蹙国百里”，自己把自己局限在某一阶段，画地为牢。

陈衍对沈这首诗的评论是：

余与君论诗语，略具其中……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

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故有“开天启疆域”云云。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故有“唐余逮宋兴”及“强欲判唐宋”各云云。

沈曾植的这首长诗，是典型的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的例子。以上这首诗的前半部分，首先描写“寒雨积闷”的情景：“寒云如覆盂，漏天不可补”，用黄庭坚“垂云如覆盂”和杜甫“畴能补天漏”语。“曜灵（太阳）避面久，畏客牢键户”，用的是王逸《楚辞·章句》中的典故“曜灵，日也”。“键户”见杨雄《方言》“户钥，自关而东、陈楚之间谓之键”。“黯黯江海蒸，惨纒霰霄聚”，“黯黯”为云黑貌，引自《说文新附》。“惨纒”为云下垂貌，引自杨雄《甘泉赋》及《文选·李善注》。“霰霄”典出《尔雅》。后面接着写在这样的天气里，诗人自锁家中，听着屋檐下的流水声，“啞啞辄虚黼”，是把锅敲得成天价响的声音，本来是很生动的，却因为用的几乎全是古文字，十分艰深难懂。写雁子“失行”，鸡冷得缩起一条腿的情景也十分形象，“水官”“雨师”的传说也富有情趣，但要读懂它，必须有《左传》《周礼》等基础，确是不容易。而“尽收天一气，并作银潢抒”，写得大气澎湃，但银河偏说“银潢”，仿佛是故意不让人读懂似的。诗中接着还写诗人忍受这种恶劣天气时的心情，充满了深刻的哲理：“南朔（北）相倚伏”，“物物固难量”。前者出自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之典，后者语出庄子“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而全诗的重点，则在于在这样“穷阴”（年终）的季节里，诗人与陈衍、郑孝胥、梁鼎芬这些诗友于“幽室”中“槃辟”（盘旋）“高吟”“汲古”（研古）“扬榷”（商榷），他们论诗的宗旨是“奇出日恢

今，高攀不输古”。“韩白柳刘骞”，诗思与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共飞。“郊岛贺籍仵”，即诗艺与孟郊、贾岛、李贺、张籍相匹敌。沈曾植“沿元虞（集）范（曄）唱，涉明李（梦阳）何（景明）数”，不轻诋七子，但对严羽的强分盛唐、中唐、晚唐是强烈地批评的：“持兹不根说，一眇引群瞽。丛棘限墙闾，通塗成岨岬。”他们以“同光体”为揭橥，“画地说三关，撰策筹九府（指陈衍助张之洞理财）”，感觉是“沧海浩横流，中潭屹砥柱”。全诗的结尾还是落到苏黄上来：“东坡眠食地，固是余所佇，郁没老涪蟠（黄庭坚），山空畴踵武。兴来舴艋舟，径欲掠江浒。政恐迴颿挝，商羊复跳舞。”沈曾植这一首诗歌“挝”的确是一阵美妙的鼓声，跳的可是高难度的舞蹈。这种“生涩奥衍”真可以令现代的读者望而却步。

陈衍与沈曾植的神交，始于见面之前，而见面之后则形同兄弟，陈衍在《〈海日楼诗集〉序》中说：

嗣是寐叟出守南昌，则资余游匡庐；提学皖省，则招余游安庆；寐叟将赴欧美考察政治，则寓余武昌寓庐；辟地上海，则海日楼、谷隐诸所居余尤数数至。其踪迹，彼此诗中，约略可寻。

查陈衍孙陈步所编《陈石遗集》，陈衍从1898年开始与沈曾植诗歌唱和，一直到1922年最后一首《哭乙庵》，诗歌题目中有沈的字号的，共有34首，而《沈曾植集》中写给陈衍的诗歌则有23首。以上序言中所说的游南昌和匡庐，时间在1904年，当时陈衍和王我臧一起来南昌，在沈曾植的官斋中住了数日。沈曾植在官斋中用巨木建成露台，高出树梢，晚上他们坐在台上乘凉。饱吃抚州枕瓜，其清凉甘润的滋味远远胜过上海的瓜。所以陈衍在《南昌别乙庵太守》诗中有“豫章青白桐，离立时往参。露台出其杪，俯见江影涵。凌虚复超然，夜色碧潭潭。取彼四年

事，偿以七日谈。贯此五夜眠，胜过百纸函。哲理我断断，群学公醺醺。坐我节目翁，诗骨耸瞿昙。食我五色瓜，诗味与同甘。”此行游匡庐，陈衍留下了一系列优美的诗歌。

下面是此行最有代表性的咏“归宗寺”和“开先二瀑”的两首诗：

归宗寺阻雨两宿望栗里有怀

参天巨木飒凉飏，独有山门徙倚宜。冒雨出游天所命，乱流竞渡景尤奇。瞻衡何处松三径，誓墓归来墨一池。我是无官有诗者，故应延伫起幽思。

雨后重过开先观二瀑布

匡庐山作浚阳派，各道涧泉自分界。青山有似绿衣人，纷恍翩翩垂缟带。中峰劈成青玉峡，见说白龙出其内。我观是龙还是剑，雷焕张华昔所佩。延津飞跃去何之？还过丰城艮其背。尚余双鞘化双峰，夹峙香炉峭天外。西江诗派首庐陵，自负庐山高为最。归川南堕与东来，双井雄奇合两大。流为章贡汇鄱阳，竖作槛泉双倒挂。道园曼硕两剑峰，以外纷纷等曹剑。我来雨前越雨后，一见一否观者再。定谓银河落九天，炎炎大言供一快。彭郎词与瀑布谣，铁崖酸斋亦天籁。

以上第一首诗中的“三径”“誓墓”均指去官归隐。第二首诗中把青山比喻成一个“绿衣人”，瀑布是她的佩巾（“恍”）和“缟带”，“翩翩而”垂，十分形象。而“中峰劈成青玉峡”，龙泉之剑飞腾而去，似龙又似剑。这时引出张华、雷焕掘出“丰城双剑”的精美的传说，描写很有气势又富于浪漫的想象。后世诗文因此用“丰城剑”来赞美杰出的人才，诗人也以所描绘的尖峭山峰、双剑并峙来赞美江西杰出的诗才：庐陵欧阳修和双井黄庭坚如两座山峰。诗歌界把元末诗人自号铁崖的杨维桢那种擅长驰骋

想象、运用奇辞的风格称为“铁崖体”，元散曲家贯云石又别号酸斋，陈衍这首诗运用了浪漫的想象和奇特的典故，确是如“铁崖酸斋”般唱出了“天籁”般的一支曲子，是陈衍诗集中的上品。

作为“同光体”的两位领袖人物，陈衍和沈曾植的诗歌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以学问为诗，用典多且难解。陈衍说“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沈曾植则推重同样是学人兼诗人的朱彝尊的诗歌，“竹垞翁固以经发诗者也”。两人诗均晦涩，沈曾植尤甚：

寐叟诗多用释典，余不能悉；余《题寐叟山居图》五言古四首，寐叟亦瞳莫解，相与怪笑。

钱仲联先生在《沈曾植集校注》一书的《前言》中说：

沈曾植为我国近代有国内外影响的著名学者，邃于旧学，经史、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书画、乐律，无不精通。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提到沈曾植有两首诗题目为《威灵仙》和《金鸡那霜》，“二诗佳妙，为梁节庵持去，不复得矣”。现《金鸡那霜》已佚，而《威灵仙》亦残缺，被收入《沈曾植集校注》书中：

草有威灵仙，厥方始海上。或传新罗僧，用除风入藏。名方唐宋传，功主脚气瘴。驱疟出后师，排决验非妄。乃知雾露淫，非独少阳王。研研说柴胡，玉卮美无当。

这首诗中的“新罗僧”系《图经本草》一书中介绍的人物，他以“威灵仙”救活了手足不遂的绝症（“脚气瘴”）。这种药还可治多种疾病，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

在中国近代诗坛上，陈衍和沈曾植被公认为“同光派”的领袖人物，而张之洞被称为“唐宋派”的领袖。张之洞有个习惯，

喜欢边喝酒，一边与文人论艺。他常常在纺纱局的露台上请来陈衍、沈曾植、梁鼎芬、王秉恩和王仁俊等人，纵情谈论，一直到深夜才休息。有一天晚上，张之洞指着席上白酒来考大家：

张之洞：“烧酒起源于何时？”

陈衍：“今天的烧酒，大约是从金元人所谓‘汗酒’而来的。”

张之洞：“不对，晋代就已有了，《陶渊明传》中说：‘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稻’，稻米造黄酒，秫米造白酒。”

陈衍：“如果是这样子，那么早在《月令》中就说过，（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那烧酒就该起源于周代而不是晋代了。”

张之洞：“对，对，‘秫稻必齐’、‘秫稻必齐’，我怎么就忘掉了呢？”

张之洞的这种虚心而不文过饰非的风格，受到了文人们的尊敬。张之洞生活俭朴，所穿外套的貂皮毛已秃光，还照穿不误，炕上铺的红呢破了，下面的稻草还露了几根出来，也并不在意。他请客时所用的大圆桌油漆也不上，只是铺上一张旧白布。张之洞为官清廉，却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在湖北建设军事近代化、振兴实业和兴学育才。

以上面提到的“两湖书院”为例，张之洞于1890年创立该书院，“共建有北南、商籍斋舍240间，讲堂前建有南北书库，藏有丰富的图书”。1896年，张之洞仿效西洋学校对两湖书院进行了改革，聘请杨守敬、杨锐、汪康年等知名学者在书院任教。^[2]1902年，又彻底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并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来湖北对此进行筹划，分学科为8门，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法律学、财政学等西学课程。但是发生于这一年的“戊戌变法”冲击了张之洞这种稳健的改革

进程。

这一年3月，陈衍被张之洞催促，不得已又一次进京参加科举会试。这时正逢北京“强学会”兴起，康有为上万言书，“戊戌六君子”等人掀起了一个变法的高潮。林旭与张亨嘉等人则兴办“闽学会”，又与王书衡等人兴办“通艺学堂”，他热烈地宣传变法，并每天都到陈衍的住处谈论文艺和国事。陈衍劝林旭说：“你一向是学文的，经济（政治）并不是你的长处，并且时局还会有变化，你姑且缓一缓吧。”科举一结束，陈衍就强拉着林旭出了京城，一起游览杭州去了。当时张之洞和陈宝箴都想把林旭请入自己幕府中，结果却被人推荐到朝廷中当了“军机章京”，参与新政。8月10日，“六君子”被捕，几天后便被斩于西市。所有参与戊戌变法的人士都遭到镇压，陈衍对林旭等“六君子”寄予深切的悲痛。

哀晚翠

谈空说有便瞽腾，为证莲花有一灯。多事千言并万语，
临厓撒手欠垂藤。

佛教中有所谓“空宗”和“有宗”，“证莲花”也是参悟佛理之意，但陈衍和林旭并非真正在参禅：1897年7月，林旭和陈衍等人在上海开办维新刊物《求是报》，林旭曾为康有为宣扬“三世说”等学说的《春秋董氏学》写跋，引起轰动。在此多事之秋，林旭当上军机章京不到十天就被杀害。几天前陈衍还和林旭坐在一起谈诗文、谈国事，如今晚翠却已撒手尘寰，危险时竟没有一根“垂藤”可以救他，陈衍对这一年青才子的思念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张之洞也支持变法，曾经支持过“强学会”，赞助过“时务报”，但是，他从一开始就与康有为等人有分歧。分歧的关键在于维护还是推翻清政府。这一年5月，他发表了《劝学篇》，表

示他所主张的变法与康梁的变法宗旨是不同的。张之洞力图在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主张变法的激进派之间取得平衡。他和这两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是他的弟子，杨锐被捕时张还设法营救过杨。正像陈衍曾劝说过林旭一样，张之洞对杨锐也是关怀有加，而杨锐在“六君子”中也属于“稳健派”。

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与康、梁的关系由原先的互相利用、互相支持而有分歧，急转直下变为完全对立。康、梁逃到日本后继续作反对慈禧太后的宣传，倡言革命，先后出版了《清言报》、《维新报》。章炳麟于1899年发表《诰书》。而张之洞则由他的门生、侍讲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上呈朝廷。该书既批判“士大夫顽固益深”，又批评康、梁等人“邪说遂张”，他称自己的这本书“会通中西，权衡新旧”。

张之洞在支持变法和维护清朝统治这“新旧”二者之间取得了平衡。这一年9月，把原先的官报停办了，请陈衍这位“官报局总编纂”人参加他的幕府，并改设《湖北商务报》，奏请批准后，以研究实业为宗旨，每月出三册。张之洞亲自定下“凡例”，亲自作序。

这一年，新年伊始，张之洞把陈衍请来，其目的之一正是要在湖北办报。据陈步编《陈石遗集》中的《经济类著译选编·题解》一文载：

1897年秋，在上海任广方言馆教习多年后，陈衍又兼任《求是报》主笔，撰文主张在中国设洋文报馆，作为国家对外喉舌，延聘贯通中外时务之人，举所谓务财、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筹议切实可行的整顿之法，广为论说。湖广总督张之洞阅报后，认为才识杰出，文章俊伟。1898年春，延至武昌入幕，后任《湖北

《商务报》主编达五年之久。

戊戌变法失败，多项新政停办，惟独商务保留。故张之洞奏准兴商八条：曰启发、曰倡导、曰合力、曰塞漏、曰祛习、曰保护、曰体恤、曰奖励。其中倡导一条指开办官营工厂为民营倡导。启发一条即包括开办《湖北商务报》在内，用通晓文字广向商界宣传。起初，湖北商务报馆设于武昌文昌门外纺纱局内，因经费短绌，每月仅由牙行牌照税内拨款若干充用。人员无几，聘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生河濑仪太郎（字长定，又名如伺）为翻译。按照张之洞手订凡例十五条，除刊登文牍、介绍中外商情、转载商务文章外，还要译登东西方商务、商律，以备他日兴学定律之用。陈衍与河濑共同译书办报，因所习日语不多，二人多以笔谈合作，自选稿、译文、编排、校订、陈衍均亲为之。

1899年，两人先后合译了《日本商律》（即《日本新商法》）、《日本破产律》、《商业博物志》三部著作。其中许多商务名词闻所未闻，两人在合作过程中往往反复笔谈，直至彻底弄清才将其译出，而在翻译时又要考虑到力求简明以使读者易于通晓。这些译著陆续刊登在《湖北商务报》上，在刊登《日本商律》时，陈衍还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说：

中国自秦汉以后，始轻商人，一切商事听民自为，官不过问。其经官者，官以民律治之……今商所有事，其非民所有事者，益繁于古，而以治民之律治之，则律所不载，为商者无所恃以不恐……商何由振？

陈衍明确地说明所译介的商律，是为了保护商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法律，并且可成为中国制订商律的佐照。

译介《日本破产律》则是因为有感于当时湖北倒账之案屡见不鲜，汉口的钱庄也常常倒闭，庄主卷款逃跑。陈衍认为国家亟

须制订破产法律，以保护债权人的正当权益，减少他们的损失，并且可防止不法商人在声称破产后，将资金藏匿起来，更改名字后重新经商。

陈衍译介日本的经济和法律等类著作，是很有政治眼光的。在近代中国，要学习西方，必通晓西方各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法律制度。而日本就是这种学习西方的典范。蒋廷黻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说：

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40余年来，（蒋书刊于1938年），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

和陈衍同时代的梁启超，也曾经呼吁：“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又说：“苟不读其书，而欲据其外见之粗迹，以臆度其长短，虽大贤不能也。”

陈步在所编《陈石遗集》的《经济类著译选编·题解》中有这样一段话：

值得一提的是，从时间上看这些译著与严复翻译的被誉为我国最早的经济类译著《原富》不相上下，《原富》首版是1901年，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而陈衍的九本译著闻世有的比之早三年，有的比之晚两年，同属我国首批经济类译作。严译重在理论，而陈译强调实用。

陈衍的九部译著分别为：《日本商律》、《日本破产律》、《银行论》、《商业博物志》、《商业经济学》、《商业开化史》、《货币制度论》、《商业地理》、《欧美商业实势》。

1900年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兴起后，打出“扶清灭洋”的口

号，迅速蔓延到京津一带。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既害怕农民起义，又试图利用他们来抵御外国侵略，他们首鼠两端。而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起来。到了6月21日，被复杂形势“惊昏”了的西太后竟然正式对各国宣战，酿成八国联军的战祸。25日，“载漪率团民入宫企图杀害光绪帝，那时候西太后受惊发昏渐渐苏醒了。她对义和团感到危险，对外国强盗觉得还有希望，下谕停止围攻使馆，命荣禄赴各公使馆商议和局”。

京津的这一场大乱，使陈衍失去了次子陈声渐。陈衍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在天津北洋大学就读，战乱中三儿陈声被逃回家中，陈声渐却被困在一位同学的家中，被八国联军的洋兵所杀。下面是陈衍的长歌当哭：

哀渐儿

儿在天津学堂，乱作，住同学袁宅。袁有新妇，洋兵将据焉，儿为说退之，兵旋复来，开枪戕儿。

冥鸿两两将五雏，年年翻飞度江湖。四雏南来一雏北，哀哉中镞亡其躯。尔雏不为稻粱谋，胡独北去天一隅。苍颉鸟篆世久厌，旁行苦记羊皮书。孽臣昏妖天下无，鬼兵守关先张弧。桃茆巫祝本无验，以车载鬼纷负塗。众人相惊则皆走，有足谁縈长趑趄？晦冥白日鬼瞰室，况有粲者窥踰间。尔非道安弓剑徒，宁能为人护孀孤？谬思谈笑却羌胡，哀哉性命戕须臾。

陈衍旅食四方，夫妇俩抚养五个儿女，现在失去“一雏”，悲从中来。他将这一噩运归咎于“孽臣昏妖”，是表现了对以西太后为首的腐败昏庸的当局的极度愤慨。据《年谱》载：

家君尝自言，平生不怨不尤，于穷达得丧，殊少介意。至骨肉死亡，不免悲哀，未有动魄惊魂如是年之甚者。自拳匪乱成，革王载漪矫旨命各疆吏攻各居留外人。广雅不奉

诏，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倡互保之约，故北方鼎沸，东南晏然。然无日不吞声北望矣。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被列强以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已被迫从闭关锁国的状态掉入开放地面对世界的境遇之中。义和团运动的“扶清灭洋”，虽然事出有因，旨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但表现出明显的盲目排外倾向，他们采取极端的捣毁教堂，包围使馆，对洋人格杀勿论等非理性行为，属于“群众性民族主义”。它表现出蒙昧和疯狂的特征。满清政府中有一些孽臣，居然想利用这种极端的行为来解决问题，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造成的后果只能如以上这一首诗歌中所说的“闻阎涂炭那忍道”、“危邦乱邦动可死”。而像张之洞、刘坤一等这些务实的封疆大吏们，对待外国人与义和团的策略却是较为明智的。当时在北京的义和团捣毁铁路、焚烧洋货、焚烧洋人药房竟不许扑救，一连烧了一天一夜，数千家商铺的商业区被化为灰烬。这就是那帮“孽臣”们对义和团所谓“抚而用之”的策略所造成的恶果。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则推出了一个所谓“东南互保”的措施，他们一面拒绝英国提出的军事协助，一面采取措施保持南方的相对稳定局面，并在各国之间周旋，可谓用心良苦。事实上，这一策略限制了列强企图深入控制长江流域的野心，也限制了义和团向南方的发展。

这一年的武昌还有一个大案，是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起义。他们“要求‘保全中国自立，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之权’。对义和团则认为是‘败国是’，要用武力来‘驱除’，要‘讨贼勤王，以清君侧，而谢万国’”。“自立军”很快就被张之洞残忍地镇压下去。

1902年2月，郑孝胥在武昌刊印《海藏楼诗》，陈衍为他作序。郑孝胥称赞陈衍所写序文的风格，在诚斋（杨万里）、白石（姜夔）之间。郑孝胥作了一首题为《野鹤》的诗，陈衍也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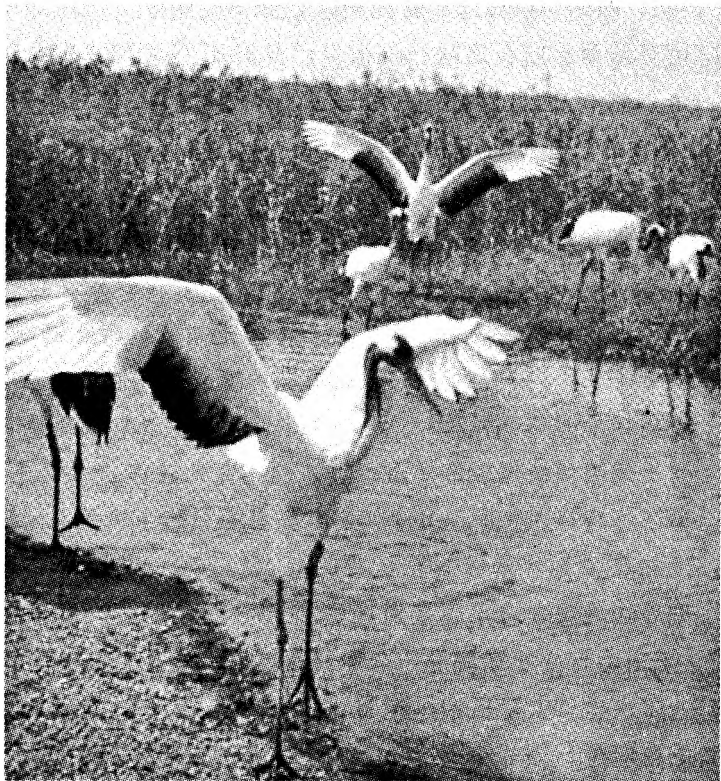
一首诗与郑孝胥唱和，两人的诗分别是：

野鹤

被服从来士不完，三年去国此衣冠。苍鹰岂免饥为用，
野鹤何缘顶自丹？荧惑太微殊未退，横流沧海故难安。等闲
鹿愤休相逼，只作桃椎委地看。

鸥鹭一首和太夷《野鹤》诗

君已盟鸥江水湄，我原雁鹭在芦葦。饥中风味鸥能语，
寒里神情鹭最知。片片急湍吟杜甫，茫茫笠泽去姜夔。无端
更有诚斋喻，枉却东风到此时。



野鹤

郑孝胥曾“三年去国”，任驻日本神户、大阪总领事。他一生奔竞仕途，热衷功名，但这一次因唐才常的案件，张之洞要加封他二品顶戴，他却不愿接受，“苍鹰”喻酷吏，他自称“野鹤”缘何要“顶自丹”？“荧惑”为不祥的征兆，“太微”指皇帝之居。沧海横流，国难当头，皇上（“太微”）也“难安”，诗人只想当个隐士（“鹿臞”）。

但是，陈衍的和诗中说：郑孝胥并不是个隐士，他在担任芦汉铁路总办的美差，并在铁路局江边上盖起了一座“盟鸥榭”。而自己始终是“有县令而不为”，只是隐居江边上的一只“雁鹭”。三、四两句戏称郑孝胥能耐饥，陈衍能耐寒，虽然郑孝胥对陈衍有诚斋、白石之喻，陈衍自己却并不愿意与“东风”争俏，是真想归隐的。他在一首题为《思归》的诗中头两句道：“买田阳羨愿真违，数亩陶江亦未归”。

这一年秋天，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两湖总督由端方兼任，陈衍准备离开湖北，写下了这首喜于归隐而略带悲情的《秋早作》：

平生麋鹿性，见绿喜无度。携家走四方，所至必种树。
流连生意足，丧志听坐误。此来真四壁，无可下锄处。
隔墙见高梧，大叶飒轩翥。对窗照书案，慰藉劳眷顾。
吟诗黄更妍，闻雨槁欲据。谁知凉暄贸，忽忽复此遇。
墙头秋色老，墙下蟋蟀语。江冷枫丹中，酒人会当去。
落叶积空山，待汝没行履。

麋鹿喻隐逸之志，唐崔道融诗有“自量麋鹿分，只合在山林”。李白诗有“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陈衍早丧当官之“志”，多次坐“误”机会，现在“酒人会当去”，就要离开两湖总督的幕府了。郑孝胥见到陈衍的这首诗后，写了一封信劝陈衍留下，信中说“江冷枫丹，酒人欲去，闻者何以为情？果动归

思，盟鸥榭益当劝过”。最后因端方坚决挽留，陈衍才没有离开湖北的督署。

第二节 “何为一卷货殖传，手自编排兼补葺”

陈衍到张之洞幕中后，除任官报局总纂外，实际上成为张之洞理财的参谋。《年谱》中有以下四处提及理财的记载：

（1899年）初，湖北钱商多倒闭，钱帖止折支十成之四五，类饱私囊万缗而去。自设官钱局，人民信用官钱票。而此害少杀。然而时有伪造官钱票者。家君教以改制暗字银纸，民间难以伪造。于是官钱票行用。由二百万银元十年至四千万银元，信用达十余省。

（1901年）是春，有《作货币论一卷刊之戏示苏戡》：“生事纷纷怨孔方，求田问舍赖伊强。归田何与江神事，要敬钱神一瓣香。”

（1902年）首议铸铜币。初，广雅读家君所著《货币论》一卷十余篇，欲创铸当十紫铜元，终恐其不能通行，未决，匆匆移镇。至是（端）抚部又疑之，家君又著论，与反复辩说，乃以停铸一两银元所剩机器试铸之，至年底，不及四阅月，估计工料，已赢余利五十万银元。明年乃大开小学堂，会城计六十处。并大派学生留学日本。次年一年赢利二百万银元，而广雅回任矣。

（1904年）广雅归，益用家君言，盛铸铜元，前后数年，获余利一千四百万银元，用以百废俱兴。汉阳兵工厂添造快枪，由日五枝至五十枝而未已。子弹称之。武健诸军

外，练成第二镇新军，炮队营、辎重营等俱备。以外，遣派各种学生留学日本，士官为盛，卒成武昌革命之局，非广雅所及料矣。

按当时的币制，一块银元理论上值一百块铜元，每块铜元值10文制钱，也就是说一块银元值一千文制钱，故上言所铸为“当十紫铜元”即相当于十文钱的铜元。但因为当时发生“钱荒”，并且银贱铜贵，所以实际流通中一块银元却只能值八九百文，甚至降至七百余文。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衍建议张之洞铸制和发行铜元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并平衡币制。但是，张之洞对此犹豫不决，这是因为他于1888年在两广总督任上时，曾倡导铸银元，但出现过波折：

银元制造的倡导者是两广总督张之洞，他看到市面上流通的全是外国银元，于是奏请自制银元以谋抵制。张之洞所制造的银元，正面纪“光绪元宝”四字，中央以满文纪“光绪元宝”，周围以英文纪省名、币重，背面是蟠龙图案，它是中央政府首铸的银元。按清朝库平（即重量），西方银元重七钱二分。为了抵制西方银元，张之洞故意将新银元的重量加到库平七钱三分，并把这一重量铸到钱币的背面，环书“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他认为新银币比西方银币分量重，人们自然会选择中国银币。然而，银币发行以后，出乎他意料的是百姓的确喜欢这种银币，但却把它们藏起来，还是花外国七钱二分的银币，几天之内他所铸造并投放市场的几万枚七钱三分的银币就不见了。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找一位金融专家咨询，那人告诉他，这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说，在货币流通中，人们愿意把质量不好的钱币先花出去，而把质量好的钱币贮存起来。张之洞恍然大悟，于是，立刻停铸七钱三分的新币，改铸七钱二分的新银币与西

方银币流通。^[3]

对于铸铜元，接任湖广总督的端方也有犹豫，但终于1902年“试铸”铜元，如前所述，尝到甜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后又“盛铸”铜元，更是大尝甜头，但这一甜头却导致了“武昌革命”，这是张之洞始料未及的，“武昌革命”中的中坚力量都来自日本留学生，这真如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其作用出乎意料并且无可挽回。

陈衍的《货币论》共有12篇文章分别刊登于1899~1902年的《湖北商务报》上。这一组系列文章的观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国家和各省必须对当时的“钱法”进行“整顿”，以扭转当时混乱的货币流通状况。如前所述，当时一块银元可值八十块左右的铜元，如果每块钱币各以一两计算，则一两银元可值八十两左右的铜，但是当时欧美各国所制的铜钱不足二十两就合银一两，这样的比例相差太大，就造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人把铜钱或铜私运出国，这进一步加剧了铜钱的不足，所谓铜钱荒。陈衍认为，要整顿这种混乱的货币现状有两个办法：一是要铸造铜元以满足市场上对铜钱的需求；二是铸铜钱时必须将大而厚的铜钱改为小而精的，这样才能符合银铜价值的比例，改变银铜之间的不正常比价。

为了整顿钱法，陈衍还提出铸造银元不应各省都设银元局铸造，而应由国家委托某些省（如湖北等）铸造，其他省可送银搭铸。陈衍还提出兑换银元铜元不应设立限制，以使银元、铜元等货币能自由流通，否则奸商就会囤积居奇，扰乱货币的流通。陈衍还提出货币兑换应把握好一定的重量，铸铜元要详核成本等具体措施。总之，他认为国家及各省应对混乱的货币状况进行管理：“货币者，当以天下为一市者也”。他在一首诗中曾说：“中央集散法，制限屈伸律”。这种统一发行管理货币的观点是符合

金融规律的。

陈衍的第二个观点是主张建立从银本位向金本位过渡的货币本位制。他说：

中国一用铜之国也，至近年而仅仅可称用银。通商日盛……则由铜本位之国，进而称银本位之国，谁曰不宜。顾本位未至于用金，则与地球上各国通商，货币物价，已无处而不受亏。货币未遍于用银，则银块、铜钱，时出入淆杂乎其间，各进而操轻重之权。二者皆大失理财之道。今就中国审时度势，则前者暂且缓图，后者则迫不及待矣。（《银价日低急宜整顿钱法论》）

陈衍认为，中国因黄金资源紧缺，所以应暂时“缓图”建立金本位制，但建立银本位制已到了“迫不及待”的时候了。他接着举湖北的例子，认为湖北已基本上实行了银本位，但是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实行的却是铜本位：

铜币应只为补助货，而铜币乃自有价值，不听命于银币，是银币不足为本位，仍铜币为本位矣。铜币仍为本位，则银币转听命于铜币矣。君转听从于臣，主转听从于仆，有是理乎？然则整顿之法奈何？曰，有二说焉：一由物价以整顿之，银元既不足以定铜钱之价，则铜币为主矣。货币既贵，则物价应跌。市上有物之价，当使平也，然此由于自然之趋势，货币果少，则购物者少，物滞而不销，则物价自落，非可以势力强抑者，即强抑之，所抑之数亦不多，受抑之时亦不久也。一由货币以整顿之，以银元为主币乎，则银元之供给，即当足银元之需要。而铜元为补助货，铜元之供给，亦当足铜元之需要。然则铜元急宜多铸矣。铜元既足供需要，则由银元可以定铜元以下之值矣。（《银价日低急宜整顿钱法论》）

为了建立银本位制，以上提出了物价整顿和货币整顿两种方法，前者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只能导致专制主义盛行，而后者才是由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掌控，是适合的。

陈衍自幼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关于理财方面的书，读的是《周官》、《管子》、《史记·货殖列传》等，但却能论述近代金融的原理并付之实践，靠的是好学敏思的素质。所谓“何为一卷《货殖传》，手自编排兼补苴”，这种反对空谈，通经致用的风格，使他成为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的“理财巨擘”，这不是偶然的。

陈衍刊登在《湖北商务报》上的，除了以上这一组系列金融文章外，还有大量论理财的文章，如论建设武汉商业中心，论商界人士应阅读商报商书等诸多主题都起到了一种舆论导向的作用。这些文章大都想法独特，语言充满气势，是陈衍刚直磊珂的性格在理财领域的发挥，与他在诗歌和其他学问领域的性格如出一辙。

陈衍虽然一生没有真正介入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相反，他对政治和经济一直有敏锐的观察，对历史一直有深入的思考。他早在 22 岁时所写的《咏史》38 首之第 17 首就是写经济的：

丈夫志四海，安事此一室。古人喜大言，未必皆情实。
史称诸葛公，炉灶见经术。又言陶桓公，运甕无虚日。竹头
与木屑，检点及纤悉。又言谢太傅，履屐位不失。可知天下
才，钜细事秩秩。经云居家理，岂以徒抱膝。

陈衍从年青开始就认为“大丈夫”应像诸葛亮、陶侃、谢安那样有经济头脑。“钜细事秩秩”，而不能做“徒抱膝”的书呆子。他曾说：“国家者，积无万数民命为之，财力其脂膏也，脂膏竭，大命无能者在。”又说“用人理财各要政，尤为治乱兴衰

之源。”他对“孔子罕言利”说表示怀疑，认为一定是孔子的弟子搞错了，利“乃天下甚美之词”，“何必罕言之，又何可罕言之”。比如司马迁就不罕言利。“太史公发愤著书，立《货殖》一传，标举人物，首管子、范蠡、子赣、白圭。皆瑰伟士夫，非生而节啬俭者也。汉轻贾，人品乃少降矣。”他还替王安石变法辩护：“世咎安石以新法乱天下，真瞽说也。宋之几于亡国者，由开国以来，武备不振，而徽宗无恶不为……于安石乎何与？”1899年至1902年之间，陈衍与日本人河濑如侗一起先后翻译了九部经济、法律著作后，河濑于1903年返回日本，陈衍在赠诗中說：

自强在尚武，原富在戒逸。翰墨久不作，管商殆绝笔。
不求三年艾，可救青盲疾？如君经济学，雅抱计然七。相从日讨论，要旨迨纤悉。窃思挽时局，财政宜秩秩。硬货定本位，纸币相辅弼。中央集散法，制限屈伸律。股券若泉流，国事理如栉。”

——《太息一首送河濑如侗归日本》

计然曾献七条计策，其中五条助越王勾践绝处逢生，重新崛起并迅速强大起来，最后打败了夫差。剩下二条助范蠡迅速致富。这些计策中就包含重视商业等思想，这在古老的中国思想界是非常可贵的，陈衍对此加以肯定，是很有眼光的。陈衍在张之洞幕府中长达十年，张之洞对他礼遇有加，建议多被采纳，张之洞卒后陈衍于1911年撰《张之洞传》，被辑入《清碑传集补》。这篇传记在抽取张之洞一生的主要政迹，对他给以应有的肯定之后，有一段评论：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此大一统之世之言也。今不能与列强闭关绝约，人富强，己贫弱，犹为此言，非駮则狂易耳。中国士大夫讳言财用，见之洞用财如粪土，从而

百端诟疾之，然其家固不名一钱也。三十年经营财用，与外国理财家较，挈短长去之尚远。而中国居高位者，遂未有其人。闹姓签捐之类，固不轨于正，铁厂、纱布、丝麻各厂，亦折阅相继。然一易商办，则赢利巨万。一击不中，谤者引为大戒，岂不误乎！独铜元钞票畅行时，衍请以中国所自有金铸造金币，以数百万建呢大厂，可支三十年国用。迟回审顾，未之能从，滋可惜耳。为专制之说者，至谓开学堂、派遣游学、练兵造械为乱阶，彼骊山囚徒又何尝负笈之学子耶？

这一席议论，首先批判了那些拘泥于古代轻视“务财用者”的保守看法，对张之洞的廉洁奉公和干练经营进行了肯定。而对张所办的工厂，公办则“折阅”（赚不到钱），商办则“赢利巨万”，已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规律。文中对“金币”的期望表现出陈衍对金本位制的推重。难能可贵的是，陈衍对专制主义者们批评张之洞造成“武昌起义”的“乱阶”给予了回击。这再一次证明陈衍对政治冷眼旁观后的深入思考。据《年谱》载，当武昌革命军起时，陈衍正在学部任职，“满员皆惶恐问计，公（陈衍）直告之曰：惟有请今上逊位，惜无人敢奏”。陈衍相信武昌起义是顺应历史的，清朝气数已尽。他鄙视那种“徒抱膝”的守旧不化者。

张之洞认为陈衍帮他理财是对湖北经济的贡献，1902年10月，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时曾上奏朝廷，建议选送“经济特科”人才。他在公文中对陈衍的考评是：“学富才长，于中外古今政治利病，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当时的漕督陈夔龙也奏保陈衍为经济特科人才。

第三节 “从此长安真日远，出门惆怅大江横”

1903年春天，张之洞入都述职，传话给陈衍催他赴都应“经济特科”考试。此时湖北新成立“两湖师范学堂”，武昌府知府梁鼎芬兼任“监督”，聘用陈衍为国文兼伦理学教授，并兼方言学堂国文教授，所以陈衍不想应试。但在张之洞的催促下他最后还是到北京去应考。张之洞认为经济财政之才非陈衍莫属，谁知考完拆封试卷时一看，没有陈衍的名字。原来是新的考试格式为空两格开始写，但陈衍因多年不参加礼部的考试了，所以仍按旧格式顶格来写。对这种“违式卷”的处理是束之高阁，不予阅卷。张之洞对此大为不满，认为经济人才用考试已不合要求，如今又强调格式，可见这种考试的弊病。三年以后科举制度废止，张之洞对此是十分赞成的。1902年，张之洞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提出要参考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1904年他还会同张学熙拟订过《学堂章程》，奏请朝廷颁行，被称为“癸卯学制”。张之洞想革新教育，选拔人才，结果这一次的“经济特科”选出的人才却大多被授以知县的官衔，穿新鞋走老路。这种教育和人才选拔上的失败使张之洞十分懊丧，却使陈衍感到十分庆幸。《年谱》中写陈衍这一次应试回家后对家中的人说：

吾平生所遭，每同塞翁失马。即如此次应征，以徇广雅之期望，勉强就试。试而不取，不可谓非辱，幸违式不阅，非战之罪矣。设不幸而取，又用知县，则吾所固有而不为者也，焉不冤哉！

不愿意当官，视当知县为畏途，却对诗歌、学问和教育十分

执着。这一次赴京，他与沈曾植的弟弟沈曾桐等人每天游历赋诗。7月回到福州又与陈书、陈宝琛等人为文酒集会。8月因夫人在武昌病急而赶回武昌。夫人病愈后他又于11月被聘为武昌府立师范学堂的教授。他对培育“群英”情有独钟：

两湖师范学堂日本教习户野周二郎招饮索诗

经年学舍育群英，今日登堂酒屡倾。万里琴书双伉俪，
一家师范两先生。（夫人亦教育家）速成业毕科犹隘，普及功收
国有氓。可惜同仇方御侮，不将袍泽赋偕行。

“袍泽”指军队中的同事。陈衍曾与河濑如侗一起翻译经济金融著作，现在又与户野周二郎在同一学校执教，他们的合作是为了办洋务、兴教育。但甲午战后，民族仇恨使日中两国的朋友不能友好相处，更不能像“袍泽”那样“偕行”，日本军国主义在两国人民心中所造成的无奈和痛苦是共同的。陈衍《太息一首送河濑如侗归日本》一诗的最后四句道：“吾行为虫沙，相见未可必。别酒惨不欢，赠策聊一述。”战争使两国人民成为“虫沙”，这种悲痛是埋藏在陈衍内心深处的。

在这个内忧外患的年头，腐败的满清政府使整个国家陷入难堪的境地，日本不仅对中国虎视眈眈，而且还于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一场与俄国的战争。对这场日俄战争，清政府居然宣称守“局外中立”，当时有位诗人黄绍箕，挖苦这是“局中外立”，这种“谑而虐”的说法是一种谴责，也是一种无奈。

这一年，张之洞经过两年调任两江总督后，又回任湖广总督。他一回到武汉，第一件事是采用陈衍的建议，大量铸造铜币。第二件事是仍任命陈衍为官报局总理事，但这时任北京大学堂监督的张亨嘉也来电聘陈衍去当教授，张之洞坚决挽留，不让陈衍走。张之洞见陈衍家贫，仅靠幕客的收入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劝陈衍当官。张之洞通过张曾畴和汪凤瀛两位太守来劝他当县

令：“陶渊明曾谓亲朋曰：‘聊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闻之，以为彭泽令。”陈衍推辞说：“我从小长到大，所见到当县令，收入万金以至数万金的，不下 30 人，但是现在他们的子孙都转眼间破落了，所以我宁可像吴梅村诗中所唱的那样‘熙载心怀宁乞食，樊南词赋尚傭书’，却不愿为五斗米来折腰。”张之洞又劝陈衍买个道员来当。陈衍说：“买个道员须花万余金，我如果有这些钱，那么也可以像陶渊明那样，‘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回家种田去了。”陈衍见张之洞如此热情地关照自己，于是便托张、汪二人对张之洞说：“官保（当时张之洞已被任命为太子太保官衔）对我有盛意，就是要我不当幕客而当官，那么请您委任我官衔就可以了。”于是张之洞第二天夜里连着委任了 3 个官衔给陈衍：一是督署文案委员，二是商业学堂监督，三是洋务局帮办。每个官衔薪水都是 100 块银元，仍然兼官报局总理事。这时，陈衍辞去各学堂教授的席位。但陈衍还是对张亨嘉的热情邀请有愧于心，于是有诗曰：

余将赴北京大学堂监督张燮君之招，广
雅督部坚留不听去，且劝作官，余辞谢商量
累日，重违督部意然于燮君殊负负矣

岂有嶮崎历落人，坐隅立鹤性能驯？水乡颇似孟诸泽，
久欲狂歌老此身。

一落江湖拾稻粱，捉将官里太仓皇。鲁连纵黠如黄鹤，
山北张罗尔许强。

无将六载居停意，不及一年东道情。此语逼人吾所病，
可嗟息壤竟寒盟。

坠欢廿载补难成，辜负嚶鸣念友生。从此长安真日远，
出门惆怅大江横。

陈衍自言“鹤性”无法改变和“驯”服。“孟诸”是古代大

泽的名字，高适诗句曰：“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苏轼也唱道：“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经过这一番的“商量累日”，陈衍已定下了一生远离政治的志向：“从此长安真日远，出门惆怅大江横。”在同时间的另一首诗的末尾，陈衍唱道：“还山同所愿，东道尚羈縻。”他每颂高适《还山吟》，归隐的意向就一直挂在心中，虽然世事“羈縻”，不能真正如愿。

想隐居，就必须买宅，1905年2月陈衍在福州买下了文儒坊三官堂旁的一座房子。此前，家人住在陶江，乡下水冷，陈衍的三子陈声被就是因为乡居而生病，于这一年正月病逝的。当三儿病重时陈衍夫妇赶回家中，但已来不及见最后一面。陈衍这一次在福州所买的房子座落于文儒坊和光禄坊之间的一条小巷中，这条小巷子现名为“大光里”，房子门牌8号。这一年春天，陈衍又在家住了两个月，二兄陈豫已于年前过世，长兄陈书也已老态龙钟，假期满时，陈衍望着回眸而视的长兄，忍痛而别，陈衍能够理解陈书那难以割舍的目光：“难道从此永不见面了吗？”岂知果然。这一年6月陈书病重，讹传凶耗到湖北，陈衍悲痛地大哭，并速寄挽联回家：“视公如父，视我如子，兄弟师友不足道；有声彻天，有泪彻泉，山川舟车尔何仇。”挽联寄到家时陈书还见到它。等到真实的凶耗传到湖北后，陈衍又为长兄写了一篇感情深致的墓志铭。

这一年3月，陈衍在湖北刊印了自己的诗集。他从青少年开始至此时共作诗1000多首，痛加删削后只存400多首，编年分三卷刻印，取名《石遗室诗集》。“石遗室”的名称，据《年谱》记载，是他20多岁时“梦至一处，重楼叠阁，阒其无人，有书数百橱，随手抽取数册阅之，书边印石遗某某，书中似是自己著作。时只记如此，书中云何，则忘之矣。时方阅《元遗山集》，因遂自号‘石遗’。后细思此二字与叔伊颇相合：“遗”“伊”国

语同音，“石”“拾”同音，“叔”训“拾”。继此《石遗室诗集》初次刊行三卷以后，诗人又分别于1914年、1921年和1927年三次刊刻诗集。我们现在看到陈衍五孙所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石遗集》中的诗集共有13卷，其中包括“补遗”一卷，“续集”两卷。此外还有《朱丝词》两卷，白话诗一首。1905年第一次印行的诗歌都收入第一至第三卷中。

陈衍诗歌的内容除少部分反映社会现实外，大部分描绘山水和表现个人的生活及抒发内心的感受，他认为作诗应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诗歌的功能有指向外部世界和回归内心两个途径，陈的诗歌大多属于后者，对于诗歌揭示内心世界有长远的启示意义。由于这种“自家言说”的原因，他的诗与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与当时的“诗界革命”一派风格迥异，内容趋于平淡。文学艺术虽然不能不与政治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但毕竟不是政治的附庸。这正是陈衍等人所代表的“同光派”诗歌能在中国近代诗坛上长期享誉的原因。陈衍诗歌师古而不泥古，强调“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以学问入诗，以文字入诗，使他的诗雅而不俗，语言上比较艰深。他的诗是对清初“宋诗派”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诗必盛唐”的泥古诗风的批判。诗歌表现个人兴会的本质。陈衍除自己身体力行创作诗歌外，一生大量地收集和评论诗歌，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一次刊印的三卷诗集。陈衍在自己写的“叙”言中说：“第一卷凡八年（1877～1884年），多闲居及游览之作；第二卷凡十有三年（1885～1897年），多行旅之作，有歌劳之思焉；第三卷凡八年（1898～1905年），有悲伤之作，诗与人亦俱老矣。”陈衍的这三卷诗歌在风格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卷的居处和模山范水轻松飘逸，第二卷开始已显出清苍刻峭的特色。陈衍曾自言受郑孝胥的影响，发生诗变，“而余感君言，作诗盘郁往复

于中者稍久，其出之也，必有自耐咀味者。乙酉后渡海游台，北溯江，游湖南，亦遂变其前诗。”乙酉是1885年，正是第二卷诗歌的开头。

1906年7月，学部拟调陈衍到部中任职，但陈衍对于当官一向不感兴趣，并不想去，张之洞虽希望陈衍当官，却也不便“逐客”。这时林赞虞前来对陈衍好心相劝。陈衍转而一想：京师朋友很多，正是饮酒赋诗的好地方。于是陈衍便形成了进京任学部职务的想法。一年前张亨嘉曾聘陈衍去北京大学当教授，被张之洞所挽留，陈衍就已有辜负于张亨嘉的感觉。对陈这一次进京，因是去当官，张之洞的态度是“听石遗自便”，比较赞同。陈衍当初应招入张之洞幕中，就是因为追崇这位封疆大吏的学问，《轺轩语》和《书目答问》曾是陈衍年青时的学问入门之书。陈衍在张之洞幕中一居就是九年，也正与张之洞尊重文人雅士分不开，张之洞常在公务之余参加陈衍和他的诗友们举行的“文酒之会”。陈衍一生的行止总是追随着诗歌与学问而去。张之洞坐镇湖北已近20年，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已过完70大寿的他不可能永远守在江汉。所以51岁的陈衍考虑换个地方也是很自然的了，何况京城更是文化的渊薮。京师“净名社”降神活动移到福建，就曾经给闽诗带来过空前的繁荣。以诗歌为性命的陈衍对京城是向往的，他于是作了入京的决定。回首陈衍50余年来的人生涯，陈三立送他的下面这首诗中对他的概括，堪称是知人论世的一种理解：

赠石遗监督

胜流沈郑抗颜行，说子渊渊无尽藏。狼籍诗篇为客久，摩挲楮具看人强。过逢江汉头俱白，上薄风骚气独苍。更欲用心到圣处，坐收俊语挂奚囊。

陈衍的诗歌既宗唐又宗宋，他曾评论长兄陈书的诗“无所师

承，天才超逸”，他虽然推崇宋代诗人，但也不专门师承一家，就是杜甫所说的“转益多师”，就是“上薄风骚气独苍”。沈曾植和郑孝胥都曾对陈三立说过陈衍治学颇广，正是“说子渊渊无尽藏”。陈衍一生漂泊“为客久”，此时张之洞已封他为学堂监督，“樗具”就是“学官”，典出《汉书·隗不疑传》。他又喜欢收集美妙的诗歌，诗论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普遍的肯定，“坐收俊语挂奚囊”确是这位著名诗论家的写照。

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微妙。它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却常常会产生一种内在的联系。陈三立是“同光体”的领袖之一，“同光体”在中国近代诗坛上以相对“保守”而闻名，与激进的“南社”等流派迥异，这是从诗歌上来说的，把诗歌分为保守与激进，实际上是不伦不类。从政治态度上来看，“同光派”的陈三立却并不比“南社”诸君来得“保守”，尤其在“戊戌政变”之前，他追随乃父陈宝箴，完全是维新派人物。据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载，1895至1898年间：

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后任徐仁铸）都是维新派，与谭唐等合作，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唐才常等为分教。谭嗣同等积极支持，一时筹办新式水陆交通、开矿、设武备学堂、练民团，又设南学会，出版《湘学新报》及《湘报》。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4]

陈三立成为其父陈宝箴维新运动的得力助手，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

忽见《时务报》册，心气舒豁，顿为之喜，又嘉吾子愚不可及，果能相与有成也，日起有功，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公度书言梁卓如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5]

令他神往的人物是黄遵宪、梁启超。戊戌政变后，陈三立与其父一起被革职。他和陈衍不一样，已深深地介入政治，即使是被革职后，他被迫成为“神州袖手人”，退出了政坛，但是他恋恋不忘的仍然是国事和人民的灾难：

……尔我羁旅共节物，向人但能结舌瘖。百忧千哀在家国，激荡骚雅思荒淫。世言古之伤心者，士有怀抱宁异今。低头篷底各量付，平生四海子桑琴。夜阑茗饮倦罢去，月出何处起猿吟？

——摘自《上元夜次申招坐小艇泛秦淮观游》

他已把自己比喻成“结舌”的哑巴，政治上没了发言权，但是忧国忧民的“古之伤心者”之“怀抱”没有变，虽然他已像《庄子》中的子桑那样处于饥饿之中，但歌琴之声仍不停止。激荡在他胸中的，仍是“百忧千哀在家国”。

把陈衍和陈三立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光体”诗歌，与政治无涉。陈衍先见其诗文，后见其人，前后相隔 20 年：

丙戌（1886 年）余在都门，己丑（1889 年）在长沙，闻张铁君亨嘉屡称其能文。见其《游庐山诗》一卷，学韩，与易实甫诸人同作者。后识李亦元希圣，言君为文在陈承祚、范蔚宗之间。迟之又久，始相见，君已中更患难，憔悴垂垂老矣。赠余一律云：“胜流沈（乙庵）郑（苏堪）抗颜行……”余次韵二首答之云：“匡阜东南一太行……”“东冶亭边字数行……”时余方丧伯兄。

——《石遗室诗话》卷一



福州冶山摩崖石刻，陈衍所书。

陈书逝于1905年，这一年陈衍所见到的陈三立已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憔悴衰老，但人老心不老，仍在诗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慈禧：

九门白日照铜驼，烽火秦关惨澹过。庙社英灵应未泯，

亲贤夹辅定如何？早知指鹿为灾祸，转见攀龙尽媿媿。恍惚道旁求豆粥，遗黎犹自泣恩波。

——《孟乐大令出示纪愤旧句和答二首》（之一）

“九门”内的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对各国“宣战”，导致庚子事变的“烽火”“惨澹”，几天后便又向各国“求和”，对于“媿媿”（依违阿曲无主见）所造成的“灾祸”，陈三立予以愤怒地斥责和挖苦。

陈三立在政治上的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性格，在诗歌上的表现就是陈衍所说的“恶俗恶熟”：

尝评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余谓亦不尽然，即如张广雅（之洞）诗，人多讥其念念不忘在督部（时督武昌），其实则何过哉！此正广雅诗长处。如《正月十七日发金陵夕至牛渚》……以上数诗，皆可谓绵邈尺素，滂沛寸心，《广雅堂集》中之最工者。然东来温峤，西上陶桓，武昌官柳，文武也，旆旌也，鼓角也，汀洲冠盖也，以及岷首之碑，新亭之泪，江乡之梦，责琐湛辈之同浮沉，秋色寒烟之穷塞主，事事皆节镇故实，亦复是广雅口气，所谓诗中有人在也。伯严不甚喜广雅诗，故余语以持平之论，伯严亦以为然。

——《石遗室诗话》卷一

陈三立不喜欢张之洞的诗歌，作为维新派，他不喜欢张之洞的“纱帽气”，陈衍却以“诗中有人在”予以充分的肯定。张之洞同样不喜欢陈三立的诗的艰深，陈衍也就此进行了说明，同样是一种“持平之论”：

广雅相国见诗体稍近僻涩者，则归诸西江派，实不十分当意者也……其于伯严、子培及门人袁爽秋（昶），皆在所不解之列……于伯严诗，尤多不解。有《九日从抱冰宫保至

洪山宝通寺饯送梁节庵兵备》云：“啸歌亭馆登临地，今日都成隔世寻。半壑松篁藏梵籁，十年心迹比秋阴。飘髯自冷山川气，伤足宁为郢曲吟。作健逢辰领元老，下窥城郭万鸦沉。”此在伯严最为清切之作，广雅不解其第七句，疑元老不宜见领于人，伯严告余云。

——《石遗室诗话》卷十一

对于陈三立这首最“清切”的诗，张之洞还是“不解”其第七句，陈衍予以批评：张之洞解诗太拘泥。“领（元老）”的主语未必一定是陈三立，也可以是“元老”张之洞自己。陈衍对于张之洞的“清切”和陈三立的“僻涩”，都能看到他们各自的长处，予以兼容并蓄，常常以这种“持平之论”做到有容乃大。陈衍对张之洞的“节镇故实”、“广雅口气”能予以赞赏，对陈三立的“生涩奥衍”也能予以好评，并且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给以分析：

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自《古诗十九首》、苏、李、陶、谢、王、孟、韦、柳以下逮贾岛、姚合，宋之陈师道、陈与义、陈傅良、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严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钟惺、谭元春之伦，洗炼而镕铸之，体会渊微，出以精思健笔……一派近日以郑海藏为魁垒，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东野，七言佐以宛陵，荆公、遗山、斯其异矣。后来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之所自出也。其一派生涩奥衍，自《急就章》、《鼓吹词》、《铙歌十八曲》，以下逮韩愈、孟郊、樊宗师、卢仝、李贺、黄庭坚、薛季宣、谢翱、杨维禎、倪元璐、黄道周之伦，皆所取法。语必惊人，字忌习见。郑子尹（珍）之《巢经巢诗钞》，为其弁冕，莫子偲足羽翼之。近日沈乙庵、陈散原，实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异焉，其全诗亦不尽然也。

陈衍把陈三立列为“生涩奥衍”一派的传人，“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其实，沈曾植的诗风同样是艰涩难读，我们前面读他的《寒雨闷甚杂书遣怀爨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等诗时已领教过了。

参考文献与引文出处：

[1] 谢放：《张之洞传》第17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

[2] 同[1]，《九、兴学育才》。

[3] 吴树国：《民之通货——历代货币流变》第222～223页，长春出版社，2005年1月。

[4]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301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

[5] 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6月。

第五章 北京十年

(1907~1916)

第一节 “诗有萌芽意，人多磊诃形”

陈衍因为夫人病重，他虽然作好了入京的决定，但还是到了第二年（1907）三月才料理好行装起身入都。他向张之洞辞掉了“督署文案”、“会办商务局”、“帮办洋务局”和“官报局总纂”四个差使。为了照顾陈衍的家庭经济，张之洞留下官报局一差的薪水 50 块银元给陈衍作旅费，而到北京后陈衍除了接下“学部”中的差事外，还兼任北京大学堂的教授席位，加上时任礼部左侍郎的张亨嘉聘他为礼部纂修，这样几个职务的薪水加起来才能维持这个夫人多病的大家庭的开支。

这位张亨嘉，自 1888 年任湖南学政后，不断迁升，先后典

试广西、提督浙江学政，后升授兵部右侍郎、补调礼部左侍郎等，其中1904年至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这所创办于戊戌变法年间的学堂当时正处于艰难的草创阶段，张亨嘉从选定校舍、讲堂、操场入手，参与制定章程、拟定考试科目，所设课程为：中文论著、中国史地、外国史地、翻译、算术、代数、平面几何、物理及无机化学等。在师资方面，他既礼聘宿儒，又任用熟悉西方文化者及西人，使北京大学的这一前身初具规模。陈衍是张亨嘉重教兴国事业的同路人，他从此在北京大学执教，前后近10年。

离开武汉之际，朋友们自然是多番“诗钟饯别”、“知交排日饯饮”。行前，沈曾植升任安徽提学使，还请陈衍到安庆一游。陈衍留下一首诗：

从黄州访乙庵提学安庆出现

蔗林相国衡湘画册属题

曾望衡山渡洞庭，廿年前梦阻杨舲。却乘千里剡中兴，展看数峰江上青。孺子百来犹下榻，康成一宿罢谈经。《尚书》《尔雅》今休讼，回雁眠龙总杳冥。

陈衍从武昌顺长江而下，经过黄州（今湖北黄冈）到安庆造访沈曾植。看到沈曾植出示的一本衡湘画册，陈衍想起20年前进入湖南时那如梦的记忆：“杨舲”（扬帆）进入洞庭却被淤塞的湖面所阻。画册上“展看数峰江上青”的美景令人想起沈曾植故乡的“剡中”，那里是李白多次歌唱过的美丽地方，而陈衍自称“孺子”，是个清贫不仕的人，却多次“下榻”在沈府上。因为两人除了共同吟唱诗歌，还同是郑玄（康成）经学的研究者，常为《尚书》《尔雅》中的问题争论不休，然而正如衡山“回雁”、湘江“眠龙”一样，这些古代的学问总是“杳冥”幽深的。

沈曾植是一代儒宗，又曾被陈衍誉为“同光派”的魁杰。他

们共执牛耳的这个诗歌流派，继承清初宋诗派的衣钵，“以涩为贵，恶熟恶俗”，陈衍谓：“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是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是也。”例如上面引用的这首诗，不讲“扬帆”，偏讲“杨舲”。《尚书》《尔雅》，曲折隐晦，生涩艰深，以学问为诗，以文字为诗，他们都是学者型的诗人。陈衍自谓“余生平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三百篇之大小雅材是已”。沈曾植的诗同样堆砌典故，文字古奥，艰深曲折，力僻平易。自从8年前两位诗友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会面以来，他们常常唱和吟咏，论诗谈文，沈当官，陈是清贫的“孺子”，“百来犹下榻”，一个提出“三元说”，一个提出“三关论”，他们常常争“讼”这些“杳冥”的学问与诗歌。

陈衍于这一年从武昌到了北京之后，张之洞也以大学士为军机大臣。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一中说：

都下诗人，十余年来，颇复萧寂。自余丁未（1907年）入都，广雅相国入枢廷，樊山（樊增祥）、实甫（易顺鼎）、芸子（宋育人）俱至，继而弢庵（陈宝琛）、苏戡（郑孝胥）、右衡（秦树声）、病山（王乃征）、梅庵（瑞清）、确士（俞明震）、子言（陈诗）先后至。计余居都门五年，相从为五七言诗者，无虑数十人。讨论之契，无如赵尧生熙，陈仁先曾寿，进学之猛，无如罗揆东惇愚，梁众异鸿志，黄秋岳濬……

经历了十几年相对“萧寂”之后，现在京中的诗歌得以复兴，这当然与“同光体”的繁荣分不开，而陈衍正是其中的“催耕之布谷，促织之络纬”。他们

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类；世所号为良辰者，择一目前名胜之地，挈茶果饼饵集焉。晚则饮于寓斋酒楼，分

纸为即事诗，五七言古近体听之。次集则必易一地，汇缴前集之诗，互相品评为笑乐。其主人轮流为之。

——《石遗室诗话》卷十二

以陈衍等人为主角的京师的这种“文酒之会”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多年，成为中国近代诗歌史上的一道景观。而沈曾植这一年（1907）来到江西，1911年后到了上海，同样将“修禊日”及诗钟集社等活动带到这些地方。

进入京都这一年，夫人箫道管已病入膏肓，痲病的症状忽冷忽热间际发作。终于8月18日谢世。12月陈衍痛定思痛，作长诗《萧闲堂诗三百韵》及《先室人行述》一文。陈衍对萧道管爱之至笃，这两篇作品一篇为五律，回叙了贯串着爱与理解的34年夫妻生活，催人泪下；另一篇为散文，从哲理上揭示了这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爱情的内在原因。这篇五律是陈衍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歌，从她的出生开始，回顾她那温文尔雅，充满睿智的一生。如描写出嫁时的窈窕身姿和学识素养为“修竹亭亭倚，黄花淡淡姿。评书苏氏轼，品画郭家熙”。写她帮助陈衍完成著作是“传记稽今种，形声辨老苔。偶披樊榭本，欲补竹汀遗。文献搜蒙古，歌行及月氏。女真黄代谢，天水碧涟漓。参考兼三史，钞胥借百鸱。遗编增秀野，丛话拟胡仔。助我长头臂，劳君右手胻”。萧道管在结婚第二年生育第一胎时即“病甚殆”，后来患血漏十几年，最后患痲病咯血一年多而逝。但是在婚后的34年中，她虽身体不好，多半时间却都是跟着陈衍，或“旅食四方”，或躲避战乱。“潏潏看西子，崎岖上武夷”，“窄堵天宁寺，湾环十刹坡”。“全家同谷窳，迁地建溪湄”。在这样的情况下，萧道管仍能把生活调理得有滋有味：“天竺连灵隐，苏堤接净慈。孤山问鹤梅，一舸逐姜夔。杯影三坛月，裙腰百草丽。”“十双田舍计，百万宅邻贲。楼阁三层筑，梅桃满院樨。”“赤壁周郎往，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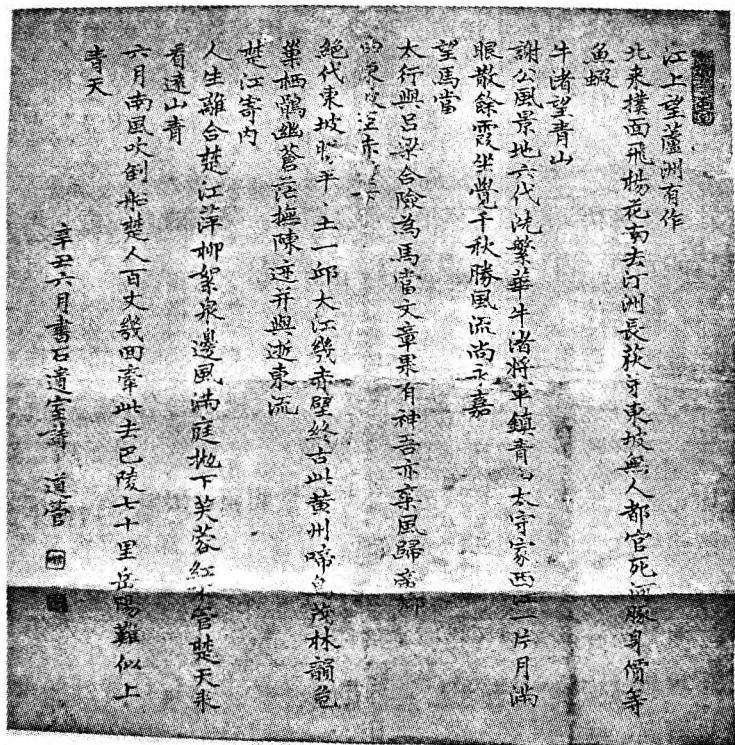
山谢朓私。武昌怀李白，江夏叹刘琦。”当萧道管生病时，陈衍“痛我肠如搦，伤君骨强搯”。夫妻俩情投意合，“同床无各梦，小住又将离”，小别如新婚，始终相敬如宾。

《先室人行述》一文则描述了两个人在人生观与世界观上的相互理解，以说明这一纯洁爱情的内在依据；她“幼就傅读书，未成诵，讲解未了然于心，辄废寝食”。而一生与陈衍二人有共同的蔑视功名、不受拘束的意趣；她快意随心，纵情恣肆：

年少时，欲博先母及外姑欢，亦望衍成立功名，二老既逝，殊漠然，衍有微官，遂以不为，学部之调，颇阻之。晚究心哲理，见解迥异寻常，尝著《言愁》、《说乐》二篇，寓轻世肆志之意。《言愁》云：愁如海也，井蛙不知有海；恨如冰也，夏虫不知有冰。其于人也为愚故愈愁……绝圣弃智，塞聪黜明，不能举剖斗折衡为例也。剖与析，一举手之劳，斗衡已失，塞之而犹聪，黜之而犹明，非入定面壁不可矣……《说乐》云：乐无涯也，而行乐有涯。于是乎苦与乐相关，如环之无端焉。孟子、荣启期皆有三乐，一至难，一至易也，而实无易之非难。父母安得俱全，兄弟安得无故，不自主也……乐之高者尚有二：曰感情，曰名誉。富贵者，所以供二者之取精用宏而已。无斯二者而徒富贵，不过藏货财之藏，土木偶像之衣冠而已……

从以上引文可看出萧道管的思想主要受庄子的影响。有明显的遗弃世务的倾向，而陈衍一生不喜科举，不愿当官，夫妻俩的这种共鸣成为爱情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人共同的苦乐观。为生计而飘泊，中年丧子，夫人多病，这些痛苦在庄子式的超脱思想中得以缓释，这是对“苦”的态度，对“乐”的态度则是“乐之高尚者有二：曰感情，曰名誉”。对于这二者，他们都奉若神明，陈衍夫妇一生清刚磊珂，名节流芳，誉满士林。陈衍

一生在关键的时刻耿直正义、态度明朗、一身正气，从戊戌政变，袁世凯称帝到日本侵华等事件，都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始终维护了一介刚直书生的名誉。而对于感情，不论是夫妻之情、兄弟之情还是朋友之情他都情笃义真。陈衍夫妻俩这种共同的人生态度是他们爱情的内在支点。陈衍“向来不作置妾想”，对萧道管感情弥纯。她逝世12年后陈衍才续娶李柳为继室。他先后刊刻萧道管的《说文重文管见》、《列女传集解》、《萧闲堂札记》、《然脂新话》、《平安室杂记》等诗文著作。可以看出，陈衍对萧



萧道管墨宝。

道管的感情是始终不渝的，别的女人是无法代替萧道管的。

夫人病逝后不久，陈衍漏痔病发作，卧病一个月。1908年初，沈曾桐等诗友常来上斜街寓庐慰问。在京都这一首善之地，陈衍结识了更多的诗友，如丁惠康（叔雅）、杨增辇（昫）等人。而陈衍所住的寓庐，叫小秀野草堂，是江苏长洲顾嗣立的故居。顾嗣立为康熙年间名满京园的文学家，他所辟的“秀野园”水木亭台之胜，甲于吴下。他曾撰《元诗选》，而陈衍也撰《元诗纪事》，最近正在补续，准备重刊，所以陈衍在《上斜街寓庐袁珏生编修云是顾侠君先生旧居》一诗的后半部分中说道：“竹垞旧闻麋日下，草堂印本共江南。元诗大有因缘在，留此编排地一龛。”朱彝尊曾写过一部《日下旧闻》，记载京城旧事，现在陈衍与顾嗣立同住一幢房子，又同撰元诗，他们之间的“因缘”真可以算是京城的一条好新闻了。

这一年陈衍又结识了樊增祥和易顺鼎。樊易两人为诗起先学中晚唐的元稹、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等人，现在也倾向宋诗，与“同光体”的诗人为伍了。所以这一年陈衍与樊增祥的诗歌唱和很多，诗集中先后有《题所南翁画兰卷子为樊山布政作》、《次韵答樊山》、《送樊山布政之官江宁》、《樊山和余骖字韵诗叠韵奉答》等8首。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别号樊山，湖北恩施人，光绪进士。他天性聪颖，美姿容，工诗文被李慈铭所称赞，官至江宁布政使，为官贤良，深受百姓爱戴。他的诗继承晚唐的香艳体，有“樊美人”之称，他的前后《彩云》二曲尤为有名。他还是骈文的能手，精于公文判牍。

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又字中实，自署忏绮斋，又自号眉伽，晚号哭庵。湖南龙阳人，光绪举人，他的父亲易佩绅为人负气，敢于任事，曾与郭嵩焘、王闿运游。易顺鼎在中日战争时曾两次去台湾帮助刘永福抗战，见其不可为而归。他自幼

被称为“神童”，长大后被称为“才子”，工诗，与程颂万、曾广钧被称为“湖南三诗人”。他和樊增祥被称为中晚唐诗派的“两雄”，他的诗既“雄伟恣肆”（张之洞语），又香艳浮靡，表现出其矛盾的性格。

陈衍在与樊增祥唱和的诗句中有“论交老去半新知”，在京城他除了樊、易两人外，还结识了吴士鉴、朱益藩、郑沅、宋育仁等诗人文士，常常和他们聚集在一起饮酒赋诗，使“同光体”诗歌愈益繁荣起来。

这一年在京都有一把扇子勾起了陈衍对兄长陈书的回忆。原来丁惠康是福建巡抚丁日昌的公子。丁日昌当时与陈书关系密切，所以丁惠康手上有一把旧扇的扇面是陈书所画的一幅作品。陈衍睹物思人，想起了兄长：

叔雅出现其先抚部公旧扇是

木庵先兄所画泫然有作

谢家团扇敬亭云，点笔清疏迥不群。太息断缣零落尽，却看片羽护持殷。黄楼吹笛人千古，沧海归舟句旧闻。剩有颍滨欧叔弼，相从萧瑟话斜曛。

“谢家”指东晋大家族，这里形容团扇的高贵。敬亭山在安徽省宣州市北，山上有“敬亭”，李白有《独坐敬亭山》诗。扇面中所作的画“点笔清疏迥不群”，有与众不同的美。然而画已残缺“断缣零落尽”，令人“太息”。陈衍的悲伤和萧瑟溢于言表。这把扇勾起的对陈书的回忆又引出了另一首诗——《思兄述旧诗四十六韵》，前面部分为：

自兄之没，四易寒暑。上心旧事，一一可数。吾父在时，居有后圃。果蔬花木，靡不种树。木兰秋菊，循陔当户。兄从馆归，课读覩缕。明灯有味，瓶花媚妩。凉月转廊，弟妹嬉舞。谈玄冥冥，说鬼嘍嘍。豫章之颓，乔木而

俯。山楼竹径，转徙旁午……

这首诗的下半部分，陈衍从这种儿时的记忆再叙述到后来兄弟俩分别在北京和福州“降神”聚会，吟诗作赋，再到杭州、博野等地，最后写兄长的垂暮，最后是生死离别的悲哀。陈衍与兄弟的这种纯笃的感情十分动人，而这首诗也是陈衍诗集中唯一的一首四言诗。

陈衍这一次来京应学部之职务不久，张之洞也调入京城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于是又对陈衍予以关照。张之洞一来到学部就过问陈衍的任职情况，一听还只是“候补”，就勃然大怒，命令立即补缺，昏庸腐败的官员们这才给了陈衍一个“学部总务司审定科主事”的官衔。

陈衍之所以未被委以职务，是有原因的。原来当时有人提了个动议，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的牌位请入文庙供奉起来，朝廷将这件事交给各部征求意见。学部尚书荣华卿（协办大学士荣庆）反对这一主张，但陈衍却持支持态度。顾、黄、王三人都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和学者，对陈腐的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或主张“经世致用”，或主张“以工商为本”，或反对豪强大地主，都有朴素的民权思想，荣庆这个保守的官僚，视他们三人为洪水猛兽。但是陈衍对他们三人的朴学思想和“民贵君轻”的主张十分钦佩。因此荣庆将陈衍的补缺一事压了下来。

张之洞当上军机大臣后，看到各部的“说帖”，大多反对将顾、黄、王三人供奉入文庙，原因主要是这三个儒生“颇言民权”，他把孟子关于“民贵君轻”的语录抄了几条，责问袞袞诸公：“你们是否也主张将孟子逐出文庙呢？”再加上另一个军机大臣袁世凯的主张也与张之洞相同，所以各部又将说帖收回，纷纷改口同意供奉三人入文庙。张之洞之所以一直关照陈衍，就是在许多重大事情上，陈衍的主张都能被他所接受。他们两人都

主张既要推进改良，又不要引起社会的大动荡。

荣庆之所以不同意顾、黄、王三儒从祀文庙，其真正的原因正是这三人的“民权”观和“革新”倾向。但张之洞和陈衍着力促成此事却只能采取正面回避，侧面说理的办法，张之洞搬出孟子作挡箭牌，陈衍奉荣庆之命以学部的名义撰《顾黄王三儒从祀文庙叙》一文时，也只能列举先秦的孔、孟，汉代的伏生、郑玄，宋代的周、程、文天祥、陆秀夫这些人，以这些都入了文庙的儒生来证明顾、黄、王三人应当入祀文庙。叙文中说他们乃“信而好古……又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黄、顾二儒既当之无愧色，亦足以从祀庙廷矣。王夫之发愤著书，有屈原之遗风……”。以儒家的风范来证明改良的合理性是近代改良主义的所谓“朴学”传统。正符合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张之洞的“中学”就是指儒家的思想，就是上文所说的“信而好古”、“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这一年之后，对于朝廷内一次关于“昭穆”的争论，陈衍也是以论证儒家礼制的方式来制止了一场政治闹剧的。1908年冬天，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一天“崩殂”，溥仪登基，其父载沣摄政，这时众大臣讨论庙号，准备按照周天子“三昭三穆”的礼制来建立太庙。即以穆宗（同治帝）和德宗（光绪帝）相“昭穆”，陈衍立即写了《兄弟相为昭穆辩（一、二）》两篇奏文给张之洞，提出反对意见。陈衍从《周礼·小宗伯》中的“辩庙祧之昭穆”出发论证了按正统的宗法制度，“若兄弟相为昭穆，则无世与及之分矣”。张之洞与陈衍看法一致，但说法不同：“本朝只一太庙，皆百世不祧，无所谓三昭三穆，不争可也。”陈衍用了两篇文章，张之洞则只用两三句话就制止了这样一场争论，表现出他们反对繁琐“礼制”的务实态度。但是，他们都是“儒臣”，都要用儒家的“礼制”作为正统的理据，来达到制止顽固派操纵政

局的目的。所谓“三昭三穆”是周天子设置七庙来祭祀祖先，太祖的庙在中间，其它依次排列，而清人是少数民族，只有一个太庙；所以张之洞用“无所谓”三个字就解决问题了。陈衍则从理论上论证“父为昭、子为穆”，说明以穆宗、德宗为昭穆不合古法。张之洞之所以重用陈衍，正是因为他们的思路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以儒家的思想来实行改良，既务实、又稳健。

张之洞于1907年9月被调入清王朝的军机处，离开了经营近20年的湖北，但是他人京后的第二年，光绪帝、慈禧相继死去，大权由摄政王载沣独揽，而载沣是个志大才疏，心气浮躁的人，他一上台就排斥汉人，刚愎自用。《年谱》中有一段记载：

先是，载沣为摄政王，专用亲贵，满洲人初疑汉人排满，至是不排于汉，而见排于亲贵，率多解体。洵贝勒既长陆军，涛贝勒又长海军，又将以某富侏为京卿，广雅力争，以为不可，为载沣所斥，归寓捶胸欧血曰：“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有《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云：“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未造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指载沣言也。遂寝疾不起。病中无以自遣，乃自定其诗。闻公（《年谱》自1908年起为王真所撰，故以“公”称陈衍）有师友诗录，急索观，颇喜。告从事在旁者曰：“选太多，誉太过矣。”

张之洞的意见和谏诤不被采纳，眼看清王朝陷入内外交困，而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专权腐败，他无可奈何，气恨交加，这位72岁的老人，自6月份开始患肝胃气病，病势日重，到10月份就溘然而逝。陈衍送给张之洞的挽联是：

合陶桓公、谢太傅为一人，弘济艰难心力尽；有裴中令、李赞皇老从事，平生学术见闻真。

陶桓公是东晋人陶侃的谥号，早年孤贫，初为县令，渐升至

郡首，在击败杜弢领导的反晋武装后，任荆州刺史，镇武昌。被王敦所忌，转任广州刺史。后来苏峻叛晋，建康失守，温峤推陶侃为盟主，击杀苏峻，任荆江二州刺史，都八州诸军事。他勤慎吏职，40年如一日，果毅善断，常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在广州时每天早上把100块砖搬到屋外，晚上再搬回来，以此锻炼意志力，造船时竹头木屑都储藏备用，为人所称颂。谢太傅指东晋政治家谢安，年青时不做官，40多岁才被桓温请为司马，柏温欲篡晋，谢安不为所动，时人把他比作王导，位至宰相，前秦攻晋，他带领弟弟谢石与侄儿谢玄领兵抗敌，获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并乘势收复洛、青、兖、徐、强等地。陈衍用陶侃来比张之洞是赞赏他近20年坐镇湖广惨淡经营的业绩，以谢安来比张之洞则是将谢抵御前秦和位至宰相来比喻他打败法国人入侵的军功和辅佐清王朝册立国君等事情上所受到的倚重。

陈衍对晚清的政局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腐败的清朝政府无法乐观，但对张之洞、刘铭传等洋务派领袖抱有较大的希望，希望这些人能成为“中兴大臣”，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现在，他们一个是“椎心泣血”，一个是“郁郁以没”，陈衍对这样一个政权已经失望，所以对两年以后的辛亥革命持支持态度，“鼎革”之后，绝不当遗老。

1909年春天，陈衍的老乡和诗友陈宝琛在被闲放了25年之后，重新被荐入朝廷。他于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后被慈禧一脚踢开，但1908年慈禧崩殂时却悲哀万分，如丧考妣，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忠君思想的表现；另一方面，陈宝琛和陈衍一样，对改良和维新变法却是抱支持态度的。陈宝琛退居里中后，兴办教育，致力于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在62岁之年，被起用为礼学馆总纂。第二年，被官复原职补授了内阁学士兼礼部

侍郎衔。这时，他的“清流”的本质又显现出来了，他提出要为杨锐等“戊戌六君子”平反昭雪。在这一点上陈衍和陈宝琛有相近的看法，在“六君子”遇害的当年，陈衍就写过一首《哀晚翠（林旭）》的诗，其中有两句：“多事千言并万语，临厓撒手欠垂藤”，写林旭撒手尘寰时并没有人给他“垂藤”来救他。他们都认为“六君子”是冤枉的。

对于林旭这个后辈，陈衍是赞赏有加的，他在一首题为《五言一首赠晚翠》的诗开头唱道：“吾乡山水秀，往往钟黄童。”林旭于1893年的福建乡试中名列榜首。陈衍爱其才华出众，鼓励沈瑜庆将他召为爱女的夫君。林旭则对陈衍的诗歌诵不绝口，特别喜欢其中《后湖》、《半山寺》、《莫愁小像》等篇目。

这里还要提一下郑孝胥，陈衍已有好久没有见到郑孝胥了，但是自从两人于1882年相识以来，诗歌或信件的来往一直没有间断。这一次，陈衍入都已有两年多了，竟然没有接到过郑孝胥的诗歌或来信。陈衍知道，自己与郑孝胥所走的人生道路并不相同，虽然两人诗歌和学问上共同语言最多，私交甚密。郑孝胥自从1903年卸了芦汉铁路南段总办的官差后，便离开了武昌。他结束了和陈衍隔江相望六年的往来唱和的生活，赴上海当上了江南制造局总办，不久后又以四品京堂充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竟以一书生穿上了戎服，率湖北新军号武建军者往龙州处理广西之乱。应该肯定的是，郑孝胥有过人的政治才能，他面对广西的动乱，建议采用“收拾民心”、“肃清吏治”、“架电线”、“练炮队”、“兴农工”、“重教育”等策略，有效地杜绝了广西的匪乱。然而，官运如日中天的郑孝胥已暂时忘记了与陈衍的联系。1909年7月3日，陈衍写了一封信给暂时闲居上海海藏楼的郑孝胥，信中责备老朋友道：“丧妻，悼戚欲死，君乃不以诗吊我，至今恨之。”^[1]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陈衍不直涉政治，在北京虽当

了学部的小官，却以主要精力执教于京师大学堂等大学。两人政治个性并不相同，却又结下了诗歌上的不解之缘。郑孝胥在日记中记道：收到陈衍的来信后“即复书许以补作，并寄捐刻闽诗之款五十两，交源丰润即寄”。其实，吊萧夫人的诗补作不补作还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是“捐刻闽诗之款”。对诗歌的一往情深是陈郑两人友谊的最重要的基础。对诗歌等艺术美的追求和学问之真的探索是共同的最爱。

另一方面，陈郑两人在政治见解上也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曾共同在张之洞湖广总督幕府中供职，郑是张的首席高参，并负责筹办芦汉铁路，陈负责办报并佐张理财。陈对郑的杰出的政治才能显然也是赞赏的，如兴办铁路和广西筹边等，其功劳均有目共睹。他们两人在政治眼光中有着一个共同的重视文化的底蕴，因为他们都属于从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那个新的社会阶层。儒家内圣外王是两人共有的观念意识，只不过郑孝胥官运亨通，更多的是“达则兼济天下”，陈衍基本上处于边缘状态，更多的是“穷则独善其身”。因为共同出生于东南沿海，两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的影响。因此，两人的私交一直到1921年之前都还是至为密切的。此后两人关系渐渐出现裂痕，1924年后不再来往。1903年，陈衍曾替自己的女儿向郑孝胥提亲，这一年的郑孝胥日记6月17日条载：“叔伊欲婚大七，寄其女相片来。”大七即郑的长子郑垂，后来两个人的这个亲家没有做成，但是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

陈衍对同乡中的诗文才子都有很深厚的友谊，这一年他还在上海认识了也是晚辈的何振岱，何工诗、能画、善琴，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第二年（1910年），他的另一位莫逆之交严复因留学西洋，被朝廷赐给“进士”出身，陈衍送给他一首诗：

几道出示岁暮诸作奉和一首

次其初七日阅邸抄韵

夫子雄才敌万夫，苦吟字字费踟蹰。偶将雁塔题名记，写入诗龕祭脯图。五十本来少进士，百年能几大葫芦。梅花上日开筵好，莫管南公与左徒。

“五十本来少进士”语出《唐摭言》“五十少进士，四十老明经”，唐代重“进士”，50岁中进士还认为早，轻“明经”，40岁已认为晚了。陈衍在北京常常召集诗友们饮酒赋诗。这一年“花朝节”后一天，他招来何彝震、梁鸿志、朱联沅、曾念圣、黄潜等人在自己家里饮酒集会。所谓“花朝节”是指农历2月15日旧俗的“百花生日”，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二月望》中：“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这一次陈衍集合而来的，除了何彝震外，全是他的学生：

春来人事集，久不对芳尊。好我二三子，起予五七言。
南中花已灿，北地树犹髡。“居易”他年录，行藏懒细论。

——《花朝后一日招鬯威、仲毅、芷青、次公、秋岳诸子饮集寓斋》

这一年春天，赵熙（尧生）、胡思敬（瘦唐）、江瀚（叔海）、罗惇融（揆东）等人创立了一个诗社。3月3日这一天，陈衍和江瀚为主人把大家集合在天宁寺，白天作诗，晚上在陈衍的“小秀野草堂”喝酒。自1907年进北京到1916年离开，这一段时间内陈衍经常主持或参加这种诗酒文会。他在诗中说“年年惜余春，日日取才藎”，虽然有夸张手法，但据《石遗室诗话》和《年谱》记载，集会无疑相当频繁。他们的习惯是：遇“人日”“花朝”等良辰吉日，选择一个名胜地方，带上茶果饼饵，白天集会赋诗，晚上就到某人家中或酒楼饮酒唱和，下一次集会时将

上一次以来所作的诗歌集中起来进行品评。这种集会的主人往往是轮流担当的。陈衍最乐意收集朋友们的佳作写入诗话。

这一年清明日，罗惇齋（挾东）当东道主约会在万柳堂，3月19日集会在法源寺，春尽日又集会在枣花寺，加上迎来送往相约游览等赋诗，陈衍的佳作和佳句甚多，每为京中诗友所传诵：

花朝同集江亭暮饮酒家

春中草未青，步履近郊垌。诗有萌芽意，人多磊訶形。
一湾怜水色，百上仄江亭。劳我精神未，居然报醪醕。

春天已到，野草却迟迟“未青”，这是北方特有的景色，而诗歌却早已萌芽，生长得非常旺盛。在此吟诗的儒生大都以刚直磊訶为形象，大家走向广阔的郊野去饱览美丽的山光水色。“醪醕”是一种美酒的名字，李贺有“醪醕今夕酒，湘帙去时书”，龚自珍则唱道：“不知复饮求醪醕，人饮获醉我获醒。”美酒是最“劳”“精神”的杯中物，“居然”却要纵情地畅饮，只有它才能融解诗歌的意境。

送江杏村归田

四海争传真御史，九重命作老翰林，当诛臣罪非今日，
待养亲年直万金。杀马行藏殊愤激，臂鹰身手任萧森。他时
共领田园兴，浮白青山是素心。

江杏村是莆田人，官侍御，以直言敢谏著称，这可是以“九重命”来作代价的，他因严劾庆亲王奕劻引用私党，被赶回翰林院“作老翰林”。他提出请假回乡养亲，实际上是愤而辞职归里，当时千万人都为他送行。

这里再一次透露出：陈衍虽然喜爱诗歌，热衷于友朋文酒之乐，但骨子里是悲愤的。满清王朝极端腐败，小人在位，贤士被逐，内政混乱，外交不振。对于这样一个政权，陈衍是清醒地意

识到它气数已尽了，在这一点上他与周围大多数朋友截然不同，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多数都成了糊涂的遗老。

1909年冬，郑孝胥应东三省总督锡良之约，自上海北上赴奉天（今沈阳）筹划锦瓌铁路及葫芦岛筑港事宜。1910年7月入都，居贤良寺，来往于北京、天津、奉天之间。于是他又开始加入老朋友间的文酒之会了：

邀子言苏戡饮草堂子言

赠诗和之兼示苏戡

旧诗人去剩林亭，小集诗人杂醉醒。下酒催诗无别物，
满林黄叶最堪听。

闽社诗人光绪初，海藏诗派满江湖。刘郎憔悴重来处，
一个当年道士无。

“子言”是陈诗的字，当时几个人在“小秀野草堂”饮酒唱和，草堂巨树参天。秋天的“黄叶”飒飒飘落，夜色十分诱人。诗人回想起光绪初的1885年，那些个深夜论诗的晚上，“同光体”的名称由此而来，现在看来，郑孝胥这个诗派誉“满江湖”。刘郎两句翻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诗句“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陈衍于1907年入都后不久，经冒广生介绍，租住宣武门外上斜街小秀野草堂。

余初至都，冒鹤亭（广生），为余赁居上斜街，群木绕屋，古槐天矫拿空，是数百年物。层楹轩爽，稍具亭榭。缭以朱藤海棠丁香诸杂花，间以湖石，枣树覆之。袁珏生（励准）谓是顾侠君先生小秀野草堂，何猿叟题有楹联云：“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者也。余居半载，遂赋悼亡。朋辈相慰藉者，时过从谈宴赋诗。樊樊山云：“倾盖逢君胜故知，春明何意聚牙期。悲怀早止辛楼酒，选本新添癸集诗（君曾

著《元诗纪事》数十卷，尚有续刻）。老作斜街花市长，贫无背郭草堂资。祥云舒卷丹青上，比似渊明此最宜。”^[2]

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亡后，溥仪即帝位，其父载沣任摄政王，这一政权更加腐败无能。他们为了节约开支，准备裁减政府各部人员。当时任学部主事的马其昶（通伯），听说学部要通过考试筛选人员，毅然辞职归安徽桐城故里。他临走时请陈衍留下赠言，陈衍写了一篇《送马君通伯南归序》，文中说自己和马其昶一样也是不求当官的，本来也会和他一样“振衣而去”，但又考虑到“吾里中旧游盖零落略尽”，闽人在京很多，如林绍年、张亨嘉、陈璧、郭曾炘、江春霖、陈宝琛、严复、林纾、力钧等，都是陈衍的好朋友，再加上京中的朋友樊增祥、易顺鼎、赵熙、陈曾寿、杨增莘等人，大家常常聚会为“文酒之乐”，所以陈衍暂时还“可以少留”。文中说，京师“园林祠庙、屋宇丘墓、陂塘丛薄，陈迹隐隐可味”。陈衍一生酷爱游山玩水，与朋友或登江亭（陶然亭）、高庙（积水潭），或到郊外漫游，即景赋诗。下面这首诗就是一群诗友们于1910年在漫游时的“放言”——一种毫无拘束的歌唱：

十月二十八日弢庵阁学招同尧生侍御昀谷太守

冒雪饮酒家遂登江亭联句暮归复放言二十八韵

一雪已三日，皓然满皇州。陈公冒雪来，叩门如有求。言求澹荡徒，去作江亭游。载酒过杨子，命车迎赵侯。燕市乏酒人，金台无培塿。犹有贺季真，能解金貂裘。登高何所见？同云凝不流。西望失翠微，南望失芦沟。北不见居庸，东不见田畴。东西南北人，抟沙聚浮沔。匡庐当此时，玉山照人眸。石鼓当此时，万松寒飕飕。侧想峨嵋颠，终古色不秋。赵侯几两屐，扬杨舟夷犹。会合对此雪，罗浮有此不？（时昀谷将改适广东）。融者疑酒泉，积者疑糟丘。有酒如此雪，

毕生可拍浮。有诗如此雪，寒郊非诗囚。冰柱与雪车，岂数韩门刘。白战无寸铁，何必苏与欧。却念郑海藏，辽阳尚淹留。片片雪如掌，大者如衾裯。定如梅都官，弓衣句雕镂。复念梁伯烈，贫病未归休。归欤香雪海，翠羽声啾啾。可折春一枝，寄我如陇头。我衰宜闭门，高卧瞻松楸。尚恋岁寒交，迟回剡溪舟。

这首诗头两句起得气派非凡，诗人与几位朋友，冒雪游金台（京城），想起了贺知章季真“天宝二年以年老上表，请入道，归乡里，特诏许之……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接下来把登上江亭（陶然亭）所见的景色写得淋漓酣畅：“西望失翠微，南望失芦沟……”对雪景的想象出人意料；“融者凝酒泉，积者凝糟丘……”诗人从大雪覆盖的芦沟桥、居庸关联想到匡庐、诗人自己和陈宝琛（弢庵）家乡的鼓山、赵熙（尧生）家乡的峨嵋山，又从孟郊想到韩愈，从苏轼想到梅尧臣（梅当过都官）最后还是落到诗人的归隐意趣上来；“尚恋岁寒交，迟回剡溪舟。”

这一年12月，端方召集了梁鼎芬、王式道、陈宝琛、柯劭忞、林纾等十几人在宝华庵纪念苏东坡生日。端方于190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被摄政王载沣罢免后，失意憔悴，陈衍数月未见，几乎认不出来。陈衍在一首记录这一次聚会的七言长句中说“自言将成习凿齿（野人）”。大家从苏东坡的生日谈到林劭忞的新作《元史》，再谈到陈衍的《元诗纪事》。就在聚会结束前，又预约了在正月的吉日由陈衍宴请端方等人。

如前所述，自陈衍到北京后，这种文酒之会越开越盛，1911年达到了高潮，下半年因为辛亥革命爆发而骤然停止，上半年的聚会，仅《石遗室诗集》有诗赋之的就有：

正月初五陈衍宴请端方。

正月初七日罗惇融招集陈衍、陈宝琛等人在他所住的四印

斋分韵赋诗。

2月1日集合在慈仁寺，由温肃（毅夫）当主人。

花朝2月15日，集花之寺。

清明，集江亭，郑孝胥（苏戡）当主人。

3月3日，修楔苇湾，林思进当主人。

春尽日，集枣花寺，曾刚甫当主人。

初夏某日，集法源寺，赵熙（尧生）当主人。

4月某日，集谢文节祠送胡思敬弃官归江西。

4月某日，集陈衍寓送陈宝琛简放山西巡抚、郑孝胥简放湖南布政使。

5月某日，陈宝琛招集林纾等人游西山秘魔崖。

某日，缪筱珊先生因管国立图书馆，聘陈衍任纂修，招饮十刹海。

6月，陈衍携张宗杨与同部胡玉缙游泰山。下山游大明湖、历下亭。

半年时间，我们可以从陈衍的诗歌中读到的他和诗友们的“文酒之会”就达13次，下半年虽一度中断，第二年便重新开始。正如他在《石遗室诗话》卷12谈到诗社时所说：“庚戌春在都下，与赵尧生、胡瘦唐、江叔海、江逸云、曾刚甫、罗挾东、胡铁华诸人创为诗社，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类，世所号为良辰者，择一目前名胜之地，契茶果饼饵集焉。晚则饮于寓斋若酒楼，分纸为即事诗，五七言古近体听之……此法似可仿行，惟闽中胜地，不如都下之颢，须择数家略有亭馆花木者为聚集地。”可见陈衍是有意识地组织这种饮酒赋诗的聚会，然后再有意识地把这些诗歌收入他的诗话，加以品评，将这种“风雅”之道振兴起来，传承下去，陈衍实际上成为这种诗歌活动的盟主。正如他和诗友们在诗中所唱：“里中诗事久荒寒，即景分题忆坠

欢。”“诗堪送热宜秋集，病不能杯爱酒香。”“世乱骚才甘自晦，地幽胜事本无多。真灵相望秋旻迥，豪宕能迴夕照酩。”“碧栖（又点）此佳招，风雅聚气类。”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将诗歌“迴”“热”起来，像司马迁所说的“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第二节 “临颖美人今不见，座中唯有薛华歌”

陈衍始终没有参与到政治中去，但他并不是不关心政治，对于这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他是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鲜明的政治态度的。《年谱》中有如下记载：

八月廿日，苏戡丈自施饭寺电告：“武昌革命军起，鄂督瑞澂不知所往。”先是，苏丈本赴湘藩任，以会议官制入都，春陷湘中。公陈衍午后到部，满员皆惶恐问计，公直告之曰：“惟有请今上逊位。”惜无人敢奏。

辛亥这一年，郑孝胥被“授湖南布政使，4月南归，至长沙住所居10日，奉命入京议官制。7月入京，8月武昌起义爆发，急驰回任，途次上海，道梗不行，遂留于沪，隐居海藏楼”，当起了遗老。^[3]陈衍对时局早有看法，心中有明确的判断：清王朝早已到了“逊位”的时候了，他与郑孝胥死心塌地地投靠清王朝不同，始终与统治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支持像张之洞、刘铭传这样实现强国之梦的洋务派官员，对那些一心为了窃取私利的政客们却是嗤之以鼻的。8月底，陈衍和他的家眷先后南下回福州躲避战乱，但对革命一直有自己鲜明的支持态度，《年谱》载：

福州既革命，孙道仁为福建都督。革党有彭寿松者，亦湘人，覬觐孙位，适孙开会，遍请绅商，公亦戾止。孙演说

欲避贤路。公以时局未定，孙不宜遽退为言，已触彭怒。又彭暗杀士人蒋子庄及学生黄某。众于故总统孙中山先生游福州时，开会迎之，公偶出观，众以彭杀人事呈告于孙，丐公代呈，中皆斥彭为彭贼。孙略阅即以授彭。时彭亦在坐也，彭憾公，遗逻卒侦公，虽不敢动手，然亦岌岌矣，知者以告公也。

陈衍对辛亥革命持支持态度，但不愿介入政治。第二年，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欲聘陈衍为史学教授，他本不想应聘，但当时福建执政当局想让陈衍出来任职，他为了躲避政治，遂于8月到北京应了大学的聘。陈衍是个诗人和学者，所以每次回到福州家中都有“躬耕之志”。这一次回到福州文儒坊的家中，发现新认识不久的何振岱就住在他对门，“始日过从，尝月夜抱琴动操，公有《庭梅将开约梅生（何振岱）弹琴》诗。所居室前有一老梅，势极矢矫而枯，改种竹二十竿，有《喜竹活》诗。是时公眷尚居陶江，隔数日则徒步往来。陶江典屋已被赎，借居力医隐（钧）旧园，又有《岁暮寄医隐》四律”等诗：

一树寒梅且盛开，商量清夜抱琴来。疏桐坠叶供茶灶，短石支床置酒杯。流水高山非绝调，参横月落更清哀。看君浩荡江湖思，只恐诗成念不才。

——《庭梅将开约梅生月夜弹琴兼以话别》

平生爱种碧琅玕，自别乡山见汝难。久客归来方草草，此君请到一竿竿。托身已恐泥多浊，卒岁殊忧天又寒。毕竟交情穷乃见，满庭玉立足清欢。

——《冬日种竹竟活喜作》

归来敛翼向江村，失喜君家剩旧园。补葺窗根安棊几，量移书牖启柴门。不多寒碧聊舒眼，无主幽香渐返魂。苦忆去年风雪里，唐花红白醉芳尊。

数畦寒菜长荒村，仿佛江关赋小园。霜菊犹花都斲地，山桃已蕊恰当门。绝江唤渡殊耽搁（将游方广岩），念远登高欲断魂。天末来书聊慰藉，蛎房春饼佐清尊。

李家山下自成村，典得君家十亩园。叱犊扶犁田破块，打鱼漉泽水开门。蜡宾曾动官家感，社祭将招古昔魂。能护全闽诗在否？称王水陆一何尊！（余刻《闽诗录》于武昌，板未知存否？陶江社公城水陆尊王，相传系宋林垆，有诗在《诗录》中。）

楞岩高处瞰山村，丘壑松篁此最尊。桶水分江登石级，囊烟绕舍入重门。峰峦隐见占晴雨，池馆经过怆梦魂。曾是母兄偕隐地，于陵来灌桔槔园。

——《归陶江借居医隐旧园岁暮寄医隐》

这些诗中已不见了陈衍诗歌一向的多僻字、用深典的习惯，完全是白居易式的平易畅达、通俗易懂的风格，曲尽了陶渊明般的田园风味、山野情趣。除了“蜡宾”（指社祭）这样少数的字外，全是妇孺皆知的语言，还使用了方言如“蛎房春饼”等。这些诗是诗人晚年诗变的重要标志。

据《年谱》载，一向不愿当官的陈衍 1907 年决定人都任学部主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京师友朋之多，花数之盛，文酒之乐，皆胜于四方。”陈衍一生以诗歌为生命，他去北京，也是冲着诗歌去的。1911 年，陈衍的官衔随着辛亥革命而消失，他更乐得当京师大学堂的教授。北京的“文酒之会”仍然十分繁盛，以 1913 年上巳节为例，这一年在万生园，修禊的诗人以梁启超为首多达 40 余人，有严复、陈衍、易顺鼎、杨度等众多名流。在北京这个花树繁荣的首善之地，仅福建省名流就有不少，1914 年 6 月林纾还在京发起“晋安耆年会”，以陈宝琛为会长，会员有严复、陈衍、力钧、李宗言、郑孝胥等十儿人。他们互相往来，经常以诗歌唱和。

辛亥革命之后，陈衍回到了山水秀丽的福州故乡，再一次萌动了躬耕垄亩的念头，对着充满野趣的陶江风物和文物荟萃的三坊七巷，一股避世隐逸的念头强烈地吸引着他。1912年3月，他派仆人张宗杨先到武昌运回石遗室丛书版、闽诗版及已印《闽诗录》200部，再往北京运回书籍、字画、瓷器等物。可是到了4月，张宗杨在力医隐家中病重，陈衍于5月赶到北京，谁知张宗杨病好后陈衍自己却病了一场，暑泄数十次。但是陈衍抱病为陈宝琛删定诗集。陈宝琛是陈书和陈衍两兄弟的共同朋友，是“同光体”闽派的扛鼎诗人。他于1868年21岁时中进士，22岁时就被授为翰林院编修，然后一路青云直上，36岁时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他为人清正，与张之洞及张佩纶、宝廷等同为朝廷中最敢于进谏言事的“清流党”。他不仅成为贪官昏吏们的克星，而且成为敢披慈禧“逆鳞”的“青牛尾”。所以当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一败涂地时，慈禧等人以他保举张佩纶不当为由，一脚把他踢开。他因此回到福州老家螺洲乡居了25年。但是他并未忘怀国事，1895年4月甲午战败，清政府派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陈宝琛义愤填膺，赋《感春》四首，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17中对这四首脍炙人口的爱国诗歌逐一给以诠释，其中第一首的注释为：

沧趣有《感春》四律，作于乙未中日和议成时。其一云：“一春无日可开眉，未及飞红已暗悲。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幡迟。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三四略言昌昧主战，一败涂地，实毫无把握也，五言台谏及各衙门争和议，亦空言而已，六言初派张荫桓、邵曰濂议和，日人不接待，改派李鸿章以全权大臣赴马关媾和，迟迟不行。七八则赔款二百兆，德宗与主战枢臣，坐视此局全输耳。

对于这四首直接批判腐败的清政府的诗歌，陈宝琛一直秘而不宣，陈衍替他删定诗集时，正是辛亥“鼎革”后的第二年，所以及时地将诗刊出，并一一释出其中所指故实，“以告观览者”。带病编完了陈宝琛的诗集，陈衍写下七绝一首：

为橘叟删定诗稿毕书廿八字

又向京尘聚一回，眼看深浅换蓬莱。推敲字句商题事，似为君诗特地来。

“蓬莱”为传说中的仙山，宋代诗人孔平仲《寄常文》诗句有：“蓬莱阁下花多少，清旷亭前水深浅。”陈衍把乱后的北京比作仙境，显然语含讽刺，而他此次来京，5月到，病中为陈宝琛删定诗集，愈后又于6月回到福州，真好像是专门为推敲橘叟的字句、商量老人的篇目而来的。

陈衍为陈宝琛所编定的诗集中除了忧国忧民的诗篇外，还有大量歌唱山水，抒发避世隐逸之情的闲适诗。下面是陈衍对这类诗的评价片断：

弢庵嗜游山，今夏同默园、宰平游上方山，至兜率寺，有诗示二子，第三韵以下云：“峰迴涧束林翠合，森壁留罅穿天光。折盘开阖路几绝，数武一换山阴阳。岂无飞流与争道，上有栏楯临洗洋。石梯历级三百尽，复磴稍坦云屏张。”此诗最警句，在“数武一换山阴阳”一韵，此山之特别即在此。古人诗文之言山水者，以能写重沓曲折处见工。柳州游记云：“舟行若穷，忽又无际。”王右丞诗云：“随山将万转，趋途无百里。”又云：“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此言港汊之转折也……弢庵此作“峰迴涧束”两联，言既至接引寺，入山则两边皆峭壁插天，中通一道，宽不数武……壁数武一转，如是者两三里……旁则飞流争道矣。合柳州、右丞语意熔铸而成。

陈衍把陈宝琛的山水诗解释得如此妙趣横生，是确实深得他雅号“沧趣”的三味的。陈衍在一首与陈宝琛的唱和诗中唱道：“知公时有乡关恋，梦里沧江足倚楼。”这种“乡关恋”是他们两人的共同追求，《陈石遗集》中与陈宝琛唱和或题目涉及他的诗歌有16首，其中乡恋或归隐的句子俯拾皆是：“绿榕城郭足海物，饱啖不饮颜亦酤。”“买田阳羨愿真违，数亩陶江亦未归。”“故乡多吟朋，诗力各精到……誓将归三径，饮水门却扫。”“尚恋岁寒交，迟回剡溪舟。”“陶江下接螺女洲，楞岩东望沧趣楼。”“天纵肯晴吾亦去，未游却作纪游诗。”“树石凌寒凝水墨，林峦著色徧丹黄。”“独坐看黄叶，西山忆旧游。”

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陈宝琛的隐逸思想是从属于忠君思想的。1909年陈被重新起用后，于1911年当上末代清帝的“授读”，1912年清帝退位，他却仍然不愿辞归隐逸而是始终跟着溥仪，“帝师”一直当到1931年溥仪潜赴东北为止。陈衍写给陈宝琛的诗中有两首值得我们玩味，即1922年作的《雪后弢庵太傅招集钓鱼台》和1927年的《寄弢庵太傅天津》：

此亦京畿一帝居，荒寒积水不成渠。半窗竹活经冬后，百本松撑压雪余。载酒携鱼来得得，听涛向曝乐蓬蓬。安排休沐看山地，绝胜东华有直庐。

灯昏雨止月微明，残夜同车黯别情。来往未容成二老，交期久许替家兄。析津地窄迴旋窘，南港江荒寇盗行。早识望衡非易事，苟全虚想伴躬耕。

清帝已宣布退位，而陈宝琛仍然当“太傅”，实际上是高级遗老。陈衍是不同意当遗老的，认为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应抱残守缺。所以他在诗中说曾是皇帝行宫的“钓鱼台”已经“荒寒”，到“山地”“休沐”要“绝胜”于在“直庐”中为皇帝值班。后一首同样把退位皇帝在天津的居处描写得“昏雨”

“黯”淡。“望衡”写陈衍春居陶江时与陈宝琛的螺江老家门对门隔江相望。“躬耕”隐逸的理想随时都吸引着陈衍，但这确非“易事”。相对于陈宝琛的愚忠，陈衍却是很清醒的，他深知溥仪和陈宝琛的处境是危险的：“析津地窄廻旋窘，南港江荒寇盗行。”跟不上时代是可悲的。

1910年至1913年，陈衍与严复有过几次诗歌唱和。据皮后锋所著《严复大传》载：

1910年1月17日清廷赏给严复、辜鸿铭、伍光建、王劭廉等人文科进士出身。二十多年前，严复对“进士”苦苦追求时屡遭挫折，当严复对它不屑一顾的时候，偏偏又天降“功名”，正应了“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熟语。1906年以来，已有不少留学生通过严复主持的考试获得文科进士出身，而这位前辈考官本人已年近耳顺，才与伍光建、王劭廉这两位北洋水师学堂的门徒一起被赏给文科进士出身！严复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没有半点激动。……严复这种无奈、麻木的心情，尽情流露在一首略带自嘲的七律诗中：

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有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别，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耻从前后说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

12年前，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就已像一颗惊雷炸响于中国的思想界，此后，又有《辟韩》、《原富》、《原贫》等一系列文笔犀利的著作刺向封建保守的清朝社会，然而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留英后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人的海军在马尾被法国侵略者全军炸毁，在甲午海战后向日本人屈膝赔偿。而严复本身，是“平生献玉常遭别”，一向不被重用。他年青时在科场屡遭挫折与羞辱，现在对科举乃至清廷已大失所

望，已“不图”“闻韶”了，然而“衰容”却与“壮夫”一起，让清廷给了他一个“进士”的头衔，他“耻从前后说王卢”：据《旧唐书·文苑传上·杨炯》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诗中的“两徒”指他的学生伍光建和王劭廉。

1910年底，严复向陈衍出示了最近的一些诗作，其中便有以上这一首题为《初七见邸抄作》的诗歌。陈衍读出其中屈辱的心情，于是次韵一首，以示安慰：

夫子雄才敌万夫，苦吟字字费踟蹰。偶将雁塔题名记，
写入诗龕祭脯图。五十本来少进士，百年能几大胡卢。梅花
上日开筵好，莫管南公与左徒。

——《几道出示岁暮诸作奉和一首次
其〈初七日阅邸抄韵〉》

陈衍对严复的评价很高，但并不过誉，严复的一系列译著和各类文章起着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确是“敌万夫”的“雄才”。和郭嵩焘一起到西方接受过近代文明思想洗礼的严复，他的主张与张之洞等“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思想有着本质上不同。他认为中国应接受的西方文明不仅是“用”上的技巧或“会计”等知识，更重要的在于西方的实证主义哲学、民主政治与公正合理的司法制度、自由平等等西方文化，这些先进文化绝不是源于中国人，而是独立于东方文明的另一种文明。中国要“开民智”，步入近代化，必须从根本上向西方学习。严复认为，张之洞所经营的洋务运动不能从根本上接受西方文明，只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是“准橘为枳，若存若亡”。严复以西方近代思想武器，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陈腐的旧观念，他撰《辟韩》一文，批判韩愈的《原道》一文所宣扬的君

权神授“君主民仆”的君主专制观点。上述皮后锋的《严复大传》中指出：

《辟韩》通篇闪耀着民权思想的光辉，显示了严复深厚的学术功底与非凡的政治勇气。有清一代素有“文字狱”传统，严复公开将包括清朝皇帝在内的历代专制君主斥为“窃国大盗”，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所冒风险不言而喻。《时务报》转载《辟韩》后，维新志士谭嗣同连声称赞“好极！好极！”其后，谭嗣同在《仁学》中痛骂：“二千年来之政也秦政也，皆大盗也”，文中还阐述了君由民选，民可废君的论断，明显受到《辟韩》一文的影响。与此同时，《辟韩》也引起了卫道士们的惊恐。湖广总督张之洞不仅亲自撰文反驳，且欲加害严复。

作为张之洞的幕僚，陈衍为张的洋务运动充当顾问，与严复相比其主张显然更加保守，陈衍虽然也和严复一样译介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但内容仅在经济和法律上，他望严复所译的思想理论著作之项背，称其为“雄才敌万夫”。陈衍的可贵之处在于与朋友政见各异，却能求同存异，互相之间继续诗歌的唱和，除了像后来和郑孝胥之间那种无法调和的民族立场之外。当然，腐败的清廷不可能重用严复这样的“雄才”，这个迟来的“进士”头衔只能令严复“苦吟字字费踟蹰”。唐代新科进士在曲江会宴后，常题名于雁塔。而贾岛则于每年除夕，取自己当年诗作，祭以酒脯以自勉，而清代的法式善则家筑诗龕三间，人所投赠诗句，皆悬龕中，因此以“诗龕”为室名。“五十少进士，四十老明经”，取自《唐摭言》，唐代重进士，五十岁得之犹为早，轻明经，四十岁已为晚。“大葫芦”即“大瓠”，典出《庄子·逍遥游》，对于大瓠似的大材，俗人无用，“神人”却有无用之用，“无功”之妙。陈衍在这首诗中用了一系列的典故将严复比作隐士南公和左

徒屈原。

严复与陈衍的另一次唱和在 1913 年，陈衍的原诗和严复的和诗分别为：

除夕前二日与几道话陶江风物兼示雪农

与子江乡忆岁阑，瓦楞刀鲚木奴丹。玉屏竹垞皆诗料，
秋树林岩久坠欢。且住为佳居易录，苦多去日远游冠。君房
端是严光友，酷嗜腐儒风味酸。

除夕意绪甚恶，答陈石遗

乡思如潮不可减，连床何限语咕喃。即今除夕非佳节，
莫向桃符署旧衔。天下诗才衡左海（君方为诗话），故园胜
处负楞岩。买山未是巢由事，江水犹应鉴至诚。^[4]

除夕前两天，陈衍与严复促膝而谈，甚至“连床”而语，引起无限的回忆，他们俩家都曾住陶江。陈衍于 1911 年、1913 年两次回闽，严复却已是十几年未回故乡了。陈衍描绘的“江乡”风物如贝类、鱼鲜和柑橘等以及玉屏山、竹垞的美丽景色勾起了严复“乡思如潮”。往日的欢乐（“坠欢”）去日苦多。但是陈衍和严复都不是真正的“腐儒”，陈衍正在撰写《石遗室诗话》，“左海”是福建的代称，在近代诗坛上，“同光派”闽派称善于天下诗才，“楞岩”是陶江的一个地名。巢父和许由是古代隐士，陈、严二人都可能真正地隐逸，陶江的清澄之水像镜子一般照出他们两人的极其和顺（“至诚”）的德行。

严复和陈衍，一位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政治人物，一位是不直涉政治的诗人和北大教授，他们所走的路径不同，但是，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君子、都是具有“至诚”的德行的一介书生，都有对诗歌美的追求，更重要的是，都期盼祖国由贫变富、由弱变强，所以，他们才成为“连床何限语咕喃”的同乡友朋。作为校长，严聘陈为京师大学堂讲席。分析他们各自所走人生路径的

异同可以加深对近代中国风云变幻局势的理解和引发诸多的思考和研究。

1912年3月8日，严复就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同年5月4日改任为北京大学校长。严复希望吸收西方教育思想，实行“教育救国”，但是，当时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治矛盾错综复杂，而严复本身的政治主张是君主立宪。虽然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倚靠当时的政府致力于治理北大，但各种困难和障碍接踵而至，到当年10月严复便不得不辞去校长一职。而陈衍于当年6月接受严复聘请为经史学讲席后，8月才到任。到第二年（1913年）2月，大学分科考试毕业回闽，当时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欲留任陈衍，被陈衍婉言谢绝。到了9、10两月，北京大学多次电聘在福州的陈衍任文科讲席，陈衍转而一想：“当此旧学否塞，大学尚有文科，尚有为文科学生者，竣拒之何忍”，遂许之。陈衍于11月至都，以上那首与几道“话陶江风物”的诗就是到京都后不久于除夕前2日写的。这时的严复已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官。据皮后锋著《严复大传》载：

面对新旧交替时期的剧烈社会动荡，为维持一家大小的生计及推行自己的救国主张，严复一改往日的清高，开始同袁世凯合作……其最大愿望是希望此时有政治强人挺身而出，不限手段地恢复秩序，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实用主义倾向：

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

严复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1915年，他“最终被袁世凯利用，在帝制逆流中列名‘筹安会’，一时声名狼藉，为世诟病”。相反，陈衍虽然不问政治，但对政治保持着距离却令他旁观者清，和严复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

同，当陈衍得知自己的名字被别人列入“筹安会”名单之中以上表劝进袁世凯实行帝制时，立即责问施愚等人，坚决要求将名字撤下，保全了自己的名节。陈衍目睹这群跳梁小丑上演帝制闹剧，自己险些“陷贼”，心中的难过只有以诗歌来遣散。他拿起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雨过苏端》、《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等诗作，诵读之下，感到历史似乎在重演，而自己的境遇与老杜颇为相似。他写下题为《连日读杜诗有题》的诗3首，以陷安史乱军中的杜甫来比喻自己：安禄山叛乱，降贼者分六等治罪，杜甫陷贼中而没有投降，是由于躲避在大云寺赞公之禅房之中，此诗的第一首为：

病余王倚军经过，置酒苏端奈雨何？临颖美人今不见，
坐中惟有薛华歌。

杜甫当时才40多岁但已是“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幸而遇到王倚、苏端这些好友，并得以躲避而未降贼。陈衍此时与罗惇齋等人观看梅兰芳的戏剧，就是学杜甫采取躲避灾难的办法的。而当时一个叫刘喜奎的女伶魁首已到天津去了，所以第三句有“临颖美人今不见”。陈衍此时已届60岁晚境，自觉和老杜一样，能在乱中躲过一劫，是不幸中之大幸。

陈衍对强拉他加入“筹安会”的人的回答是“吾自民国，既不为官，绝口不谈政治”。辛亥革命以后，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众说纷纭，除了不可救药的顽固派外，大体上可归为革命和改良两大派，前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后者又分为虚君共和及建立专制等流派，严复、康有为等政治人物均认为中国建立革命的共和国时机未到，急于求成会引致大乱，所以均反对共和。严复等人居然支持袁搞复辟。而梁启超则有所游离和摇摆，最后则带头反袁。对于这一切，陈衍自然无法厘清，但他明确反对帝制和倒退却是很清醒的。虽然陈衍和严复在政治态度上迥

异，但这不影响他们成为朋友，因为两人都有赤诚的爱国热忱和“至誠”的德行。更有对诗歌创作的共同爱好，只是在陈衍这是一个专业的挚着的追求，而在严复则是一个业余的情感美的抒发罢了。

1915年在家乡，同人们疏浚福州西湖，兼修西湖名胜，重建宛在堂。这可是陈衍关心的大事，他赋诗《寒食日寄怀梅生兼讯西湖》：

寒食寒犹甚，东风怒若雷。尺书前日到，襦被不能来。
栽杏方含蕊，停尊懒举杯。故山猿鹤侣，饥饱费疑猜。

闻说湖西水，青青似圣湖。每临游女影，未照老夫须。
常泛瓜皮否，曾添柳浪无？诗龕有楹帖，耽阁事鴉塗。

圣湖般的西湖吸引着陈衍，那里有诗龕楹帖。但他不能整理行装（“襦被”）归来参与，只是思念着已归隐故乡的朋友们（“猿鹤侣”）是否能吃饱穿暖呢？

福州西湖兼有水利和游览之便，历代有作为的官吏都要修浚之，正像苏轼、白居易等人修浚杭州西湖一样。这一年主持浚湖修胜的是林则徐的曾孙林炳章，而何振岱（梅生）积极参与，并著《西湖志》一部。据志中所记，西湖宛在堂原祀“闽中十子”林鸿、王偁、郑善夫等人，后在重修时增为十六人，此次重修又增祀林寿图、谢章铤、龚易图、陈书、叶大庄、林旭六人。陈衍赋诗怀念梅生和西湖，再一次勾起了故乡之恋和隐逸的志趣。

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宣布推翻民国，恢复帝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这一举动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袁世凯转于1916年3月取消帝制。对于这“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政治，陈衍无法介入，也不想介入，“吾自入民国，既不为官，绝口不谈政治”确是他的心里话。这时，京师大学堂分科学生第二次毕业，陈衍正准备回福州，又接

到福建省长许世英对他的聘请，让他担任新修福建通志的总纂。陈衍于是决计避开袁世凯所制造的混乱，回到了老家。

参考文献与引文出处：

[1]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198页，中华书局，2005年8月。

[2] 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第3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3] 黄珮、杨晓波校点：《海藏楼诗集》第586~5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

[4] 转引自孙应祥著：《严复年谱》第43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第六章 里居修志

(1916~1930)

第一节 “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

4月初旬，陈衍与沈瑜庆一起回到故乡，他们是回来修志的。一年前，何振岱刚刚带领林师尚、龚乾义、林宗泽、陈鸣则、叶心炯等文人修完了一部《西湖志》，那只是一种专业志，而《福建通志》却是一部大部头的省级综合志，一修便修了5年时间。

这时的福建政局同样像个走马灯，许世英已因与李厚基政见不同而离开，改由李厚基省长聘陈衍为《福建通志》总纂。四月份回到福州后，志局设于乌石山沈宝楨祠堂中。沈瑜庆为名誉总纂，何振岱等人为协纂，志局工作人员多达三、四十人，约期

三年。

但是，陈衍回福州，首先牵挂的还是西湖和宛在堂，这一年咏西湖和宛在堂的诗歌有《归家杂诗》、《次棕舲〈湖上雨饮〉韵并示涛园筱云》、《敏生招同人夜泛西湖耕煤有诗次韵》、《耕煤复叠前韵再次之》、《暑夜泛舟西湖达晓不睡》、《重九日宛在堂秋祭作》、《再作》。陈衍这一年还作文《小西湖重建宛在堂记》，可见其对西湖和宛在堂的一往情深：

宛在堂重建之明年（1916年），西湖既浚，余自都归里。至湖上水色漾碧，堤柳方新，堂以外荷亭、镜湖亭、澄澜阁亦结构灿然，顾之乐甚。盖兹湖之浚，与兹堂之成，怀之有年矣。方余十余岁时，从伯兄木庵先生馆于光禄坊刘氏，兹堂春秋之祭，刘氏主之，寒食重阳辄约与祭。堂四方向明，中立无倚，堂前老藤压架，负墙则芭蕉紫薇诸草木，湖周堂外。湖中有画船，林文忠公浚湖时所置也。未几纚连大水，湖上桂斋、荷亭诸胜有倾颓者。居民久占湖中种菱藕，湖水汙缩……癸丑（1913年）里居，十月与诸同人结社课诗，一日集林雪舟寒碧楼，谋修斯堂，即以命题，余成七言古一首纪其事……

这里所说的一首七言古，即陈衍1913年所作的《寒碧楼小集谋修西湖宛在堂》。诗中有两句为“诗亡雅废无人问，一木不支听倾废”。陈衍一生以诗歌为生命，他不能任宛在堂倾倒，他钟情于西湖和宛在堂，实际上是钟情于湖光美色和宛在堂诗龛中所祀的历代诗人们。

然而，诗人此时已年过6旬，总不能每天坐肩舆去观赏西湖。陈衍想了个把西湖搬回家的办法，这一年他在石遗室前凿了一个小池，当时曾以诗歌来庆祝它的落成：

双圆水月一方池，三面栏干缭绕之。老去慎词风皱后，

独居深念夜观时。求田问舍归湖海，凿石疏泉见井眉。（池中有井。）十二竹竿凭照影，千言赋更七言诗。

诗歌的无穷魅力在于“主观力量的对象化”，诗人在家所凿的池子客观上只有一丈见方，这样一个“对象”，主观上却能赋予它小西湖般的美丽。俗话说“一个针眼中看到整个世界”。“千言赋”指诗人在小池落成后所写的《小池赋》，当时引得好事者从上海专程到福州来参观他的小池，大家都惊诧于作者想象力之丰富。



陈衍故居，坐落于福州文儒坊大光里8号。

1917年，陈衍又在居室旁修了一个“匹园”，这一回一连写了三篇文章。陈衍的五孙陈步在编《陈石遗集》时为这三篇文章写了一个题记：

1917年2月，陈衍于福州文儒坊大光里住宅后修一小花园。园西北隅建有两层小楼，名“皆山楼”，后更名“花光阁”。此园呈扁方形，四周有墙，仅东南角留一门通前屋，

似“匹”字，故名“匹”。园成，陈衍作《匹园记》、《皆山楼记》，后又作《花光阁记》。陈衍富于诗人想象，小园虽陋，但所记文字却极为富丽。

花光阁建成后，陈衍自撰楹联：“移花种竹刚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又作《小辟匹园欲作数诗落之久未成咏岁暮乃足成十四首》，诗中写人造瀑布的两句诗为：“檐溜聚成双瀑长，雨中月色电灯光。”陈衍喜欢观瀑，据《年谱》载：

乃谋于大雨时，聚重屋数十瓦沟之水，汇于东南两处，泻下成小瀑布。又张电灯于楼角最高处，使满园花树，一如月来弄影。楼旁一露台，设醉翁椅数张，夜足乘凉，不必肩舆往湖上矣。

陈衍热爱山水之美和诗歌之美，骨子里是一种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如前所述，他钟爱福州西湖起因于小时候与木庵兄所馆之刘氏每年祭祀宛在堂的缘故。山水楼馆因人而美，陈衍的匹园同样因怀念夫人萧道管而美：

吾以中岁奔走四方，无往不与先室人偕，劳苦三十年，日思弛其负担。室人尝言：“愿筑楼数楹，竹梧立后，花树仰前。”既营一楼，具体而小，众花陵于高树……盖全形扁方，而东北缺其角，东南呀其口，逼肖匹字焉。乃位一楼于西北隅，西南隅位以小榭、东北位以露台，台下室焉。隙地则遍种花木。噫！斯楼成，先室人已亡十有一年，余为匹夫久矣。前六年营葬先室人于梅亭之文笔山，坟地横九丈有奇，直六丈有奇，山径从右入，亦具匹形。匹夫卧楼上，匹妇卧于地下，所谓鳏寡而无告者也。不以“匹”名吾园而奚名邪？

匹园建成后，林纾曾从北京寄诗题之，陈衍和了一首《畏庐寄诗题匹园新楼次韵》，其中有两句为“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

三坊七巷间”。陈衍“旅食四方”、漂泊在外时常常想念家中的亲人和朋友，现在回到了福州，又思念出门在外的故人。这一年秋天，陈衍与何振岱一起游览鼓山，却触景生情，想起了老友陈宝琛：

同梅生国容坐听水斋头半日怀听水主人
前度至此及至听水第二斋主人皆不在也

不到国师岩九年，主人长作出山泉。听泉看竹真成例，
一度空斋一惘然。

“国师岩”为福州鼓山上的一个景点，而陈宝琛在鼓山有一榜书“听水”二字刻于摩崖石壁上，至今犹存。陈衍睹字思人，牵动了对已“出山”的“听水斋主人”深切的怀念。此时的陈宝琛正和郑孝胥一起，以他们的愚忠不化，仍然把逊帝溥仪当作自己的“今上”，围着这样一具封建僵尸团团转。对此，归乡“听泉”的陈衍，只有“惘然”而已，不直涉政治的他总是比曾是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的陈郑更清醒，这也许就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边缘化”的意义。

陈衍晚年诗风为之一变，好学香山体。1917年除夕之日，62岁的陈衍又一次阅读白居易诗集，恰巧翻到白居易62岁（太和7年）这一年的诗作。陈衍不禁和了一首：

除夕读白诗恰逢六十二岁所作

已过潘安三十年（白句），有何佳趣足流连？可怜颌下都
苍白，能向花前不赧然！临山登水无气力，观书索句每思
眠。解嘲强作欺人语，未愿常为白乐天。

诗中的第一句采自白居易的《凉风叹》：“昨夜凉风又飒然，
萤飘叶坠卧床前。逢秋莫叹须知分，已过潘安三十年。”白居易
以他的现实主义诗风，倡导唯“歌生民病”、唯“伤民病痛”的
新乐府诗歌，但是中道左迁，天涯沦落，晚年面对激烈的党争，

只好避祸闲居，诗风越加闲适蕴藏。而此时的陈衍也已退居故乡，主持修志，他面对的同样是乱糟糟的社会现实，同样感到“有何佳趣足流连？”“潘安三十年”有个典故：晋人潘岳《秋兴赋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后因以“潘年”指鬓毛已斑。白居易 62 岁这一年“以病免河南尹，再授太子宾客分司”。白居易自称“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宋人阮阅《诗话总龟》云“白乐天洛中高退十余年，度日娱情，惟诗与酒，追游唱和”。第二年，（大和 8 年，即公元 834 年）白居易作《序洛诗》评价自己的后期之作：“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62 岁的陈衍，特别向往 62 岁的白居易的人生状态和诗作，第二年（1918 年）他又作诗一首，透露出他对白居易的崇爱：

元旦见桃开放香山体

菊后梅前花断时，桃前梅后亦如之。客冬梅与菊相见，
今岁桃开梅满枝。自是春光偏早暖，也因日色有先施。窗前
烂熳催诗就，不学香山更学谁？

追求闲适，便离不开“觞咏弦歌”“山水风月”，便会对花开的季节特别敏感，这一年的“春光”“早暖”，梅桃同开，而陈衍走南闯北，也见过梅菊“相见”的茂盛花季，他的这种对自然现象的歌唱，这种从平凡中发现地理与物候间的美妙变化，完全是一种香山体。白居易作《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1]

陈衍和白居易一样是以地域和季节的变换，悟出大自然的某些道理并陶醉流连其中的。白居易就大林寺的游览，还写过一篇《游大林寺序》，其中就这首诗辅以如下的描绘：

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

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东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口号绝句云。^[2]

诗人特有的敏感，使他们共同品出了蕴涵在物候季节中的美感。陈衍晚年效香山体诗甚多，集中俯拾皆是，如：

上北效坟

廿年不上北山坟，谁种千松一片云。五凤不如崎上好，徘徊荒垅倚斜曛。

陈衍这些诗语言平淡，情趣闲适，自然之美跃然纸上。这些诗除少数典故外，已不涉艰深的语言，与白居易那些妇孺皆读的诗歌一样令人喜闻乐见。

但是，即令陈衍想学白居易那样地隐逸于仕途，形势却不允许他有一刻的安定。这一年他先是听说蜀中甚乱，怀念六年未通音信的赵熙，不知老朋友是否安宁？不久后，陈衍自己的家乡也燃起了战火。先看看《登楼怀尧生二首》，其中之一为：

万方多难此登临，杜老当年难未深。犹有花卿能杀贼，终怜严武是知音。浮萍转徙知何地？拾橡生涯恐不任。欲寄尺书无处所，高楼花近独伤心。

岂止是四川，这一年的福建广东一带也不安宁，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先是大旱，接着发大水，早晚稻俱无收成。在政治上，一年前（1917年）张勋在京中抬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上演复辟的闹剧。陈衍听说后判断：“不出三天，复辟就会烟消云散。”结果张勋的复辟仅11天即被扑灭，张勋本人躲入天津租界。其时福建督军李厚基通电支持段祺瑞，被段任命为福建督军兼省长，于是福建卷入军阀混战。1918年5月，粤军开始向福建进攻，李厚基的部队屡屡战败，福州人心惶惶，城内到处筑起了栅栏。陈衍帮助福州执政者一起筹划维持治安，并联系请“清乡督办”

萨镇冰入闽，不久后他携家眷避到上海。

1918年，家乡久旱不雨，陈衍仿古代士大夫，作《祷雨诗》，有“大早已八月，山川意殊恶”“官长蹶然起，忍坐视民瘼”等句子，而迎来甘雨后，又一再作《喜雨诗》。从《谷梁传》“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到苏轼的《喜雨亭记》式的忧乐观，陈衍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性格：“一雨原酬诗一首，待他霑足到春余。”

1918年陈衍在《登楼怀尧生二首》之二中有“水碧山青万里长，兵荒马乱六年强”的诗句。自辛亥革命以后的六年来，国内先是袁世凯和张勋两次上演帝制闹剧，后是爆发军阀混战，而国外是日本提出阴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英美等国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真是内忧外患，“兵荒马乱”。陈衍自1879年开始出游、参幕，离开福州以来，已有40年飘泊在外，自1916年因受聘主编《福建通志》而开始回到福州家中，正想于老年叶落归根的时候，却又一次遇上兵荒马乱。

他在1918年的《至沪杂诗》之二中有“旅食四十年，此来家居久。廿度见蟾圆，遂复逼我走”的诗句，掐指一算，40年来，还是这一回在福州家中住了最久。而1898年离开上海入张之洞幕府，至今也已有二十载了。乱糟糟的形势再一次逼他离开福州。这一回上海相对稳定，福州人心惶惶的原因是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后，南北战争爆发，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积极参与，福建于是成为南北对抗的前沿阵地。陈衍自1916年开始至1930年长达15年的时间内除了1918年、1922年两次避兵上海一带，1925年因长子陈声暨逝世于北京而短暂赴京外，基本上都在福州家中或在厦门大学任教，1931至1937年则入苏州执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陈衍的人生取向是坚守于诗歌与学问，所以自1916年开始的长达20余年的晚年生活主要是编著书

籍和执教于大学。陈衍的追求可从他 1918 年所作的一首题为《朱九江先生入祀乡贤何翊高诗人赋诗征和》的诗歌中找到答案：

文章渊雅似卷菴，道学儒林传孰宜。穷到儿孙乃廉吏，
老归教授是人师。黄蕉丹荔先生社，白雪阳春弟子词。合谱
神弦备迎送，鸿文谁补退之碑？

朱九江名次琦，南海人。何翊高名藻翔，顺德人。这一首诗中所刻画的朱次琦先生逼肖陈衍，以现代美学观念“主观力量的对象化”来透视陈衍，他主观上对人格美和文学美的追求力量已“化”到了朱次琦这一“对象”身上去了。所以从这一首诗中我们看到了陈衍本人的形象：“文章渊雅”、“道学儒林”、“穷到儿孙乃廉吏，老归教授是人师”。这些诗句写的是朱九江先生，同时也是陈衍的自画像。在此“艰难丁国步，憔悴问家林”的时代，陈衍“浮海愁求筏，过江羨抱琴。鲁连非玉貌，谁识此时心？”（《送绂云回江阴并示治庵》）作为一介书生，在战乱之中，陈衍自言“军旅本未学，问陈亦何有？浮海而居夷，漫比藜床守”（《至沪杂诗》之二）。“问陈”即问阵，“居夷”这里指避战乱而居，“藜床”为藜茎编的床榻，杜甫有诗句曰“衰颜动觅藜床坐，缓步仍须竹杖行”。纳兰性德有词句曰：“独卧藜床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听谯鼓，二更彻”。

1919 年 2 月，身在上海的陈衍函请福建省长派通志局的分纂林雪舟带领校对誊录数人往金陵、杭州等地抄录《福建通志》中应用的材料。这一年，陈衍所游历的地方甚多，先后有苏州的范仲淹墓、邓尉梅花，太湖、寒山寺、金陵、杭州、扬州、北京，最后回到故乡。其中邓尉山的梅花多达万株，满山盈谷，人人其间，夹道花开与肩齐，似立雪海中央，被称为“香雪海”。诗人难免诗兴大发，一口气写下 12 首绝句，下面是其中的几首：

還元阁外众峯排，听雨渔洋句亦佳。一片太湖横眼底，

不知何用苦萦怀？（渔洋有《還元阁怀太湖》诗，“怀”字当误。）

玄墓知名过范坟，二名不讳却云云。野人称谓惟从简，吾里陈都亦省文。（郁泰玄墓只呼玄墓，与吾乡古灵先生裔孙陈都御史墓只呼陈都墓相类。）

司徒庙下双蛟卧，（“清奇古怪”四柏唯“怪”最妙，卧地似两蛟。）
可敌戒坛双卧龙。阴雨风雷如起舞，不知谁柏复谁松。

竹间石壁树间台，山色湖光泼眼来。持较岳阳楼上望，君山稍觉是粗才。

冒雨平生惯出游，自张油伞坐山兜。累伊朋友兼僮仆，透到绀袍湿到裘。

前面说过，陈衍晚年诗学香山，但他如长兄陈书，既有继承，又“绝无所师承”，转益多师。所以陈衍自言“年来学放翁”、学“后村”。

陈衍一生好作山水之游，以上最后一首中画出了一幅生动的图画：一位 60 多岁的老者自张雨伞坐在山兜中，悠然地观赏“香雪海”，而朋友与童仆们都冒雨相拥，这让我们想起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陈衍这些诗的画面形式多为白居易式和陆游式的：

烂漫红梅千百本，浑疑误入武陵溪。碧桃绿萼尤相似，几树无言日欲西。

——《观植物园梅花》

这一年 3 月 3 日，陈衍在客中，既无法出游，更不能过修禊的节日：

三日不出游坐窗下看瓶中桃花命酒独酌

山阴道上未成行，禊事重三作不成。此地初无流可引，

群贤谁与酒同倾？永和海宇犹巢幕，长乐桑溪欠弄兵。懒逐
龙华车马去，小桃照眼数枝明。

这首诗仍是令人想起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
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3月3日不能修禊，多少有些遗憾，但是，不能曲水流
觞，取酒独酌却也挺好的，不能投身大自然，“看瓶中桃花”却
也不错。中国人过节追求的是一种文化，在花朝、修禊、登高这
些节日里，文人们在乎的不是热闹，而是过节时的那种文酒之
乐，那种雅趣，何况当时的形势是军阀“弄兵”，百姓如燕子筑
巢于帷幕之上，至为危险。所以陈衍懒逐“龙华车马去”，唯愿
“小桃照眼数枝明”。正如诗人在另一首诗中所写，“古来四美本
难全”，所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不可能尽如人意，所以不
妨笑口常开：

题仲可衔杯春笑图

春来开口笑，日日况衔杯。得此一百岁，乐哉几万回。
这一年还有一幅图画勾起了诗人儿时的记忆：

为吴季尘题其夫人秋灯课读图

课读孀亲常有之，罕能自课自题诗。他人渲染皆鳞爪，
此味由来最自知。

一月四十有五，一年三百有六旬。最长惟有秋宵漏，
记取儿时倍怆神。

万事无非勤有功，机声图说北江洪。而今杼柚千千万，
夜读儿能课女功。（季尘方经理通州纱厂。）

陈衍自己儿时也曾曾在父母的课读之下成长，这里再一次唤起
诗人的时间意识：勤勉者的时间是可以延长的。而“机声图说北
江洪”讲的是洪亮吉（号北江）6岁而丧父，他的母亲姓蒋，非
常贤明，督课甚严，风雪之夜，常读经至鸡鸣。后洪亮吉中进

士，授编修，因指斥朝廷而遭戍伊犁，遇赦后自号更生，诗文与黄景仁、孙星衍齐名。而陈衍对黄景仁的《两当轩集》同样是自幼酷爱阅读。

诗人对诗歌的热爱往往是与对大自然的热爱分不开的，例如在李白的笔下，对月亮形象的刻画便是多姿多彩：“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辉”；“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素月坠江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吴牛喘月时，托船一何苦”；“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跪进彫胡饭，月光明素盘”；“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陈衍这一年有一首诗对月亮作了细致的感悟和描绘，值得读者深味：

松寥阁下坐月至曙示肖项及暨儿

焦山寺接江水平，天下明月无此明。我来既望越六日，下弦月出将三更。松寥阁下临无地，坐看日落微云清。久之月上铁出锻，久之潮上江缓声。久之半壁色渐莹，久之素彩流天行。江声此时复滂湃，夜静风薄尤以宏。水流月去月与乱，石与水拒水偏迎。此江本从平羌下，此月常向峨眉横。少陵不作太白死，我辈语要令人惊。诗成月午忽骤雨，天地人籁争善鸣。

诗人为什么在松寥阁下坐观月亮到天亮呢？原因是“天下明月无此明”，月亮照耀着的是滚滚东流的长江水和边上古老的焦山寺，这一江防要地曾是南宋韩世忠抗击金兵时的驻地。农历22日的下弦月在将近三更时才出来，慢慢地上升。诗人连用四个“久之”来描写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亮的四种形象：先是像炽

热的铁片刚从炉中出来准备锻打的样子；再过很久，潮水上来，江声渐缓，月色平静下来；再过很久，半圆形的下弦月渐渐显得晶莹透亮，色彩益发明亮；再过很久，则像白色的彩璧在天上行走。在月光的照耀下，松寥阁下临无地。此时江水越流越快，夜静风薄，水声宏亮。只见江水中月亮的倒影凌乱而移动，石头抵挡着水，水流却一往无前地冲刷着石头。这时诗人想起了李白的著名诗句“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远在四川的平羌江流入岷江后正是流到眼前这浩瀚的长江之中来的，而这同一个月亮此时正照耀着平羌江北面的峨眉山。陈衍诗中的意境，此时与李白诗的意境在时空上对接了起来。诗人从日落开始坐在松寥阁下，他与这一弯皎洁的月亮厮守在一起。到了半夜，忽然下起了骤雨，嘀嘀嗒嗒地响了起来。杜甫曾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陈衍的这首诗语言惊人地美丽，其原因仍然是陈衍自己所说的“诗中有我”，整个晚上的细致观察、全身心地品味，诗人几乎把自我融入了月亮，使月亮和“我”一起活了起来。这是一首优秀的吟月诗。

这一趟出游，陈衍会见的诗友也特别多：在杭州遇陈曾寿（仁先）；在上海，与陈衍过从最密的是沈曾植、郑孝胥、李拔可；在无锡，一起出游的是何振岱；正月在邓尉与林雪舟一起赏梅花又遇张元济（菊生）、汉弟（叔通）、重光、印昆、剑丞诸人。他住在林桀（肖珩）寓中，到金陵则住在陈三立家中。在北京常与泊园、陈宝琛、沈曾桐（子封）往来或唱和，还看望了病中的梁鼎芬。陈衍与这些诗友们相见均留下了唱和的诗歌。

这一年8月，陈衍在萧夫人逝世12年后纳妾李氏，名柳，字小杨，保定人，幼习于梨园，能歌唱。

陈衍回到福州后，通志局决定将原定三年期限延期两年完成，原因是连年战争，所以1920年陈衍仍然在福州修志。

2月，福建省议院院长林翰等十几人结社向陈衍学诗，陈衍为之命名为“说诗社”。于是在清明等春暖花开之日，同人们结伴为诗，常在冶亭、环翠楼、开化寺等地赏花、饯春、感旧、赋诗，福州的诗文酒会一时颇为繁盛。

3月，陈衍购邻舍破屋修为直园，与匹园相连接。三年前修成的匹园长7丈、宽3.5丈，种上花木后日益繁茂，渐觉狭小，连接拓宽后，移植到直园的花竹很快都成活了。陈衍将欢喜织入诗歌：“梅树桃枝微瘦损，海棠木笔亦平安。”陈衍将自己的性格移情到花园中去，将新花园取名“直园”：

余赋性拙直，屡困而不改，少治经，首《考工记》，轮人之职，有曰辐也者，以为直指也……直之为用大矣。今此园直如辐，故直名曰直。亦以表自反而缩之意云。

直园的形状像个扇形，陈衍治《考工记》时研究过车辐就是扇形的，它有两个特点：一是笔直，二是由大缩小，这正好应了陈衍的两点性格：刚直和收敛。唐文治评他的性格为“今世之松柏也，秉至大至刚之气，有独来独往之概，屹然不为万物所推移”。钱基博则认为“其为人俊迈倜傥而不可以方物”。都认为他的性格特点是刚直而内敛。

1920年8月30日易顺鼎在北京病逝，陈衍哭作《哭哭庵同年因寄樊山诗老八绝句》，其第一首为

霜林摇落满江潭（年来涛园 [沈瑜庆]、恪士 [俞明震]、节庵 [梁鼎芬]、筱珊 [缪荃孙]、梅庵 [瑞清]、元素 [唐宴] 并逝），又向燕云哭哭庵。一世春人今顿尽，不知剩得几何戡？

陈衍悲从中来，他和易顺鼎相识是从1890年开始的，他在第八首中说“交期卅载太匆匆，夕照金台不再逢”。30年前，陈衍未见其人先读其诗，那时惊叹于易顺鼎作诗的数量之多，且“无所不学，无所不似，而以学晚唐者最佳”。1901年，易顺鼎

在武昌拜访陈衍，请他为自己的《魂西集》题诗，陈衍的题诗为：

题易实甫魂西集戏效其体用魂西二字为韵

华裾客子过题门，几上牛腰束捆存。万里麻鞋行在所，一囊古锦乐游原。堂堂国事西台哭，草草交期北梦言。欲唤临川汤玉茗，为君宛转记还魂。

体格唐三十六齐，更将五十六评题。潼关华岳新高掌，林屋匡庐旧赫蹏。令仆黑头方袞袞，才人白下尚栖栖。樊南甲乙樊川两，肯让樊山与浙西？

“牛腰”喻诗文数量之大，“古锦囊”指贮诗之袋，易顺鼎诗作多达近万首。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易顺鼎正服母丧，却满腔热情地投入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府，北上抗击日寇，连连上书，其激昂慷慨与写《登西台恸哭记》的李翱一样。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逃，易顺鼎为了表示忠诚，与当年杜甫一样“麻鞋见天子”，从南京疾行千里赶去西安的“行在”，却不可能被重用，赖张之洞、刘坤一保荐而得了个督办江楚转运的小官。但是他的诗歌可是大受欢迎，“以学晚唐者最佳”，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皆排行第十六而诗文则以俚偶相夸，世称“三十六体”。“林屋”指江苏吴县洞庭西山，乃道教十大洞天之一。“高掌”指华山东峰的仙人掌，易顺鼎笔下的山水逼肖晚唐，和樊南、樊川一样清丽瑰奇，他与樊山（樊增祥）、浙西（袁昶）一起被称为张之洞的三名高足。张之洞是清末诗坛“唐宋派”的首领。易实甫和樊增祥虽然是唐宋派的代表诗人，但却与“同光派”的陈衍等人有深厚的友谊。这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生于王朝的末世，面临剧烈的变革和混乱；他们虽然都忧国忧民但在政治上难有成就，最大的收获就只能是诗歌了。

1905年，他们两人一起在张之洞幕中，同病相怜，互相唱

和，以陈衍的一首小诗为例：

实甫读余西山诗先得一句云饱听寒溪

夜雨声即以寄示因催其足成之

饱听寒溪夜雨声，君曾行处我来行。催诗更比催租急，
莫例重阳雨满城。

易顺鼎游过的地方，陈衍往往也要游一次。那时在他们之间以频繁的“文酒之会”来催诗，这就是他们之间最“急”的要务。

1908年仕途蹭蹬的易顺鼎似乎是时来运转了，因为对他的才能十分欣赏的张之洞于1907年调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后，便于1908年末授予易顺鼎云南临开广道的官衔，后又调广东等地当道台，但是不到三年，辛亥革命便爆发了。此后，易顺鼎到袁世凯手下捞了一个小官以谋生，袁倒台后则潦倒以终。对于易顺鼎在仕途上的奔竞，陈衍倒是很冷静的，他在送易督关云南的诗歌中唱道：“易子结习老不除，除官备兵仍耽书。浙西樊山旧同调，赋诗刻烛秉公余。常言此乐足忘死，持较南面王何如。”陈衍对易顺鼎的判断仍然是诗人而不是贵官，“刻烛”赋诗喻诗才敏捷，而作诗之乐超过了南面称王。所以在诗的末尾劝他“点苍西洱毋久恋，东海还驾琴高鱼。桑溪待修春褰饮，钓龙凭吊越台墟。天风海涛上劣崩，坐看红日升东隅。”“点苍西洱”在云南，而“天风海涛”则是朱熹在福州鼓山劣崩峰上的题字，陈衍相信只有这里才是他们这些读书人的归宿。上引陈衍《哭哭庵同年因寄樊山诗老八绝句》中之四为：

山水遍留文字缘，并华饮处总流传。堂堂万首皆才语，
除却樊山无汝贤。

陈衍相信，易实甫充满悲剧的一生，永远逝去了，但他的诗歌将永远流传，这也是他们之间的“文字缘”。

第二节 “横舍高楼壮海滨，重阳风日足清新”

1921年1月，“说诗社”同人游福州的桑溪，陈衍作《重游桑溪记》：

桑溪亘东郊十余里，水石之胜，四郊所仅有也。闽王王氏始率其后宫褰游于此。至宋，郡守建小兰亭，岁与僚佐以上巳日饮集焉。越千百年，流风寥廓，惟万历间，徐兴公曹能始诸先生，道咸间一二先辈，来修故事而已。山川作此寂寂，固吾乡文人与宦游斯土者之不好事，抑虽有而淹没不彰欤？是溪发源鼓岭，多小悬流，野人引以为度碓，舂声水声相间、闻数里。溪中石大者丈，小者尺，方者，圆者，直者，曲者，可席可几。余者顷歆历落，弥望水次。水属其间，莫者澄涵，行者磬折，箭疾轮旋，被为短瀑……余少日一游，顾而乐之，别去不能去怀。旅食四方，忽忽四十余年，乃今与同好十数子来寻旧迹……吾老矣，曾游三峡洞，未至三峡，曾至建溪，未知重至之何时？此兹溪之所以重可乐，将使吾常游之而不厌欤！

陈衍的这篇游记文短而韵味无穷，让我们想起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柳宗元将山水之美写得清新深幽并将遭贬时的心情升华为庄子的超脱逍遥，韵味深邃。陈衍笔下的桑溪同样是这样地清澈，幽静，曲折有致，迭宕多变，而陈衍对晚近世文人雅事的寂寥所留下的遗憾，以及“将使吾常游之而不厌”的心情同样是一种升华，同样是一种庄子式的超脱逍遥。柳宗元散文中僻静荒寒的山水，折射出的是他从事政治改革失败后的不屈的精神和

孤傲的性格，而陈衍游记中的寂美荒寒的山水，投放出的则是逃避乱糟糟的政治的清刚精神和磊河的性格。

这一年，吴用威运使请陈衍一起游览连江琯头的青芝山，同样有记，而三年前陈衍在上海曾先写过下面这篇散文：

重修青芝寺记

青芝一名百洞山，山一而洞百，其胜可知。余居会城，去青芝仅百有二十里。十余岁时闻乡人多绳之者，顾至今曾未一游，良由数十年旅食四方，罕还其乡。然亦好游之情先难而后易，图远而忽近，用蹉跎耳。去岁读见龙先生集所为文，熟于首郡形胜，自台江至海百余里左右，缭绕之山川岛屿，如指诸掌。顾未详青芝，惟诗中有憇泉、定光石室、星窝、悬石洞、猿公岩、天路、三玉蜍诸绝句，不甚显于世。然读叶台山游青芝诗《序》，则云孟溪之上为中峯，岩洞奇绝，去廷尉董公居不数里，鲜有迹者。公芟芜刊阻，名胜始出，可与吾邑福庐相伯仲，是兹山赖董公而辟，更赖叶公而传也。山故有寺，久倾圮，洞壑半没榛莽，青芝征社同人谋鸠资爬梳修葺之，请记于余。余投老归里，方欲多游吾乡名山水，以补吾阙，今又避兵海上，五十年闻名之胜，请见未有日，所谓山一而洞百者，尚未得一而曲状之也。

陈衍3年前写这一篇《重修青芝寺记》时，并未游览过青芝山，正像杜甫写《望岳》并未登山一样，杜甫那一篇脍炙人口的诗作靠的是“望”，陈衍这一篇短文靠的是“闻”和“读”以及充满理趣的议论，令人读《记》之后，神往该山。三年后，陈衍终于了却夙愿，亲自登览了这一“其胜可知”的名山，得以“一而曲状之也”：

董卿招游百洞山归先以

诗来次韵奉和

游山最好半阴晴，五十年来欠此行。趺足犹能盘登上，
归舟准备退潮争。垒空百石穿珠曲，壁立重径拔地生。持较
天平共灵鹫，倚栏也喜小楼成。

“董卿”是吴用威。这首诗以浓浓的游兴画出了百洞山奇特的景色，中间两联以代表性的景物勾勒出登山和泛舟的情趣及曲径通幽和壁立高耸的百洞山灵异的风光。最后以高与天平的小楼点缀这一幅迷人的海边山色。陈衍这一年和吴用威的诗歌多达9首，都酷似白居易的晚年诗风。

从1920至1921年陈衍的诗友一连有9人逝世：沈瑜庆、俞明震、梁鼎芬、缪荃孙、瑞清、唐晏、易顺鼎、沈曾桐、王梦湘。陈衍均以诗哭之。1921年年底，《福建通志》全稿告成，共六百余卷，约一千万言。

陈衍认识《福建通志》的协纂何振岱是在1909年，当时陈衍从北京请假归里，路过上海，遇见林则徐的曾孙林大任，林把与自己一样耽于佛学的何振岱介绍给了陈衍，陈何“两人均有相见恨晚之慨”。^[3]陈衍在《何心与诗叙》一文中说：“识其人，读其诗，与之言，吾所觉者，心与觉之，吾如是观，心与不如是观者，或寡也。”这是因为，何振岱一生不愿为官，这一点与陈衍一样，他“无当乎利禄”，走的是一条“荒寒之路”。而“其于诗，人如是言，心与亦如是言者，殆寡矣。”追求诗歌的个性，这一点又与陈衍一样。他们两人真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乃至何振岱听说陈衍住在文儒坊三官堂，竟也于1910年买下陈衍对

鄭序

民國五年本省開局續修省志十二年縮為校刊局後陷停頓已刊者計
八十本二十四年省政府請石遺先生廣續其事仍歸民政廳主管二十
六年秋石遺先生逝世陳公治主席以為省志費時逾二十年用款越二
十萬元乃囑教育廳續成限期半年經費則就二十六年度預算項下二
千元開銷貞文乃委廳員魏應麒着手整理就已編未刊之稿先行付印
續得三十本其餘編稿詢諸石遺先生後人迄難檢出乃于二月派員續
編古人比擬著述謂如天衣無縫蓋以羨夫完整之作也完整之作必出
於一人之手或由一人董其成非然者難之故以褚少孫補史記而必不
如司馬自作然天下事往往出於事實之不容已者班孟堅死而續成完
史乃不得不委其女弟即以近事言之福建道光省志蔡甫先生作古而
和齋先生乃不得不承其乏故福建新志之編著沈總纂開其始而不克
觀其成此瀟園先生之遺憾也陳總纂費一十年之精力而溘然長逝功

福建通志序

郑贞文撰写的《福建通志·序》。

義例史書見二
著烈女非不著也巴清教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
榮之見刑志不特揚敏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固不

層層爲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署文
苑也云云案詩稱女士傳云女有士行則無非無儀不可以詞害意
矣

一列女傳首書法有名者宜著姓名及字士昏禮有問名曲禮無名者

稱氏先書某邑人從後書某巨從某人妻范書列傳皆用班傳書法

而列女篇首獨用郡望夫名已失列女名篇之義矣章氏譏之是也
一前志僑寓與遊客往往混淆僑寓當爲立傳遊客只宜入軼事類也

一古人左圖右史故志必有圖由來久矣惟圖學日精舊圖每病疏畧
今置域府州縣各圖悉用界畫至名勝各圖仍用毛筆畫以畧存山
水面目

沈瑜慶

陳衍 擬

福建通志凡例

沈瑜慶、陳衍共同撰写的《福建通志·凡例》。

面的一幢房子。从此两人过从甚密。何振岱多才多艺，他弹琴，陈衍予以激赏，他作画，陈衍则以诗为报。陈衍是“同光派”闽派的领袖之一，而何振岱则是这一诗派的殿军。钱仲联先生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云：“读何梅生诗，如置九溪十八涧，隼

秀刻深，虽无弘伟之观，无愧山泽之瘿。”^[4]陈庆元先生评曰：“何振岱诗取材不广，面目稍窄，但其诗不独在‘同光体’诗人中可以称上逸品，在历代诗家中也可称逸品。”^[5]

陈衍评何振岱的诗歌，有两个要点：

一是深微淡远：“乡人中能为深微淡远之诗者，有何梅生振岱。非惟淡远，时复浓至，其用力于柳州、郊、岛、圣俞、后山者，皆颇掎其馘也。”陈衍举了何的《鹤涧小坐》为例：“地天忽自通，一碧不可绝。举眸悚阴森，恐入神灵窟。万篁争夺挺，丛枿皆耸拔。桥行俯寒涧，自古流苍雪。愔愔琴思生，冥冥鹤迹没。出出衣藓香，湖光湔不灭。”陈对它的评语是：“真写得出，起四语是东野境界。”^[6]何诗确实有孟郊寒瘦奇险的特点，从诗中的“寒涧”、“苍雪”、“阴森”、“神灵窟”等语可以读出何诗的力避平庸、才高气清的风格与孟诗一样。何、孟两人所生活的时代与个人境遇多有相同：同样是战祸连年，朝政黑暗，人民受难，社会凋敝，同样是穷愁寒苦，屡试不第，却都是“诗癖”。陈衍和何振岱作为“同光派”的代表性诗人，对元和诗人孟郊特别偏爱，这与陈、何他们所处的时代与人生道路相关。陈衍曾说孟的诗“迥绝千古”，何振岱同样对孟诗持以褒义。陈衍还举《理安寺泉》为例：“百涧竞成响，一潭私自澄。紫苔下绝壁，小甃为幽亭。声外尚含秋，意中欲无僧。久坐闻香气，何必存禅名。江湖流浊世，湍激何时平？真当守此水，心根同孤晶。”评语是：“起是柳州境界，余则宋人语。”^[7]何振岱这首诗的开头部分写的是幽僻的山水，看似冲淡，实际上饱含着柳宗元式的悲情，而诗的后面部分则是宋诗式的议论与抒情，其中的“江湖流浊世，湍激何时平？”正是这种悲愤矫激的心情的议论与抒发。陈衍在分析何振岱诗的风格时说，何诗除了在郊、岛之间外，有的又似乐天（白居易）、诚斋（杨万里）的闲适之作。陈衍与何振岱一样，

他们所走的“荒寒”的人生之路与诗歌之途上总伴随着孟郊、柳宗元等诗人的影子。

陈衍评何振岱诗的第二个要点是戛戛独造：“吾乡中诗之戛戛独造，不肯一语犹人者，梅生、惕菴可称二难。”^[8]龚惕菴是何振岱的挚友，两人的诗均富有个性。何振岱在《延晖楼诗草序》中云：“若学而徒效千个之所为，则又奚贵其为学哉？”^[9]又在《答陈生泽隍》中云：“凡看一家诗，观其所独觉而知其所独具者已得大概……所贵乎为诗者以其应时触景皆有所独觉也。”^[10]何振岱把这种“独觉”化为他的诗句，确实是别人所没有的：“钟定声依无际水，诗成意在欲开梅。”（《孤山独坐雪意甚足》）“灵僧荷笠穿云去，黄叶千峰不可寻。”（《理安寺》）“兴来倚石立移时，看竹听泉忘入寺。”（《游长庆寺》）这些诗句有的以“钟定声依”的听觉感受让读者无法忘怀，有的将“灵僧荷笠”在“千峰”中穿行的视觉效果演成了蒙太奇让你去追寻，有的则以“听泉忘入寺”的心理遗忘使你感受到时空推移的妙谛。何振岱曾说：“诗不在多，以精为贵，假使过了数百年后，有人传诵我的诗二三首，吾愿足矣。”^[11]我们作为后人谁也不会怀疑，他的这些诗句已永远地刻入读者的心目中了。“钟定”一联，当时被写在陈衍的扇子上，受到沈曾植等诗人的喜爱和赏玩。这样的诗句还有不少：“桥行俯寒涧，自古流苍雪”，“诗无雕琢关天趣，饮自安徐爱有恒”，“翠禽滴水作花飞，一行都上风篁岭”……

陈衍是何振岱的知音，除了诗歌，陈衍还对他的音乐书画等艺术造诣极为赞赏。赞他的琴声为“流水高山非绝调，参横月落更清哀”，誉他的画则为“写出蹇驴诗满载，寄余野鹤鬓同斑”。而何振岱同样对陈衍推崇备至，他在赠陈衍的诗中写道：“石遗人天眼，众妙参真源。鸿鹄志八表，焉得守乡园……”他们虽然家门相向，但陈衍常年“旅食在外”，何在家中的时间多些。尽

管如此，他们之间无论相隔千里还是共居家乡，都有唱和往来的诗歌记录下他们真挚的友谊：

梅生得唐琴书来乞诗以一律答之

烽火郊关独屏居，买琴添债足轩渠。甌香旧物通灵去，
松雪家藏入手初。见说发音胜金石，何时闻雨共阶除。聚于
所好诚堪券，微尚平生顿起予。

何振岱“买琴添债”之时正值军阀混战“烽火”在福州燃烧，他竟能“独屏居”而乐在其中（“轩渠”）。“松雪”是元文学家赵孟頫之号，“闻雨楼”是陈衍家的楼名，与何家正对门。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的雅好：登山望水，欣赏花木、品茶评画。陈衍每每将交游和品艺的画面定格在诗歌之中：《招梅生看画》、《寒食日寄怀梅生兼讯西湖》、《同梅生国容坐听水斋头半日怀听水主人前度至此及至听水第二斋主人皆不在也》、《同梅生游惠山寺》、《梅生画秋山旅行篋见贻以诗为报》、《心与以惠泉淪龙井茶一杯分饮三年前曾同到惠山也》，我们看看后面的两首：

绝爱秋山作旅行，几回有约不能成。忽从清簟疏帘底，
眼见高林霜叶颀。负担提携忙各役，仆夫骑从恣横生。何曾
尽与诗人事，写自诗人倍有情。

飞符调水几千里，小别惠山将四年。分得一甌青玉色，
恍如重坐竹罐边。

挚友俩都酷爱秋山之旅，但难以成行，现在忽然从画中感受到旅行的欢乐，观赏着“高林霜叶”、“仆夫骑从”姿态横生的图卷，欣赏到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韵味，这就是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写照。而几千里地的一壶水泡出的龙井茶，各人分得一甌，竟品味出三年多前同游惠山的乐趣……

如前所述，他们两人常常是聚少离多，但一直保持着诗画和信息的来往。1927年，陈衍的诗集中有《梅生自都摹宋人雪景

图见寄报以长句》：

高人数载去乡关，饱看京畿雪后山。写出蹇驴诗满载，
寄余野鹤鬓同斑。折梅远赠情犹浅，命驾相思愿未还。便欲
钓鱼台再到，白鱼黄酒共酩颜。（前六年弢庵曾雪中招游钓鱼台）

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两位“高人”，两心“相思”近20年，却不知什么原因，自1928年开始断了往返，出现隔阂的原因至今成为一个谜。据《诗人何振岱评传》的作者刘建萍女士分析，“造成陈、何两人不和的真正原因尚不清楚，但有人从中拨弄是肯定的”。何振岱是“同光派”闽派的殿军，陈衍1920到1923年所编《近代诗钞》24卷，其中闽籍诗人入选诗作数量除陈宝琛、郑孝胥外，以何振岱为最多，共计128首。《陈石遗集》中现存与何振岱唱和及题目中涉及他的诗歌达12首，《石遗室诗话》中也多处论及何振岱，可见陈衍对何振岱诗歌的推重。

第三节 “七旬百炼筋骸在，万里三分骨肉亲”

1922年福建再次爆发战争，据林祥瑞等编著的《福建简史》载：

民国11年（1922年）直系独掌北京政权。6月，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联盟。8月12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到延平与王永泉商订合作条件，达成共同进攻福州，驱逐李厚基的协定。

9月上旬，北伐的粤军许崇智等部在王永泉默许下进入闽北。9月27日，王永泉致电李厚基，促其交出军民两政，

即日离闽……10月6日，许崇智部在占领古田后，会同王永泉部进攻水口……统治福建9年的李厚基终于垮台。

《年谱》中所载与上文基本相符，陈衍于是又一次避兵至沪。陈衍有诗《避兵至上海三首》其一为：

十载乘桴三避兵，旁人悯我太劳生。渔童莞尔樵青哂，只算浮家泛宅行。

在上海的朱祖谋（古微）相见之下和陈衍开玩笑说：“盼你好久了，你都不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的家乡有兵事呢。”陈衍于是又吟成一个绝句：

与古微

故人情重把诙谐，果尔相逢笑口开。回首三年饥渴意，只除祝汝避兵来。

陈衍于是与李宣龚一起游览宜兴。这时听说沈曾植逝世的消息，陈衍作《哭乙庵》诗两首，中有“岂知遂弃捐，净土号长征。七十复何求？恨阙永诀情”，“平生破万卷，蕴崇腹中蠹。当时曾火逼，酬唱连朝暮”等句。

这一年9月，陈衍从沪宁铁路入都，经过金陵时与陈三立等重聚。入都后再与樊增祥、黄濬、傅岳棻、邓名镛等人相聚唱和。而其中陈宝琛招集钓鱼台那一次，“台前后老松近百株，松顶压雪，倍增偃蹇之态，南窗竹一遝，弄影晴日，弢庵丈载酒携大白鱼，向曝听涛，饮啖乐甚。归沪近岁除，乡思甚浓。”得诗二首；

岁除诗二首一次梅泉韵一倒次梅泉韵

客居无座可延宾，小榭聊堪接所亲。也趁颺轮走南北，待看风物换冬春。车声每过楼皆震，炉火常温案有尘。懒把电光替灯火，照将须髻信如银。

故园花发已如银，数纸书来带战尘。卒岁惟应添白发，

还乡莫漫盼青春。七旬百炼筋骸在，万里三分骨肉亲。堆案尚多文字债，待烦虎仆与龙宾。

过大年了，陈衍却“骨肉三分”：一部分仍在“故园”，一部分是大儿声暨一家在北京，自己则寄寓在上海。几十年飘泊，如今仍然三地相思，这样的“卒岁”真是“惟应添白发”。而陈衍的文字债仍然很多，“虎仆”和“龙宾”分别是笔和墨的代称，比如1922年开始李宣龚（拔可）提出让陈衍编选《近代诗钞》，刚开始编纂不久战乱爆发。陈衍1923年初在上海加快了编书的进度，每天编数卷，于上半年告竣。

陈衍在《近代诗钞·述评》中提出两点看法，第一，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有王士禛，在乾隆有沈德潜，在道光、咸丰有祁隽藻、曾国藩。而王士禛、沈德潜的时代属于“生际承平”的时代。正像孔子将西周的文王、宣王及东周前期的隐公、桓公等时代称为自己所向往的“所闻”、“所传闻”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宜其诗之为正《风》、正《雅》”；而祁隽藻、曾国藩的时代包括陈衍自己所处的时代却是“丧乱云旆，迄于今变故相寻而未有届，其去《小雅》废而诗亡也不远矣”。正像孔子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所见之世”，是个“身丁变《雅》变《风》以迨于将废将亡”的时代。所以陈衍自己虽然“位卑身隐”，但是“以数十年见闻所及，录其尤雅者都为一集……其诸世之君子，或亦有乐乎此也？”他认为编这一部书是有意义的。

第二，陈衍认为王士禛“标举神韵”而“神韵未足以尽《风》《雅》之正变”，沈德潜“言诗必曰温柔敦厚”但孔子删诗“亦不尽温柔敦厚”，只有祁隽藻“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甫）为韩（愈）为苏（轼）、黄（庭坚），辅以曾文正（国藩）、何子珍（绍基）、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王士禛、沈德潜论诗强调才力而少及学问，

“顾其才力为正《风》则有余，为正《雅》则有不足”，祁隽藻等人则“合学人诗人二而一之”，故能超越王、沈二家。所以在《近代诗钞·述评》中陈衍将祁、莫、何、郑、曾等人名列最前面。

从祁隽藻等人开始到陈衍的时代，正是道、咸、同、光这一内忧外患的近代时期，确是“丧乱云旻”、“《雅》废而诗亡”的时代。陈衍、李宣龚等人辑刊《近代诗钞》，接过王士禛、沈德潜、祁隽藻等人手中的诗歌薪火，传递下去，是对从《诗经》开始的几千年的诗歌文明的虔诚的坚守。

陈衍几十年的旅食四方，浮家泛宅，历经兵燹祸乱，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诗歌与学问的追求。他不仅创作诗歌而且以顽强的毅力搜集、选编和评论诗歌，从《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诗品平论》、辽、金、元三代诗《纪事》、《宋诗精华录》、《全闽诗录》、《清诗三百首》、《樊榭诗评》到《近代诗钞》及《续近代诗钞》。这种用生命来延续诗歌命脉的精神超越了乱世，超越了世俗。陈衍的这种品质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品质。

陈衍坚定地认为学问和诗歌是可以也应该“二而一之”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陈衍在他的诗文中一再阐述这种思想。例如这一年有一首题为《题书味庵图次苏戡韵》的诗歌中批评“今人治词章，绝不理经史”，结果只能是“充盈为肤革，体格各自己。为语庵中人，涂抹乃伪士”。“体格”指人的健康状况，这里用来比喻文学的价值，“肤革”就是肤浅，这样“不理经史”的“词章”，其文采只能是“涂抹”和作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将词章文彩与经史子集兼而为之，《诗经》《左传》等名著常是将学问与文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年陈衍有两首送给伶人王梅笙和周信芳的诗，第一首表扬王梅笙爱好《左传》，“海藏所取人，不随流俗转。王生有士行，匪独以艺显。艺余闻幼学，

左癖胸不浅。”郑孝胥所介绍的这位艺人能够“劬学”，把艺术与学问结合起来，自然就不俗不浅了，陈衍将他与著名的伶官王感化和后唐庄宗李存勖相比：“吾乡王感化，卓著伶官传。后唐李天子，风流日游宴。”第二首称赞周信芳的名字“取义本楚《骚》”而又爱演包龙图，所以如果让周当京兆的长官，一定会让那些唯唯喏喏的人感到惭愧。陈衍治诗总是在文采与学问中注入历史的厚重感。

这一年除夕，因战事未除，有家归不得，陈衍在上海度过新年后，又忙着编辑《近代诗钞》，由李宣龚出版。1923年2月陈衍与李宣龚（拔可）、高凤谦（梦旦）一起游杭州，月底又与高凤谦一起乘乌篷船游绍兴。晚上也住在船上，白天则船到一名胜景点即停船上岸而游。这一次游玩禹陵（禹穴在其下）、吼山、柯亭。下面这篇游记，写的就是吼山的东湖：

东湖岩洞记

绍兴人善凿山为岩洞。以奇伟观相诧。东湖有山亘半里，峭壁插水数十仞。郡人陶氏擅山为庄，隄湖水为渠，长如其山，通以水门，墙其隄上，属其两端于山峭壁正面。有水洞二，一如方井，缺其一面之甃（井壁），一如古东房西室制，中隔一壁，后有门通焉。最奇为后洞，舟从峭壁旁向入，两壁高耸为阙门，内三面壁立，宽数间屋，若无路矣，左转又一阙门，居其壁之半，再进又一阙门，偏右，宽如前阙门之半，再进壁立，下宽上狭，如瓶甃，如裙幅，十数而开其一，高皆逾正面峭壁，中可般旋一舟。相传南齐时人力所为，谛验似有穿凿痕，石色虽旧，未至苍黝。然来游者竟叹奇绝矣。至水宕柯岩，人为之迹显然，观者自能辨之。

陈衍的游记短小精悍，像一幅精美的图画。这篇散文先写岩洞周围的景色：“山亘半里”、“峭壁插水”和水渠环绕。写岩洞

则用奇特的比喻：一是比为一口缺一面井壁的水井；一是比成古代房屋的几个房间的墙壁，壁上有门，而门都一“阙”又一“阙”，令人应接不暇，令人“竞叹奇绝”。

清明节雨后，陈衍游兰亭：

打蓬急雨晓初晴，正好山阴道上行。数里清溪多屈曲，百丛修竹遍纵横。如乘雪夜拏舟兴，未想中年誓墓情。亭馆萧疏宜被袂，何论上已与清明。（今年清明先上巳十二日）

——《清明日雨后至兰亭》

陈衍中年以后的“誓墓”（隐逸）之情挥之不去，但因旅食之困未能真正地归隐。归隐和出仕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恒常的矛盾，白居易却想出了一个“中隐”的对策，陈衍晚年最喜香山，也许他的“出处”也颇仿这种“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12]

陈衍虽然不像白居易那样正在“仕宦”之中，但此时身在修志，“文债”甚多。所以也不能真正“大隐”或“小隐”，只能作介于两者间的“中隐”，“旅食四方”为避饥寒，而既办好公事又能“恣欢言”和“好登临”，坚持吟诗作文，坚守在诗歌与学问之中。

游完了兰亭，陈衍登上陆游的“快阁”，但是，当时放翁所居，如今虽物似人非、“英灵”已逝，却景色依旧：“门前镜水从

前碧，槛外稽山分外青。万首诗多归里作，一春雨好倚楼听。”
(《登快阁》)

如前所述，陈衍晚年除了追寻白居易、陆游外，还常以杜甫、梅尧臣自况，如这一年的诗集中就有《读杜集戏题二首》和《读宛陵集戏题》等，以前者中的第一首为例：

杜陵身世试追寻，太似吾生感不禁。宾客诸侯曾潦倒，
曹郎员外偶浮沉。常携眷属同流转，屡避兵戈此滞淫。托命
长镵天且靳，草堂花木付萧森。

如本书前面所引，陈衍曾将“筹安会”复辟闹剧对自己的折腾，比作杜甫的“陷贼”。他觉得自己一生颇似老杜：困于下僚，像“工部员外郎”这样的官位只是偶尔“浮沉”，“携眷”飘泊才是家常便饭，陈衍一生与这种“杜陵身世”何其“太似”！“长镵”为古代一种掘土器，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之二有句“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同样“屡避兵戈”、“托命长镵”的陈衍，对老杜的“草堂花木付萧森”怎能不充满诗意的共鸣呢？

1923年陈衍所作诗歌有5首与郑孝胥有关，此后就未见两人的诗歌往来了。这四首诗的前3首为《题书味庵图次苏戡韵》、《赠王梅笙》和《赠周信芳》。郑孝胥将其激赏的艺人王梅笙和周信芳介绍给陈衍，王梅笙喜欢研究《左传》并绘有《书味庵图》，而他又善于演风流天子的角色，所以陈衍的诗句有“艺余闻幼学，左癖胸不浅。吾乡王感化，卓著伶官传。南朝李天子，风流日游宴。王也工词赋，讽谏托歌扇。”诗中以南唐的戏子王感化喻王梅笙，南唐的李璟“风流日游宴”，被感化的一句唱词“南朝天子爱风流”所感悟。周信芳则专演包龙图，故陈衍的全诗道：“信芳锡嘉名，取义本楚骚。可知疾恶意，非种必爬搔。观演包龙图，笑比清黄河。唾面斥奸佞，居然活阎罗。屡醉我美

酒，请我为浩歌。倘使尹京兆，愧比徒唯阿。”“唯阿”形容卑恭顺从的小人，如果让疾恶如仇的人当上了京兆尹，则愧杀那些小人。其余两首诗写的是郑孝胥在海藏楼前面又盖了一座盟鸥榭，大家以诗唱和。这便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陈、郑两人唱和的最后两首诗了。

实际上，他们两人的私交一直到1921年之前都还是较为密切的。如前所述，1903年，陈衍曾替自己的女儿向郑孝胥的长子郑垂提亲，没有成功。过了十几年陈衍竟又替自己的女弟子再次向郑孝胥的三儿子提亲。《郑孝胥日记》1916年8月25日条载：“叔伊为王子仁侄女求婚事，作书告以小儿志欲学成乃娶，且从缓议。”陈衍再次遭到拒绝后，还将此事写入诗歌。这个被陈衍相中，欲将女弟子嫁给他的郑胜于1918年病亡，陈衍作《苏戡丧其第三子胜以诗唁之》，全诗感人至深：

函请书墓碑，旬月未得覆。念之心焉疑，向来报书速。
忽闻近状恶，丧及亲骨肉。姪孙姊孙女，第三子又续。数日君书至，发函颈频蹙。胜也见遗照，愁容若可掬。五言古六首，长歌过于哭。小传二百言，悲愤逾累牍。小诗廿八字，述之痛在腹。请我唁以诗，此痛我最熟。乌生八九子，伤亡昔相属。次儿歿于兵，北方正沈陆。君诗曾吊我，廿载事转烛。三儿夭于瘵，三九岁何促。旁行书满架，代数草盈麓。正月初三日，（三儿亦此日逝）此日何太酷。怆君工哀挽，悽惋难卒读。东七哀连篇，栗兄伤手足。怆君喜东野，东野杏殇剧。怆君喜荆公，荆公痛舐犊。拙诗远不如，胡亦罹此毒？又怆君名子，胜也欠厚福。白公空勇猛，陈涉枉鸿鹄。胜也信佳儿，自命非碌碌。吾有女弟子，择婿吾所欲。胜也辞早昏，学业方自勗。谁知方出世，羈絆脱尘俗。谁知鄙愚鲁，公卿苟福禄。人生若散花，片片过春目。小儿偶游戏，曼倩

时往复。

“五言古六首”和“小传二百言”都是郑孝胥为郑胜所作的致哀的诗文，郑孝胥的三子东比 1893 年出生，第二年便夭折了。而陈衍此时已同样经历过第二、三两个儿子的早逝。两位诗人一同想起了孟郊和王安石的丧子之痛。孟郊一生贫困潦倒，元和三年，居然三个儿子在几天之内都死去。他写下《杏殇》九首，《序》中说“杏殇，花乳也，霜翦而落。因悲昔婴，故作是诗”以花苞遭霜摧残来比喻自己幼小儿子的夭折。孟郊另有《悼幼子》诗，他这些哀悼晚年丧子的诗，引起洛阳城里普遍的同情。王建有《哭东野》诗道：“老松临死不生枝，东野先生早哭儿，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则是英年早逝，王雱 24 岁中进士后和王安石一起参加注释儒家经典的工作，他作策论 20 余篇纵论天下大事，支持父亲的新法，颇有贡献，熙宁 9 年却不幸病逝。王安石悲痛得要求解除宰相职务，宋神宗不许。在变法中备受打击的王安石因此更加心灰意冷，他请参知政事王珪（禹玉）替自己在神宗面前说几句话，《与参政王禹玉书》中说：“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波常出于交游之厚。”由于王的坚决请求，终再度罢相。陈衍的这首诗的后半部分提到了陈衍为女弟子向郑胜求婚的经过。谁知陈郑两人的儿子，都是“人生若散花”一般片片地坠落。郑孝胥的长子郑垂于 1933 年病故，那时两人已然绝交，陈衍再也不会为父子同当汉奸的人写哀悼的诗歌了。1918 年来上海避兵的陈衍因所居客舍无法种花，还以诗向郑孝胥乞菊花来插瓶：

连朝看遍菊花堆，（俗所诗为菊花山者皆堆垛也。）客舍羌无隙地栽。尊酒已孤重九节，瓷瓶才寄一双来。折枝聊欲分盈把，数朵还期带半开。少损东篱黄紫色，愧无以报小诗裁。

因为是采枝插瓶，所以希望花朵是“带半开”的，巧妙地写出了陈衍爱花的心情。从此诗可知至此为止两人的友谊，还是很深的。但是3年以后就出现裂痕了。以下两则郑的日记都是1921年写的：

拔可谈及叔伊所选《近代诗钞》余曰：“吾将致书叔伊，勿以吾诗入选。”（民国10年5月12日）

叔伊来书，为人求书墓志，即复书辞之。（民国10年5月12日）

显然此时两人关系已出现严重裂痕，但还在交往。根据林则彬为陈衍之孙陈槻所撰《诗人陈衍传略》所作的《序》中载：“（1932年陈衍）当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兼文教部长时，愤慨之余，不惜与郑绝交，并将1923年《近代诗钞》中所收录郑作，通知商务印书馆，予以删除……。”根据上述日记，郑早在1921年就不愿以自己的诗歌入选《近代诗钞》，但后来却又替他人说情：据《郑孝胥日记》民国12年（1923）5月23日条载：

叔伊来，余询《近代诗钞》已付印否，吴光禄遗诗能否附入？

而同年“6月20日”条中又载：

石遗求书《近代诗钞》封面，辞不书。

陈郑两人的交往止于1923年，1924年后就不见有诗歌唱和及信件往来。而这一年，正是“逊帝”溥仪任命郑为“总理内务府大臣”的时间。这可见陈衍的政治警觉性是很敏感的：根据陈郑两人的亲密关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陈早就从郑的言谈中知道郑有一个投靠日本人建立满洲国的政治腹稿。陈衍知道郑孝胥的性格，一旦受到溥仪的信任，郑就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走上叛国的不归路的。陈再也无法容忍这样一个朋友了。

陈郑二人在文学上成为亲密的诗友，互相唱和论艺四十余年，而1924年绝交后成为政治上的敌人，连文学也分道扬镳了。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文学与政治异途：文学是一项追求美的事业，它重感情的抒发，他们两人曾在情感上有共同之处且酷爱文学之美，故两人走到了一起；而政治却是一项追求权力的活动，它重立场的判别，他们两人一嗜当官一厌权力，一当政客一喜为民，一个无耻一个爱国，所以最后誓不两立。

从文学上看。中国传统的文学所表现的情感是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乐感与道家的无为而逍遥的美感的结合。前者可以孔子与其弟子的一个对话为例：有一天孔子让他的四个弟子申述各人的人生理想，子由说他把一个千乘之国治理得“勇”“义”双全；冉求说他只能像子由这样来治理一个小一些的国家；公西赤则说自己只能为诸侯会盟当司仪；曾点却与他们不同，他停止手中正在鼓的瑟，慢悠悠地说：“我只想暮春三月里和一批人在沂水里洗澡，然后起来吹吹风，歌唱着回家去。”孔子听完后，长叹一声说：“我赞同的是曾点啊！”其实孔子的意思是，读书人应有志治国，但不要忘记其中的困难，更不要忘记“礼乐”这些文化的根柢。

陈衍和郑孝胥两人从小都饱读诗书，又都在关心时势、思考政治的同时不忘“鼓瑟”和“詠”——治诗作文这些美的追求。更进一步说，他们两人都认为文学要有清幽的个性而不要太俗，要有发展的眼光而不受局限，要有学问基础而不单靠才气……这样，他们便一起揭橥出“同光体”这一个诗歌流派。当然，他们两人还是有不同的：郑更多地“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好唱高调。陈却更倾向“穷则独善其身”，故更喜淡泊。因为郑孝胥是政治舞台上的主流人物，所以郑诗既“惘惘不甘”又“自耐咀味”；

陈是自甘边缘化自我放逐式的人物，所以其诗更多地寄情山水，抒发个人情怀。总之，他们既有同好又各具个性，曾是最真挚的一对诗友，最后却分道扬镳。

再说政治上，虽然两人都曾经参与过戊戌变法等维新运动，都通过参幕支持洋务运动，但因为对权力的态度迥异，郑钻营官场，青云直上，最后发生膨胀，直到“丧心病狂”的地步；而陈一直“雅不喜”科举和当官，基本上属于平民阶层，后期以写作和执教为业，所以在政治上清醒冷静，光明磊落。1923年以前，当郑逐渐设计出一个与“大东亚共荣圈”相似的中日“共管”政治蓝图时，陈衍敏感地产生警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但还是在诗歌上仍保持往来。1923年陈衍与郑唱和之诗以及相关之诗还有5首，还请郑书《近代诗钞》的封面，但是当郑要将他的认贼作父的设想付诸实施时，陈衍再也无法与他粘粘糊糊了，他断然与一步步滑向叛国深渊的诗友一刀两断。到了1931年“9·18”事变发生，两个人已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阵营。这一年12月8日日军攻打上海，陈衍捐资慰问抗日军民，愤怒地唱道：“枪闻万卷成焦土，又说千尸积肉山。休怪老夫怀抱恶，屠苏饮过未开颜。”而郑孝胥居然在这一年10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计亚洲中有权力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真是得意忘形，在他眼中亚洲已然是日本天皇和他的儿皇帝的满洲国皇帝的天下了！1932年，陈衍在福州于山带头勒石“国魂”二字，以表抵御外侮之铁心钢胆，郑孝胥却于这一年3月9日在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监视下参加就任仪式，被“特任”为“国务院总理”。4月17日，郑在自己生日这一天写了一首七绝：“举世纷纷尽笑余，嘉名揽揆似包胥。门前谁识心如雪，抱膝初来柳下居。”申包胥是春秋时楚国的大夫，国家被吴国攻破，他到秦国求救，在秦廷痛哭七天七夜，终于使秦国发兵救楚。柳下

惠与一女子共坐一夜，不曾淫乱。郑将日寇这一狼外婆当作能发兵救楚的秦国，并自诩坐怀不乱，我们不知道此时的郑孝胥是把黑白是非都颠倒了个儿呢，还是已没有了羞耻之心，抑或是两者均有。

“达则兼济天下”的龙种种在郑孝胥的身上，却收获出这样一只非颠倒的跳蚤，给我们后人留下的只有荒谬感。同时期其他的“达”人们，他们“兼济天下”或者给我们以维新变革的照人风采，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领袖；或给我们留下洋务运动的体用思考，如张之洞、刘铭传等晚清重臣。郑孝胥显然成了儒家传统、王道思想培育出来的反面人物。和郑孝胥相比，在“穷则独善其身”为主要经历的陈衍身上，却显示出了德高独尊、深明大义的政治眼光。

陈衍和郑孝胥同是福州人，年龄相差只有4岁，同样饱读诗书，他们在诗歌上的合作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福建古典诗歌最后的遗产，却在政治上为我们演绎出截然相反的两个典型形象。这种对比，使我们不能不佩服孔老夫子“吾与点也”的政治智慧和文化的“乐感”。立志于治理大国的读书人有时真应该“悠着点儿”，如果郑孝胥没有对自己的政治才能的过份自信，没有对自己以“王道”理论设计出来的荒唐的政治“志向”的自足，没有“惘惘不甘”地追求名利，只是安心“鼓瑟”和“风”“咏”，相信他的文化成就一定会更为后人所崇敬。陈衍的诗论成就领先于“同光体”诗家们。而陈衍自始至终对政治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该表态时光明磊落地表态，该介入时理性地或间接地介入，使他在历史上成为一个“德高独尊”的人物。郑孝胥的政治才能可以算是卓越的，但却走出一条荒唐至极的历史道路。他的所谓亚洲“共管”的政治理论不仅设计出以日本天皇和满洲皇帝为权力中心的可怕的“理想国”，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日本关东军处

处监视“满洲国”的一举一动，郑孝胥明知“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傀儡，自己卖身投靠竟还不够，还曾计划让甘肃新疆等西北部乃至埃及、土耳其等国，一起并入日寇的权力范围之内！《郑孝胥日记》民国21年9月12日条载：

西山政猪、上村哲弥来。河南回部李谦，字公谨，来见言：“甘肃回部受冯玉祥之祸，死者数万人。冯后挫败，回部遂力自保守，现新疆南八城丰富安乐，人马甚强，与土耳其、波斯、阿拉伯皆为同教，颇相联络。然皆拥戴大清，拒绝民国。如今上入关，西北各部必先归附。谦明日即行，自埃及、土耳其归哈密，布告情形，先通电承认满洲国，以待机会。”（孝胥）告之曰：“今满洲国以王道仁义为国本，欲造成乐土以待举世之响应。若西北与东北联结，可速派人来学航空，先以飞机交通，一面速派学生来此留学。子至哈密可布告回疆各部，将来必于帕米尔高原建立大清国之西京，此不过十年内事耳。”以《王道要义》、《拨乱反正议》及影片赠之，李大悦而退。

郑孝胥的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蓝图，只有以陈衍的四个字来评论是最简洁而准确的：“丧心病狂”！我们今天作一想象力最为丰富的假想，如若此“大清国之西京”真的成立，也许今日的塔利班不会在巴基斯坦，而要改个地点了。上述日记中的《王道要义》、《拨乱反正议》是郑孝胥为“满洲国”所作的宣传材料，其内容我们可不必阅读，仅从早几天的“8月23日”日记中可窥见其意：

上海法文日报总理马兰士士来访，询王道立国大意；（孝胥）语之曰：“……故今日之行王道，即欲消灭种族国际之恶念而已。”

“种族”的“恶念”全部取消，整个亚洲全归日本统管，这

就是郑孝胥的“王道”。儒家的思想被郑孝胥解释到这一份上，如果让孔老夫子的在天之灵听见，他肯定不会只以一声长叹“吾与点也”了事的。



1932年5月9日陈衍带头于福州于山勒石“国魂”，以示抗日决心。

1923年9月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通过他的丈人黄乃裳（绂丞）认识陈衍，聘陈衍为文科教授。陈衍在应聘时推荐自己的学生龚乾义（惕庵）为讲师、叶长青（俊生）为助教。9月9日这一天为登高节，陈衍与叶长青、龚乾义两人在南普陀登高：

九日叶俊生龚达生两生邀余南普陀登高

归集斋头小饮叶生有诗龚生继作次韵和之

横舍高楼壮海滨，重阳风日足清新。数峯排闥如相识，
册载登台尚此身。案有和诗殊不寂，瓶余浊酒未为贫。两生
青眼高歌望，昕夕过从倍觉亲。（席间话四十年来登高之作。）

陈衍刚来厦门没几天，在这里“集斋头小饮”，透过窗户所望，景色似曾相识：窗外是“数峯排闥”，所居的高楼雄壮地矗

立于海滨之上，这种重阳节特有的秋风同样清新可人。对着两个年青的弟子，陈衍回忆了几十年来历次在异地过重阳登高赋诗思念家人时的情景，其中最难忘的有几次：

一次是1887年在台北的“大稻埕”，他给外甥丹曾写诗：《九日寄丹曾甥二首》“他乡无赖强登高，故国园林忆听涛……”“风雨朝来尚满城，海天愁思不分明……”。

另一次则是在上海制造局刘麒祥兵备的幕府中，陈衍又一次想起了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村居江上已近重阳即事兴怀辄用东坡霜风

渐欲作重阳句作起三首存一

霜风渐欲作重阳，入夜高楼月似霜。可与言愁人有几？未知独驾税何方。登高自昔怀兄弟，隔岁相逢益老苍。怪汝长空书雁字，替人咄咄两三行。

再下来就是在武昌张之洞幕中了，那是1904年，陈衍以登高的形式送李葆恂（文石），文石是前闽浙总督李子和（鹤年）的儿子，他也是陈衍的哥哥陈书和陈宝琛的侄子陈翥（芸敏）的朋友。陈衍从送别朋友再一次忆起了兄弟，他在那首诗中说自己年轻时对李葆恂有“失逢迎”，大约是陈书更多地来接待他的，俯仰之间更自“老成”，李葆恂工书、工诗，又精于金石书画。回首当年在乌石山麓的峥嵘岁月，陈衍萌动的“别后情”，苍茫感人。

武昌下来就是北京了，那是1909年，陈衍任学部主事兼京师大学堂经学讲习。这一年他与好友赵熙一起在武昌天宁寺登高：

九日同尧生天宁寺登高

赵公健游者，迢递下峨眉。随意登高去，聊纾作客悲。

废台迟落木，衰鬓短交期。只有源源醉，多为数首诗。

赵熙字尧生，四川荣县人，写诗速度惊人，下笔立就，书法工于颜体。他当谏官，极敢说话。陈衍曾有个老乡在广东部队中当官，犯了错误，其实是冤枉的，未加审讯就被定罪为“斩监候”，他的家眷向陈衍求救，陈衍就是通过赵熙为他力争讨回了一个公道的。辛亥革命后，赵熙还乡不出，常常以诗歌互相唱和，真正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人几千里地之间往来的诗歌中多为骨肉沉痛之言。

5年前（1918年）的登高节和这一年一样，陈衍都是逃避战争而离开故乡的，只是那一次不在厦门，而是在上海。那一年9月，陈曾寿（仁先）也来到上海，约同朱祖谋（古微）、王乃征（聘三、病山）等几个人一起到焦山登高并且过访陈三立（伯严），但是陈衍患疟疾无法参加：

仁先约同古微病山诸人焦山登高并视伯严疟作不与

年年不肯负重阳，今岁重阳忒可伤。避乱携家离故里，登高约伴聚他乡。明朝稳上焦山顶，后夜还过白下堂。却被罡风吹散了，疟寒疾作卧匡床。

年年都不肯辜负重阳节的陈衍，今年却辜负了朋友们的聚会，到了第二天他仍然难以忘情：

重阳后一日作

误却登高病便苏，败人佳兴过催租。诸公山水清辉里，可念衰翁为一吁。

现在陈衍身在厦门，刚从南普陀登高回到书斋中，望着窗外，海边上虽然树木甚少，但南方的许多景色还是十分相似：

楼居室前广台风景极似杭州西湖湖滨旅馆

此台绝似湖滨馆，南北高峰拥一湖。谁识此湖是沧海，绿波淡沱浪花无。

4年前的1919年，陈衍住在杭州湖滨的杏花村旅社：

三月晦日杏花村旅邸小楼

春杪夏初清若秋，袷衣穿后又披裘。雨晴不定湖无月，
拥被看山一日休。

坐倦书楼出见湖，门前一幅米家图。看书读画甘粗粝，
十足酸寒一腐儒。

诗人的回忆把几十年来重阳登高的画面连成了一片，又把厦大的楼居与曾住杭州西湖边的旅馆小楼重合了起来，一个“极似”又把这厦大的风景与西湖的风景与米芾的“米家图”联系起来。

但是，厦门海滨的风景又确有许多特有之处，比如大学座落在海边，石头多的地方不宜种树，所以诗中还有“无花无柳过花朝，乡思聊凭浊酒浇”又如南普陀的左边有一股泉水，石头甚奇，伏流断为三节。第2年（1924）春天陈衍多次在雨后游览，将它命名为“三节涧”，并写了一篇游记。又将绛桃、绿芜、紫燕、白鹭、青蛙命名为“厦岛五君”，将如紫燕：“岂有卢家旧画梁，也无门巷照斜阳。可怜燕子纷无数，水际呢喃作底忙。”又如海上的白鹭，这些景色都与内陆很不相同。厦门大学里的花匠种植的是洋花。陈衍觅得一盆红玫瑰后宠之以诗曰：

海角虽流落，天然盛小丛。一花开楚国，移句赠娇红。

1924年旧历9月11日，林纾与世长辞，陈衍作《五言四十韵哭畏庐》（见本书引言），对两人五十年的文学交往和友谊作了一个总结。林纾在散文上接近的桦湖（吴敏树）、柏枧（梅曾亮）均为桐城派作家。但是，林纾虽然推崇桐城派，却反对派别门户之见，他曾说：“凡侈言宗派，收合党徒，流极未有不衰者也。”林纾不认为自己是桐城派作家。陈衍更不喜欢拘泥于桐城派的“师法”。在这一点上陈衍与林纾既有分歧，又有共同的想法，陈

衍也不喜欢以条条框框来束缚诗文：

桐城人士多以文章负异于众，余识马君通伯（其昶），姚君叔节（永概），皆能为其乡（桐城）先生之文，而识陈君剑潭（澹然、亦桐城人），先于二君，则不守桐城师法，慕太史公、班孟坚（固）之言，其至者，权奇动宕，恣肆自喜。马、姚二君于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余亟称剑潭之文，世人疑信相半。

——《送陈剑潭南归序》

陈衍自己写文章，就不信什么“师法”，从不墨守陈规。

陈衍与林纾有一点不同之处是他强调将“朴学”与文学结合起来治之。林纾却认为这两道“已分”开，陈衍喜欢在诗文中融入哲理，林纾却认为此非“原”道。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并不影响两人长达50年的深厚友谊，他们早在年青时代就已互相稔知。陈衍作于1883年的诗作《长句一首赠林琴南》道：

林生年少负狂名，与我相逢已长大。君言识我亦良早，贫贱骄人此人那。酒酣耳热话童时，折节读书谁督课？斩蛟射虎百不忧，乡里齷齪横作逻。台江狙佞本如鲫，酒恶情怀辄骂座。世人白眼尽欲杀，每值氍毹暗相贺。我识君才已二年，讲院曾窥珠玉唾。骈文酷似洪北江，小言詹詹亦偶作。昨读我诗袖之去，旬月不还若奇货。谓将肆力古文辞，诗非所长休索和。

以“贫贱骄人”来描写林纾是十分生动的。他自幼家中清贫，却傲气十足，刻苦读书，擅长丹青，习剑练武。他血气方刚，愤世嫉俗，被称为“福州三狂人”之一。然而，福州的台江地段是个生意场，奸商市侩云集，他遭人白眼，酒酣骂座是常有的事。这些年青人“每值氍毹（犹烦恼）暗相贺”。林纾才华横溢，咳珠唾玉，骈文酷似洪亮吉（北江），最喜欢陈衍的诗歌，

常常袖去不还。

1899年林纾出版了惊世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简称《茶花女》），陈衍为他写序，并在书后题诗：

为林琴南题《巴黎茶花女遗事》后

曾论懿德回心院，西土重生加他邻。事到无聊说因果，
夫人汧国定前生。

唐高宗时，妃子武则天设计闷死亲生女婴，嫁祸于王皇后，高宗废王皇后。一次探监，高宗呼王皇后，王曰：“陛下幸念畴日，使妾死更生，复见日月，乞署此为回心院。”“加他邻”即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丽而强毅。据唐白行简《李娃传》载：李娃乃长安之娼女，与荥阳公子相爱，几经曲折，结为夫妻。荥阳生后为数郡之守，李娃遂封为汧国夫人。后因以“汧国”借指从良之美妓。陈衍以此妓女的恋爱来比较林纾所译的《茶花女》。农村姑娘玛格丽特为生活所迫来到巴黎，出卖青春和美貌，过着强颜欢笑的所谓“名妓”生活，爱上纯真青年阿尔芒后，与他隐居乡间，过上了正常女子的幸福生活。但阿尔芒的父亲出面干预，玛格丽特为了阿尔芒的前程，忍痛与他绝交，不知原委的阿尔芒对她责骂、污辱，但她不愿道出真情，最后在百般折磨和极度痛苦中悲惨地离开人世。

茶花女译作在中国的出版，像在黑暗的夜空中投入一颗闪亮的明珠，陈衍在《福建通志》的《林纾传》中说：“《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人们第一次欣赏到西方文学的瑰宝，对当时批判封闭保守思想、开启民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看出，陈衍也深深地为这部小说所感动。唐高宗和王皇后、荥阳生和李娃，这些都是中国文学中最能打动人的恋爱故事。特别是白行简的《李娃传》，写得曲折多姿、真切细腻，十分感人。陈衍在《为林琴南题〈巴黎茶花女遗事〉后》

一诗中將中西相近的題材進行比較，引起讀者許多有益的思考。

林紓的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令國人耳目一新，具有維新思想的人士與青年人爭相傳閱，但也受到封建保守的老學究們的攻擊，斥其為傷風敗俗。陳衍為之正名。林紓不懂外文，與王壽昌（字子仁，侯官人）合譯小仲馬的這部催人淚下的言情小說。1899年小說出版後，引起了轟動，特別是“打動處在金錢勢力包圍和等級觀念支配下而又有反封建要求的中國青年讀者的心弦”。^[13]然而，封建衛道士們視為洪水猛獸。陳衍這首詩卻熱情讚美瑪格麗特的善良、堅毅和柔美，甚似唐皇后與俄女皇，小說故事曲折淒美，令人肝腸寸斷，茫然若失。難免使人想起佛家的因果說，也許李娃就是瑪格麗特的前身？

林紓自幼家貧，中舉後在各地執教，並以鬻文賣畫為生。《石遺室詩話》卷3云：

琴南號畏廬，多才藝，能畫能詩，能駢體文，能長短句，能譯外國小說百十種。自謂古文辭為最，沈酣于班孟堅（固）、韓退之（愈）者三十年，所作有柏枏、梓湖之長，而世人第以小說家目之，且有深詆之者。余常為辯護……畏廬于陰柔一道，下過苦功。少時詩亦多作，近體為吳梅村（偉業），古體為張船山（問陶）、張亨甫（際亮）……高者可追文與可（同）、米元章（芾）。雜題云：“蘆蕩不可見，竹鷄亦好聽。絕憐歸路迴，溪暗一林星。”末五字真工。《為太夷作畫》二首云：“曾從留下過秦亭，無數雲松作隊青。飽飯僧寮無別事，長廊坐看少微星。”“年來酷似藍田叔，復社詩流頗見知。寫寄漢陽江上客，看山莫待晚秋時。”鄙見欲易“莫待”作“且過”。又《雜題》云：“時時昭慶寺前過，三兩梧桐蔭酒廬。我自關心南宋局，旁人只說重西湖。”末二句太直，鄙見欲易作“只道關心南宋局，我來原自愛西湖”。

用太白“自爱名山入剡中”意，较含蓄些……

中国古代正统的文人看不起小说这种体裁，目之为“稗官者流”。虽然林纾多才多艺，但当时有人仅以小说家“目之”，“且有深诋之者”，陈衍却给以充分的肯定，并且评他的文章兼有桐城派的梅曾亮和吴敏树之长。陈衍又搜录了他的诗，赞赏他的工诗之处，并对其中的字句进行推敲，这些更改可谓是画龙点睛。

陈衍和林纾是知交，两人都不愿仕进而热爱文学。陈衍集中有18首是专门送给林纾的诗，有的寄情山水、有的题示字画，特别是林纾与陈衍分别于1901年和1907年进入京师后，两人都在学堂中执教，更是来往密切，唱和频繁，以其中一首为例：

次韵答畏庐送行之作

津门昨岁怅分裾，已分长乘下泽车。世乱敢期踪跡密，情亲肯任简笺疏？买田种秫将谐价，假馆传经待卜居。（几道请余续就大学讲席。）第一老来真乐事，故人共读古人书。

“买田种秫”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假馆传经”则是他们目前共同的选择，而他们共同的“第一老来真乐事”就是共读古人之书。

然而，他们两人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1911年辛亥革命后，林纾甘当遗老。民国之后他每年都要去拜谒崇陵——光绪帝的陵寝，而且每次都有诗文，成为情真意切的“恋主”的犬马。而陈衍却非常清醒，他在《石遗室诗话》卷9中说：

自前清革命，而旧日之官僚好处不出者，顿添许多诗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其实此时局羌无故实，用典难于恰切。前清钟虞不移，庙貌如故，故宗庙宫室未为禾黍也。都城未有战事，铜驼未尝在荆棘中也。义熙之号虽改，而未有称王称帝之刘寄奴也。旧帝后未为瀛国公、谢道清也。出处去就，听人自

便，无文文山、谢叠山之事也。余今年出都，有《和秋岳》一绝句云：“未须天意怜衰草，岂望人间垂晚晴？春兴田园吾自足，义熙端不托泉明。”故今日世界，乱离为公共之戚，兴废乃一家之言。

从陈衍与林纾在对待满清皇帝的不同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两人思维方式的不同。陈衍是一位文学家兼朴学家，所以他善于对时势进行理性的思考，而林纾则纯是一位文学家，他对哲学思考不感兴趣。正如前引陈衍《五言四十韵哭畏庐》诗中所说：“我进以朴学，君谓道已分，我更以哲学，君谓非道原。”林纾受桐城派姚鼐的影响，将词章与义理和考据分别开来，所以在治词章（文学）时更多地诉诸感情，较少升华为理性思考。

在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这一问题，林纾同样有缺乏理性思考之处。他虽然在理论上说“凡侈言宗派，收合党徒，流极未有不衰者也”，但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却感情用事，堕入门户之见中去。民国之初，有魏晋文派与唐宋派之争，大抵崇魏晋者，以章太炎为师；尊唐宋者，推林纾为盟主。当时章氏之学盛行，林纾与北京大学中魏晋文派势力不合，于1913年愤而辞去大学讲席。

从此林纾在北京闭户不出，在家作画写小说。而陈衍于1916年回到福州主编《福建通志》，他们继续唱和，下面是陈衍的《畏庐寄诗题匹园新楼次韵》：

敢云隐几日看山，只拟千忙博一闲。联扁分书已坡谷，
画图传本待荆关。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循例
吾家悬榻在，何妨上冢过家还？

陈衍所建的新楼位于三坊七巷之中，面对风景秀丽的乌石山，而东坡、山谷的诗歌，荆浩、关仝的绘画，陶渊明的隐逸之趣，这些都是他们共同的最爱。陈衍希望在北京的林纾在“上冢过家”时能光临自己的寒舍，到时陈衍为他下“悬榻”，两人忙

中偷闲，谈诗论画，这是他们心中最大的乐事。

当然，目前他们虽然相隔几千里，但还是挡不住互相的唱和，下面所摘的是陈衍在福州收到林纾诗作后的评论：

畏庐近来诗境大进，在自然不假做作。《自都门寄余福州》云：“长安扇暑风，市尘翳寻丈。儿女趣园游，偶出意颇强。时彦集若蝟，聒耳故扇奖。尖状挟伦语，白日接魍魎。触之辄头痛，戢足禁交往。石遗书斗至，令我发遐想。明月照流水，夜打西湖桨。雏柳才数阴，尺苇若成荡。亭榭固非多，受月颇宏敞。脱衣去靴袜，船卧至萧爽。闭目拟蹇态，幻境出俯仰。妒绝诗人福，羁客詎堪仿？”……承接转换外殊见手腕，是以文家画家法作诗者。

——《石遗室诗话 26 卷》

从上面所引的诗中可见，当年的北京沙尘暴已开始肆虐，“寻丈”之外，遮天蔽地，而公园人满为患，游人们以鄙俚的语言互相怂恿，令林纾头痛禁足。他想起了故乡避静的小西湖，充满诗情画意，不禁嫉妒起归家小隐的陈衍来了。明月之夜，在苇荡中打桨，林纾的诗句像一幅幅特写，难怪陈衍说他是“以文家画家法”来写诗的。

第二年，林纾又从京中写信给陈衍，这一回谈的是养生之道，他劝陈衍食量不宜太大，否则不利于老年健康。陈衍答之以诗：

畏庐书来力劝省食报之以诗

平生自负沈家脾，数十年来已就衰。远道故人相切戒，屠门大嚼甚非宜。两餐牛液浓于乳，一饭鱼膾烂似糜。食愈省时身愈健，谨当如教审行之。

除了节食，陈衍还注意早睡早起，身体还算健朗。林纾却于 1924 年在京中逝世，远在福建的陈衍写下了上述那一首哭畏庐

的诗，诗的后半部分说：

……脱稿印千本，不胫走市廛。六法抚四王，砢罗版具陈。三绝真广文，通灵几桓玄。不官而不稼，岁入数千缗。如何勤室庐，区区酬辛勤。此外持左券，羌无十万缠。头衔宋既庭，自嘲一儒酸。犹复效顾怪，梁髻髻共攀。男儿女子子，小者六七人。尚费钱与布，未毕嫁与婚。中好纸笔者，枚臬闻象贤。咸此罢叹息，《大招》告精魂。它时老梅崖，喜得高澗然。

林纾多才多艺，他除了翻译小说一百多部外，还自己创作小说、传奇等，他诗、文、画俱佳，许多书“不胫”而走，大受欢迎，收入颇高。“六法”、“四王”、“砢罗版”均指书画等艺术，“三绝真广文”为郑虔的诗书画三绝。林纾一生不愿当官，始终坚持勤苦的文艺创作生涯。顾炎武被称为“顾怪”，生而双瞳子，中白边黑，见者异之。读书一目十行，性耿介，绝不与世人交。陈衍把林纾与顾相比，十分怀念这位已故的知交。赞赏他的为人和文艺成就。枚乘和枚皋父子均才思敏捷，陈衍诗的最后对他的家庭子女寄以无限的关怀。

这一年年底陈衍回到福州后，1925年开春想辞去厦大讲习，但校长林文庆坚决挽留，陈衍只好将讲义寄去请龚惕庵代讲。辞职的原因，可从这首诗中看出：

赴厦渡海作

又被驱来岂为饥，微生守信直几微。行年七十犹为客，涉月三冬始得归。骇浪折腾安若素，中阴黑暗是邪非。只赢来岁花前醉，醉到风花一片飞。

陈衍感到自己应该“归”去休息了，“行年七十犹为客”，而他请龚惕庵代讲，则是因为“微生守信”。惊涛“骇浪”和“中阴黑暗”都不是陈衍所在乎的，他为之陶醉的只有“风花”“雪

月”这种诗意的美。他在回答龚惕庵的怀念诗时也有“我虽痛饮花前酒，谁与同行行李下蹊”的句子。

1925年2月，大儿陈声暨从京都寄来家书，提出带家眷回故乡为父亲庆祝70大寿。陈衍极力劝阻，陈声暨却极力坚持，于是捆载大量的寿屏回到福州。到了4月8日这一天，虽不发请帖，却有许许多多客人前来祝寿，而家里既不演剧，也不招女乐，只有酒席款待客人。

乐极生悲的是，陈声暨庆祝完父亲的生日不久后开始生病，回到北京后病情加重。陈衍闻讯后于7月7日赶到京都时竟成永诀。陈衍万分哀伤，“老树孤根久耐凉，老天复与降繁霜”，老天爷竟将老年失子的悲哀降给了他，而更令人肠断的是“童孙五尺终何恃？待有寒闺耳顺娘”。望着幼年失怙的孙子，陈衍悲不能已。过了两年，陈衍的第七个儿子陈声讷也抱病身亡，以至他所生八个男儿全部下世，陈衍作《葬讷儿讷效行口号》，面对生死的无常，以庄子“螻蛄不识春秋”自解，仍执着于诗歌美的追求。

陈衍一生坚守在诗歌与学问这样一条荒寒之路上，并不意味着他是孤独的，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虽然内有政治剧变，外有列强侵略，战乱频仍，动荡飘泊，但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古典诗歌却是很有成就的。陈衍在《小草堂诗集叙》一文中说：

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薪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盖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词。甚且嘻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至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然皆豪杰贤知之子乃能之，而非愚不肖者所及也。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

以比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矱类也。自今日视之，则以为古处之衣冠而已。

比陈衍稍后一些的著名诗论家汪国垣也对同光时期的诗歌予以很高的评价：“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陈衍所处的虽然是动乱的年代，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此期诗歌的繁荣延续了古代中国优秀的诗歌传统。同光之际诗歌流派众多，就是因为有一批以诗歌为生命的人在“言情感事”，“嘻笑怒骂”。而陈衍是当时著名的“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之一，他走到哪里，就把诗歌的繁荣带到哪里：交结诗友，组织文酒之会，互相唱和，收集诗作，刊行评论，俨然以诗歌为己任。尤其是在武汉、北京、上海、福州等地，他居留的时间较长，所交游的诗友最多，文酒之会也最盛。自从1916年应福建省长之聘回到福州编志后，1920年闽人成立“说诗社”推他为首领，当时社员有林翰、苏南、江古怀、林葆炘、董子良、陈樵、林宗泽、陈鸣则、张葆达、陈元璋、陈炘侯、沈覲冕、吴铎等十几个人，后来又不断增加。逢人日、花朝、上巳、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必聚会饮酒赋诗。陈衍的另一兴趣就是游山临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百洞、石鼓、螺江、桑溪……在那个年代，这些游山临水、文酒之会常常在战争和动乱的间隙进行，常常在避乱异地或与故友重逢时进行。诗歌是感情的结晶，陈衍曾说：“乐之高尚者有二，曰感情、曰名誉。”而名誉又是从属于感情的，这种感情有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亲人等各种感情，陈衍的诗作内容主要是挚情的传递、故情的回味和哀情的宣泄。

以1926年为例，这一年正月，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电催开学，但陈衍归依“三径”之意甚浓，欲行又止，这时听说门人何琇先卒，悲作挽诗26韵，难免又想起去年刚下世的长子陈声暨，

痛定思痛，又作《伤暨儿》八绝句及《检暨儿书篋五首》，下面是其中的几首：

 汝羌无一首诗，极哀经岁不成词。也思和泪书长句，
 时复酸风吹断之。

 书卷抛荒簿领忙，几回欲唤汝还乡。仅赢十口粗生活，
 枉作邯鄲梦一场。

 八月由来最有凶，更从七月起罡风。西来秋色全悽黯，
 北地妻孥几告终。（余父暨长兄长嫂余妻皆卒于八月，余妻及两子皆终于北地。）

 故人怜我日招邀，寻壑经丘破寂寥。到处登临无一字，
 此心无往不萧条。

 满载佳文寿乃翁，自言为子乐无穷。可怜酬汝娱亲物，
 悽怆哀词百许通。

 这些催人泪下的诗歌刻画出陈衍的父子深情。诗写完了寄给谁呢？还是寄给散原吧：

书前诗寄散原

 诗成无可寄，聊寄散原翁。不须为洒泪，诸郎多文雄。

 自己悲伤还忘不了安慰朋友，陈三立的几个儿子都是“文雄”，长子陈衡恪是著名画家，但三年前不幸早逝，陈衍曾作诗哀之：“师曾（陈衡恪）吾小友，亲厚俨吾侄。寻常敬父执，踪迹无汝密。长安居数年，商榷几文笔。有造独戛戛，有思抽乙乙。画手无前辈，下笔风雨疾……”陈三立的另一个儿子陈寅恪则是著名的史学家。寄完了散原，陈衍又为盛开的海棠赋诗：“花光阁前双海棠，向我厚意非寻常。花时往往别汝去，爱而不见伤肝肠。去年今年行且止，看汝烂漫一月强……”接着所作的诗为《读放翁遣舟迎子通口号》：“我昔客海上，有诗比杜公。我昔客山阴，有诗比放翁。……杜公有二子，文武表所宗……放翁

有六子，五处睽行踪……我生五男儿，三者短折凶。今乃及长男，无端命考终……”

这一年3月，厦门大学校长来电催促，陈衍不得已，到厦门大学将大学的教务结束后，一个月后即回到福州。在厦门又作《只有二首》、《厦岛书所见》、《送戴密微归国并游学日本》等诗。在这些诗中，挥之不去的仍然是丧长子的悲情：

只有伤心月，羌无称意花。家居犹不乐，何况是离家。

——《只有二首》之一

满山尽是相思子，老乏风情只忆家。独坐楼前谁是伴，刺桐树与木棉花。

——《厦楼独坐》

回到福州后，陈衍将如夫人李柳和陈声暨的妻儿移住入闻雨楼东边的第四楼。望着长子遗下的孤儿寡母，陈衍仍然止不住悲伤：

绿瘦红肥奚足悲，只愁红日上高枝。老夫长夏浑无事，睡过骄阳作恶时。

——《苦热袭荆公语意成二绝句》之二

天气苦热、骄阳作恶，陈衍的心情也是恶劣的，唯有像他的两个门生陈钟凡（黼玄）和陈柱（柱尊）学有所成担任金陵大学和大夏大学的文科主任，这样的消息才能使陈衍心中感到快慰：

赠柱尊并示黼玄

远闻佳士辄心许，老见异书犹眼明。移句赠人今可再，春申浦与石头城。

“异书”指二人皆精于考据之学，“春申浦”与“石头城”分别是二人所任职的大学所在地上海和南京。接着还有一件事使陈衍十分高兴：久未通信的章太炎，这一年出版了《章太炎丛书》，陈衍忽然收到他所寄的来信和新书，回了一信：

太炎老友足下：廿年阔别，辱承先施，念我之深，感叹何极。仆于奔走国事者，不敢辄问候起居，懼嫌攀援也。窃叹区区旧学，考据、词章数千年无能兼者。歧而二之，即已误矣，卜商、荀况已属偏至，何论许、郑、杜、韩？君乡竹垞，颇识厓略。亭林浅尝，只可供梁鼎芬、林纾之仰止。足下学与年进，真善读书，见解高超，海内罕其匹……

30年前，陈衍曾向张之洞推荐章太炎的“真善读书”，但章因倡言革命而被逐。作为老朋友，陈衍对章太炎“奔走国事”“不敢辄问候起居”，但在学问上却引为同道。写这封信后六年，即1932年，章太炎在苏州与金天翻、李根源、张一麀、陈衍等人成立国学会，出版《国学论衡》，由陈衍任主编。陈衍晚年一如既往地走一条治诗与问学的荒寒之路，不仅为的是自己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也为的是“稍有裨于学子，藉赎素食罪过”，给年青人以学问上的影响。

陈衍的学生张尔田，同样是将词章与考据兼而治之的，这一年张著有《史微》和《玉溪生年谱》二书，陈衍收到他的书后回了一封信，给以鼓励，又写了一封信给学生叶长青，讨论版本学。

9月，福州又一次爆发战争。厦门的周殿薰（墨史）、黄瀚（雁汀）又请陈衍到厦门避兵。陈衍与他们两人唱和，所作的诗歌多达20首，以下是其中的几首：

差胜焯汤剪纸时，南飞众鸟得安枝。翻于宾至如归后，东道先来七字诗。

山石嵌崎似列璆，刺桐苍翠早经秋。（所居林峦在望）当门排闥遥相向，矜此劳人作卧游。

此亦羌村同谷诗，草堂未暇觅西枝。家徒壁立寻常事，忽有江虹贯月时。（逊臣携字画为张四壁）

讲席辞归正倦游，何期衰翮复凌秋。丹丘老去才弥健，怪底当年早贡瓊。

“燖汤剪纸”以杜甫为喻，安史乱中盗贼充斥，杜甫身涉艰苦，魂魄为之沮丧，故孙宰剪纸为旄以招其魂也，杜甫《彭衙行》：“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陈衍在这首诗中感谢周、黄二人为他提供避兵的场所。羌村、同谷都是安史之乱中杜甫避兵的地点。陈衍已于这一年因“倦游”辞去了厦门大学的讲席，但是战乱使他“衰翮复凌秋”，不得安宁。1926年冬天，北洋军阀所属张毅部，在溃逃途中，对福州南港附近90余乡进行焚掠，虽然最后被国民革命军与闽系海军配合所歼灭，但百姓流离颠沛，苦不堪言。陈衍勉力寄钱赈救兵灾。

作为海岛的厦门，是避兵的好地方，黄瀚等人请陈衍游览云顶岩和禾山等名胜：

雁汀招同墨史文典登云顶岩

百怪千奇石刺天，九溪十涧恍鸣泉。（初入山极似杭州十八洞。）平桥忽向芦碕转，仄磴刚容竹轿旋。拔地众峰都俯伏，有亭绝顶尚高悬。一层更上观云海，始信岩名不浪传。

雁汀招游禾山杂诗五首

古戍周遭尽刺桐，临江乱石稍提龕。雨花台下骑驴路，犇确山坡约略同。（过湖里山炮台）

水抱山廻又一邨，峯明树暗向朝暎。几多白石红砖屋，尽是黄皇老子孙。（村尽黄姓，有黄帝庙）

四人从我上丘陵，独坐肩舆愧不胜。纵有十年差长处，山灵笑我太无能。

塞门土合石为陂，闻说终年饮料支。我爱诸山纯浸水，分明杜老漾陂诗。（观自来水池）

古人宾礼殊繁缛，燕飧还将卷俎僮。莫道今人不相及，

叨君鼎肉再而三。(雁汀既饷鼎肉，复两次享之)

刺桐原产印度、南洋一带，后福建广东等地渐多，苏轼《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诗中有：“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杜甫曾随岑参游溪陂，作《溪陂行》和《溪陂西南台》句有“沉竿续蔓深莫测，菱叶荷花净如拭”，“高台面苍陂，六月风日冷。蒹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此时陈衍还为周殿薰作《题王阮亭明湖秋楔图》，以下是其中的第三首：

朝衫戴笠旧风神，原是销魂绝代身。绿鬓朱颜我能识，
手持麈尾第三人。

在“明湖秋楔图”中，陈衍一眼就认出王士禛是第三个人，绿鬓朱颜，手持麈尾（一种驱虫、拂尘的工具）。

1926年这一年，陈衍在避乱之中却给我们留下约60首诗歌和15篇散文。正像杜甫在羌村、同谷躲战乱时一样，诗思甚多。陈衍一生旅食四方，不论走到哪里，不仅自己勤作诗文，而且总是成为该地诗人们的盟主。他或是领衔诗社，或是组织文酒之会，或是搜集众人唱和之作，品评出版。这一次在厦门，他共收录和评点了周殿薰、黄瀚等几十位诗人的作品数百首诗歌（含陈衍本人唱和之作）辑入《石遗室诗话》卷29至卷30。所以章太炎的女婿朱镜宙在诗中称道：“吾爱陈夫子，诗盟主建安。”南安苏鸿图（鼓浪屿学校教授）也在诗中赞道：“骚坛品藻析毫厘，海内争传一字师。（当代陈弢庵、赵尧生、俞恪士、梁任公、罗挾东诸公，有作每就商定。）我闻其名久倾葵，今秋始幸得见之。”从这一点上说，陈衍所走的这一条诗歌与学问的荒寒之路又是温暖的。诗歌往往是贵族的，它在文人雅士间的评品和推挹、在山水花树间的游历和吟唱，使中国这一“诗的国度”的传统得以延续。

第四节 “芙蓉红白晓来天，此景依稀卅载前”

1927年初，陈衍从厦门回到福州，因患老年皮肤骚痒，服药无效，故隔日泡温泉疗之。七旬之人，又特别怕热，有《畏日》诗曰：“老来岁月曾余几？伏里光阴总太长。捱过桐桨复薇紫，拒霜霜白傲霜黄。”陈衍渐入老境，更喜赏花饮酒，几年后自言成为“花狂”。

老来别无他好，只喜花前饮酒。一昨庭花盛开，春寒特甚，得《狂诗》一首云：“好花白白与红红，共尽花前酒几钟。十日东风虽似虎，八旬老子尚犹龙。加餐不畏鲋多骨，冒雨常欣瀑万重。便有贡谗谈宿世，鳞虫三百长为侬。”余食鱼不畏骨，游山常遇大雨，遂有疑前身为龙者。^[14]

拒霜又称木芙蓉，陈衍又说：“余于秋花，最喜木芙蓉。少日有句云：芙蓉红白天初晓”。其实，陈衍并非“老来别无他好，只喜花前饮酒”，而是一辈子喜欢赏花、种木、游览山水，天生一个美的使者、一个大自然的宠儿。这一年3月，陈衍“移种第三楼前松树植第四楼前，竟活，并买木芙蓉一树栽之”。陈衍又说：

余生平最爱竹，视王子猷殆有过无不及，尝作《竹赞》刻集中，颇尽竹之好处，子猷所未有也。非不爱松，以种松不如种竹之易活易长易生子孙。故无往不种，无种不活，虽旧都之寒亦活，皆有诗志之。为人书对，必自集句。如“种树似培佳子弟，看竹何须问主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种千亩竹，封千户侯”。尤属书不一书……独喜一对云：“万

年老竹，化为与可；大地春水，尽是天随”。亦屡书之。^[15]



陈衍曾孙陈动先生珍藏的陈衍所藏扇面画。



陈衍曾孙陈动先生珍藏的陈衍所藏扇面画。

种松不易活，此番竟活之，陈衍不能不喜出望外。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陈衍喜欢花木归根结底是喜欢诗歌、喜欢美。上引“与可”即苏轼《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中的文与

可，关于文与可的竹画，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介绍说：“善画墨竹，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者也。复爱于素屏高壁，状枯槎老桧，风旨简重，识者所多。”^[16]苏轼的那篇散文，就是“胸有成竹”成语的出处，是苏子的文艺创作思想之一。陈衍的喜欢花木不是才子佳人的花前月下，而是一种文艺的哲思，美的追求。上引对联巧妙地将“与可”“天随”等人名辑入句中，语意双关，确是一副充满语言美的工对。

这一年，又有一件悲哀之事打击着陈衍老迈的心情，他的七儿陈声讷竟然因病而亡，陈衍的悲诗道：

我生零落尽山丘，而我碌碌始白头。狗马何曾成《史记》，螭蛄原不识春秋。流金烁石炎天过，苦雨凄风霎地收。见惯世间颠倒事，老夫诗笔益清道。

登垅看埋五十儿，衰翁脚力尚支持。须知强健非佳事，敌此玄黄反覆奇。

此路他年我必由，一棺扛入万松楸。魂兮若有归来日，西望佳城倚北楼。

卜兆多年文笔山，敢言笔力压瀛寰。孙曹若得分毫末，事业功名付等闲。

陵谷何时不变迁，吾楼未必尚依然。吾楼虽毁吾诗在，也要流传数百年。

送死完全要养生，两端无憾足兢兢。是谁教汝多男子，父职无亏恐未能。

亡人视我较多男，平日嵇康七不堪。莫道索逋都已了，中丁黄口一肩担。

这是陈衍的第几次为儿子送行了？他一共生了8个男孩，长大成人的有4个，却一个接一个地先他而离世，谁能不肝肠寸断？然而陈衍是一位哲人，他说，狗马动物不懂得写《史记》，

只有人类才有文化，庄子说“蝼蛄不识春秋”，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能够“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所以陈衍并不像俗人那样悲伤欲绝，痛不欲生，而是“见惯世间颠倒事，老夫诗笔益清遒”，只有诗人才能诗意地安居。天地“玄黄”竟有白发送黑发的“奇”事，然而陈衍对生与死有哲学的思考；不论是“苦雨凄风”还是“流金灿石”，他都能坚强地“支持”下来，因为他坚信自己一生诗的事业——“敢言笔力压瀛寰”，“吾楼虽毁吾诗在，也要流传数百年”。作为老人家，他交代“孙曹”辈：“事业功名付等闲”。“送死”和“养生”是“瀛寰”间的规律，“陵谷”是一定要“变迁”的，但是“吾楼虽毁吾诗在”，我陈衍虽然“父职”有“亏”，但想起嵇康的“七不堪”，也就稍作释然。嵇康由于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以“七不堪”来抨击当时虚伪的礼法和趋炎附势之士，为司马昭所杀。福州人至今仍骂短命儿为“讨债团”（“索逋”），最后一个儿子走了，但一家十几口的生计，还都担在一个七旬老汉的身上，陈衍的悲伤又是无止境的，虽然他是个倜傥的“嵇康”。

于是孙子光度、光衡们都由陈衍自己来教课了，孙儿们的聪颖勤读和知书达礼都令他感到宽慰。这一年9月福建省建设厅拆毁福州西郊古城墙，发掘一批古墓中的瓷器文物，陈衍考证此墓为唐人墓，于是叶俊生和黄曾樾请陈衍为之作“记”一篇。城墙拆掉后，原在城外的豹头山宿猿洞可平步而至。这一天，陈衍带着16岁和8岁的孙儿光度、光衡游览了宿猿洞：

稻孙楼古已无存，别有桐孙与稻孙。能上丘陵从长者，指看鸡舅十余根。

古代楼宇已经不存，然而新生的一代已然成长，这是生活中的哲学。陈衍自己坚守在荒寒的诗歌与学问之路上，追求诗意的栖居，最美好的希望是此路后继有人，而“说诗社”正是薪火

相传的希望。这一天又逢重阳佳节，社员们集于酒楼，陈衍即兴赋诗《九日集酒楼时余以病痒戒酒》，最后两句为“佳节总须求酩酊，强携啤酒注深杯”。陈衍因病不能喝酒，姑且以啤酒代之，然而这时又见花开，人面桃花，又一次想起了萧夫人：

芙蓉盛开

芙蓉红白晓来天，此景依稀卅载前。若问芙蓉如面者，再生已复廿余年。

老人是最恋旧的，何况陈衍对发妻的深情云天可证，正如他在《宋诗精华录》中对陆游《沈园二首》的辑评一样：“无此绝等伤心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掐指一算萧夫人离陈衍而去已逾二十年，但陈衍对她的爱却如经年老酒，逾久更浓，情何以堪！如前所述，陈衍说过“乐之高尚者”为“感情”，这一年陈衍还有一首小诗是记写对日本友人的感情的：

招西泽总领事饮索诗为纪念领事将介余游

日本并述台湾总督招余往游也

倾盖已如故，佛言有缘者。未成东海游，先此共杯斝。

陈衍一生交友甚广，友情至笃，但他讲朋友之情与利无涉，乃是以诗会友，以文会友。这一年，他的散文有《章甫陈先生墓志铭》、《故奉政大夫献廷陈君墓志铭》、《万母危宜人墓志铭》、《再与斟玄书》、《沈甥继室祝夫人诔》等篇章，诗歌共有 20 余首，除个别篇目外均已编入诗文集。从 1928 年起，他的诗文已不存。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石遗室诗集》及《续集》，《石遗室文集》均刊于 1928 年，此后的诗文未曾刊行，“遗稿尽被公门人叶长青取去，长青既逝，遗稿散失”。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我们只能透过陈衍门生王真女士所撰的《年谱》窥见这些未刊诗文的

部分题目，其中1928年至1937年的诗歌题目有210多首，散文题目有10多篇，这些诗文大部分今人已无法看到，除了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可看到少量篇目以及从《年谱》中还可看到部分小诗及诗文的摘句和摘段外，其大部分已成为佚篇。

1929年元旦，天气晴朗，陈衍诗句中有“瞳瞳晓日今何如，不然洞房重闼暗乌乌”，这是为了辩解家中人们对陈衍的埋怨。他喜欢在房前屋后种上许多花草竹木，致使走路泥滑，特别是雨天，步履艰难，但陈衍以花木为挚友，只好委屈家人们，而他在诗中的说解似乎又是雄辩的。

除了爱好花木，陈衍一生爱好游览。他家面山而居，随时可登山游览或坐闻雨楼观乌山。游览当然是文人雅士结伴而出，游必有诗，或辅以记游散文。1928年，陈衍应门人刘衡邀请游览螺洲。第二年游西湖和豹屏山。1930年则游门人叶松坡的“松坡草堂”，陈衍为草堂题对联为“但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使居良田广池背山临流。”

参考文献和引文出处：

[1] 顾学颀校点：《白居易集》第341页，中华书局，1999年11月。

[2] 同[1]，第942页。

[3] 刘建萍：《诗人何振岱评传》第26页，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2月。

[4] 转引自陈庆元：《诗词研究论集》第335页，巴蜀书社，1998年9月。

[5] 同[4]。

[6] 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第8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7] 同[6]。

[8] 同 [6], 第 406 页。

[9] 同 [3], 第 96 页。

[10] 同 [3], 第 96~97 页。

[11] 同 [3], 第 103 页。

[12] 萧瑞峰、彭万隆:《刘禹锡、白居易诗选评》第 16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13] 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第 13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7 月。

[14] 同 [6], 第 674 页。

[15] 同 [14], 第 655 页。

[16] 方智范等:《新编大学语文指要》第 180 页。

第七章 苏州晚岁

(1931~1937)

第一节 “诗人垂老到扬州，禅榻茶烟两鬓愁”

1931年3月14日樊增祥逝世，陈衍挽以七律一首，前面4句是“二品官阶屋一廛，诗为茶饭万余篇。红裙不醉词偏艳，白发无私耄尚玄。”樊增祥别署樊山，官居二品，1900年曾参与慈禧太后的国家机要事务，担任过陕西按察使、浙江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等职。张之洞、李慈铭是他的老师，他又在张之洞、荣禄的幕府待过，一起筹划过不少要事，与端方等人关系密切。他一生以诗歌为“茶饭”，写诗多达3万多首，常与陈衍互相唱和。“红裙不醉词偏艳”说的是他爱写艳体诗，陈衍说他想编一本樊的艳体诗集：“拟于往来赠答诸作外，专选艳体诗，使后人见之，

疑为若何翩翩年少，岂知其清癯一叟，旁无姬侍，且素不作狎邪游者耶！”诗歌光华富丽的樊增祥，连肤发也不与人同，他年近古稀而须发却不发白。

陈衍的《石遗室诗话》中对樊增祥的评论多达十几处。如卷一说“樊山诗才华富有，欢娱能工，不为愁苦之易好”。又如卷四中把樊的诗与王乃征（字病山）相比，认为“王苍秀而樊潇洒。譬诸泉上两亭，王喷玉而樊涌金矣”。再如卷九说：“去年过沪，读樊山《与苏戡冬雨剧谈》之作，瘦淡似苏戡，不类平日之富丽，叹才人能事不可测，往往效他人也。”

陈衍论樊山之诗有几个特点，一是善于次韵和叠韵：

次韵叠韵之诗，一盛于元、白，再盛于皮、陆，三盛于苏、黄，四盛于乾嘉间王兰泉……近如貂字韵雪诗，十刹海樊山韵，竹勿韵，皆叠次不已，亦一时之盛也。

我们翻开樊的诗集，到处可见叠韵之诗，最多可在“四十叠”以上的。

陈衍评樊山诗的另一特点是他的诗特别工整：

近来诗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奥衍，学诗者不此则彼矣。若樊山之工整，祈向者百不一二……

以对仗为例，樊增祥的诗工对特别多，例如“略取蜀姜生辣意，定须越纸熟槌功”，“幸有小男胜元白，宁期老境似查朱”。查是查慎行，朱是朱彝尊。又如“冠样小堪方子夏，才名大不若壬秋”，“壬秋”是王闿运。

陈衍和樊增祥互相之间多有唱和评论，陈衍评樊增祥的如：

樊山有《苏门集》一卷，实游记日记也，诗数十处并载其中。刻成，先印红样本示余，请题诗。余谓剑南（陆游）、石湖（范成大）游览诗不入《入蜀记》、《骖鸾录》、《吴船录》，金王寂《辽东行部记》、元长春真人《西游记》，乃与

诗并载。因书三绝句于卷端云：“《入蜀》《骖鸾》揽胜来，羌无诗句漫猜疑。《辽东行部》《西游记》，此例金元北派开”。

樊增祥评论陈衍的诗句如：

石遗爱淡交，不数数相见。十日前谓余，景光老可恋。耆旧此数翁，栖心在琴砚。月当一再会，互出新诗看。清言美于酒，旧书熟于饭。人生贵意适，呕心非所愿。^[1]

当时在京师诗钟、结社等诗歌创作活动十分繁盛。陈衍给樊增祥的诗歌以很高的评价：

今年中秋前一夕雨，中秋日小雨，雨止犹阴，其夜忽大晴，坐月南窗下，四更方寝，欲得一诗不成。次日樊山见过，携示《中秋喜晴》一律云：“南山莫复詠朝隲，离合阴晴理不齐。隔宿广寒施膏沐，今宵世界入玻璃。经年大隐依金马，满院秋香扇木犀。说饼移花儿女事，老人拈取作诗题。”《通考》曰：“中秋为移花日”，是雨后次夜得月诗，三四真所谓如祖腹中语者矣……余夙谓樊山今日之白乐天，观此数诗，爱月亦复喜雨，真白傅性情矣。

——《石遗室诗话》卷19

“隲”是虹。“金马”为汉代宫门“金马门”。陈衍在这里把樊增祥比为白居易，对他推崇备至。

文学流派的形成原因是创作风格和艺术旨趣的趋同，在我国近代史上樊增祥等人所代表的“唐宋派”与陈衍等人的“同光派”有许多不同，例如在语言上前者贵清切，自然不满于艰深奥衍，后者偏僻涩、幽峭，却“恶熟悉俗”。但是文学流派又只是相对的，同一流派内的不同作者往往有异，而分别属于不同流派的作者之间又多有相同。陈衍的诗歌观点与樊增祥便有不少相同之处：

一是他们都主张转益多师。例如樊增祥承其师李慈铭的“八面受敌”之主张，喜欢博采众长；而陈衍说“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他反对“诗必盛唐”说，将学习的范围扩大到“三元”，且将眼光再延伸至前之风雅后之近人。樊增祥也提倡少陵所谓“转益多师是汝师”。^[2]

二是他们都强调诗歌创作的个性化特点。陈衍说：“诗者，一人之私言，喜怒哀乐，他人能代吾言之，与吾能代他人言之，皆非诗也，酬应之作也。”樊增祥则曰：“能言人所不能言，如山出灵无不宣，能圆人所不能圆，如月三五悬中天。”

三是都善于用典。陈衍在《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中评樊增祥：“工于隶事，巧于裁对，见人用眼前习见故实，则曰：‘此乳臭小儿耳’。”陈衍同样认为学问和典故是诗的重要组成。

这一年9月陈衍应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唐文治的聘请，任该校讲师。唐文治是陈衍乡试时的同年，两人在沈曾植处互相认识后，成为亲密的白首朋友。陈衍到苏州后在门生叶长青等人的陪同下游览名胜古迹，曾为一个亭子拟就一副对联为：“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不久后，陈衍在胭脂桥下的茅家弄买了一处房子，12月22日迁入这座被他命名为“聿来堂”的新居。所谓“聿来”，取自《诗经·大雅·緜》“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姜女”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的妃子姜氏，“胥宇”是察看房屋的意思。陈衍的这一新居，是与他的继室李柳一起入住的，陈衍于1919年8月纳娶李柳，字小杨，保定人。陈衍说她“幼习于梨园，能歌唱，尤擅京调梆子腔……每遇余怀沉郁，辄引吭高歌，颇足迴肠荡气”。

这一年底，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于9月18日占领沈阳后，不到一周时间，辽吉两省的千里江山均沦陷于日军。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向上海闸北发动进攻，国

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驻在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兼该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在未接到抵抗命令的情况下自动奋起抗战。他们屡败日军，毙敌万名，迫使敌人三易统帅。但是，国民党政府惊慌逃跑，坚持不抵抗政策，致使闸北被日军占领，日寇大肆焚掠。陈衍义愤填膺，《除夕感事》有“枪闻万卷成焦土，又说千尸积肉山。休怪老夫怀抱恶，屠苏饮过未开颜”等句。1932年，陈衍有《人日思家怀人》、《用高达夫寄杜工部韵偶感》诸诗，均为感时之作。2月，他挈妇幼避兵无锡，不久后又回到福州。4月，他以庆祝生日的筵席费慰劳第十九路军，并赈某地水灾。

7月底，陈衍决定作华山之游，他一生好作山水之游，不畏艰险和劳累是他的性格。他的人生与华山一样峭拔挺立，曾对门人王真说：“华山未游，我死不瞑目。”自从去年底听说潼关铁路已修成通车，他就决定游陕西。这一年，陈衍已77岁高龄，他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乐事，游迹遍及全国，不知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悬崖峭壁，28岁时在上海落水几近淹毙。他55岁时所唱的那首诗中的四句话是他的写照：“春中草未青，步履向效垌。诗有萌芽意，人多磊诃形。”不避风险，刚直磊诃，游不停步，诗不停笔，这就是他的一生。

8月1日下午，陈衍带着王真和张宗杨从苏州出发，数次换车，跋涉二天，从有“天堂”之称的繁华江南，来到人烟稀少的黄土高原，从潼关望着滚滚黄河边上的蜿蜒山势，陈衍乘舆登上了华山的青柯坪。诗人饱览华山风光后，下山作长安之游，华清池、骊山、灞桥、雁塔……一系列的景点孕育出一首又一首的《西游杂诗》。陈衍觉得汽车不够浪漫，“若于风雪中骑驴行此地，安得无好诗”；但现实却是汽车，而且汽车竟然在归途中翻车，陈衍和张宗杨都受了伤。这一趟行程风尘仆仆，历时15天才回

到苏州。

这一年重阳节，陈衍邀请陈钟凡、陈柱、曾克崙、龙榆生、王真等到自己家中饮酒赋诗，接着又往天平山观红叶。一起和诗作文的还有费树蔚、李根源、沈觐安等十几人。其中有一位陈子奋，是著名的画家和篆刻家，陈衍为他作《印存小序》，文中写道：“陈意芑子奋精金石之学，擅丹青，尤工治印，画则人物、山水、花鸟皆迫近老莲，篆刻则融冶皖、浙二派于一炉，而追摹秦汉，瘁心力以赴之，故其笔力苍劲深厚。”“老莲”指明代画家陈洪绶。

1933年夏天，陈衍从苏州回到福州，生了一次病。秋天，闽北又一次爆发战事：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镇压以十九路军领导人等为首成立的“福建政府”。榕城许多人纷纷逃离避兵，陈衍也返回到苏州，这一次是全家十几口一起到苏州来。陈衍作《无子诗》句中有“无子悲伤第二层，耄年事事孰担承”。1934年，陈衍的门人陈鸣则贫病忧郁而死，陈衍以一首五古哭之，他想起了年前自己的另一个门人林步瀛同样是贫病而死，诗句中有“烟门一东野，吾乃有二焉”。他又想起了元和时的著名诗人孟郊。陈衍喜欢元和诗人，是因为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动乱，中经“鼎革”，战争不断，民生穷困。这与元和时代十分相像。文学无不烙下时代的印记，孟郊，自幼经历安史之乱，八年浩劫，战祸连年，宦官专权，朝政昏暗，社会凋敝，民生苦难。而孟郊自己则屡试不第，流寓冻饿，穷困潦倒。这是孟诗“寒”“奇”的原因。陈衍则称赞孟诗“迥绝千古”，正是同病相怜，深有理解。“同光体”诗歌清苍幽峭、生涩奥衍，就是因为其作者或“惘惘不甘”，或中丁患难，所以均喜欢元和、元祐之诗。

这一年夏天，陈衍从苏州回福州，临行前曹经沅以七律送

行，陈衍次韵答和，中有“里社渐稀文酒侣”的诗句。陈衍想起了说诗社，抚今追昔，他20多年前领衔建社，社中人少而壮，壮而老，现在又有许多人散到四方。近年来陈衍卜居苏州，这里却是江海之交，四方所辐辏，由于陈衍一向“乐道人善之心”，所以不论认识与否，许多人都把诗歌送到他的案头，竟然堆积如山，于是大家又劝陈衍编写《石遗室诗话》的续篇，79岁高龄的陈衍又在聿来堂撰成了《石遗室诗话续编》六卷。

1935年4月8日是陈衍的80大寿的日子。年初在福州时，说诗社同人宴于匹园，预祝寿辰。2月回苏州后，因陈衍谢绝礼物，门生们于是以捐资续刻石遗室丛书的方式祝寿。陈衍的著作至此已多达40余种1000余卷，所以大家在“征启”中说他“谈经夺席，岳岳多折角之徒；脱稿杀青，沉沉有颀颐之羨”，这是一副写实的对联，而唐文治所撰《石遗室丛书总序》中说：

先生之寿，日月不刊，宜表扬其平生所著之书，发挥其盛德与其高行，传诸无穷。俾清刚劲直之气，扶輿充沛，庶几世道人心，如狂澜之有砥柱，而不致湔沫……先生著作等身，经史子集，百家九流，靡不六通四闢……

这一天来祝寿的有章炳麟、李宣龚、冒广生、钱钟书等一百多人。章太炎的寿联已于本书开首录出，从道德文章两个方面来评价陈衍，且以仲弓、伯玉相比，评价是很高的。作为寿联，难免有恭维的成分在内，陈衍纵然有“扶衰汉”、“启盛唐”之心，客观上也难有回天之力，更何况陈衍位卑身隐并非政治人物。但是，陈衍在政治上明辨是非，从道德上看，为人清刚磊诃，钱基博先生誉其“为人俊迈倜傥而不可以方物”。在治诗上，章太炎用一个“清”字道出了他的特点：诗文的“清”来自于为人的“清刚”。唐文治先生评他的诗为：“清劲真适，风骨高骞，且时时发明哲理，尤可贵者，苍老之色，高亢之音，激铜琶铁板之

调，发青松明月之怀……盖先生生平最喜东坡，间近昌黎，晚年多近香山，要之奄有众美，不专一家。”

过完 80 大寿，陈衍并没有衰飒之意，而应番禺陈融之邀，游览罗浮，5 月末动身，6 月 2 日到广州后，因大雨改为先游桂林。一路上诗歌伴着山水行，陈衍的诗句有“路人迂江千万峰，峰峰离立挺尖峰”“桂林荔浦还阳朔，未识如何间气钟”。陈衍在门生陆更存（字玄同）等人的陪同下谒柳州祠，游独秀峰、七星岩、风洞山、罗浮、从化、兜峡山瀑布诸胜。此行陈衍电招容县门人陆更存来粤作游桂向导，并以苍劲圆润的书法录 1903 年所作《扬州杂诗七首（之一）》赠与玄同，这一绝句最能体现陈衍此行的心情：

诗人垂老到扬州，禅榻茶烟两鬓愁。犹及花时看芍药，
平山堂下一句留。

陈衍一生好山水游，足迹遍及祖国南南北北，但岭南未游，是一遗憾。南朝梁殷芸《小说·上扬州》：“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货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后以“到扬州”为难以实现的愿望之典故。除了游岭南，陈衍还有一个愿望是游峨嵋，于是决定于 1936 年 4 月 8 日生日的前一日入蜀。《怀拔可》诗句有“蜀山绝似奇文字，欣赏谁同仔细求”，因拔可也同时作蜀游。《过酆都》诗句有：“江天寂寂多云雾，试把少微星细看。”把四川多雾的天气写得维妙维肖：雾里看山，只得大略。一路上少陵遗迹目不暇接，然而杜工部草堂居然成为驻军之地，陈衍讽之曰：“浣花溪接百花潭，草堂寺中有诗龕。诗龕之前何所有？纵横健儿卧僵蚕。”四川除杜少陵遗迹外还有陈衍最喜欢的苏轼故里。景点之多，令陈衍饱览之余得诗数十首。此行最令人心动的是与赵熙相见的场面，二老情同手足，却相隔万里，赵

詩人老老到揚家
祥榻茶煙兩養慈
及花昔者寫藥平
以生下一句留字

壬午同社人正書
乙亥夏日八十書行

熙有诗句曰“我自入山无出理，断难相见只相思”，于是相见时两人相抱而哭。他们间的友谊可从赵熙的诗中窥见一斑：

惜别纪感

瘁心不能读，我亦梦三官（陈衍居三官堂）。健甚长年诀，贫来远道难。感将子由待，谁寄太夷看？从此仙峰寺，消魂到盖棺。

别后十日到家绝句

乌尤今已隔天涯，遥忆吴航正到家。惘惘入门无语坐，绿阴庭院紫薇花。

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光绪进士，官江西道监察御史，以抗直敢言著称。工诗、书、画、词。陈衍曾于1912年为他的《赵尧生诗稿》作序，以志雅素：

尧生豪于诗者也。观其诗，疑若鎚凿甚力，而为之则甚乐而易……清奇浓淡，无不备也。独深嗜余诗，刊本数百首，能背诵其大半……尧生好游，足迹所至，泰岱、嵩高、伊阙，以及吴越平远秀丽之区。然其游峨嵋最久，居京师思之不已。宜其所为诗，载蜀山蜀江之青碧而出也……

赵熙的诗歌，和蜀山蜀江一样青碧永存，而陈、赵二老的友谊同样如诗中所言“消魂到盖棺”，超越了生死的界限，与蜀山蜀江一样青碧永存。

第二节 “一幅林山收晚景，数家茶肆息劳生”

1937年2月，陈衍第二次为说诗社撰写诗录序，这篇序文就编辑《说诗社诗录》说了三个观点：一是诗歌的发展应随着历

史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变化，说诗社的发展同样必须如此。二是将说诗社同人创作成功的原因以两个字概括：“雅”和“驯”。所谓“雅”，即非“习见之语”，也就是要有艺术的个性化。所谓“驯”，即不能“强凑字句，难以索解”，这就要求“功夫在诗外”。三是诗录选诗的原则是“宁为狂简，毋为乡原，上焉者足张吾军，次焉者不失为特立独行之士可矣”。

6月29日，陈衍回到福州后冒着盛暑，伏案不停地为说诗社勘定诗篇。7月4日门人龚达青请陈衍喝酒，他还是像往常一样食量甚好。7月7日晚王真拜访陈衍，侍坐在匹园竹林下，陈衍侃侃谈诗，认为女子应读韩诗，并谈到鬼神及人死后灵魂的有无等玄理，王真闻所未闻。7月8日早陈衍如例见客，到中午疝气大作，请医生注射后自觉甚适，谁知到傍晚则眼睛发直，口不说话，到9点慢慢合上双眼，与世长辞。

8月8日，陈衍被安葬在西门外文笔山他自己选定的墓地里，与萧夫人一起傍着闽江之水长卧于青山的怀抱之中，那山上沙沙的松涛声和江中滔滔的流水声一样，轻轻地、永不停息地为后人吟诵着他的诗歌和文章。陈衍生前曾对他的女学生、《年谱》的撰写者之一王真说：“他日挽我以‘一幅林山收晚景，数家茶肆息劳生’之句，最为恰当。”这是一首作于1906年的诗中的颌联：

苏勤至武昌同登黄鹤矶怀白楼有作次韵

逼人岁事渐峥嵘，来听江流断岸声。一幅林山收晚景，数家茶肆息劳生。更堪轮铁辘辘去，且看风帆叶叶行。唤起沙鸥话前梦，荒龕颓榭几微醒。

一年到头的时序更相交替，逼人的峥嵘岁月如长江之水而逝，夕阳西下，江流之声拍打着断岸，林山正准备收起它那幅美丽的图画，几家茶肆渐息劳生。伴着江面上的片片风帆，铁路线

上的火车轮子辘辘滚过，使那河滩上的江鸥难以歇息，它们在荒
龠颓榭的边上似醉似醒地做起了前生的旧梦。

陈衍以这样一首诗来祭奠他自己，正像老舍的《茶馆》中那
三位世纪末的老人一样为自己送行。他的一生坚守在一条荒寒的
诗歌与学问的道路上，刮垢磨光，焚膏油以继晷，口不绝吟于六
艺之文，手不停披于诗歌之编。说他“名满天下”，那只是暂时
的，但是，他的诗歌与诗论一定能永垂诗史，他自信自己的诗可
以流传几百年，显然是一种谦虚；说他“士林争附”，也只在一
定的范围内，因为他的诗歌是贵族的（精神上的贵族）。但是，
那些愿意传诵他的诗歌及学问的后人们，将会对他的荒寒的坚守
心存敬畏。作为跨世纪的诗人和学者，陈衍的价值将是永恒的。

注释：

[1] 涂晓马、陈宇俊校点：《樊樊山诗集》第 2100 页，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4 年 4 月。

[2] 同 [1]，第 8 页。

第八章 诗歌与散文创作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他经史子集无不淹该，在文学上的成就首先是诗论，而对于他的诗歌与散文创作，人们较少提及。但是，作为“同光体”的领袖人物，陈衍富于个性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具有相当的成就，与他的诗文理论一样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传承。陈衍的诗文虽以文言为表达工具，但显示出其特定时期文学演化的轨迹。分析和研究这样一种传承和轨迹，对我们思考近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是有益的。

第一节 “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清启盛唐”

陈衍 1905 年刻成《石遗室诗集》一至三卷及《石遗室诗集补遗》一卷，1921 年刻成《石遗室诗集》四至十卷，1927 年刻成《石遗室诗续集》一至二卷和《石遗室文集》四集，至此，陈

衍的诗文集已基本上刻成。他的诗文充满生活气息，将文学性与哲理性融于一炉，章太炎在送给他 80 岁诞辰的寿联中说他“伯玉（陈子昂）诗清启盛唐”。^[1]而陈三立在诗中誉他为“说子渊渊无尽藏”、“上薄风骚气独苍”。^[2]唐文治评“其诗文若鸣凤之翱翔”、“俾清刚劲直之气”^[3]。钱钟书则尊重他的“志行学问”和“知人论世”^[4]。当然，作为“同光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诗歌上的成就难免受到“南社”成员等激进人士的诟病，而与其同乡严复、林纾相比，他在文学上的名声也稍逊一筹。但是，文学与政治异途，纯以“保守”与“激进”作评，往往过于简单化，而如果将名声大者喻为如雷贯耳，那么和风细雨式的批评和创作同样是文坛上的佳音。在经历了那些疾风暴雨式的运动的洗礼之后，人们能坐下来，冷静地阅读和评析像陈衍这样的“稳健”一派的诗评和离政治更远些的诗文创作，对于文坛的梳理和文学的研究应是很有意义的。

陈衍所处的时代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着古老的中华大地，这是一个过渡和转折的时代。陈衍虽然于 1882 年 27 岁时中举，属于旧式文人，但他并非感受不到时代跳动的脉搏，他自幼“雅不喜治举业”，对传统的科举制度表示不满，对新式的学堂和大学却情有独钟，在中国第一批大学教坛上耕耘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求是》杂志的《序》言中“痛言中西交涉以来，种种受亏，率坐暗于外情”，所以在该杂志中主张中国设洋文报馆，作为国家对外喉舌，延聘贯通中外时务之人，举所谓财务、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呼吁并亲自“多译格致实学以及法律规则之书”、“每册皆有论谈，风行一时”，捐资助刊预购者麇至。陈衍虽然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但他对西学并不一味迂腐排斥，相反，他通过与日本学者合作等方式翻译西方经济、金融和

法律著作多达九部。他撰写过《戊戌变法榷议》、《伦理讲义》和《货币论》等政治经济专著。陈衍对自己的同乡严复、林纾等人所翻译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的作品十分推崇。对于翻译过《天演论》等惊世之作的严复，他的评价是“夫子雄才敌万夫，苦吟字字费踟蹰”，当多才多艺的林纾受到保守势力的“深诋”时，陈衍则为他辩护。

陈衍的诗歌内容是丰富的。首先，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自己的祖国有着切肤之痛，并予以坚决的谴责。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在自己的家门口爆发，陈衍对那些丢盔弃甲的“将军”和海盗般的“鬼兵”表示了切齿的愤慨。“将睥而幡弃犀兕”，“鬼兵到底守关难”。他的次子陈声渐因对八国联军的掠夺行径据理力争而被枪杀，他悲愤已极：“孽臣昏妖天下无，鬼兵守关先张弧”，“危邦乱邦动可死，王涯宅有玉川卢”，“萧萧悲风时起，今我不愁何如？”“玉川卢”指唐诗人卢仝，号“玉川子”，家贫只有破屋数间。1932年初，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攻入闸北，陈衍义愤填膺，诗句有“枪闻万卷成焦土，又说千尸积肉山。休怪老夫怀抱恶，屠苏饮过未开颜。”他捐资慰劳奋起抗战的十九路军。郑孝胥与他同为“同光派”闽派诗歌的领军人物，长期互相唱和论艺，但郑晚年投靠溥仪，当了日本人的伪满洲国的总理。陈衍斥为“丧心病狂”，与他绝交。陈衍集中还有不少感时忧世的作品，如《京口访茅子贞留宿晓起同登北固山》、《岁朝六日自金陵归沪上拉杂书事寄伯初家兄并视爱苍》、《杂感十七首》等。

其次，陈衍的诗歌对时势有深切的感受。他一生不愿为官，除了1907至1911年任过三年的学部主事外，均以入幕或执教等为业。但他不涉政治，却有明确的政治思考。1911年8月20日下午，陈衍到学部上班，人们听说武昌革命爆发，不知所措，陈

衍却坦直地对他们说：“惟有请今上逊位”。可见他早已意识到满清统治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早在戊戌变法之时，他就撰《戊戌变法权议》支持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爆发后，陈衍暂时回到福州，当时有一个政客叫彭寿松，采用暗杀手段觊觎福建都督的权位，陈衍不顾自身安全出而斥责。陈衍一生刚直磊诃、正义凛然的性格与他的诗风清苍刻峭是交融统一的。

陈衍与倡导维新与革命的政治人物梁启超、章太炎以及在思想文化上刷新风气的领袖人物严复、林纾、黄遵宪等人均有密切的交往并相互唱和或论艺。对于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陈衍发现他是个年轻的才子，极力推荐，关爱有加并相互唱和：“吾乡山水秀，往往钟黄童。”

再次，陈衍的诗作关心民瘼。如《祷雨诗》和《三喜雨诗》中有“大旱已八月，山川意殊恶。肤寸既不合，怪物亦未遘，陂池糜不枯，井渫罔不涸……官长蹶然起，忍坐视民瘼。”“小楼三听雨潺潺，万户农民尽破颜。比似河流分擘后，龙门伊阙不能关。”陈衍晚年诗效香山体，“歌生民病，伤民病痛”，反映人民生活疾苦和愿望。他在诗中揭露天灾人祸、战乱频仍的社会现象，继承儒家关怀国事民生的优良传统。

第二节 “说子渊渊无尽藏，上薄风骚气独苍”

然而，这种关心时政与民瘼、表现爱国热情的诗歌在陈衍的诗作中只占一部分，他的诗集中为数较多的诗歌是以歌唱祖国山水为内容的游览诗、论诗诗以及交游诗等抒写生活和创作感受的诗歌。他年青时的山水诗清新脱俗，如歌唱福州家乡的佳作《春

暮登治亭》中的诗句“舍北舍南白鹭群，桃花万片赤鱼鳞。钓徒何必烟波远，浅渚捞虾即富春。”《九月初七日同人集塔江金山寺》的“面面江光碧且涟，抽帆绝好纳凉天”。歌唱武夷山水的，除上引《八曲见桃花》等诗外，又如：

路入天游观

路转石桥山几重，山石确犇稀行踪。檐峰余溜尽日雨，
林洞倒瓦千年松。生鱼莓苔合支榻，吠犬水声知曳筇。我来
未览众山小，便觉出山情已慵。

陈衍的山水诗往往透露出隐逸的情怀。诗人为美丽的武夷风光所陶醉，希望在山水之中“支榻”而卧，“曳筇（竹仗）”而游。到了中年后，陈衍的山水诗，正如他自己所说“作诗盘郁往复于中”，“自耐咀嚼”，以学问为诗、重于议论的风格非常明显，例如上引的一首题为《雨后重过开先观二瀑布》的山水诗（见第四章）。诗中把青山比喻成一个“绿衣人”，瀑布是她的佩巾（“悦”）和“缟带”，“翩翩而”垂，十分形象。而“中峰劈成青玉峡”，龙泉之剑飞腾而去，似龙又似剑。这时引出张华、雷焕掘出“丰城双剑”的精美的传说，描写很有气势又富于浪漫的形象。古代诗文常用“丰城剑”来赞美杰出的人才，诗人因此以所描绘的尖峭的山峰、双剑并峙来赞美江西杰出的诗才，庐陵欧阳修和双井黄庭坚如两座山峰。陈衍所代表的“同光派”推崇宋诗，但不局限于宋诗，元代诗人虞集（道园）、揭傒斯（曼硕），陈衍把他们比作“双剑峰”。诗歌界把元末诗人自号铁崖的杨维桢那种擅长驰骋想象、运用奇辞的风格号为“铁崖体”，元散曲家贯云石又别号酸斋。这首诗运用了浪漫的想象和奇特的典故，确是如“铁崖酸斋”般唱出了“天籁”般的一支曲子。“同光派”诗歌好以学问入诗、以议论入诗，陈衍这首诗把关于欧阳修、黄庭坚、杨维桢、贯云石等诗人的知识和理论融入诗歌，并对李白

诗句“疑是银河落九天”进行议论，但并不枯燥，因为这种议论是与美丽的山水融为一体的。此诗堪称“同光体”诗歌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上面这首诗典故较多文字较僻，这一类诗给现代的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而到了晚年，陈衍的诗风更多的推崇白居易和陆游，山水诗则更加闲适浪漫，细致入微。

诗句年来学放翁，后村近体亦差同，也应博得梅花许，
著我寒香万树中。

——《邓尉口号十二绝句》之二

四十年前此地游，拍桥新涨橹枝柔。庞公妻子山公妇，
转眼都成貉一丘。

——《暑夜泛舟西湖达晓不睡》之一

这些诗平白晓畅、回归自然并充满哲理。陈衍山水风光诗的特点是诗中有我，诗中有人。例如：

与肖项涤楼诸人游荷花荡遇雨旋晴

廿年梦想荷花荡（廿年前读实甫游荷花荡词），打桨来游花已稀。
穿尽亭亭擎雨盖，偶逢冉冉褪红衣。百钱买藕玉双臂，一霎停桡碧四围。
绝喜跳珠声可听，却嫌柳外又斜晖。

这首诗作于1919年，早在20年前陈衍就读过易顺鼎（实甫）写荷花荡的诗词，心向往之，现在来游，荷花已不如当日茂盛，但仍然亭亭玉立。在诗人的想象中，红色的花朵就像女孩的红衣，当它褪去之后，露出的将是如玉臂般的莲藕。陈衍最喜欢听雨，他将自己在福州家的小楼命名为“闻雨楼”，此刻，雨点跳珠般的轻打在碧绿的荷叶上，转眼间雨过天晴，柳树梢上又露出了斜晖，陈衍诗中的美丽风景总是离不开抒情主人公“我”的感情和意趣。又如《湖上杂诗》之一：

环视出钱塘，平湖水色凉。桥头未残雪，台上已初阳。
山石芭蕉大，僧楼松柏香。盘陀小延伫，懒问半间堂。

西湖的风景是那样的纯新，真切，诗末了那个因山路曲折“盘陀”而延伫不前的“我”，则是点睛之笔。

陈衍的论诗诗很有特色，作为“同光派”闽派的领袖之一，他的论诗诗首先是揭橥“同光体”诗歌，我们在前面第四章中曾以他的《冬述四首示子培》为例分析过陈衍与沈曾植以论诗诗互相唱和，探讨“同光体”诗歌理论的精彩内容。

陈衍的论诗诗内容丰富多彩，如“汉魏至唐宋，大家诗已多。李杜韩白苏，不废皆江河”，说的是继承传统；“千言排比铺张易，几字商量妥贴难”，说的是创作；“韩柳笔力藉磨砺，勿怨世路多崎岖”，说的是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诗教本性情，六义各有宜”，讨论的是“诗教”，等等。这些诗对文学的批评、创作、鉴赏等方面都有借鉴意义。

陈衍曾说“乐之高尚者有二：曰感情，曰名誉”，他写了大量倾诉对夫人、亲友真挚感情的诗作。《陈石遗集》中记叙和思念妻子萧闲堂的诗词有十几首，而其中的《萧闲堂诗三百韵》是集中最长的一首诗。由此可见，陈衍对夫人爱恋的忠贞和执着。陈衍的爱情观中既有与杜甫、苏轼等大诗人在诗中所歌唱的对妻子的传统式的挚爱相类的美好感情，也颇具近代高雅的爱情观。陈衍既不携妓、也不纳妾，夫人逝世12年后才续娶李柳为继室。这些爱情诗中好几篇都记述了携夫人出游时的欢乐，如《重游天宁寺同道安》、《同道安暨儿登蕉山》、《五月十四夜宿湖上宛在堂堂祀明以来闽中诗人》、《三至西湖同道安（两首）》等，后者之一为：

约子来游近十年，转因容易屡迁延。林泉坐落他人手，泥爪尚留临去缘。骆宕风光春夏际，淡浓景物雨晴天。残荷衰柳吾重到，不及裙腰草色妍。

陈衍与夫人相约同游西湖，却一再拖延，近十年后才了却这一心愿。对女性的尊重是现代思想的特点之一，陈衍不仅对夫人爱之弥笃，而且重女学，对所教授的女生，与男生一样平等相授。他的诗中可以看到对门生王真、刘衡及韵芳女士等女性，每每赞誉有加，或互相唱和、或谈学论艺，表露出女性解放的新思想。

诗是感情的载体，《石遗室诗集》中处处充盈着对亲友的真情。“多情爱客如公子，别后相思未有涯”。“昔时所与游，垒垒皆黄土。去年故园去，邻笛极凄苦。当其一息存，名利锐进取。可怜盖棺后，寂寂与终古。九泉宁有知，酒到亦何补？”陈衍一生交游甚广，他在对朋友的感情中融入的既有深切的关心和理解，也有深刻的诤言和人生感悟。

陈衍的诗还有一类是咏史和杂感，往往充满哲理，回味无穷。从诗人 22 岁开始所写的《咏史三十八首》到后来一系列的《杂诗》、《杂感》以及众多与诗友唱和等诗歌中渗透出来的哲思，处处都富于理趣。如《咏史三十八首》之三：

二人诚同心，其利可断金。同心之难言，管鲍差知音。
孔子疑颜回，母也疑曾参，孙刘好不终，耳余仇方寻。南宋
辽金元，唇齿日相侵。

陈衍一生特重友情，视同乡、诗友和同人们间的友谊如生命，但是，他深知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理解与合作的困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间的思考颇具现代哲学意义。存在主义认为，“他人是自我的地狱”，这个说法也许有偏激之嫌，但他们提出的一个“主体间性”的概念确实十分辩证。人与人之间除了友谊的一面，还有冲突的一面，人在我思中不仅发现了自己这个主体，也发现了他人，而他人也是主体。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就是所谓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

理解是一个难题。又如他在《怒诗六首示乙庵一笑》中说“相见令人怒，不见令人思”、“怒者常情真，笑者不可测。但怒不复笑，古之愚也直”。人与人之间除了“思”，还必须有“怒”，因为“怒”比“笑”往往更真。

陈衍还有一些应酬诗、题画诗等其他类型的诗歌，内容丰富，韵味深藏。

第三节 “千言排比铺张易，几字商量妥贴难”

陈衍诗歌的特点，首先是融朴学精神入诗歌，这是与他的诗歌理论相一致的。他曾说：“窃叹区区旧学，考据、词章数千年无能兼者，歧而二之，即已误矣。”这里所说的“考据”即乾嘉朴学，而“词章”即文学。他与林纾讨论文学时常有观点上的不同。在《五言四十韵哭畏庐》一诗中说林纾“论文常贻我，自昔荷断断……久之乃自命，梓湖柏枧间。秘钥矜昌黎，闼抑不使宣。我进以朴学，君谓道已分。我更以哲学，君谓非道原”。林纾自命在梓湖（吴敏树）、柏枧（梅曾亮）之间，他们都是桐城派作家，受姚鼐影响，将“义理、词章、考据”分而治之。陈衍却是相反，主张兼而治之。这便形成陈衍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

陈衍融议论入诗，化哲思为意境，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起来。例如“万方正多难，行作虫沙继。问君欲何之？吾亦从子逝。”“岂有嵒崎历落人，坐隅立鹤性能驯？”前者从《诗经》中的“誓将去汝，适彼乐土”而来，后者由苏轼诗句“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化出，这些议论不是抽象的说教，而

融入“虫沙”“野鹤”的形象描写，诗歌的意境独特而高雅。他在《沈乙庵诗叙》中说“作诗却是自己性情语言，且时时发明哲理”，把性情、语言、哲理三者一起融入诗歌是他创作诗歌的风格。

因为强调以学问入诗、以议论入诗和以文字入诗，所以陈衍的诗歌语言有时难免晦涩，但他的大多数诗歌还是文从字顺的，而且秀丽多姿。到了晚年，他诗效香山、放翁，更趋平淡晓畅，有时甚至作《宗孟留饭索诗纪之并作妪解语》这样语言最浅近的诗：“七年不见林宗孟，剃去长髯貌瘦劲。人都五句仅两面，但用心亲辞貌敬。狂既胜痴瘦胜肥，目之于色亦论定。纵谈政学无不有，引观内室评图镜……”

艺术追求的多元化是陈衍诗歌的另一特点，他自己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三中说：“……余与海藏侪诸散原，方诸北宋苏、王、黄三家，以为海藏服膺荆公，遂以自命；双井为散原乡先哲，散原之兀傲僻涩似之，皆成确证。因以坡公属余，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这正是杜甫“转益多师”的意思，所以陈衍诗歌的风格多元，有年青时的清幽超逸、戛戛独造，有出游参幕后的“盘郁于中”、“自耐咀味”，也有年老后的平淡晓畅，更有贯串一生的深蕴哲理。他诗歌创作的这种多元化的艺术追求是与他的诗歌理论“三元说”相统一的，例如他自言“绝爱坡公七言”，而苏轼就是“三元”中最后一元——元祐诗人的代表，其特点正是多元化。陈衍喜宋诗，但将学习的范围上溯到开元的李杜乃至诗经的《风》《雅》传统。

陈衍诗歌的另一个特色是追求独创，表现鲜明的个性。他评陈三立的诗“恶俗恶熟”，评郑孝胥的诗“高调要不入俗调”，他反对用“人人能道语”、“人人所喜语”。如上引他的《雨后重过开先观二瀑布》中的比喻，“青山有似绿衣人”，而又将瀑布比做她的佩巾，就十分新颖而形象。再如他写梅花的诗句：“枝有盘

虬势，人添似鹤姿。短廊看涉倚，浅水照嵌寄。”画面清新奇特。再如他的名句“一卧忽惊天醉甚，万牛欲挽陆沉艰”，以传说中的天帝醉酒来比喻世事混乱，并连用杜甫的两处诗句“一卧沧江惊岁晚”（《秋兴》）、“万牛回首丘山重”（《古柏行》），化出新诗句，变化巧妙。“同光体”诗人因为避俗避熟，所以用典较为频繁，有时也造成解读上的困难。但是，陈衍强调诗“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并提倡“流宕而不落于浅俗”。要用典就必须有学问做基础，这种对学问与诗歌的坚守对于提高诗歌的境界，鼓励诗人们加深学问根柢是有益的。陈衍曾以《诗经》为例，强调“若三百篇，则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之类，足以备《尚书》、《逸周书》、《周官》、《仪礼》、《国语》、《公谷左氏传》、《戴记》所未有。”这是“同光派”诗歌与诗论对文化遗产的意义。

第四节 “不务雕琢，平淡苍老”

陈衍的散文也有相当的成就。上述章太炎对他诗歌的赞语引自章在他 80 岁寿辰时撰送的寿联，上联是：“仲弓道广扶衰汉”。仲弓是东汉的陈寔，任太丘长，被党锢之祸牵连，却不逃亡，后何进等招他做官，他辞而不就，被公认为最有德行的人。作为祝寿者，章太炎对陈衍从道德文章两方面进行评价，应该说是十分恰当的。唐文治先生在谈论陈衍的文章时，同样从文如其人的角度加以推崇：“先生为人清刚，故其气道，其体曲而直，其辞矫以健，于子厚，介甫为近而不可绳以家数。他人号为古奥，或出于作为，先生则纯任自然，不务雕琢，平淡苍老中，符采复隐。”^[7]曾撰《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钱基博先生则称赞他的文章为

“并世文章之雄也”。^[8]

陈衍自言“生平无韵之文无虑二三千首”，但在自编文集时大部分“皆弃不取”，只“择其稍雅驯者”辑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石遗室文集》共有四集，计有散文 221 篇，是他散文中的精华。这些散文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是“传”、“志”、“表”等类的记人散文，二是山水游记，三是“序”、“叙”、“论”等类的议论文，四是书信。这些文章是作者丰富生活的一面镜子，是他对人生、学问和艺术的充满哲理的思考。

第一类，记人散文不是一般的奉承文字或臆墓文章，而是作者对“他者”的观照和思考，是作者与文中人物的坦诚交流，像《张之洞传》、《林旭传》、《先室人行述》等。作者在文中倾注了对他们的真挚感情。这些朋友和亲人，是作者本身生活的一部分或一个侧面。陈衍的这类散文描绘细腻，文字简洁，十分动人。如《三儿声被圻志》中的一段：

庚子之乱避地村居，江水冷，饮者多症寒疾，儿尤甚。癸卯（1903 年）娶妇王氏，至睦。甲辰（1904 年）秋，举一男不育，相向悽惋。未几病，误服药，亦小愈矣。其季弟病于城中，呼之往，力疾赴之，遂大病，寄居妇家，竟至绵悞，乙巳（1905 年）正月三日卒，娶未二年也。余与室人在鄂，以儿素善病，未留意，及闻病笃，四千里路行六日，至已不及见矣。航海将至，室人忽悽然曰：“吾儿得佳妇，吾尚未见，乃以孀见乎？”泪下如糜，悲夫，悲夫！

以这种“悽惋”的文字回忆往事，如在目前，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而对于传主有特异性格的人物传记，陈衍往往能了了数语就写出人物别具一格的能力和特定的环境和形势。如《张之洞传》中的一段：

未几，法越事起，擢两广总督。沿海驿骚，方修炮台、

楼船水战具，之洞注意陆战。专力筹军饷，重顾广西边防，兼济云南，余力及福建，之台湾，皆百十万。以湘淮军已暮气，王德榜、潘鼎新辈连战不利，乃起宿将粤人冯子材，畀以重任。谅山告大捷，为自来中西构兵所未曾有，云南宣光亦捷。法人势大屈，浼英人议和，急请停战。政府怵且暗，遂从之。之洞力争，且密饬冯军速战，朝旨终连责，不得已，乃退师。

这种力透纸背的记叙充满一种流荡的真气和深挚的感情，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扼腕叹息。陈衍的传记散文总是这样充满感染力。

陈衍的游记散文同样写得很有特色。如《行抵台北内山加九岸记》、《游君山记》、《出居庸关记》、《登太山记》、《游方广岩记》等篇目，都能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曲尽塞北江南，东岳海岛的各个不同的地域风光，每一篇美文都能让读者置身于水光山色之中，与作者一起遨游于山窈水涯，令人陶醉。

如著名的《登太山记》，先写太山（即泰山）“有石而无土”、“有松若柏，无他木”，“石之窈往往有泉，小者滴沥，大者迸泻，湊赴诸峯之间以为涧”。接着写“太山之所独者，有极天之天门，广丈余，矗七千级之磴道以至之也”，“不数里至太山之麓，已见所谓南天门者，在数千仞之上，夹持于两峯之颠。峰岩仰攢巨齿微缺其中央，天门若古货布之竖，上见其贯穿之孔，更上无所有，则苍苍之天而已。”作者以登山沿途所见为线索，写中天门、写一线瀑布、写五大夫松、写云步桥，写山上奇异的石头和松柏，最后写登顶所见，一路上景色随时变化，极具特色。如写观日出一段：

迟明观日出，天晴而有蒙气，蒸为薄云，日大略如车轮，不能明见全体。将升之顷，红光横射数百里，须臾近日处喷猩血色，凡红之物无与并者。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自頂至基有石而與之開毛有松若指
無他木石出處實往三有泉小者滴漉大者道流
凍赴諸峯之湖以名淵此泰山之奇而非泰山諸
之奇獨也凡山之奇以石為奇水之奇以石為奇自
泰山之奇獨者有極下坐天門崖丈餘直聳七千餘
級之磴道以至此也余以辛亥六月十三日日將午至泰
安城遂命肩輿不義里至泰山出麓已見所謂
南天門者在數千仞之上夾於兩峰之間峰巒
仰攢巨壑微缺其中央下門穴古名負布之堅
上見其牙貫之孔壁上與所有劍峯巖之止天而
已下下有石一條瀑布心澗而留其縣流
出辰者上天門之磴道也又其下皆石不可履
而稍屈於所謂十八盤將盡處世道行數
里而了門隱數至天門又見凡五隱見正中
天門登山止跡望坐望天門之迹也大小全
以甚異于初見也又數隱見傲來峰
既下旁丈人諸峯瞰其上向所見一條瀑
門下五五六丈松雲步橋磴澗石磴之
左自雲步橋下至中天門澗居磴道止
右望盡東峯出水多小縣汜數壘其匯
于雲步橋而為瀑布石出橋下別入一澗
此東水出歸于西者七自了門下至
迴馬嶺澗又居磴道止十東諸峯之水

入焉此東水之跡于東者也自迴焉嶺下
 至東石橋澗又居磴道之右西諸峰之水
 若水皆廉洞者入焉已抵下而澗轉居磴
 道出于此世水止歸于東也自是至山
 出界也寸下門以下其木皆柏之一松焉
 中天門以上其木皆松之一柏焉指踏者百
 年物矣是故曰尤家密者稱名柏洞在壽
 不知父于家元頂猿臂鵝翅鸛喙川子乃
 三側出側挂于懸崖絕壁危峯之際人跡
 所不能到全山石紋斷裂德健此鐫形
 三方長方其圓者百之一二銳尖峭者十止
 一三百丈千丈者十之二三風亦止此削能由
 雲三可穿暫礮礮崩墜於澗光者不可
 計而此石月星似特液內含氣脈充溢如龍
 水泉噴噴博潤澤巖岫挺生萬棘蒼州濼
 濼與蒼崖並石水澗日此世入乃入南下門至
 無泉之本惟在巖元負戴草率成茲工令安
 利否未入天門者原以見馬歷蔡明現實元
 乘羽觀三字解在玄宗紀泰山銀止于絕頂日
 觀峯；東軒並野但律志騰騰亦甫某甫
 濟水自東而南而西橫互衣帶僅流差之入焉
 濟水今已奪為河自南而西而北汶水入焉其
 北亦可見其西可見其南亦隱可見履以觀
 日出了晴而有雲氣蒸為博雲之日大異如
 車輪亦能明見全證將昇之際任先撥射
 去百里頃刻之日亦噴猩血色凡紅生物皆
 亞者南下門之東此皆皆有下門山止會有
 後石馬松尤奇傲東峯下有龍潭瀑布
 尤壯余嘗未至也 己未燈前書 石道人

这种雄伟壮观的景色被描绘得真切而细腻，既不靠华丽辞藻来修饰，也不受某一种文章结构的束缚。而是“有什么讲什么，讲完就完，不作迂回蓄缩”，文章往往写得质朴自然。所谓“迂回蓄缩”即指桐城派的“师法”。陈衍论诗，主张既师承古人又不受某一家古人的局限，对于散文，同样不会被某一家的“师法”所限。

陈衍的议论文及书信最能体现他散文的特色——富于哲理性。如前所述，他主张将“考据”与“词章”兼而治之，陈衍作为“同光体”诗歌的领军人物之一，为文同样融议论与记叙于一炉。如他的《先室人行述》一文在叙述他的夫人萧闲堂的出身及经历时，夹叙夹议，作了大量的哲学思考。他谈到萧夫人曾著《言愁》、《说乐》二篇，《言愁》云“愁如海也，井蛙不知有海；恨如冰也，夏虫不知有冰”，所以“人有祸在目前，而不知忧戚，至死亡而不知哀者，非其天丧，乃其天全也”。这些哲思显然是受了庄子的影响。文章的后面又说：“乐之高尚者有二，曰感情、曰名誉……感情名誉二而一者也”，强调人的感情生活。这篇散文有一半以上的篇幅在发议论，将知情意三者水乳交融地交织成对萧闲堂的回忆与理解，确是一篇很有特色的奇文。

陈衍的许多散文中都夹以精彩的议论，如《文笔山生圻记》写过为他本人与夫人及家人所准备的生圻地理位置和风光之后，便插入一段关于人生面对死亡的看法：

夫余以为人死无知，葬之宜薄而可保也。久矣，厚裹其血肉之躯，殄渍臭腐，无所于洩脱。其有知秽恶之情状，其能堪乎？亦即无矣，又曷为择地清淑，意若甚得者。自湖西至江干（陈衍生圻所在的地理位置），吾童时之所闲行游眺，吾与家人清明上冢，避乱村居，买舟建溪之所，往来皆在兹山之左右。天下甚乐甚苦之境，往往有设于吾心，不必其外

体之亲尝者……

陈衍在这篇优美的散文中将自然山水之美与自己的人生经历及对生死的思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给读者以文笔山一带美丽风光的欣赏又融入对人生与死亡的辩证思考，给这篇短文赋予很深的哲学意蕴。“天下”的苦和乐，不在于麻木的吃喝玩乐等感官的“外体之亲尝者”，而在于“有设于吾心”。苦和乐，是一种心灵的感受，这是美学的原理。

陈衍是一位文学家，又是一位朴学家，他“经史子集，百家九流，靡不六通四辟”。^[9]所以才能将文学与哲学综合起来。他在创作诗歌与散文时能将传统的经学与哲学渗透于其中。深入思考他的这一创作特点，对我们深入进行文学理论和文化的研究是会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与引文出处：

[1] 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第207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2] 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第1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注：以下所引用陈衍的诗文。出自此书的，限于篇幅，不一一说明。

[3] 同[1]，第2155页。

[4] 同[1]，第2167页。

[5] 陈庆元著：《诗词研究论集》第313页，巴蜀书社，1998年9月。

[6] 同[2]第8页。

[7] 同[1]第2163页。

[8] 同[1]第2167页。

[9] 同[1]第2155页。

第九章 《石遗室诗话》

陈衍的《石遗室诗话》是近代诗歌批评著作中的代表作之一。^[1]全书共 32 卷，每卷万言左右，卷帙的浩繁是空前的。它是对“同光体”诗歌的揭橥，同时收录和评论了咸、同以来大量诗家的作品。它既继承了源于钟嵘、盛于宋代的那种论“品第”、“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的中国古代独特的诗论形式，又对传统诗话模式有所突破，更注意专题性、理论性，更具有近代朴学精神。它不仅对近、现代旧体诗坛有很大影响，而且对研究诗歌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12 年 10 月，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梁启超在北京开办《庸言》杂志，向陈衍约稿，在他的杂志上刊登陈衍的诗话。这是陈衍诗话的第一次面世。他后来在 1927 年出版《石遗室诗话》（以下简称《诗话》）时的《序》中说：

数十年来多说诗，意有所得，辄拉杂笔之，未成书也。
壬子（1912 年）秋客居都门，梁任公编《庸言》杂志，属
助臂指，则请任诗话，彙积旧说，博依见闻，月成一卷，卷

可万言。癸丑（1913年）旋里，寄稿偶有间断。迨甲寅（1914年）夏日印行仅十三卷。诗之可话者尚多，而《庸言》则既停矣。乙卯（1915年）六月，李拔可（宣龔）谋为《东方》杂志，增文苑材料，复以诗话见委。亦月成一卷，卷万言，至十有八卷而复止。则鄙人有《福建通志》之役，事方殷也。久之，十三卷之本坊间私行翻印，既非完书，复多错误。十八卷之本，从未单行，阿好者欲购末由，时来问讯。乃取旧稿，删改合并，益以近来所得，都三十二卷。属涵芬楼主人印之，以饷海内之言诗者商邃密焉。^[2]

从这篇《序》中可以知道，《诗话》的面世虽始于1912年，但“拉杂书之”，却始于多年以前，他“数十年多说诗，意有所得”，这些诗话早在未面世之前就已经受到了诗友们的欢迎：

乙酉之春，郑苏戡（孝胥）归自金陵，尝借余钟嵘《诗品》，因谓余曰：“盍仿其例，作唐诗品？”后数年旅食上海闻蜀人宋芸子（育仁）撰有《唐诗品》，从叶损轩（大庄）处翻阅之，非吾意中之唐诗品也。又数年戊戌，客武昌张广雅（之洞）督部所，子培（沈曾植）、苏戡继至，夏秋多集两湖书院水亭、水陆街姚园、墩子湖安徽会馆，多言诗。子培欲余记所言为诗话，自是易中实（顺鼎）、曾重伯（广钧）、陈伯严（三立）诸人，遇则急询诗话，而余实未之为也。^[3]

世界上的好文章，有个共同的优点就是有感而发。从以上可知陈衍的《诗话》，是经几十年的思考并在与诗友们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先是“多说诗”，后才形成文字。当我们读着《诗话》时，就会发现其中的每一处感受、每一条理论，或来源于诗歌创作的实践，或凝聚着诗艺思考的结晶，都是诗人心曲的流淌。全书洋洋洒洒三十余万言，内容丰富多彩，实实在在，在许多问题

上都有其精辟见解：有的揭橥“同光体”这一诗歌流派的产生与发展，有的收集和评论众多诗人的作品，有的研究和思考诗歌理论，有的讨论诗歌的创作方法，有的记载诗人遗闻轶事，可谓博大精深，启人良多。

第一节 “同光二三子，差与古淡会”

《诗话》首先是对“同光体”诗歌的揭橥。陈衍早在 1886 年，就开始思考“同光体”诗歌及其理论问题了：

丙戌在都门，苏戡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戡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4]

所谓“专宗盛唐”，是指一种诗歌现象：从宋代一直到明代乃至清初，诗坛上有一种强分唐诗与宋诗的风气，宗唐诗而贬宋诗，这种风气到了道、咸以后才开始被打破：

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隽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柅（东谿）、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5]

所谓“私淑江西”，就是以“江西诗派”为美，即尊以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宋诗流派为美。陈衍认为，这种“不专宗盛唐”，对宋诗的肯定，是一种开拓和变革，是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就是说宋诗是从唐诗发展而来，并且对唐诗有所开拓，“力破”出一个新天地来的。

对于宋诗批评，始于宋代，认为宋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降低了它的艺术性。如同是福建人的诗论家严羽就持这一看法。严羽认为“诗必盛唐”，陈衍对此不予同意。如前所述，这种不同意早在“道、咸”就已开始，“同、光”年间已形成一种思潮，所以陈衍和郑孝胥把这一诗歌流派命名为“同光”派。陈衍提出，诗莫盛于“三元”：

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沈曾植）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故有“开天启疆域”云云。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欧阳修）、宛陵（梅尧臣）、东坡（苏轼）、临川（王安石）、山谷（黄庭坚）、后山（陈师道）、放翁（陆游）、诚斋（杨万里），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陈与义）、止斋（陈傅良）、沧浪（严羽）、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干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故有“唐馀逮宋兴”及“强欲判唐宋”各云云。^[6]

所谓流派，就是彼此的看法相近或相同的派别。陈衍的这段话是评论沈曾植的一首讨论诗歌的诗歌的，诗的题目叫《寒雨积闷，杂书遣怀，爨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

关于“同光派”诗歌，陈庆元先生有过明确的界定：“同光派是近代提倡宋诗的诗歌流派的总称。在陈衍本人看来，这一流派从风格上来划分，还可分为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一派生涩奥衍’。”^[8]

诗歌有自身发展的源流，从《诗经》、《楚辞》到当代诗坛，其间绵延流淌，虽然有波澜起伏，有高潮和低谷，但不应将某一

高潮割裂开来，过份地褒扬，所谓“诗必盛唐”，对某一高潮强调过份就会忽视整条河流。“同光派”虽然强调宋诗，但陈衍并非局限于宋诗，他强调“三元”，沈曾植强调“三关”，都将诗歌的高潮由唐代向外延伸。陈衍他们还十分强调“六义”和“风雅”，并且强调他们同时代的“今人”，这就比较有整体的历史观点。在下面这一段引文中，陈衍讨论诗歌和学问的关系，开头部分便强调诗六艺的历史意义。

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余甚疑之，以为六义既设，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用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素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才也”，能之乎？汉魏以降，有风而无雅，比兴多而赋少，所赋者眼前景物，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不过言之有工拙，所谓“有别才”者，吐属稳，兴味足耳……故余曰：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少陵、昌黎，其庶几乎？^[9]

陈衍针对严羽的“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并提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主张，如祁雋藻就是能将学问与才力合而一之。再如沈曾植也是“博极群书”，而后才“时托吟咏”。陈衍还举过一个“学人之诗”的例子：“张铁君侍郎亨嘉，素不以诗名，然偶为之，惨淡经营，一字不苟，所谓学人之诗也。”在举了他的两首诗作例子后，陈衍议论道：“二诗不过数百字，凡用经史十许处，几于字字皆有来历。”而“字字皆有来历”最著名的是杜甫：

“意匠惨淡经营中”，王阮亭改作“经营成”，论者以为点金成铁。然须知少陵无一字无来历，“经营中”三字，实本古乐府“小立经营中”句。“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共一家”，“寡妻”如何与“群盗”并举？盖即“喜心翻倒

极，呜咽欲沾巾”意，不觉其口号之语无伦次也。然亦从《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翻出来，至爱者寡妻，至恶者群盗，举其两极端言之耳。^[10]

陈衍以杜甫为例，说明诗“关学”，而又同时肯定“‘有别才’者，吐属稳，兴味足耳”。这是他的高明之处：既肯定“学”，又强调“才”。所谓“吐属稳”和“兴味足”如钟嵘《诗品》中所要求的：“余谓文制，本欲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对于“吐属稳”，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而“兴味足”则是与严羽等人的“兴趣”、“兴会”等相近的看法。

总之，宋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断代，自有它自己的地位，我们既不能完全否定它，简单地以“诗必盛唐”来一笔抹杀宋诗，也不必以放大镜来放大它的成就。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所说：

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模仿旧社会商店登广告的方法，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力竭声嘶地赶任务。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11]

“同光派”推崇宋诗，特别推崇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陆游、杨万里等人。推崇他们分别以自己的富有个性的艺术手法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唱出了诗人的心曲。陈衍等人又将宋诗源头追溯到唐诗，如说“放翁、诚斋，皆学香山，

与宛陵同源”，就是肯定诗歌发展的源流。但是，他们说“诗至唐而后极盛，至宋而益盛”，这样的话，是否显得有过头之嫌呢？他们对宋诗的缺点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否缺乏批评呢？这些就是钱钟书所说的“分寸”感的问题，确是值得斟酌的。

当然，陈衍也不是不注意分寸的，例如他怀疑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严羽：

严沧浪有别才非关学之言误矣。然非沧浪之误也，钟记室之言曰：“‘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诂出经典；‘思君若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持斯术也，一人传作，不越一二篇。一篇传诵，不越一二句。汉高《大风》之作，斛律金《敕勒》之歌，岂不横绝古今，请益则谢不敏矣。……故沧浪又曰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故别才不关学者，言其始事，多读书云云，言其终事，沧浪固未误也。^[12]

陈衍认为严羽的“诗不关学”应是开头，“诗关学”是其次，顺序不可颠倒。陈衍说，“诗非关学”的错误不应记在严羽身上，而应记在钟嵘身上，引文中钟嵘所举的四句例子固然是一种自然真美，但诗歌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自然，还可以是历史活动、社会生活等，这些就牵涉到知识和学问了。但是用典要适当，如果用典过多或过僻，那就是存心不让一般人看懂了。

汪国垣曾在一首诗中这样评论“同光派”：

同光二三子，差与古淡会。骨重神乃寒，意匠与俗背。^[13]

这里强调了“同光派”的两个特点，一是在文字上与“俗”相背，即对当时的“诗必盛唐”、“桐城派”散文等风俗不予认可，推崇宋诗对唐诗的发展。另一个特点是古朴淡雅，追求诗歌

的传统源流，风雅古拙。既崇古，又创新。对汪国垣的总结，陈衍认为“颇肖”，这应是恰当的评价。“同光体”诗歌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人为的。流派是特定时代文学发展的产物，陈衍对“同光体”诗歌进行理论上的揭示和探讨，为“同光派”诗歌乃至近代旧体诗的繁荣做出重要贡献，故“时人称为诗坛救主”。^[14]

第二节 “雅人深致循良事，都被先生古锦收”

然而，陈衍并不以“同光体”为界，画地为牢，非此不取，相反，他的这部《诗话》包容了当时诗坛的大多数诗人的作品。陈衍后来于1934年编辑《石遗室诗话续编》时曾回忆说：“仆前后两编诗话，嗣复合成一编，无虑三十万言，咸、同以来诗家，殆亦十得八九矣。”《诗话》囊括了咸、同以后的300多位诗人的2000多首诗（包括陈衍自己的100多首）、约1300多个句子或段落，以及一些对联，诗题等。同时，陈衍还对当时京师的净名社等诗社及福建的诗钟结社等诗歌进行搜集整理。陈衍对这些诗歌的收集和评论已接近一部诗歌断代史。

班固曾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15]陈衍就像这样一个“行人”兼“太师”，以自觉的文学责任感来采集诗歌、评论诗歌、研究诗歌。

《诗话》所搜集的2000多首诗歌和1300多个句段中，有大量刻画山水田园的诗歌，充满了诗情画意；也有不少讨论政治事件的诗歌，不乏讽喻和谴责；还有不少描绘生活画面的诗歌，充

溢着人文的意趣。《诗话》中的 300 多位诗人有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林旭等，有咸、同以来的封疆大吏如左宗棠、刘铭传、张之洞、张佩纶等，还有这一时期著名的文人墨客如林纾、严复、王国维、黄遵宪等，而集中最大量的是那些繁星般的众诗人。这其中除了上一节提到的“同光体”诗人陈衍本人、郑孝胥、陈宝琛、沈瑜庆、何振岱、李宣龚、陈三立、夏敬观、沈曾植、袁昶、金蓉镜等人外，许许多多不同流派的诗人都被纳入陈衍的视野，许许多多不同身份人的诗歌都被收入陈衍的囊中。

陈衍之所以能像班固笔下那些“振木铎徇于路”者一样，以“采诗”为己任，是因为他对诗歌艺术的包容如海纳百川一样广大而不受流派偏见所束缚。例如同样是“同光派”的陈三立，就将张之洞等人的诗歌贬为“馆阁体”，陈衍却能见出其中的长处，予以吸收：

伯严（陈三立）论诗最恶俗恶熟，尝评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余谓亦不尽然。即如张广雅（之洞）诗，人多讥其念念不忘在督部（时督武昌），其实则何过哉！此广雅长处，如《正月十七日发金陵夕至牛渚》云：“牛渚春波溅涨时，武昌官柳已成丝。东来温峤曾无效，西上陶桓抑可知！”《九曲亭》云：“华颠文武两无成，羞见江山照旆旌。只合岩栖陪老纳，虚楼扫榻听松声。”其二云：“矜此劳人作少留，却烦冠盖满汀洲。隔江欲唤杨夫子，戴酒携书伴我游。”（自注：“黄冈教谕杨君守敬。”）……以上数诗，皆可谓绵邈尺素，滂沛寸心，《广雅堂集》中之最工者。然东来温峤，西上陶桓，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文武也，旆旌也，鼓角也，汀洲冠盖也。以及岷首之碑，新亭之泪，江乡之梦。青琐湛辈之同浮沉，秋色寒烟之穷塞主，事事皆节镇故实，亦复是

广雅口气，所谓诗中有人在也。伯严不甚喜广雅诗，故余语以持平之论，伯严亦以为然。^[16]

陶桓公即东晋的陶侃，他击败反晋武装后任荆州刺史。镇武昌，旋为王敦所忌，调任广州刺史，在广州，无事即朝夕运砖以习劳。王敦败后，仍还荆州，又平定苏峻之乱，温峤赖陶侃兵力，收复了建康。陶侃勤慎吏职，四十年如一日，为人所称颂。他和他的盟友温峤这些历史人物都被张之洞作为自己致力于变弱为强的洋务事业中的榜样，而杨守敬则是同时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当时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及勤成学堂总教长。张之洞为走强国之路，广招有识之士，他在诗中对“杨夫子”的召唤正表白了这一种心情。所以陈衍的评价是“绵邈尺素，滂沛寸心”，是“青琐湛辈之同浮沉，秋色寒烟之穷塞主，事事皆节镇故实，亦复是广雅口气，所谓诗中有人在也”，这种“持平之论”使陈三立改变了看法。

陈衍不直接插手政治，但并不排斥政治人物的优秀诗歌，他与梁启超、严复、林旭、张之洞这些互相之间政见不同的人都能互相唱和。他虽对他们的诗歌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如评张之洞“隶事（用典）太颀”，评王闿运“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评樊增祥等人“诗境并不相同”，但他都能充分肯定他们的诗歌成就，予以收录，品藻。陈衍作为“同光体”诗歌的领袖之一，眼光特别开阔，对众多宗汉魏六朝、宗唐、宗宋等众多诗家都能给以持平之论，不一味地排除异己。所以，“同光体”在当时许多诗歌流派中生命力最为旺盛，例如易顺鼎和樊增祥起先并不属于“同光派”，后来都能共同唱和，融为一体，这些都是与陈衍的不拘于门户之见分不开的。

樊增祥是与陈衍同时代的诗人，是当时“中晚唐诗”派的代表诗人，但是《诗话》录评他的诗歌多达7处以上。卷一中说：

樊山诗才华富有，欢娱能工，不为愁苦之易好。余始以为似陈云伯（文述）、杨蓉裳（芳灿）、荔裳（宋琬），而樊山自言少喜随园（袁枚）、长喜瓯北（赵翼）。请业于张广雅（之洞）、李越缦（慈铭），心悦诚服二师，而诗境并不与相同。自喜其诗终身不改途易辙，尤自负其艳体之作，谓可方驾冬郎（韩偓），《疑雨集》不足道也。尝见其案头诗稿，用薄竹纸订一厚本，百余叶，细字密圈，极少点窜，不数月，又易一本矣。余辑有《师友诗录》，以君美且多，难于选择，拟于往来赠答诸作外，专选艳体诗，使后人见之，疑为若何翩翩年少，岂知其清癯一叟，旁无姬侍，且素不作狎邪游者耶！^[17]

我们常说“诗穷而后工”，但樊增祥却能以“欢悦为工”，这就不容易了，何况还要以艳体诗为工。这种叛逆精神，陈衍均能兼收并蓄，确实具有“行人振木铎”、“献之太师”、“以闻于天子”的意义。

和樊增祥一起代表“中晚唐诗派”的易顺鼎乃至与他们意见多有不同“六朝诗派”领军人物王闿运，在《诗话》中都多有评论和提及。

陈衍搜集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不片面追求大家和名人效应，他说：

论诗文者，每有大家名家之分，此文人结习也，或以位尊徒众而觐为大家，或以寿长诗多而觐为大家，或以能为大言，托于忠君爱国，稷契许身，而亦觐为大家，其实传与不传，不关于此。^[18]

他接着举清初一位诗人宋萃，曾与王士禛齐名，后“有不能举名者”。相反，陈衍对当时二流、三流的诗人，只要他的诗歌有艺术价值，都能传而评之。他的《诗话》及其《续编》，乃至

《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等诗评都具有这一特点，上至王公贵族，下逮布衣平民、日本友人、闺阁才女乃至贩夫走卒，都能采撷其优秀的诗歌作品并加以评论。

陈衍的仆人张宗杨虽然识字甚少，但跟着陈衍走南闯北“山水之游，无役不从”，竟然也“喜弄文墨”。陈衍也把他的较为浅近通俗的诗选评入《诗话》，评语是“起句俱好”、“意自寻常，音节却亮”，这些诗的起句如：“诗人无不爱江村，我愿江头得小园”、“夜眠如在万梅村（室中瓶梅甚颗），晓起寻诗城北园（主人女公子园林在城北）”、“雪峰水碓响村村，草棘为篱护菜园”。陈衍在介绍这位仆人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乡土诗人时，将大自然之美促成诗歌之美的道理写得令人陶醉：“余仆张宗杨，侯官绅带乡人，乡在万山中，由陶江西上，十余里至洪江，又水路西上数十里，至小箬。又陆路四十里，乃至其乡，泉石林木，奥如皋如，乡名绅带者，以溪流形势言之也。”山水之美令一个“识字甚少”的农民成为一位诗人，此中蕴含着诗歌艺术起源的道理，令人联想翩翩。陈衍还将张宗杨及其诗歌编入《近代诗钞》。

陈衍自己说他平生有收集友朋诗歌的爱好，除这一部《诗话》及其续编外，他收集和评论诗歌的诗集还有《辽、金、元诗纪事》、《宋诗精华录》、《全闽诗录》、《清诗三百首》、《近代诗钞》、《续近代诗钞》、《樊谢诗评》等，其中许多都是卷帙繁富的大部头。樊增祥有一首题为《再示儿辈》的诗末尾两句为“雅人深致循良事，都被先生古锦收”，正可以借来赞誉陈衍搜诗评诗的雅好及为构建诗歌史所立下的功绩。

第三节 “歧而二之，即已误矣”

陈衍的这一部《诗话》富于理性精神和朴学精神，富于集大成之功和地域色彩。

首先说理性精神，如本文开头所述，陈衍的《诗话》，既继承了古代诗论的品藻形式，又有所突破，它更富于理性思辨。这种思辨特色实际上是诗歌批评从诗话这种古老的形式向现代诗论的过渡和演变。陈庆元先生在谈到《诗话》时说它“虽然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形式，但和传统的三言两语的评点式诗话已经不完全相同，陈衍的诗话更注意专题性，更注意论述的条理和文字内在的逻辑关系”。^[19]陈先生以《诗话》卷23中论钟惺、谭元春《诗归》的两条为例，认为这两条“实际上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论文”。这两条文字多达4000余字，先批评钟、谭二人所选《诗归》中的点评以传统的三言两语的形式解不出诗的妙处，再以近代人的眼光，很有条理地解出诗中蕴含的理趣和情趣，解出了唐诗内在的逻辑性。如《诗归》中所选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泉》诗中有一句“天清风雨闻”，谭元春评为“瀑布诗此是绝唱矣，进此一想则有可知不可言之妙。”陈衍批评道：“夫天清本不应有风雨，而闻风雨，自是瀑布，有何不可言之妙？”他破除了谭评中的神秘感，以生活的逻辑一解，使诗意豁然而通。

又如陈衍以近代人的时空观念，解开了钟、谭《诗归》中解不开的诗意，理清了杜甫诗歌形象中的逻辑思维。先说空间，杜诗《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云：“山豁何时断？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验鸟随舟。”钟惺评为“写舟行奇幻入

神”。陈衍批评“奇幻”二字说得很玄虚，“案此四句，写景之妙，心中实有体验，笔下实有工夫，非奇幻之谓也。盖江平水缓，泛舟不觉其流，忽见有山豁然乃觉之。于是视其岸，而岸改矣。何以知之？岸上之花改也。仰观其鸟，而鸟不改，始悟舟行鸟飞，相随之故，而其实皆江平疑不肯流误之也。此诗之妙，全在第二句点出眼睛。”经陈衍这样一评，四句诗意中的空间观念明白地显现出来，这种空间是立体的，水平之面是江流岸改，而上下之面则是鸟飞舟行，这一切并不“奇幻”，完全是日常生活中的时空逻辑，是一种逻辑之美。陈衍紧接着又以另一首杜诗写“江最不平最肯流者”的《放船》为例进行比较：“送客苍溪县，山寒雨不开。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船廻。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陈衍的评语是“此首最妙在第三联，写下水船其去如箭之状，亦借两岸之峰峦橘柚形容之。工夫在一写过去，一写未来。过去者初未留神，迨见有一片青苍之色，始想是峰峦，而惜其已过矣，于是留神未来者，又见远远一片黄色，揣想之，知其为橘柚也。然此首直说易解，非如前者于不流中说流也。改岸之改，从《左传》‘服改矣’来，改岸随舟，又从佛家舟行岸行之说来。”以上两首诗，一是“江平不肯流”，一是“江最不平最肯流者”，两相比较，衬出美学中动静的辩证法，今有专门的学科为比较文学，陈衍这里正是在进行这种异同的比较。

其次《诗话》明显受到朴学的影响，陈衍本身是朴学大师，他继承乾嘉学派的主张，认为治学必先从文字、音韵、训诂等考据学开始，必先从经史之学开始。陈衍主张，这种考据之学应与词章之学（相当于今之文学），兼而治之。以上一段所引杜甫《放船》一诗中的“稍知花改岸”中的“改”字，陈衍的评语是：“改岸之‘改’从《左传》‘服改矣’来”，这一典故，来自《左

传·成公三年》：“齐侯朝于晋……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韩厥曰：‘君知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朴学家总是从研究经书扩大到研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乃至宗教教义等等，这个典故中的“改岸随舟”又与佛理中的箴言“舟行岸也行”的玄意相吻合。

陈衍曾在《复章太炎书》中说：“窃叹区区旧学，考据词章数千年无能兼者，歧而二之，即已误矣。”陈衍主张将朴学的考据实证与文学的词章兼而治之，他认为将二者分开是错误的。所以陈衍将训诂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山川风物、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他无论作诗还是评诗，都离不开朴学实证。陈衍的这一部《诗话》，博采众长，少有门户之见，所选评诗歌不避各派不同旨趣和观点，可谓是一部集大成的《诗话》，它对唐宋派、魏晋派等不同流派的诗歌，均能加以收录和品评，并给以公正的肯定。

朴学的精神既强调实证又强调经世致用，治这种质朴之学，是为了为我所用，陈衍身当近代，对于当时的西风东渐所带来的新诗料，能顺应历史的潮流，不排斥而兼收并蓄。如《诗话》卷15中评严复的弟子侯毅，他游学英伦后，采用西方谚语入诗：“荒庭倚树真亡我，白日持灯不见人”，陈衍评曰：“‘白日持灯’为西人骂世语，谓碌碌者看不见也。”《诗话》接着说：

君刊有《说理杂诗》四十首，自跋有云：“四十首所言，大抵拾古今人唾余，惟第十一、十四、十五及三十二四首，为所臆造”余最取十四、十五二首，以为传声者浪，传光者以太，夫人知之矣。蜃市楼台，光何自传？无线电音，声何自传？则别有无形之浪也。人之心思智慧，万有不齐，所谓不同如其面，虽覩面而相隔若山河矣。然设有两人焉，其智慧之比例，无几微不相等者，则此人之心思虽不言，而彼人

可以喻，所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所谓目击道存，皆非妄语也。古人梦寐相感，啮指通诚之类，则心浪之力量过人，足以远达，而受感者实心与相印也。君诗云：“脑府孕其灵，动荡构思意。积浪传八方，万物供驱制。触类成感应，离电同其致。至诚开金石，前贤岂吾戏？心浪或凝郁，历久未易散。推移流大宇，托物时隐见。尘心骇非常，万象况能幻。鬼神六合外，圣人存不论。”疑始尚有《题王氏姑母小照》、《纪梦篇》两诗，间得香山、东野真挚处，篇长未录。^[20]

由上可知，陈衍对于西学有浓厚的吸收欲望，虽不能一时通透透彻，甚至说得不伦不类，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兼通中外，融传统与西方于一炉，应该说这种方向是正确的，是近代人应有的兼收并蓄的胸怀。

清代乾嘉以后朴学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明道救世”，陈衍提倡将考据与诗歌结合起来的精神同样是“入世”的。所以，《诗话》评诗总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以描绘故乡生活的诗句为例，除了卷一中评论福建诗人们结诗社时所创作的《至闽示同社诸子》等诗歌已如前述之外，还可举出描写闽中习俗与风光的例子。如写家人寄居神州陶江力氏庐时的生活：“楞苦高处瞰山村，邱壑松篁此最尊。桶水分江登石级，爨烟绕舍闭重门。峰峦隐见占晴雨，池馆经过怗梦魂。曾是母兄偕隐地，于陵来灌桔槔园。”又如记二兄陈豫旅食福建屏南时当地景色的句子：“千年奇境僻未著，当无蜀道若是班。”《诗话》中这些钟爱家乡的画面常常跃然纸上，令人神往。

朴学的“明道救世”，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容的第一性以及内容和形式的有机融合。例如《诗话》收录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黄遵宪、林旭这些近代民主革命家的诗篇，真实地道出了他们驾驭时政的胸怀和忧时伤世的心境以及他们高贵的品格。正如

钱仲联先生所评：

先生之论诗，以为道咸以降，丧乱云旆，身丁变风变雅以近于诗亡之会，故其选之者，无异于尼父之删诗，盖有感于诗与时世相关之切而云然，其所见为先立乎其大。^[22]

由此可见，“同光体”诗歌虽然较重形式，但并非没有内容，虽较保守，但并不完全落伍。陈衍认为，作诗靠的是真实的“怀抱”、“道理”、“本领”，是一种胸怀与品格，而不是靠“一二虚实字”这些技巧便能奏效的，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融合。如梁启超的诗句：“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风雨吾庐旧啸歌，故人天末意如何？”“急难风义今人少，伤世文章古恨多。”“入骨酸风尽日吹，那堪念乱更伤离。九洲无地容伸脚，一盞和花且祭诗。”陈衍对这些诗歌的评语是：“以上十首，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梁启超自戊戌政变后侨居日本，致力于实现君主立宪的梦想，走虚君共和之路，但孙中山等革命派不予认同，国内则“风雨吾庐”“入骨酸风尽日吹”，真个是“九洲无地容伸脚”。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气质，陈衍的评论是“余由噉谷识梁任公，当时任公刚弱冠，见者疑为贾长沙、陆宣公、苏长公复生”，把梁启超和著名的《过秦论》作者贾谊及唐代指陈时弊的陆贽等人相比，有此胸怀才能有此诗歌，光有技巧是不能“自诧能事”的。

闽人林学衡在他的《丽白楼诗话》中说：“清戊戌维新，迄于民国，远沿五口通商之旧，近经辛亥与丁卯革命之变，文物典章，几于空前，生活之因革，虽或矛盾杂陈，要其于人情与风俗之推移，实为有史以来之创局。”^[23]研究陈衍的这一部正处于这样一个急剧变革时代的《诗话》，对于思考中国近、现代诗歌乃至文学理论中的诸多问题都会有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与引文出处：

[1] 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2005年8月；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2] 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第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3] 同 [2]，第6页。

[4] 同 [2]。

[5] 同 [2]。

[6] 同 [2]，第9页。

[7] 同 [2]，第8页。

[8] 陈庆元：《诗词研究论集》第299~300页，巴蜀书社，1998年9月，成都。

[9] 同 [2]，第1057~1058页。

[10] 同 [2]，第163页。

[11] 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12] 同 [2]，第1073页。

[13] 同 [2]，第217页。

[14]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第43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15] 《汉书·食货志》。

[16] 同 [2]，第16页。

[17] 同 [2]，第18~19页。

[18] 同 [2]，第17页。

[19] 同 [8] 第309页。

[20] 同 [2]，第217页。

[21] 同 [2]，第20~21页。

[22] 同 [2]，第1页。

[23] 同 [8] 第309页。

后 记

年青时读陆游的《沈园二首》，总是在叹赏“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等妙句的同时，也激赏陈衍的妙评：“无此绝等伤心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然而，当陈庆元先生建议我选陈衍为研究课题时，我却犹豫了一番，“同光体”诗歌以“生涩奥衍”和“清苍幽峭”为特点，陈衍作品的艰深不时令我生畏。是陈老师的关爱和教诲，使我决心涉足对这位曾经倔强地坚守于“荒寒之路”的同乡先贤的研究之中。陈衍诗歌与学问的博大精深，令我这部评传显露出自己的才疏学浅。现在书稿已贸然推出，对于其中的错误与疏漏，只有真诚地祈盼着方家们的批评指正了。

本书得以完稿，首先归功于陈庆元先生的悉心指导，他为我匡正纠谬，赐我以序文，令我汗颜无地。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闽江学院的张帆教授、刘建萍教授、福州市文联副主席林公武先生等均热情提供资料和指点，以上师友的热情帮助令我永远无法

忘怀。一年多来，本书传主的曾孙陈动先生一直给我以无私的帮助，提供珍藏字画。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旭副社长等对本书的出版予以热情的支持。对于这一切，都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是为后记。

林东源于福州象园永同昌公寓

2006年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坚守在荒寒之路：陈衍评传/林东源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12
ISBN 7-5334-4564-3

I. 坚 II. 林… III. 陈衍 (1856~1937) —
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6151 号

坚守在荒寒之路

林东源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25592 83726971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350005)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25 印张 224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34-4564-3/K·119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北不可見其西可見其南上隱之可見
日出下作而有愛氣紅蒸若薄雲日大異如
車輪亦能明見全神將昇之頃紅光橫射
幾百里頃刻之間雲霞變色凡紅土物皆上
並者高下之象西北皆有之山止合有
後名瑞如也奇變交次象下有龍潭瀑布
光姓余於水堂也



責任編輯：楊青楚 封面設計：李凱聞 書名題署：趙玉林

